



# 小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八 2023.04

在萨尔图的原野上 | 非虚构图书馆

刘天《我无法再欣赏任何一条口号式的女性向广告》 | 专栏

案毅《给我一段仁爱路》 | 24小时文学聚会

张海律《在冰箱般的首都寻找古拉格》 | 生活亲历者





## 小 说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05 给我一段仁爱路 案毅  
第二回 | P11 被选中的静止 刘宛照  
故事群岛 | P21 兔子测试 萨曼莎·米尔斯  
P31 摩天大楼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 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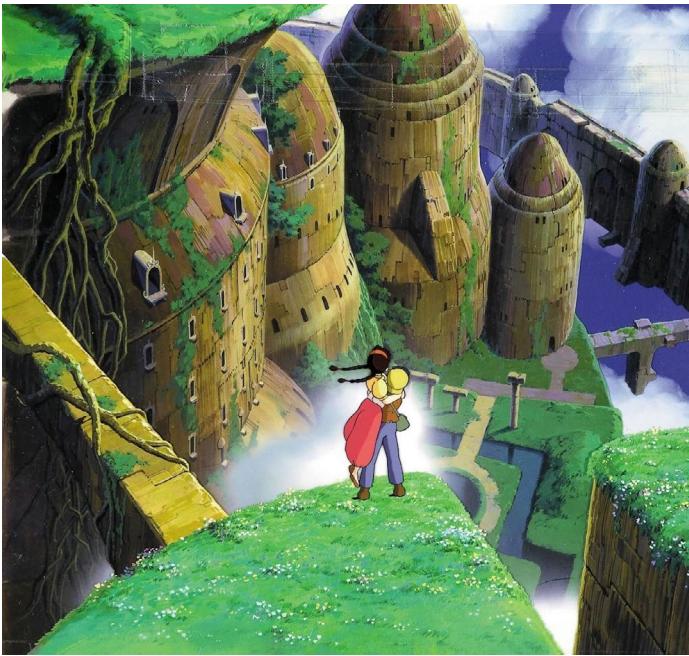
非虚构图书馆 | P39 这份写于 20 年前的大庆回忆录，如何被看见？好奇心日报  
P49 去萨尔图 /  
P55 这我个演员走下了舞台 /  
P63 去廊坊 查滨华、杨瑞松  
田野中国 | P71 赵捷，通往权威之路 伊险峰  
局外人 | P87 蟹家大院 Christopher St. Cavish

## 档 案

Newsletter | P93 战争进入第二年，俄罗斯与世界产生了技术隔离 张依依  
P99 气候问题迫在眉睫，抗议行为有用吗？ Snufkin  
发现经典 | P105 罗贝托·波拉尼奥

## 专 栏

斯嘉蒂的眼睛 | P115 我无法再欣赏任何一条口号式的女性向广告 刘天  
接力访问 | P119 029 静远：发起写作计划之后，我成了一个“入侵者” /  
P123 030 金特：用文学炸药毁灭那个腐朽的世界 /  
P127 031 阮阮：优惠券薅太多，我就发起了卫生巾捐助 /  
P131 032 Wen：进行一场有公共话题的聊天就那么难吗？ /  
P135 033 冯俊华：你一个人已经没办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  
P139 034 一娃：这里最大型的表演，轮不到艺术家来做 /  
P143 035 滕宇堃：提问“我们该往何处去”之后 /  
P147 036 津一：为了更完整地理解别人，她决定先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 杨樱



题图为电影《天空之城》(1986)剧照

## 小鸟回答 Vol.28

### 小鸟 | 小鸟回答

做我们高兴的事，做有力量的事

一年了。

i

说点什么？

我们被告知，不得评论。

ii

乔姆斯基

自从那个 ChatGPT 出台，老男人们又“未来已来”了。他们永远对马斯克的火箭、任何一种机器人还有贾跃亭的 PPT 没有丝毫抵抗力。你还记得他们恐惧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吗？他们假装思考人类命运，再次表达了惊异和惊慌，其实就是哀嚎的变体；他们假装深邃，其实又贪婪又恐惧。

乔姆斯基和合作伙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机器学习的核心是描述和预测；它没有提出任何因果机制或物理定律。当然，任何人类式的解释都不一定正确；我们会犯错。但这正是思考的一部分：要追求正确，就必须有可能出错。”

必须有人不是永远正确。

iii

查女士和杨先生

他们是这一个月“非虚构图书馆”的作者。查滨华女士 82 岁，杨瑞松先生 85 岁。在 2019 年的秋天，我们曾经去南京小汤山采访过他们。他们在退休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去了二十七个国家，为自己出版了二十几本小书——游记、回忆录、画册、摄影集、书信日记选。在三年疫情中，尽管生活在恐惧和闭塞之中，他们还是写了最新的组文字：廊坊回忆录。

两位 1962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去大庆十年，廊坊十几年，这是在石油部门；然后去南京建筑设计部门；然后退休，开始他们的旅行和文学生涯。他们给我们以

启示：每个人都丰富得如同整个宇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安素编辑想为他们出书，于是我们一起去拜访两位老人。

他们说，八十岁以后，健康有如断崖，问题挨个找上门来。

他们说，你们知道这疫情会专门找老年人的麻烦。

他们说，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用电脑，五笔字型拆字都忘了，要重新学起来。

他们在小汤山的书房里摆满了他们自己印的书，说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展览。

他们说，你们能来真好，就是来得有点晚。

iv

夜报读者

查女士和杨先生说得对。那病专门找老年人的麻烦。

与一位还在报业从事相关工作的人聊天。他说，某晚报发行量又创了新低。问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好多读者都死了啊。

真是悲伤。

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春天没有报纸，老人们发现不读报也能获得信息，七八十岁，他们用起手机来已经很熟练了。另一个是往年大征订的四季度，很多小区还不让外人进入。

哪一个都让人悲伤。

v

金特

每个人都丰富得如同整个宇宙。“接力访问”在 3 月初访了写小说的金特。他说：哪有什么小人物，我最讨厌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这种说法，没有小人物，都是大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精彩的大宇宙。所以，金特的小说里上来一个人就思考，金特替他们思考，如果逮住机会就安排他们说出来，没机会就安排他们“想”。

他就想写知识分子，他说这是他的困境——他总是写超出他自己生活经验的东西。比如知识分子，总是控制不了自己要写他们，写他们各种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我总觉得中国文学应该还是要把泛政治性的东西容纳进去。干涉性的。我觉得已经到时候了，否则我们当代汉语言文学就不会真正成长，真正发生成长”。

如果有一个人叫“作家自觉”，这个就是。作家，就应该想着这事啊。而不是去俄罗斯拿个罔顾左右的奖开个公众号做做怪相儿子处女作直接发《收获》还要上个澎湃新闻之类的吧。

vi

波拉尼奥

但我们也劝金特：你不一定通过知识分子来写啊，你看波拉尼奥，写俄罗斯黑社会，写色情片演员，写啥最后都是在写那个独裁者，揭露他，恨他，诅咒他。作家啊，就应该想着这事啊。

波拉尼奥多迷人啊。四十岁开始写小说，写十年，写到五十岁，输掉肝输掉生命，但赢得永生。如果他活着，是七十岁。四月二十八日是出生纪念日，七月还有他的去世二十周年纪念日。

我们必须把他的小说放在最隆重的地方推荐给大家。

vii

接力访问的所有人

我们就想，每个接力访问的人，他们都跟波拉尼奥笔下的那些人一样，管他是黑社会的还是拍色情片的，你不要触碰我，只要触碰到，就是无边无际的愤怒和忧伤，就是对极权政府无时无刻的控诉。别放过任何机会，要让自己振奋起来。做我们高兴的事，做有力量的事，做永远让他们望尘莫及的事。

viii

小鸟要找一位研究助理

我们正在找一位研究助理，与我们一起开拓“田野中国”这个栏目。总的来说，工作内容是发现合适的作者和研究者，与他们商量合适的选题，共同完成整个记录的流程。小鸟愿意提供适当的薪水和关于公共写作、非虚构写作力所能及的经验。如

果自己也有写作的计划，那是加分项。

招聘条件是：

- 1、需要有一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
- 2、有田野经验者优先。
- 3、对公共写作有兴趣者优先
- 4、如果愿意了解一下小鸟更好，至少你得看看“田野中国”这个栏目。
- 5、工作地点不限。
- 6、这工作要求自主性和行动力。我们希望你是合作者，不是下属。
- 7、如果有应聘意愿，请发邮件和简历至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另外，请在邮件正文至少说一个你认为适合小鸟的“田野中国”选题。
- 8、其他问题面议。我们办公室在上海。

ix

## 本月目录和封面

卷二十七里有一篇非虚构投稿，《四个离开俄罗斯的年轻人》，作者之一是刘天。聊了几句之后发现，刘天在当年的好奇心研究所短暂实习过。看她平时写的东西，有不一样的人类观察热情。于是就有了这一卷的《我无法再欣赏任何一条口号式的女性向广告》。这将是小鸟开设的新专栏，每月更新。

“24 小时文学聚会”繁荣了一点，本卷有两篇我们认为有趣的稿子出现。一篇《给我一段仁爱路》，来自武汉的爱情小说；一篇《被选中的静止》，来自刘宛照，这是她尝试的第一个短篇，你可能还记得她之前为小鸟写的中篇《破地儿》，一个讲述校园暴力的故事。

Chris St Cavish 开始写他第二个写作项目，一系列和面有关的人物故事。他为了探索中国不同地方的面去了很多地方，面是他了解这个国家多样性的切口之一。本卷开始，我们双月连载一篇，第一篇是上海的蟹黄面。

“接力访谈”里会出现更多面孔。

这一卷的封面小鸟是斑旋木雀。

x

## 联系我们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邮件至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

一年了。“当所有选项都被拿走的时候，你依然有无限自由的可能”。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Lysander Yuen](#) on Unsplash

## 小说

# 给我一段仁爱路

案毅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太久了，太迟了，  
我无法继续在废墟上等待你了。

三线建设起始于 1964 年，牵涉到东西十余个省份，是当时的共和国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临时状态而采取的一项全国性举措。此后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三线建设从兴起、发展到停滞、落幕，那场在工人们读报，跳舞，看电影之际总不时谈起的核子热战却并未降临，取而代之的是工厂的搬迁、破产或改制，人们的返乡或驻留，老迈与衰败，以及一片片纯粹、如同暗室的废墟。曾经的车库、宿舍、厂房、镶满墨绿瓷砖的文化厅与挂有领袖画像的商店变得无人踏足，在山中开凿的隧道成为蝙蝠的巢穴，藤蔓爬满了红砖，远远望去像是古代的塔楼与碉堡，最终，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动员话语湮没在偏僻的深山峡谷中，沦为历史一个沉寂的声部。

“阳台，阁楼，老虎窗，屏风，庭院，街巷，电线杆，水磨石地板……这些对你意味着什么？是住所，家庭，做客的地点，还是某片使你安心，如同教堂的风景？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潜在的废墟。”2007 年，在一封寄给远在大连的朋友的信中，罗歇这样写道，“我意识到，世界或许是一大片废墟的集合体。这些日子，每当我乘轮渡过江，看见那些陈旧、像蜘蛛网般的平房区，心中总是想到废墟二字。长江码头边用铁链相连的船只，公园中的鸽子屋，沙湖畔闪烁着暖光的小灯，这些都会或迟或早地变成废墟，然后废墟上将出现新的空间，被用作全然不同的目的，却也逃不脱变成废墟的前景。武汉就像是一层摞一层，相互交叠着的废墟，一条串联着无数废墟的锁链。”在信的最后，从废墟这个点出发，他简要地提及了三线建设的历史和去寻访三线建设遗迹的愿望，并表示，这将是他在未来几年最关心的事宜。

如果不理解他和这位朋友的关系，很容易将这封信理解为一次单纯的思想交流。但对于写信与收信的双方来说，它实际上是一场绝望的告别。收信人——毕小妮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与罗歇保持着密友和接近恋人的关系。信中提到的所有地点与景象，都是他们一同走过的场所，而这些在此刻的罗歇眼中，“不过都是些废墟而已。”这座长江边的城市

已然是一股隐晦的黑浪，席卷了他的身心，粮道街、珞东路、卓刀泉，这些地名被他如同钉子般摁进了这封信里，宣泄着悲痛与迟来的决心：他无法继续在废墟上等待了。

差不多十五年后，这封信被夹在出版于 2009 年的《野棕榈》中，通过孔夫子网，以旧书售卖的形式抵达到居住于马房山的艾幸手中。此时是七月，她正经历着一个迷宫般的夏天。几乎每一天，她都彻夜难眠。睡不着的时候，她就骑自行车到凌波门，沿着东湖散步。尽管周遭全是小摊贩和跳水夜泳的人，她仍然觉得七月夜里的凌波门有一种古怪的气息，像是夏天走投无路，索性令黏浊的死亡与躁郁的热情交织在了一起。这股气息催逼着她不停地走，既不回头也不抬头，因为周遭的一切都在腐蚀着：长椅、影子、栈桥，还有那轮月亮。她一个劲地走，用手臂和脸庞去体会汗水，去体会那埋葬了溺水者、意味着死亡与衰朽的湖水腥味，好像如此，她就能逃出这个迷宫般的夏天。

然而她办不到。在某天的日记中，她写道：我还能爱上任何人吗？我对他人抱有的感情只会是对孩子的疼爱、关照和保护吗？我对爱情的渴望难道只是出于对岁月流逝的恐惧吗？我难道不是一直在复制那些“我爱他，他不爱我”的俗套故事吗？她陷在了这一连串的疑问中。就这样，在一个困惑与忧郁的黄昏，在一个灿烂、像泡沫一样的黄昏（这种黄昏在七月的武汉并不常见，尤其在这样一个阴雨连绵的七月），她翻开了《野棕榈》，在“我选择悲伤”的这一页，发现了这封十余年间兜兜转转、最终又回到江城的信。

她一眼就认出了信中废墟的含义，并联想到了许多东西九岁时的房间，倒闭的度假酒店，电线杂乱的楼道口，大棚子，菜市场，已被武汉天地掩埋的推拿馆与学校，那些变动不居的当代之物。同时，出于某种共鸣，她也觉察到了信中那潜藏着的绝望之情：太久了，太迟了，我无法继续在废墟上等待你了。看来写信人的情况与她正好相反，毕竟一直以来，她始终擅长扮演一种等待的角色。在这天的黄昏，她反复地阅读这封信，并放任自己回到过去的几年当中，从紫藤花廊走到广场中央的雕塑，从民国的琉璃瓦建筑走到高架桥边的树林，从剧团的房间走到波光粼粼的东门，最后，她惊讶地发现，这一切，不过是“潜在的、当下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废墟。”

借助外部的文本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对她来说并不是件稀奇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再熟悉不过了。早在 2015 年，她二十三岁那年，在导师李斯永的提倡下（他告诉她要让理论活过来，就像用木柴烧火一样），她对几组概念就像对自己食指上的茧一般了然于心。首先是社会认同理论。意识到自己分属于特定的群体，意识到群体成员身份为她带来的情感价值，分为类化、认同、比较三个阶段，包括地域、文化、阶层、族群等认同。她指涉这一理论的方式格外简单。那是一个雨天。路灯射在雨水潺潺的车窗上，像是老虎的斑纹。她坐在后排，出神地盯着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后视镜里不时有刺眼的远光闪过。她想象副驾上柳生明的后脑勺是以怎样的姿势倚在靠枕上。类化、认同、比较。她自愿地成为了他的读者，并默默地将他视作自己唯一的读者。

其次是那一本出版于 2003 年的书上的女性主义理论。这套理论的核心在于是位置与结构而非本质与还原主义的问题。携带着这套框架思维，她参与到剧团对一出经典剧目的改编中。在那个苍白、漏风的房间里，她与另一个女人（她已记不清名字，只记得她那夸张的月形耳环，还有周围人发呆的神情）争论：女主角不应当变成浮尸漂浮在溪流中，女人不是男人的时钟，要让那场血腥仪式的位置颠倒过来。两天后，她向这个女人道歉，请她原谅当时的“过于激动和用词不当”。

但剧团的经历不是只有争论，冗长的探讨，互不相让的立场，还有一种似乎触手可及的爱情。一次排练结束后，她和柳生明坐在舞台的边沿，一面用脚背蹭深红色的幕布，一面漫无边际地聊天，比如先锋派，实验，嵌套回环什么的。不知道是哪句话引发了他的回忆，他突然谈起了少年时期的足球队，逃学和早退，发生在厕所的暴力事件（斗殴的人的尖叫像是来自远方的呐喊），还有悬崖般的快乐：他在旅馆目击了一次麻果交易。麻果是什么？她问他。毒品，他说。

她觉得他看起来脆弱，干净，胆怯，疑惑他怎么会参与到这些事件当中呢？为什么这些又会令他感到快乐呢？但她并没有问出这些话。当时，占据着她的内心的是另一种喜悦，像新雪般的喜悦。大多数排练结束后，他们都会结伴离开礼堂，穿过那片秋天的杉树林子，在湖边分手。她总是幻想自己听见了叶脉开裂的声响，并在心里默念一句诗：这里发生过战争。有时也会约着去酒吧喝一杯。不过他们两个人当时都太穷了，喝不起什么像样的酒。此外，其实他并不喜欢喝酒，只是享受这种坐在某个地方干着某事的感觉，就像小孩模仿大人们的步伐。幸运的是，她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一点，不然她在那会儿一定会愧疚得要死，因为“喝一杯”的提议总是由她发出的。也是在那段时期，他俩认识了鲁遥和白先。

毕竟一直以来，她始终擅长扮演一种等待的角色。

这两个人在外形上看来几乎是对双胞胎，一样的瘦削，一样的窄额头和短发，一样的粗喉结，一样的圆框眼镜，但在爱好和性格上却截然相反。鲁遥喜欢看兵击电影，关注国际新闻，懂得绘画和一丁点艺术史，常常想要说些一鸣惊人的聪明话；白先则总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看上去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对画画也是一窍不通，只在私底下写些没多少关注度的都市怪谈（使徒，动物园，深渊，失踪，金发的人皮怪物，微缩核战和电子刑场之类的）。他们和他俩都是一个学校的，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因此打过几次照面后，就慢慢熟络了起来。

回忆起四人行的那段日子，她总倾向于将其想象为一种娄烨风格的电影，一段充斥了摇晃、长曝光和闪回的影像。她有时也会把这称作她最宁静的日子，没有焦虑，没有临近前夕似的不安，没有日后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似的忧郁。他们，有时是三个人，有时是四个人，一起去过博物馆，美术馆，洪山宝塔（白先说这座塔让他想要写一则关于塔砖内是血肉与白骨的怪谈），东湖，一座隐蔽在面馆中的教堂，还有长江边那些陈旧、黑蒙蒙的窄巷子。他们曾在那些逼仄、潮热的巷子中赛跑，险些摔得一塌糊涂，这一段她总是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使她联想到雨夜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由她参与改编的剧目在那段时期也顺利演出了。不出意外，只有一小部分是按照她的意见修改的，即剧目的高潮：女主角手持匕首，来到舞台中央，准备挖出自己的心脏，但在犹豫了几秒钟后，高声说，她不是任何人的绿眼睛女郎，不是任何人的时钟，不是任何人的奇迹与救赎，她决定此后只为自己而活，然后，她将匕首掷向了舞台的柱子。

演出完成后，在庆功宴上，她想过向柳生明表达爱意，但最终却退缩了，只是在某个时刻捏了捏他的手而已。这很自然，她想，只是同志和伙伴的感谢，而不是其他涉及危险的情爱关系的表现。然而情况很快就超出了她的预料。威胁不是来自于柳生明，而是鲁遥。就在演出结束后的几天，鲁遥单独约她出门，向她表白，提出想要和她单独过夜的愿望。起初，她大吃一惊，很快又陷入了巨大的彷徨，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纯粹的愤怒。她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不全是因为他的措辞和轻佻的态度。

后来，在几次和高中时代好友的通电话中，她将之描述为一种背叛。是对友谊的背叛吗？差不多，她说。但其实，在她的内心深处，愤怒的更多的是男人的位置。好像只要坐到了某个位置，男人就拥有了命令和指手画脚的权力，能直白地说想和你睡觉，做爱。这算什么呢？比起借用书中的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她更偏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

自然，四人行从此也就土崩瓦解了。柳生明还与白先和鲁遥保持着联系，而她则淡了出去，就像影片转场时所用的视觉技巧。在这段时期，她逐渐发展出她自己的理论，因为爱情的阴霾，或者说爱情这道疮伤里的脓血，已经开始弥散在她的身上：柳生明不再和她散步，只是偶尔回复她的消息，她却几乎是片刻不停地想着柳生明，仿佛黑色小说里的侦探或杀手，把自己锁在一个充满了照片、记号笔痕迹和灯泡的房间，费尽心思想要找寻到一丝确凿的线索。他是否爱她，在这之前并不算一个问题，但如今却像雪崩一样溃落下来。

她想，失眠的毛病就是从这时候染上的。手机的提示音常常让她迷失在可怕的患得患失中。她开始重新试着写作。不是剧团意义上的集体写作，而是私密的写作。与此同时，柳生明在剧团留下的文本就像镜子，像金字塔，像从历史中爆破出来的单子：在这之中，是否有他爱她的证据，有她所相信的真理。她对私事讳莫如深的习惯，使得剧团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只清楚她的活力和热情都日益消逝了。她没日没夜地写，连学业都耽误了，尝试着在书写中建构出她的爱情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他对她若即若离，为什么他有时送她花，有时却躲着她。在一出关于杀手，名叫《谋杀上海》的剧目中（她几乎没有参与入任何阶段的创作流程），她提出要加入一个片段：这个总是戴着黑色皮帽的男杀手迷失在午夜的上海，像着魔了般念叨着上海，上海，上海……他跌倒，费劲地用四肢从湿冷的街道上爬起来，仿佛被抽了筋的蜈蚣。暗红的灯笼落到他湿漉漉的身上。突然，他大声地喊，上海，伤害！上海，伤害！随后，他拔出腰间的刀，疯狂地凿挖一面褐色的墙，好像用这种方式就能给上海带来伤害。

这个提议没有被通过。因为这部剧目更多的是想要通过男人刺杀名为“上海”的妓女的过程，讲述现代都市对个体潜移默化的腐蚀与异化，不是真的要杀掉上海这座城市，或者，真的塑造出一个疯子。而她的理论也遭遇了瓶颈。事实上，这一切几乎只关于两个问题：他是否爱她？既然她已经爱他了，那么他是否也需要去爱她？

答案是明确的，她的心灵却无法承受这些。几年以后，回顾这些天真，笨拙的书写时，她称之为堕落与失败的过程。这种论断颇具宿命论的色彩。尽管一切都为时已晚，在那出由香港人创作、改编自梁祝故事的剧目演出后，她还是选择退出了剧团，不再与柳生明来往。关于那出戏，她仅有的印象是十八相送：再会讲了十遍，嫌夜晚太短（多么像此前的她和他转了又转，循环不止的散步），以及一句台词：海中一对游龙，世上一双戏凤。

此后，事情开始朝天平的另一端倾斜，因为那时的她的确是破绽百出。与柳生明在剧组通宵谈话，散没有尽头的步的日子被李斯永的教导取代了。办公室里像螺旋楼梯的书架似乎为她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种落点，可是，不过是幻象而已。

李斯永的意图并不难察觉。他及时地满足了她被承认的渴望。他称赞她有多么漂亮，在微信上对她说一些暧昧、偶尔露骨的话和诗句，约她去电影院，全是些老套，但又包含着些许克制的把戏。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像鲁遥那次一样，感到难以置信的厌恶和反感。李斯永告诉她，时隔多年，他再一次能够一口气走完六层的楼梯来到办公室，他变得慷慨、耐心、宽容，开始注意到季节的转变，秋冬之交，风就像从绸缎变成了玻璃屑子。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她的爱慕。

我爱他，他不爱我。这种态势顷刻间得到了反转。她品尝到的是一种微妙的虚荣与报复的快感。她放任李斯永的殷勤举动，好像在这场游戏中，她才是主导的那个。当然，还有许多的诺言：学位，教职，前途……只要她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一切唾手可得，至于李斯永的婚姻阻碍，不过是“世俗的道德枷锁罢了”。

她把这一切都写了下来。书写是一种恶疾，一旦患上，就再也难以摆脱。她试图在书中找到答案：李斯永此刻的卑微和惺惺作态，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结果来的很快。穆旦的水流山石变成了一道又一道刻意为之的资格壁垒。看不到成功希望的李斯永变得挑剔、果断和恩威并重。那些日子，原本的博弈变成了精神上的折磨与恐惧。她养成了依赖药物入睡的习惯。而这些，她从没告诉过柳生明。某一天，在失眠和噩梦的交界点上，她发现自己第一次如此嫉妒柳生明，不只嫉妒他的冷漠，他的疏离，而且嫉妒他作为一个男人不需要应付李斯永的权利。

书写是一种恶疾，一旦患上，就再也难以摆脱。

就这样，在嫉妒的驱使下，她于 2017 年办理了休学，离开了武汉。

据她自己所说，在休学的日子里，她去过青海，福建，东北，还有隔着太平洋的日本；她做过义工，在大山里迷过路，和牧民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她说，降临在东北某个海港的雪景，就像是一出美好婚姻的终幕，而福建的海都太矮了，和青海被风压低的草场一般。日本的群山和神社都是倾斜的。也许是在东京，也许是在京都，她和另一个女人同床共眠。毫无疑问，另一个女人是日本女人，但也是个女同性恋。不过她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听着这个日本女人对她痛诉童年的伤痕和情爱的挫折（她并不懂日语，所以这些只能是她的猜测）。但不论在什么地方，她都酩酊大醉过。她这样描述那些日子：挥霍家里的积蓄，与他天各一方地共同睡去，以此缓解她“紧张兮兮的神经和腺体”。

显然，在这些旅行中，她没有踏足任何和三线建设相关的地带。那个时候的她是否知道三线建设也让人抱有疑问。但总之，在将精神状态调整得差不多以后，她回到了武汉。她认为，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热诚与激情，都慢慢顺着脊柱骨回到了身上。她有了“足够的心理效能”去应付一切。

这时已经是 2018 年，也是我认识她的年份，但并不是我参与到这个故事中的时间。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花园道附近的酒馆里，是在四月。那时的她看上去美丽、脆弱，又有某种男孩子气的坚韧，手腕上有一道啤酒盖形状的伤疤。我对她几乎一见钟情。我还记得，当时，她看了我一眼，夜晚就过去了一大半。

在那几个月里，我一直无偿地为一个谋杀者百科全书的编纂小组工作（因为我痴迷于侦探的角色）。我负责疯女人板块。这些女人发疯的原因各式各样：茉莉花，月亮，铁轨声，香水，毒打，杯子上的裂缝，一根头发；杀人的手法各式各样：下毒，棍击，手枪，绳索，煤气罐，纵火。她们有的杀了丈夫，有的杀了自己和孩子，还有一些散发出让人颤抖的邪恶气质——杀掉了无辜的陌生人。我很快就厌倦了这些，开始不断地在闲暇时想着艾幸，想着她的马尾辫，她的眼睛，她的股男孩子气。

而我不知道的是，这些日子将成为她罕有的平静时光。回到武汉差不多三个星期后，柳生明找到了她。这一次，他诚恳地为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道歉。他平易近人地说，过去是他不对，他只是没有准备好而已。这么说，后来我问她，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喜欢他吗？她不置可否。看见柳生明放下他的傲慢（那曾经伤害过她的傲慢），她的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她无法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归咎于他——他什么都很好，只是不爱她而已；另一方面，她的心中有一种淡淡的宽慰，毕竟，她依然爱着他。这天，他们聊了聊剧团，学校里旧相识的事，可以称得上是相谈甚欢。最后，他带着些许的犹豫，问她是否愿意和他尝试一下。

答案自然是愿意。为什么不呢，她对我说。她像是站在了一片柔软的草地上，面对着无数让人心旷神怡的花丛，以往的痛苦，哀伤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承认——她找到了她的读者。

于是，就像《丐女》中的露丝，她没有丝毫顾虑地纵身一跃。

那之后的事情她从来没有主动告诉过我。她只跟我谈过那时候的感受：快乐与悲伤，纯粹的快乐与纯粹的悲伤，却不愿意说再多的细节。而这段恋情最终的结局，是柳生明去了柏林，她留在了武汉。那是在 2019 年。柳生明走后，我逐渐与她熟悉了起来。我时常邀请她出来散步，她并不拒绝。有一次，我对她说，你非常漂亮，像是一颗樱桃。得了吧，她说，别说这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她问我。我希望做个寻人的侦探，在废墟，瓦砾和档案局里翻找线索，你呢？我说。我？我希望做一座西北寺院的文保员，天天在那里守着那堆老房子，她说。挺好的，我说。那我问你，你想睡吗？她说。不，我说，不。别撒谎，她说。

事情是，我们最终没有做爱，她也在那时就陷入了她称之为迷宫的东西，我们只是维持着一同散步的关系。那年十二月的一天，她对我说（更像是自言自语），她想起了高中的日子。那时，她常常和朋友讨论物理考试最后一道电磁题的解法，比划左手和右手的那些法则，决心要在下一次月考中至少进步十分。十分，也许就是二十个排名。我们的生活不总是从一个决心抵达另一个决心吗？她说（更像是第一次书写）决心变得优秀，决心让分数好看起来，决心考上好大学，决心变成漂亮的大人，决心成为更好的人，却什么都没做好，只是周而复始地回到第一个决心。可是在十六岁时，我们哪里知道这些呀。我们惊讶于六月的黄昏，乌青与赤金交替的云朵，盯着墙上被风掀动的排名表直到晚自习结束，幻想一段脆弱、美妙的爱情降临。那些年的晚霞都是那么的生气勃勃，不像现在，只令我联想到死亡、颓废、破败……我们的生活难道是由一个个让步的决心构成的吗？

也许是的吧，我说。这天，我去了她家。我们一边喝酒，吃披萨，一边聊天。喝了大概三杯后，我忍不住好奇，问她，她和柳生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爱他，他不爱我罢了。好，我说。聊天结束后，我戴好帽子，呵着寒气（她喜欢在冬天里大开窗户，说这样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从她家离开。自那之后，我再次看见她要等到 2022 年的七月。

新冠封城期间，我发给她的消息，打给她的电话都没有回音，就像是在给大地写信。在那些抑郁、漫长的夜里，我迫切地觉得自己需要她的友谊，安慰和鼓励。但她像失踪了一样。这使我感到不安，来回地在房间里踱步，担心是否有什么我不知晓的灾难降临了。解封后，她打电话告诉我，她在一月的时候感染了病毒。啊，我说，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回应她。她没有在乎我的语塞，只是声音沙哑、疲惫地说，她之后会离开武汉，去另一个地方休息，也许就留在那里工作了。什么地方，我略带哽咽地问她。秘密，她说，还有，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络了。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很快，我就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待它：把它视作一次早晚来临的寻人工作。我擅长某种愚蠢的乐观跟逆来顺受，一向如此。我积极地投入到手头零散的案子中（这会儿我已经把寻人当成一门正经营生了），发展同在公共部门供职的旧相识的关系。开始很艰难，不论是寻找工人、孩童、丈夫、旧情人，还是赢得他人的信任与支持，学着像条执着的老狗一样，在江城里绕来绕去。总的来说，那对我而言是冒险的一年，是与以往的书斋生活截然对立的一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劳动的一年。

当我在这门行业步入正轨以后，有两桩案子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桩恰好与三线建设有关，这也是我再度卷入艾幸的故事的原因，但还是先从另一桩说起吧。那是一次潜伏，委托人是我朋友的妹妹。事情是这样的：她发布在社交软件的照片被一群男人在外网上用作意淫的材料。我花了大概三天的时间，找到了照片传出的源头。是一群自称猎人的人，他们在推特上曝光女人们的照片、信息，有时甚至是电话和住址，号召其他男人来一起羞辱、骚扰她们。他们还有一个内部的电报群聊房间。据他们在推特上的截图和配文，那里头是些“更劲爆的东西”，而入群的门槛是八十块钱和一张射屏照。

她在一月的时候感染了病毒。啊，我说，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回应她。

混进所谓的内部群并不难，也很容易就找到泄漏照片的人：一个名叫“DD”的账户。起初，我假扮成他们的同伙，活跃地在群里发言。这期间，有种现象十分奇怪：这些人多数时间都在自言自语，互不搭话，仅仅对着自己发送的女人照片进行空泛的意淫，像一群不可思议、由空心的阴茎构成的身体在数字空间里互不干扰地漂浮。一列怀揣着邪恶动机，水银色的电子阴茎舰队。我觉得他们几乎不是人，而是某场大战过后遗留下来的数据，关于阴茎、欲望和黑洞的数据。我尝试着和 DD 搭话，表示出对于他的“猎物”的浓厚兴趣。他这样描述他的性幻想（充斥了暴力和侵犯）：在荒郊野岭，在地下室，在公开场合，在地铁，在她的卧室里，他强迫她，令她屈辱的臣服，而他则重复不断地射精。

一天过后，我意识到这种搭话对我的调查毫无帮助，只是在促进他的欲望滋长，于是，

我转变了思路，另外注册一个账户，加入群聊，对 DD 表明，我是他的猎物的身边人。他的反应喜出望外。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也是她微信好友列表当中的一个，并且想干她很久了。”

这点线索给了找寻一个固定的锚点。我们运用排除法，即把她微信中的男性联系人分成四组，每隔一段时间针对不同的分组发送用软件处理过，仅有微小差异的照片，譬如耳环的形状，痣的位置，指甲的颜色，同时，我继续在电报上向他索要最新的照片，回应他的意淫请求，依据照片独特的特征判断他究竟属于哪个分组，接着再缩小范围，继续细分。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两个星期。最终，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她的大学学弟身上。

后续的对质，争纷，我没有参与。单从照片来看，那是一个普通，文质彬彬的男生，一个大学各种院系中再常见不过的男生，会在图书馆因为接热水时间到的锈味而烦恼，也是许许多多的空心阴茎中的一个。确定结果的那天下午，我久违地去了趟大智路，在京汉火车站附近站着抽了根烟。我想象，在那白绿相间的建筑里，我躲进了一个柜子，从门缝偷窥一群空心阴茎的聚会。他们正对着吊灯手淫。因为是想象，所以他们的每个动作都是慢镜头，像药丸在水杯中一点点地溶解、褪皮、下沉，最终沉到玻璃的底部，最终他们的脸变得一模一样，身体也变得一样的寒冷，僵硬，以至于溃解，如同遭受了致命的瘟疫。

很难说清这桩事件为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基于道德，也不是基于担忧。需要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野外的树丛中头一次窥视动物群，比如鬣狗们秘密的集体捕猎，而我与他们是同类。

第二桩是寻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它将我引向了三线建设与艾幸的交汇点。接到委托的时间是二二年的七月。当时，我刚参加完一场好朋友的婚礼，陷入了相信美满跟怀疑人性的分裂中。一方面，在做寻人工作的经历中，我在许多的酒店门口，公园和步行街，停在街边的车里见过毁于一旦的婚姻、男人和女人，通常男人是出于欲望，女人会留恋金钱，但两者都没剩多少尊严；另一方面，我打从心底的最深处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抱有一种美好的祝愿和希冀。婚礼结束后，在那个七月的傍晚，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边，隔着不太干净的玻璃观看江面上的晚霞。大团大团的云红到发黑，像在酝酿某场风暴，也像是一片燃烧着的珊瑚，我梦中干燥的礁石。房间里的冷气温度很低，在我的背后，有两个女生在聊天。我没有回头去看她们，仿佛在我身后的是两个幽灵，可我，我们所有人，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幽灵吗？

我一边思索着这些，一边眺望那熠熠生辉的晚霞，以及大片大片、在视觉中延伸着直到长江的草地。外头的空气里一定有某种变化将至的预兆，就像暴雨前的闷热和不安。忽然，一种属于岁月与孤独的忧郁俘获了我。我不无伤感地想到了以前的日子，想到了以前的旅行，爱情，友谊，学校生活，曾去过的花园和几座优雅、古老的建筑。从这些日子里，我一无所获，除了将某个人变作想象中的知己，利用想象中她的陪伴去抵抗生生不息的岁月浪潮。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正是在这时，我接到了那通关于寻找老人的委托的电话。

老人名叫王建军，年轻时曾在代号 3607 的军用缝纫机工厂参与生产，如今住在青山区，多数时间过着独居生活。他的身高是一米七二，左手上有一块烧伤的痕迹，走丢时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裤子，并未携带手机。在他家属的描述里，失踪前的一段日子，他常常打电话说中美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这场残酷、势不可挡的现代战争将在台湾海峡爆发，我们将在壮烈的牺牲后赢取伟大的胜利，完成祖国的统一，彻底终结美国的邪恶霸权，把红旗散布到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每个国家，他必须提前为之做好准备。他每天五点起床，围着小区跑步，以此“强身健体，好抵抗美国人的病毒”。

依照这些线索，我首先用了半天时间走遍了他家附近的每一个角落。我去了老人常去的推拿馆，麻将室，过早店，街边的象棋摊。人们说，关于他的出走没有印象，并称他平时是个清明，灵光，乐观的人，经常戴着一个绿色的棒球帽，一顶好像是这个年纪的人会选择的帽子，因为这是他的孙子送他的。他的精神和神智状态始终保持着稳定。这些话表明，他不会是一个因为痴呆或者痛苦而出走或自杀的人。在麻将室，老人的牌友提起了他针对战争的说辞。那天下午，军事频道谈到了台海关系，老人瞬间变得忧心忡忡，把一张牌在手里攥紧。主持人愤怒的语调（在我看来，在那些麻将室无尽的军事频道里，主持人总是愤怒的），引发了老人关于战争的预言。他把牌放到自动麻将桌上，用冷静的态度对所有人说，战争很快就要来临，我们要放弃幻想，调整状态，来迎接这场贸易战，能源战，海空战，生物战，信息战，总体战，以及可能的核战。

我想，这是一种奇特的谵妄。冷静，像冰和玻璃，缺乏激情，出于深思熟虑的谵妄。怀揣着这种想法，走在七月的武汉的街道，就像踩过一个个发烫、掉漆的萨克斯音孔，耳边充满了不和谐的音声。我看了一眼灰暗的天空。它似乎正在旋转，搅乱了上个世纪和此刻之间的电波通讯，记忆变得失真，过的战争想象进入其中，经历转码，输出为确凿的信念。

在之后更大范围的搜寻中，我发现，这种战争幻想不是老人一个人所独有。在青山区那

些稍显破旧的工厂旁，在一些往日工人分配住房的小区，在出租车司机和烧麦店老板的口中，战争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必然，它的到来只是早晚的区别而已，就像那场谣传了数个月、最终于二月爆发在东欧的冲突。战争是二十一世纪，是数字时代，是光荣、理想和正义的政治愿景的复苏。他们确信战争，只是以妥协的方式确信，更像是确信明天终会无可奈何地到来，而不是将其视为一起例外状态。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实如此。第三天，我走进了一家旧书店（在线索中断的时候，我总是会钻进旧书店里）。我看，随意堆放的书堆的顶上，有一本名叫《红鸟》的杂志。

可我，我们所有人，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幽灵吗？

不知为何，我在第一时间就被它吸引了。杂志的封面非常简陋，像我小时候在乡下看见的布告牌上的简笔画：一个线条构成的人坐在线条构成的船上，手里拿着一把锤子，眺望着画面另一端的山脉和田野。在那片景象中飞翔着几只红色的鸟。这些鸟环绕着红鸟二字，使人联想起红色的乌鸦。整个画面的结构有一种无力感，像是在鸟与人之间存在一段透明、漫长的距离，也像这个线条小人是在一座深渊的底部眺望那些不属于他的风景和动物。我翻开了它。

这是一本新左派的杂志。里头有出于善良愿景的技术讨论，有严肃却不合时宜的文艺批评，有关于农村、宿命和大地的小说。大部分都标明了转载，而剩下的那么几篇是否属于杂志编者和支持者们的原创也很可疑，因为我似乎在哪里读到过相近的观点。我翻阅着它，速度越来越快，直到看见那篇描述战争幻想的文章才慢下来。它与这个地带的隐蔽传闻不谋而合。

“战争将会消灭官僚主义与特权阶层，战争将会重塑断裂与连续，战争是死亡但在死亡以上，战争使人类成为人类，使生命成为生命，战争是亲密的友谊、团结的同志和纯粹的邪恶、纯粹的敌人，而战争是未来。让我们迎接未来吧。”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所使用的话术颇像二十一世纪开头那几年在论坛上风行的工业党。随后，它又引用上世纪两次大战的例子，来道明毁灭与希望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子，并将话头指向了“波澜壮阔的六十年代”。从这一部分开始，文章成为若干人的口述史：周丽是一位身高一米五九的女人，左脸有鲜明的胎记（令人不安的印记），在旧社会被父亲卖出去当童养媳，于六十年代偶然卷入了风波，并在短短几年后跻身高位；江晓，演员，曾在江苏的农村与她饰演的角色原型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她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场巨大的浪费；林森野，知识分子，在六七年的五月，他身处上海，他说，那一切都像地震，像陨石坠落时苍白的闪光；朱亚学，职业不详，他透露最多的信息是他迷恋着太阳，以及“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而在这些陌生的名字中，藏着我的当事人：王建军，三线建设的参与者。他在文章回忆了开凿隧道的记事，“就像一群瞎子在石头的大雨里摸着绳子往外逃”。我放下杂志，问坐在门廊上的老板，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老板扶了扶他的镜框，眼珠向上挑，盯着我。这种神色令我紧张，仿佛他是在疑虑什么，又或者是在酝酿敌意。这本杂志吗？《红鸟》？他说。是的，我说。

“是我放在这里的。”他不再看我，又扶了扶眼镜，不过这次是为了向下挪，“我是《红鸟》的负责人。”

突然之间，事情就有了意料之外的突破。我伪装自己的身份（一位“真正的”左派青年），请他说得更详细些。他便告诉我，那篇文章出自他的手笔。他用了很久的时间去寻找文章中出现的人，挫败、困惑、失望之感贯穿了那几年。他说，就像是勘测某条改造河流的形状，收录幽灵们旷日持久、沉默且危险的回声。至于战争，他并不相信，但在今天，“除了战争，我们这些人还能相信什么呢？相信博爱和包容吗？相信北京吗？还是相信成功的男人们？”因此，他不认为战争的幻想是被凭空召唤出来的。他只是起到了观察者和收集者的作用。慢慢地，他的话越来越多，像崩溃的水库一般，渐渐和文章跟杂志无关，充满了琐碎的悲伤和遭遇背叛与抛弃的无力。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在听一个死人说话，而他也不是在对我说话。他想要对话的人，早就忘记了他。彻彻底底的遗忘。我在他眼中，不过是另一个死人而已。我满怀耐心地坐在他旁边，一边听他说话，间或积极地说几句，一边凝望着黄昏的降临。那时，天空是灰色的，树和门面是灰色的，只有水银般的云中间有几缕光亮。我想，这死气沉沉的黄昏好像一个疲惫的证人。

终于，在许许多多的话以后，他谈到了三线建设和王建军。他说，这些人决心游历大陆，去探访曾有过的东西的遗迹。在他们这个年纪，决心总比勇气重要的多。何况这个时代方便得很，只需要一辆黑色的六座轿车，一张有效的驾照，两三个懂得使用网络、看得明白导航的人。合作，团结，对他们来说是最擅长的事情，不是吗？瞒着家人们，在车座上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前往空无一人的破旧工厂，在一株杏树下合影，探访或许早已不在人

世的老朋友，记住见面时要用那熟悉的口音，要警惕着别表现得太激动，握一握手，摇动胳膊就可以，随后就再次沉浸在几十年前的点点滴滴当中，但是这种游历又能带来什么呢……又能带来什么呢？这会儿，夜晚已经完全地展开，从街上传来一阵倦怠的烟雾，还有一双双倦怠的眼睛。在七月傍晚的武汉街头，尤其是阴天时，那些眼睛总会变得模糊，渴望去看些什么，但是从来都没有看清。我问他，这个旅行团有联络人吗？我想跟过去看看。为什么？他问我。我不知道，我说。我心想，这是实话，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实话。你叫什么？他问我。毕履，我说。他看了看我。和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同一个姓，姓毕的不常见啊。然后，他掏出了手机，给了我一个号码。去吧，他说，我相信你，因为你也姓毕。这时我才发现，他其实跟疯了没什么差别。

有了书店老板的担保，我顺利地和王建军搭上了线。那时，他们正处于前往丹江口的途中。我把老人的通话录音交给了他的家人们。于是，事情告一段落，我拿钱收工。至于为什么要瞒着家里人出远门？这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以内，我不必去弄清楚。然而，在一天之后，这桩案子又缠上了我。委托人依然是王建军的家属。他们委婉地表示，希望我能够在旅途中追上他们，并陪着王建军走完这段路。当一个看护者的角色吗？我问，我不擅长这个。没事，他的家人说，我们出双倍的钱。双倍？是的，双倍。我看了看王建军的儿子。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是某个建材公司的老总，住在二七滨江。三倍，我说，预先给四分之一。成交，他说。

当天中午我就启程出发。但在水库边的3607厂，我并没有追上那支夕阳红车队，反而却遇见了艾幸。事情是这样的：我得知王建军一人已经转往下一个地点后，索性决定花个把小时在这里转转。我穿过隧道（那曾经下过石头和灰尘的大雨的隧道），来到一片宽敞、被大山环绕的拱形区域，出现在我的眼前是灰白的建筑（据说那里头是个能容纳几百号人的剧院）。褪色的标语与一扇扇黢黑的窗子，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就像濒死的山羊，也像被某个神秘的权力所掌握的岩石雕像，等待着遥不可及的恩典。鸟群从大楼上飞过。石头的鸟，石头的雨，我想，碧绿的石头松树，浴池的光滑石头，石头的顽固党派。我继续往前走，琢磨着石头的轮廓与历史。忽然，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她靠在大理石柱子上，侧过脸，两只眼睛平静地盯着我。黄昏的笼罩使她也像灰白的岩石，抵抗着时间的无限。我感到喉咙在震颤，就像光在镜子与镜子之间的快速来回。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是艾幸。

相信博爱和包容吗？相信北京吗？还是相信成功的男人们？

一时间，无数感慨涌上心头。似乎另一段我早已承认的无法追回的往昔绝望地在当下复活。这种感受甚至压抑了我的疑惑。艾幸就站在那里看着我，孤身一人，像块石头。石头，石头，用来营造地狱的石头，用来创造幻觉的石头。“石头的雨啊，石头的雨啊。”我默念着这句话，不知过了多久才想到，要么捂住眼睛，要么走上前去，总之别再伫立在这里，继续承受她的观望与彼此间的距离。因为在那两株绿金辉映的松树（就像农村厅堂里摆放的水彩画里的迎客松）中间站着的，是千真万确的艾幸，是我迷惑了几乎整个青年时期的重逢。

那天晚上，我没有离开那里。我和艾幸一起过夜。第一次，我知道了她和柳生明的事情的全貌，知道了这两年她并未离开过武汉，也是第一次，她为我解释了手腕上伤疤的来源。我这才发现，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有机会去真正地认识她。她告诉我那段发生在2015年的计谋：柳生明一早就知道了她对于他的爱意，“看来我真的学不来隐瞒，或者是别的技巧，”她说。他并不爱她，不想与她交往，却也不想失去她这个朋友，于是他唆使鲁遥对她表白（在柳生明看来，她需要的只是个恋爱对象），而鲁遥呢，把这当成了肆意妄为的信号。她始终记得鲁遥盯着她的那副样子，好像她的灰帽子，她的黑裙子都是他的所有物了。她痛恨那样的眼神，连带着痛恨自己那天所穿的衣服。至于2018年，柳生明的邀请不过是出于他的情场失意。在那些日子，她一碰他，他就像石头一样冰冷。把她推开，只愿意给她所谓的友谊和关照，牵手需要准许，接触需要同意。有些夜里，她恨不得把自己脱光了，跑到大街上去抗议。难道她对他而言，真的不具备半点的吸引力？她记得柳生明说他们可以在一些时刻亲近，但最好保持距离。柳生明还与她讨论过三人关系的可行性，讨论她分配到的会是一个较为脆弱的角色。她统统答应了。

“但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说，“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爱他，他不爱我，他爱的是男人，是白先，我是他重要的朋友，我就得受这个吗？”说到这里时，她走到窗户边，长叹了一口气，但她的气息无法搅动那个沉闷、短促的夏夜，就像我所写下的一切也无法召唤她一样。

是的，我所做的一切都再也无法召唤她，而这正是那天夜里我对她许下的承诺。在我讲述完所有之后，她对我说，她选择我作为她最后的作者，不论我写的好坏，都要为她写下全部。她说，开头要从三线建设写起，要从那封夹在《野棕榈》中的信写起。在写了她以后，要写写我自己，写我是如何顺着命运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来到 3607 厂。过程全凭我定，可以虚构，可以撒谎，唯一重要的是我最终抵达了这里，成为她的证人与作者。然而，她要我记住，我来到这里的目地绝不是为了寻找她。她要求的是偶然的驱使，是随机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宿命，是万中无一的小概率，而绝对不能是一次有心之举。

于是我照做了。我会出现在 3607 厂是因为我寻人侦探的身份，我在追踪一位名叫王建军的老人。我以必要的理由记录她称作“狗屁不通”的精神分析：柳生明是一面镜子，是世界上的另一个她，柳生明与她的一切都几乎一致，作息、口味、习惯、行文、爱好，甚至连爱的性别都一模一样。因此，柳生明对于她的拒绝和否定，是她对自己的拒绝和否定，只是在 2020 年她才领悟这一点，而一旦领悟，就意味着她必须着手去做那件早已注定好的事情——进入迷宫，毁掉自己。她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能统统毁掉，统统浪费，她要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不光彩的可悲存在。这就是她报复柳生明——艾幸共生体的最佳方式，完美得像一个圆，一场了无痕迹的讽刺，像某次不急不缓的呼吸。而知道了这一切后，我才真正地爱上她。我总是绝望地爱上那些处于阴影当中的女人。

在七月，天亮得很早。那天早上，我是被山中像溪流的鸟鸣叫醒的。小鸟的喉咙藏着一把会尖叫的锁。依照我和艾幸的约定与承诺，我离开的时刻到了。现在，我必须上路，去追踪那位名叫王建军的老人。我穿好衣服，走进清凉的空气和清凉的阳光里。她也一样。分开前，她问我，有思路了吗？我说，当然，对于这类事情，我一向文思泉涌。她递给我一个本子，说，这是她的档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我看了看她手中的小本子，接了过来，又望向东边的隧道。我想，只要走出隧道，这里的一切就只属于她了。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于是，我决定走得稍微慢些。我一边走，一边翻阅她给我的东西。在第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废墟是拧扭的螺旋，是偏移的线，是地图上抽搐的迷宫，是沉默的非洲。从第二页开始直到后面，则是她的一些日记和剧作。这时，我忽然想到，我写下的一切她根本不会看见。这令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刻不容缓的焦虑和恐惧。我立刻转过身，却发现她依然坚定地站在那里，就像石头一般。

“怎么了？”她问我。

我攥紧了本子，侧过头瞟了一眼隧道的入口。

“是这样的，我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老人，不知你能否为我提供些许的线索呢？”

她看着我，然后笑了起来，像是觉得在这样的时刻玩这种游戏也不是不可。她说：“你要找的那位老人呢，我猜他应该是想在这里寻找某些东西，不过没有找到。现在，他应当是去了更西边的地方。”

“是的，”我说，“我所知道的是他想在这里寻找战争的影子。”随后，我顿了顿，问她，“那你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呢？”

她微笑地看着我，就像是在回答一个已经重复过一千次的问题，却依然闪烁着某种持久的热情与耐心。

“我在这里等待废墟。”她说。



案毅

请多来夸夸我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周六见。



题图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 小说

# 被选中的静止

刘宛照 | 第二回

到底是谁在害怕？

是谁让我停在这，害怕失去三十岁的我？

五十层到了，电梯说完中文，说英文。看我走出来，电梯门在我身后，缓缓合上。我掏出钥匙开门，电梯门又开了。我往回看，电梯里空荡荡的，跟我下来时一样，我看着它合上，又弹开，走过去看有没有曲别针、橡皮筋卡在轨道槽里，电梯门合上，又弹开，什么都没有。我朝着插着门钥匙的家走去，走了半个小时，还没有走到，身后的电梯合上，又弹开，合上，又弹开。

意识到走不到之后，我又走了两千步，来确认这件事。全长不足两米的走廊，变成一台插电的跑步机，不动声色地消耗着我的卡路里。我又走了两千步，还是一动不动。我没遇到过鬼打墙，这也不是荒郊野岭，但我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两条腿也在抖。我不敢停下来，我担心一旦停下来，就会顺着这条反向的传送带，从走廊上的窗户滑出去。这是五十层，四舍五入，也有两百米高，正下方是五层的商场，后面是施工工地，正在盖写字楼，幸运的话，我会往南偏一点，掉进海河，一路向东，注入渤海，就是不知道，现在刮的是不是北风——

好吧，没人从五十层掉出去还能幸存，我深呼吸，重新确认眼下的困境：这是一栋违章建筑，封顶五十五层，只有一架电梯在运行。电梯没法下去，载其他下班的人回家，我没法回家，走完这条近在咫尺的路。看起来，时间停止了，我的人生，停在这个两平方的走廊，左边是一开一合，不停咀嚼的机械怪兽，右边从前到后，分别是强电井、弱电井和消防栓，我的身体，困在这条小一码的牛仔裤里，站着还行，走快了实在勒得慌。在可以预见未来里，我会瘦，瘦到这条裤子掉到地上，把我绊倒，我会像氢气球一样，飘出窗外，嘭地爆掉。

都说运动能消除焦虑，可我现在每走一步，都更焦虑一点，这一步没摔倒，还有下一步。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只剩下两条腿，每一步下去，从脚底板到小腿，都有针板碾过，而这条该死的牛仔裤，还死死卡在我腰上，出了汗，更紧了。渐渐地，两条腿也不在了，我低头看瓷砖上的鞋，就像长时间注视某个汉字，不认识了。我紧紧抠着消防栓的把手，害怕自己会飘起来。右脚崴了一下，然后是左脚，我感觉不到疼，我脑子里塞满了应急预案，什么

时候护颈，什么时候抱膝，什么时候双脚离地，垂直跳起——我发现自己正在双脚离地，起跳是这块缺了右上角的方砖，落下来还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试着在隐形的传送带上，扎起马步，一、二、三、四、五——一切没有变化，还是这个楼道，背后一米是窗，面前一米是家，我在当中，不能接近，不能远离，左边的电梯，还是开了又合。我惊愕地站在原地，感受自己的震颤，一把无形筋膜枪，按在我腿上，我靠在消防栓上，像一袋刚剪开的真空大米，一寸一寸堆下去。

嘴里的酸水，一口一口反过来，耳鸣潮水一样，把我淹没，待它们退潮，露出我的鼻子、耳朵，我闻到灰尘的味道，好闻的，像刚下过雨，邻居家里，钻出支离破碎的《致爱丽丝》，我叫爱丽丝，我是说，在公司的时候。我感到命运的召唤，不受控制地开始解裤腰带，在楼道里经常不亮，现在常亮的声控灯下，露出我的肚皮，新添的脂肪上，新添一道两指宽的勒痕，鲜红间白，看起来肉质不错，我上手抓了一下，又疼又痒，像要馊了。

突然，我听到一声脆响，什么坚硬的、冰冷的，打在肉皮上，一声之后，又是一声，我赶紧把裤子系起来。《致爱丽丝》还是那半句，每一次中断，都是这声脆响，听起来像钢尺。我家邻居，在音乐学院教大提琴，但在家一对一授课，教的是钢琴。现在跟她学琴的小男孩，胖胖的，戴着一副弱视眼镜，海蓝色的眼镜套，一个月蒙左眼，一个月蒙右眼，是个瞎得很任性的海盗。据说他是个神童，我没看过他弹琴，倒是常看他拿那只长宽一样，正方形的手，揉搓短裤里的鸡鸡。上周末，我甚至看到他在消防栓旁小便，想象自己是另一只消防栓。第二天，我在公司翻了半个小时，才找出一张“请勿便溺”（其余都是禁止失联，请勿翻墙，莫谈国事），拿回来想贴在楼道里，一出电梯就发现，小男孩尿在了强电井上。显而易见，他还不识字，他跟麻雀和乌鸦一样，可以在尿在任何地方，我能做的，是不要让他在认字前被电死。

我开始大喊大叫，叫小男孩的名字，水手呼叫海盗，水手呼叫海盗——海盗无动于衷，迎接命运的重击，又是一下脆响。我打开消防栓，拿破窗器敲击强电井的铁门，钢尺又一次落下——小男孩会记得吗？我希望他记得，但那不就说明，这个世上，只有我在活着吗？我掏出手机，给邻居打电话，一遍，两遍，三遍，我听不到电话铃响，给男朋友打，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他说他在开会，挂了。第三遍，我说我知道你在开会，你不用说话，听我说，我现在困在我家门口——我听到他推椅子站起来，电话就断了，正好五秒钟。第四遍，还是没人接。第五遍，他勉强听懂了，问我，电梯坏了？第六遍，他又听不懂了，停电了？你在电梯里？打到第十遍，他仍然以为，这是我今天给他打的第一个电话。

我放弃了，开始给男朋友发微信，五秒钟看两百字没问题吧？我飞快地打起来，打完了往前一翻，只剩十九个字，都是我在过去五秒钟里打的，而后，它们以每秒四个的速度，消失成一片空白。我盯紧屏幕，从头开始，我没法相信，我最信赖的手机患上了洁癖，每隔五秒，就把我之前跟它说的话，当成垃圾净化掉。我记得我说过这些话，但没有任何目击者，任何机器，能证明我说过。更可怕的是，我打了几十个电话，打了几千个字，我的手机电量，仍然是满格的。

我在手机上设了一个计时器，让它每隔五秒钟，提醒我一次。但我忘了，它跟我男朋友一样，只有五秒钟的记忆，只能我设置一次，它提醒我一次，而且大多数时候，我设置完，它连一次都不提醒。设置了几百次后，我发现，如果我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按下设置按钮，手机会在电梯门合上的时候，发出提醒铃声，如果在电梯门合上的时候设置，手机就不会提醒，在电梯门开合中间的任意一秒设置，也不会收到提醒。原来，这个五秒钟的世界，是以电梯打开为开端，电梯合上为终止的。电梯打开，开始计时，电梯合上，计时结束，进入下一个循环。从这个角度讲，我不是活着，而是带着前世的记忆，生生不息地轮回着。

怎么才能跳出这个轮回呢？一、二、三、四、五——我已经浪费了一世，一、二、三、四、五——又浪费了一世，一、二、三、四、五——我不禁要怀疑，这样的一世有什么意义？像一个电影开头，主角还来不及反应，就结束了。我试着把手机时间，调回到一天前，一切都正常的时候。效果非常明显，首先给出反馈的，是手机里五秒钟的计时器。它开始五秒钟叫一次，五秒钟叫一次，十分聒噪，十分惊心动魄。我把它设成四秒钟，重新开始打字，四秒钟，全选一次，贴上去接着打，下一个四秒钟，再复制一次，贴上去接着打，来回重复几十次，我终于积攒了两百字，终于第一次，把我遇到的事说清楚了，按下发送键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在抖——男朋友能相信最好，我觉得他能相信，毕竟我三十岁还长在长个，反常识的事一件跟一件，是恐怖片的标配，男朋友看过所有恐怖片，收到我的微信，他会很兴奋吧？

我不是活着，而是带着前世的记忆，生生不息地轮回着。

红色的感叹号，显示消息发送失败，我重发一次，两次，几十次，几十个红色的感叹号。我知道我现在的遭遇，是挺值得感叹的，但也不用这么捧场，太热情了。我需要一个不大惊小怪，了解物理，了解鬼，了解时空旅行，了解宗教轮回，又关心我生存状态的人，来指导我走出循环。比手机不掉电更可怕的，是手机开始掉电了，20% 是个非常危险的电量，很快，我的手机不叫了——电量还有，它只是不叫了，我设置的计时器失效了。我不敢相信，为了发这条微信，我用掉了整整一天。

我往窗外看，天还是我刚出电梯时，太阳快要落山的样子，茶水色的黄昏，恹恹在刮沙尘暴。现在我知道了，我没法给一天前的男朋友发消息，没法从未来向过去，传递还没发生的消息——不对，是我没法拿一天前的手机，发给我现在的男朋友——反正，不管谁在过去，谁在未来，我的手机，都跟我男朋友，不在同一个时空。要是我男朋友的脑子里，有一个内置的时间系统就好了。

我的手机，在我看天的时候，鬼魅一般，恢复成满格电量。跟我一墙之隔的小男孩，还在挨打，一天有 24 小时，1440 分钟，一分钟挨 12 次打——要是我出了电梯，没有回头看，要是我握着钥匙，转完剩下的半圈，这个世界还会停止吗？就算停止，起码也会早一秒，停在他还没挨打的时候吧？我实在想不出，他反反复复，因为一个来不及告诉他的理由挨打，是什么感觉，会不会跟莫扎特一样，再也不长个？还是跟我一样，到了三十岁才长个？

现在想起来，我骨骼线闭合后，还长了六厘米，本身就是灵异事件。按照迷信，一个人中了彩票，就容易出交通事故，一个人仕途升迁，孩子就不容易孝顺，世间好运，都是拆东墙补西墙。那我长个，就算好运气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人到三十岁长个，还有什么用。

刚开始，我去公司体检，发现自己长了两厘米，压根没在乎，体检嘛，也不准，我对桌同事，前年做手术，割掉一个肾，体检完长回来了，体检报告上写得义正言辞：双肾未见异常。过年回到家，大事不好，我妈苦梦成真，生的孩子比她高了。以前我穿上鞋，将将和她齐平，现在不穿鞋还比她高，把我妈吓个半死，跟中了五百万一样，挨到月黑风高，带我到离家三公里的药店，花了两块钱，量出来一米六一。我脱了鞋，站上去又量了一次，这次比较接近事实，一米五九。我妈捂住我的嘴，回家跟我爸说，长到一米六了，你以后别赖我了。

发表完免责声明第二天，我妈发现我还是一米五九，就有点不高兴。从前她老说，我脸长得这么美，脑子又好用，面皮属于最白的那种，去海边晒一个月，回来还是比别人白两度，但凡多长几厘米，天下男人简直任我挑。现在我长是长了，可也订了婚，收了男朋友的戒指和膝盖。她觉得，我要跟现在的男朋友结婚，根本就没必要长个，长浪费了，还不如中个五百万，当个合伙人啥的。搞得好像长个，是我做了选择题，ABCD，我不听她的，非要选 A。好像她完全不记得，我十六岁骨骼线闭合那天，她是怎么抱着我哭的。育儿要是有志愿表，那她第一志愿，就会填让我长个。要是从她身上截十厘米，能让我长高一厘米，那她肯定第一个报名，去给白雪公主当小矮人。她老是觉得，她一米五六，我爸一米八，数据摆在这，我长不高，完全是她基因不行。这里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她一直觉得，如果她长到一米六，就轮不到我爸当我爸，换句话说，她找我爸，完全是为了让我长得比她高。

这就是第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灵异事件。现在回想起来，不但不灵异，反而像一出吵闹的家庭伦理剧，没有导致我爸妈离婚，没有导致我和男朋友分手，只导致了我妈对更加不满意，好像我拖到三十岁才长个，完全是为了跟她找别扭。如果这六厘米，是命运分派给我的福兮祸之所伏，如果让我长高六厘米，就是为了应对眼下的困境，我一下子跳起来，长高六厘米的我，能做什么之前做不了的事？

我抬起头，看走廊的棚顶，空空荡荡，只有一盏声控灯，五秒钟不足矣让它熄灭，它将像太阳一样，一直亮下去。要是让我，为这个五秒钟的世界命名，那它毫无疑问，是这个世界里的太阳，而窗外那个只见其形，不会发出微弱电流声的落日，顶多是个落灰的装饰品。剩下的，就是一扇扇门，弱电井、强电井、消防栓、水暖井都是横向开门，对身高没有要求，唯一一个需要掀起来看的电表间，上个月让小男孩的弹力球打掉半扇，现在是个洞，在我和邻居的入户门之间——我装作刚出电梯，往前走一步，又走一步，我向前伸出胳膊，没有玻璃，没有强风，没有任何看不见的物质挡着我，我不会撞南墙，但也不能朝我的目标，接近哪怕一厘米——行，这个世界挺智能的，是个自行测速的跑步机。

长高了六厘米，却没有东西可以够，没有地方可以去，要是没有这六厘米，我还能在走廊里打横躺下来，现在醒着还行，睡着了一伸腿，脚就被电梯门夹住了——终于，我注意到钟摆一样，规律开合的电梯门，五秒钟，一开一合各减半秒，剩下四秒，我完全可以走到电梯里——我简直是瞎，这么大的门，也没锁，我竟然以为自己无处可去？

电梯门不慌不忙，接受我的凝视，它之前是入口，现在也可以是出口。我从电梯里出来，时间开始停滞，要是我走回电梯，时间会接下去吗？难道时间停滞，只是为了阻止我回家？我家怎么了？要发生火灾吗？甚至于，那扇我没打开的门里，站着持刀入户的盗窃犯吗？

电梯门一开一合，对我大展胸膛，它毫无遮掩，里面也没有危险。我坐下来，看着它，抗拒它对我的召唤——现在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如果我想去的话。现在我多了一个选择，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比较。我得考虑电梯失灵，以及电梯不失灵，打开门时间仍然停滞的状况——死在自己家门口，总比死在电梯里强吧？在自己家门口静止，总比去别人家门口静止，强一点吧？我再想打破眼下的困境，也不能病急乱投医，把自己引向绝路，谁知道我是不是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上？冷静，我要冷静。

冷静后的我，再看这个电梯，它像房间里的大象，之前有多隐形，现在就有多不怀好意。嗯，它看起来，像一个诱惑。就像我长高六厘米，是命运给我妈的恶作剧，这个电梯，就是命运安在我手边，将我导向深渊的。我环顾四周，的确，我什么都没有，但我也切切实实，什么都不需要啊。时间停在这，我既不用吃饭，也不用上厕所，我的手机永远不会没电，我什么都不用做，也没人能来逼我做什么——根本就没有别人，这么一想，我就把牛仔裤脱下来，卷成一个窝，放到屁股底下，在五十层的高空中，感觉自己是一只鸟。羡慕，到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这条走廊，就是我命定的杨柳，我不该不安分，不该老是生活在别处。

难道时间停滞，只是为了阻止我回家？

真的，要说待一辈子，待到永恒，楼道走廊，可能比家更好——在这我选择不多，我不会生出到沙发上坐一坐，到床上躺一躺，把电视打开，把空调调低的愿望，这些愿望说白了，都是烦恼。就像我妈非让我长到一米六，我长不到嘛，在向一米六努力的过程里，我生出过无数幻梦：如果我长到一米六，我喜欢的人就会喜欢我，如果我长到一米六，珍本古籍会降价卖给我，如果我长到一米六，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我会更加自信，我会敢说现在不敢说的话，敢和我妈作对，敢走进电梯里——其实，如果现在我妈让我进电梯，我会进去的。

电梯仍在一开一合，如果我不进去，它就在做无用功，它不知疲倦地一开一合，不就在等我进去吗？我为什么要让它满意呢？它又不是我妈说真的比起在邻居家挨打的小男孩，我简直可以算幸运。至少，我没有静止在办公桌前，反反复复，看那份狗屁不通的红头文件。不用赚钱，不用为了赚钱挨骂，不用为了赚钱被扣工资，不用为了赚钱损害自己，把自己变成弱智，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开始找手机里，我下了三年，都没来得及看的禁书——说真的，差一点找不着，它如此安静，不占地方，拥有它，跟没有一样。现在不一样了，我真正拥有它，我可以把它看完，我可以看完天底下所有禁书，眼睛看累了，就看看北墙外的黄昏——很可能不会累，因为每隔五秒钟，我的眼睛，就会调回五秒前的状态，跟我两天没睡觉，一点都不困一样，我也不饿，不渴，不担心便秘。生活在真空里，没有一点损耗，不是每天焦头烂额的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吗？我之前是斯德哥尔摩了，竟然急着要改变。

电梯一开一合，毫不气馁。禁书没有我想象中好看，首先，它有点像我妈，一上来就把我骂得晕头转向，其次，我看得太晚了，它想告诉我的事，我在过去三年里，已经看过了。我非常不耐烦，点进微信朋友圈，结果还是那些东西，有人拍猫，配文“天生的作家，喜欢踩键盘”，有人拍路灯，配文“沙尘暴里的丁达尔现象”，有人拍孩子，配文“黑客帝国三部曲”，我都在电梯里看过了——等等，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的记忆，不是每隔五秒钟，刷新一次呢？如果我的记忆，跟我的眼睛，我的胃，我的肠动力一样，那我将永远没法看完一本书——不对，我的身体有感觉，我感到过疲惫，不然我完全可以一直走下去，走到这台看不见的跑步机报废——

我开始感到不安，我站起来，开始原地起跳，一、二、三、四——三十九、四十，别说累，我连呼吸都没有加速，四十一、四十二——九十九、一百，难道刚才是我不想走过去，才说自己累了吗？我从地上捡起牛仔裤，已经干了，我刚才真的出汗了吗？我穿上裤子，朝插在门上的钥匙走去，我太慌了，没走几步，就跑起来。两条腿重新抖起来，我发现我控制不了脚的落点，前脚掌触地生疼，另一只脚晚到半秒，我都要摔倒——不行，我要更直观的反馈，眼睛能看到的。我一步一跌，汗水一滴一行，从我脸上滑过，打在上周小男孩尿过的方砖上，激起一阵尿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感到累，又感到困，一坐下就昏睡过去。不知道睡了多久，我醒来第一件事，是马上朝着北墙上的窗户，开始奔跑。我盯着窗外那个一动不动的太阳，恐怖像藤蔓，一下勒紧了我。原来机械的运动，不会引起我任何身体反应，只有当我想回家，为回家做出努力时，疲惫才会累积起来，不自找麻烦的话，我必须放弃回家的愿望——我不是早就放弃了？我不是觉得这条走廊，是命运给我的恩赐吗？我举头望天，白色乳胶漆灰扑扑的，看起来

不大高兴，那个监视器一样，常亮的太阳，照耀着我，它知道那是假的。

你放心，我说，每个人的不敢，都会变成不想，自我保护嘛，没人想知道自己是胆小鬼——但我的记忆呢？我的记忆，难道不是因为我还想回家，才没有被复位成五秒吗？我开始没法思考，没法掩饰，更没法安慰自己，我每隔几秒钟，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几岁时，被你妈逼着剃了寸头？（小学五年级）

你第一次表白时，收到的回应是什么？（还能听进去吗？我说点别的吧）

最后一次见面，他跟你说什么？（努力加餐饭）

这些很惨的事，现在回忆起来，竟然有点恋恋不舍，想到我迟早都会跟电梯一样，不知疲倦地一开一合，我就不寒而栗。电梯合上时，泄出一线黄光，是一个有筋骨的竖，一个没写完的竖弯钩，我想起十三岁的他，毛笔字学赵孟頫，硬笔字写出来，也随风飘摆，弱柳扶风，卷子经常被当成女生的，考不好就哭。我对他，跟他父母对他一样，不许哭，即便是想我想哭的，也不行——他是不该喜欢我，我跟他父母撞型了——可在这条昏暗的走廊，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和他手拉手，到阳光里走一走。大雨倾盆的时候，我还是很想你，看到卧铺，绿皮火车飞逝的景物，甚至一扇窗，我都会想起你——我现在就有一扇窗，永远有，这条走廊，只是比我心里的安全屋，具体了一点点。

我感觉好一点了。眼下这个场景，交给我，是比交给别人好一点。我有经验。这二十年，因为有他，我才该吃吃，该睡睡，我相信他会帮我，不会怪我，想他，是我获得安全感，最便捷的方式，简直跟水龙头一样，打开就有。是我，把他囚禁在十三岁。我老是想见他，想和他说话，我老是害怕，害怕别人，也害怕自己——那现在，到底是谁在害怕？是谁让我停在这，害怕失去三十岁的我？

男朋友吗？这不太可能，他的安全感多到，要靠恐怖片来排遣，他像我没有的父母，我是跟他学会睡懒觉，学会长个的。我妈？比起三十岁的我，她更喜欢我小时候，高考成绩公布那天，她头一次觉得，我长不到一米六也没什么。我爸？除开我妈想逼我就范时，拿他撒气，他不大能意识到我存在，我充其量，是我妈的一个外接器官。那还有谁呢？他吗？我们快二十年没见了，三十岁的他，和我几乎是陌生人，虽然我知道，再过三十年，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他来，在夜晚的街道，一切变得模糊，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声音，陌生的气味，一团一团的，裹在光里，可以看到又看不清，可以接近又怕打扰。我知道，只有在我心里，我们才和以前一样好。

我现在就有一扇窗，永远有，这条走廊，只是比我心里的安全屋，具体了一点点。

好吧，我不再想，是谁把我留在这，我开始想，留在这，我能为谁做点什么。我环顾四周，除了一个时间紊乱，不能跟外界沟通的手机，我什么都没有，没人想要一扇掉漆的铁门，一个干粉灭火器，一只闪烁的电表。我闭上眼睛，想看看安全屋里的他，都有什么。他穿着校服，握着一只包尖钢笔，右手中指上的筋包，也是蓝的——想到我刚才脱了裤子，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你放心，我不会走的，我会一直在这。

事实上，没坐一会儿，我就觉得无聊，我觉得整件事的设定，有点失真，好像是我为了让自己好受，硬编出来的。我从来没想过，我能活在别人的时光结界里，我也能对一个人，如此重要吗？一般来说，在给他人造成困扰之前，我不大看得见自己。我跟我脚下的跑步机履带一样，是隐形的。在我暂时还没复位成五秒的回忆里，充满了难堪的瞬间，像乌云滑过树梢，稍稍露个头，我就得站起来倒杯水，让太阳光刺一下眼睛，才能消解。这里没有水，也没有刺眼的光，这个世界的太阳，只有五瓦，我按捺着，让阴影慢慢刮过去。

要不要把手机调回一年前呢？这样我能大概有个时间概念，能知道我停在这多少年，三十岁了多少年——想到我能活多久，跟我的寿命毫无关联，我的存在状态，只跟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人有关，我终于不再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怎么能帮他，但他比我确定，这很好。

五十层到了，电梯说完中文，说英文。又是沙尘天，太阳都不爱上班，我头转回去，看到门上的钥匙，我这个记性啊。我跑到家门口，扯下钥匙往回跑，电梯门轰然合上，却像出了故障一样，轻轻弹开。我赶紧走进去，今天运气真好。



刘宛熙

《消弥》作者，陈医生患者，正在治疗对色彩的恐惧。

## 第二回

这是“24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题图为电视剧《使女的故事 第一季》(2017) 剧照

## 小说

# 兔子测试

萨曼莎·米尔斯 | 故事群岛

她目睹自己的一生从眼前闪过，  
想知道如果有权自主选择，她会成为怎样一个人。

现在是 2091 年，格蕾丝盯着自己视觉叠层上的那只兔子。它是一只安哥拉兔，毛茸茸的，浑身雪白。此前格蕾丝刚辨认出这个图标的时候，她还没觉察到自己会对它感到多么恐惧。只要她动，视觉叠层就随着她动，提醒，威胁。

还有三名授权用户可以访问她的兔子测试：母亲，父亲，以及在她头几次月经之后不久，按照父母要求安装兔子测试的家庭医生。

再过两个月，格蕾丝将年满十八岁。到那时她可以自行决定，是继续使用还是禁用这款应用。可是她没有两个月的时间，她的月经已经迟到了六天，明天她的追踪系统将自动执行一次孕检。

格蕾丝调出好友萨尔的个人信息，发出了一条她们常用的紧急警报：咖啡？

现在是 1931 年，莫里斯弗里德曼和麦克斯韦爱德华拉帕姆刚刚在《美国妇产科学杂志》第 21 期发表论文《用于实验诊断早孕的简单快捷方法》。这种（非常）简单、（根据某些标准）快捷的测试过程需要一份尿样和一只非常不走运的兔子。

（1927 年，其实塞尔马·阿什海姆和伯恩哈德·桑德克才刚刚首次推出这种测试，他们的方法需要五只小鼠。然而这两位医生都是犹太人，他们将很快逃离纳粹德国。只有零星实验室更喜欢繁殖老鼠而不是兔子，所以弗里德曼的测试方法反而流行起来。）

第一步：向一只活的雌性幼兔的血管中注射尿液样本，等待数天。

第二步：解剖这只不幸的兔子，检查它的卵巢，如果卵巢变大变黄，那么就要恭喜或者表示遗憾了。这种卵泡发育的现象表示尿液样本中明显含有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你怀孕了。

与当时说法矛盾的是，表明怀孕的并非兔子的死亡。兔子每次都得死。

现在是 2091 年，兔子测试公司的善人们没有实验室养殖场，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会导

致动物死亡。他们的用户中甚至只有极少数理解公司名所代表的含义——算是个冷知识吧，久远的历史，只是个办公室笑话。

格蕾丝不知道，也不在乎，当然也没被逗笑。她在咖啡店等待萨尔，每喝一口咖啡，焦虑似乎都会被点燃，折磨她的肚肠。

萨尔赶到后——可爱的萨尔留着棕色长发，指甲涂成龙鳞的样式——还没等她们来到停车场，格蕾丝差点儿就脱口而出。

“怎么会？”萨尔喊道，“你没按我说的算准时间吗？”

她算过，算过时间，这才是问题所在。格蕾丝像监视工人游行的无人机一样紧盯她的经期追踪数据。尽管她的父母禁止显示最容易受孕的日期（“别有什么想法。”他们说），但她在纸上加加减减，算出了最不易受孕的日期。至少，她以为算对了。

此刻萨尔焦虑地咬着一根手指上的指甲（这样她会毁掉涂好的指甲，一向如此），“你告诉麦克了吗？你觉得他会陪你吗？你爸妈——”

“我要一次数据封锁，”格蕾丝打断她，“求你了，萨尔。我知道你能办到。”

这是她们以前用过的小故障，一小段错误的升级代码会把她们的应用屏蔽一两天。每当父母出城，萨尔就用它们禁止自己的血液酒精测试。父母每次都会打好补丁，不过她善于从新编写，而这正是格蕾丝所需要的全部，让兔子测试故障一两天。有些上年纪的女士在禁令颁布之前囤积了药物，藏在柜子里出售。在数据封锁的掩护下，她可以联系上其中一位。

她努力不去想麦克，或者在他家后院的那个夜晚，他们俩笨手笨脚地在一个睡袋里亲热。两周后麦克就要离开，去做一份深海捕捞的临时工作，甚至都等不到毕业，像是以前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离开，人人都知道这些男孩没有几个回来。

萨尔看起来慌了神——这跟周六晚上一醉方休不是一个级别——可她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周末的女巫和异父异母的双胞胎。

她小声说，“我帮你。”

现在是 1940 年，怀孕的生物检测材料已经从老鼠和兔子转向青蛙，确切地说，是非洲爪蟾。兰斯洛特·霍格本从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研究中获得灵感，发现非洲爪蟾是一种绝佳的替代对象。

（这位动物学家是英国人，他的研究地点在南非。后来他对当地的种族歧视感到幻灭，才带着一批非洲爪蟾离开南非。）

这个新进展的天才之处在于：幼蛙在注射充满荷尔蒙的尿样十二个小时之内，神奇地开始排卵，远比性命不保的兔子快得多，而且瞧好了：你可以重复使用这只非洲爪蟾！

尽管存在使用限制（医生必须确定早期诊断是否具有正当的理由），但是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非洲爪蟾从南非出口，来满足验孕的需求。

现在是 1839 年，还用不上老鼠、兔子或青蛙，可是凯瑟琳知道她怀孕了（她太熟悉症状），明白自己没办法靠做裁缝抚养第五个孩子。

她在《纽约太阳报》发现一则广告：

致已婚女人——婚育者家庭的过度生育常常导致他们无法获得父母辈的那种幸福，这大概不怎么广为人知？……如果我们掌握一种简单、便捷、健康、可靠的补救措施，那么家长不顾自身后果或后代福利，仍然去扩大家庭规模是否道德？本条广告的刊登者体会到这个话题的严重性，并认为采取她指定的方法会对数千家庭大有裨益，所以开设一间办公室，让已婚女性可以获得所需的信息。

文中的广告刊登者自称雷斯泰尔女士，上午九点至晚上十点之间，她在格林威治街的办公室接待客户。

凯瑟琳的外祖母深信薄荷油或艾菊茶的效果，可是她也因为剂量过大导致不止一位朋友中毒病倒。既然已经是现代社会，凯瑟琳更想采用一种更加精确稳妥的办法。雷斯泰尔女士除了向凯瑟琳这种情况的需求者提供简单、便捷、健康、可靠的补救措施，她还出售预防粉（五元一包）和每月服用一次的女性避孕药（一元一粒）。凯瑟琳不确定自己能否把这加入家庭预算，如果可以的话那简直太幸福了。

（现在是 1839 年，对于梅森－迪克逊线 [1] 以南被迫生产的女性黑奴来说，没有报纸广告，也不存在公共街道上便于造访的办公室，更不能在自家的私人环境中静养，因为她们除了自己的智慧一无所有。这些女性被迫在奴役她们的体制内生更多小孩，如果她们可以获取并且懂得使用棉花根皮 [2]，就会采取这种私下分享的补救措施，然而如果被抓住，最恶毒的惩罚也会落在她们头上——可她们还是会尝试。）

凯瑟琳没理由知道这些，如果知道，她会感到极为不安。她不是参加废奴集会或者订阅相关出版物的那种女人，她是一个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处理自身问题的女人，因此她需要处理这个问题，立即着手。

幸运的是，有人有办法、有兴趣、有创业精神来帮她摆脱困境。

现在是 2091 年，格蕾丝正祈祷有人有办法、有兴趣、有创业精神来帮她摆脱困境。

安装了萨尔的屏蔽代码几小时后，格蕾丝感觉她的兔子测试开始了。仅仅是在她的手臂上扎一下，医疗芯片的检测功能采集到一份血样，扫描结果直接传入她的追踪程序，一个欢笑的宝宝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差点让她的心脏停止跳动。不过萨尔的代码依然有效果——她的数据存储在本地设备上，格蕾丝绝望地用手指一扫，不等它传输到别处便删掉了记录。

格蕾丝趴在枕头上啜泣了好久，深信自己的计划没有开始便已失败。因为她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她怎么会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呢？她会死掉并直接下地狱。

她不是参加废奴集会或者订阅相关出版物的那种女人，她是一个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处理自身问题的女人

可是她止住了泪水，用午后剩下的时间在抗议网站上搜索，点击一环套一环、不断变换的链接寻找一个终止妊娠的临时简介为了逃避机器审查，介绍用语都使用最新的俚语。她在卧室的屋顶投屏，很快就用打开的网页布满了屋顶，然后一个接一个浏览，努力分析那些委婉的说辞。

(1840 年，维多利亚时代，各种各样的人在报纸上搜寻女性调节剂、泻药、以及通过疏通梗阻解决私人问题的任何手段。2091 年纸媒广告虽然消失，但是私人问题依然存在。)

找到了。在一个大学黑市的网页上，淹没在机器生成历史论文和食堂门禁卡芯片的需求之间。格雷斯发现了自己要找的内容：兔子测试作弊。

至少她以为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可能表示另外一种数据封锁——或者只代表避孕？格蕾丝不是很清楚后者具体怎么操作。

这个帖子用首字母 A.M.E. 作为签名。格蕾丝把自己的消息反复写了无数遍，然后才迟疑地确定下来：要是我已经测完了该怎么办？

经过三十分钟的煎熬，一条回复弹出来，告诉我你的通话线路。

不管有没有数据封锁，避免打字交流都说得过去。然而一给对方发去号码，格蕾丝的全身就开始颤抖。她没法跟一个陌生人聊这些，往好了说对方可能是个网络喷子，往坏了说可能是警察，她不可能对这种人坦白。电话打过来时，她嘶哑地挤出一声哈喽。

“你听起来一团糟。”A.M.E. 毫不怜悯地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宝贝儿。”

格蕾丝和盘托出。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格蕾丝的认知接二连三受到挑战。比如，她还以为所有的药物囤积者都是老太太，可是 A.M.E.——“叫我安布罗斯吧”——笑着向她保证自己没那么老，也不是一位女士。不只有女人担心她们的子宫，早在 2084 年禁令通过之前很久，安布罗斯就在墙上看过这个说法。

“我早在七十年代就切除了子宫，”他说，“不过邮寄业务衰落之前，我尽可能从海外订购了大量药物。”他警告格蕾丝药物已经过期一年，不过最差也是不起作用，她已经在面对同样的后果了。

安布罗斯收费四百美元——他想要帮忙，可是，嘿，世道艰难——这个价格勉强可以接受，格蕾丝可以用上生日剩下的钱，再从网上出售旧玩具凑一凑。如果有人问这笔钱用来干什么，她会说带萨尔去吃饭看演出。

然后安布罗斯开始问她以前不曾有人问过的问题。对避孕她了解多少？（“不，宝贝儿，吃药不能让你一辈子不怀孕。净想好事儿。”）这件事过去之后她有什么打算？不是今天，不是下周，而是她真正的打算。她的人生计划。

格蕾丝一边交谈，一边下定决心这是安布罗斯用谈话带给她的馈赠，他本可以不用多说，谈好价格和地点就行。他也没有逼迫格蕾丝，而是给她时间考虑清楚，为自己接下来的行为负责。毕竟那是她的身体。

“那么，”安布罗斯说，“怎么打算？”

恐惧和内疚如同泥石流汹涌而出，令格蕾丝哑口无言，沉默了一会儿。她几乎难以在脑海中思考这个词语（堕胎），因为它让人担忧，而且被父母的厉声警告变得下流。

你知道，2084 年她母亲就在现场，游行支持更严格的子宫监护管理。母亲说在那以前，

人们随随便便就能快速杀自己的胎儿。那很容易，无法追踪，兔子测试曾是私人应用，不要求上报医疗机构。堕胎药物支持自动订购，所以你几乎还没注意到月经推迟，一架无人机就已经顺着卫生间的滑道投放了一包毫不起眼的药物。这只是针对没有篡改自己自然生理结构、像扎耳洞一样把妊娠阻断器装到身上那些人，仿佛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没有大幅跳水，仿佛他们并没有迫切需求结实的白人宝宝挺过来的风暴——（她母亲的抨击一句接着一句）。

格蕾丝还记得游行时藏在母亲的双腿之后，只有九岁的她怕极了人群。她记得母亲把她拉到众目睽睽之下，大喊“我的奇迹之子！这是我的奇迹之子！”她用扩音器讲述了整个故事：她的营养补充剂如何被调换成堕胎药（这种事情怎么能意外发生？格蕾丝又长大很多才开始质疑），医生告诉她即便立即干预，胎儿存活的希望也很渺茫，不过她一遍遍祈祷，救了格蕾丝。

所以没错，格蕾丝感到内疚，仿佛背负着大山，身陷动荡升温和海洋。内疚如同有钱人的空间站，把她困在其中。

可是格蕾丝也感到振奋，她会完成学业，会更加小心谨慎。这件事过去之后要怎么打算呢？她还不知道，但无比渴望花时间想清楚。

“告诉我地点。”她打定主意说。

现在是 1978 年，艾丽斯正在看食物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的首款家庭孕检产品的广告，如今全国的药店都已经上架了这款产品。使用它需要九个步骤、两个小时、一面有倾角的镜子和一小瓶羊血。不过花十美元你就可以在自家的私密环境中弄清自己的身体状况。假如结果是阴性，你可以百分之八十确定它的准确性。

让艾丽斯屏息凝神的不仅仅是这种验孕产品，还有在《小姐》杂志上刊登的广告。几十年来，《小姐》标榜自己是面向聪明年轻女性——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那些时尚高雅、重视事业的女性——的高档杂志，除了时尚评论和美容秘诀，它还推崇诸如弗兰纳里奥康纳、雪莉·杰克逊、詹姆斯·鲍德温、琼·狄迪昂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这类作家和编辑。

可是，这条广告不一样。

家用早孕检测工具是一项小小的私人革命，任何女性都可以在药店方便地购买……如今它的高准确率已经在美国被医生证实……这意味着你可以放心地——私下——使用这种便捷的妊娠检测产品，在家里就行，不用等待预约或延迟……我们所有人终于可以轻松准确地尽早了解妊娠情况。

这则广告足够引人注目，但是第八十六页的评论让艾丽斯差点流泪。它坦率、务实——真诚，给人美的感觉，勇敢地陈述私密快速的结果所带来的益处，也就是如果怀孕，你们会得到一个机会，“开始关爱自己……或者考虑尽早堕胎的可能。”

见证这样的描述公开印刷在一本全国发行的杂志上？

她几乎没想过会看到这一天，因为——

因为现在是 1971 年，艾丽斯无法想象自己多么接近这样一种未来：《小姐》以及康泰纳仕集团其他女性杂志序列居然以一种坦然的成熟，提出堕胎这个选项。

艾丽斯是一名已婚女性，有两个孩子正在上学。每天下午，她按照一张名单打电话，联系给简留言的陌生人。她们迫切需要帮助。

简这个人不存在。

更确切地说，简是好几个女人，她们为大芝加哥地区提供非常特殊的服务，自称女性解放堕胎咨询机构。不过出于慎重考虑，有需要的女性可以拨打她们传单上的电话号码，给简留言，简会尽快回复她们。

（她们不是第一个想出这种做法的组织，好几个州都已经有了圣职咨询机构——牧师、神父和拉比组成的体系，游说堕胎合法化，帮助能够旅行的妇女接洽合法的诊所，把不能旅行的妇女介绍给谨慎的本地联系人。）

开始关爱自己……或者考虑尽早堕胎的可能。

全体成员每周碰面一次，分配咨询顾问回拨的电话号码。艾丽斯在这个组织里是为数不多的黑人成员之一，其他的都是白人，白人家庭主妇、白人女工、白人活动家，寻求做些实事，立即投入行动。她们帮助数千人，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不变的事实是，她们的服务覆盖芝加哥的西区和南区居民，委托人中非白人越来越多，日益跟她们的组织成员不匹配，艾丽斯的目标是为那些人呈现一张熟悉和可靠的面孔。

她在组织中担任咨询顾问和司机,有时候陪同朋友赴约也会充当助理。打这个电话号码,她朋友的医生说过,你们付多少钱都可以。毫无疑问,艾丽斯帮忙一起凑了五十美元,他们也只收了五十美元。她环顾那间由客厅改造的等候室,里边坐满了忧心忡忡的青少年和疲倦的三孩母亲,她知道自己想要帮忙。

堕胎不是一直都属于精神病院和医院评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也并非一直都是有人将死才勉强做出的让步,或在充斥细菌的旅馆房间进行的绝命赌博。

堕胎曾经是助产士和江湖医生、朋友和邻居的工作,那些有子宫的人搞懂了自身的工作原理。

所以扮演筒的成员们在自学堕胎。

现在是 2091 年,格蕾丝不了解子宫如何发挥作用,但是有人了解,她正要去找他。

即使有了数据封锁,她也疑神疑鬼,不敢乘坐出租车——一切都会留下痕迹,一切——所以她从车库取出弟弟的电动滑板车。安布罗斯要求她把钱换成礼品卡,不要直接转账。这么多潜在的错误她甚至都没有考虑到,所以被吓得浑身发抖。

格蕾丝的目的地离家二十四公里,是一座有许多出口的停车场,位于一座商场改建的水培菜园后方。

她在破晓前出发,路灯如同一盏盏探照灯,每一张经过的面孔都仿佛监视她的间谍。她似乎随母亲来到当年的游行现场,扩音器大声放送奇迹之子!我的奇迹之子!她又穿越回高中卫生课上,被灌输要禁欲、三思而后行、守身如玉、不要向不值得的伴侣袒露身体。她辜负了父母、上帝、老师、男朋友和自己,不过他们谁都不必知道这一点。她会下地狱,但不在今天。

格蕾丝走了还不到八公里就听见刺耳的鸣笛声,她父亲透过车窗大喊,她母亲在副驾驶座位上啜泣他们追近时父亲的腕带闪烁起来——滑板车安装了老式的地理定位标签,格蕾丝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后来她了解到原委(萨尔慌了神,告诉了她母亲),可是在当下,她只知道自己的父母赶来抓住她。这扇门关闭了。

现在是 2083 年,格蕾丝的母亲仿佛急先锋手中的一柄长矛。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陷入水深火热,另一半在愤愤地争论,如果要接收难民,那么应该由谁接收。(他们延缓了这种未来,在三四十年代硬生生推动,绝望地开展恢复植被运动,完全是被动的,而且早已经来不及——最后只不过是拖延一下罢了。)

艾米莉亚来参加游行是因为她害怕成为少数派;因为她相信自己有责任保护婴儿,并让他们诞生在具有良好基督徒价值观的家庭;因为科学机构已经不受控制,变成一伙人间恶魔,把整整一代人挡在了救赎的天堂之外。

所有的术语她都不清楚或不理解,可她同样批判如今美国面对的每一个问题。边界入侵、儿童编造性别、学校推行无神论、情景剧都演女同性恋、以及笼罩在一切之上的巨大难题:技术对与生俱来的身体的侵犯。整个冷酷无情的精英经济允许——鼓动!——人们调整激素,改造器官,植入医疗芯片和追踪设备,当技术不再可爱时,恶魔们用兔子测试这类可爱的辞藻为技术命名,而那却是种工具,一发现怀孕的迹象,就牢牢控制住本该完全听凭上帝意志的自然过程。(她绝不会想到,在格蕾丝身上安装同款测试设备有多么虚伪。合适的人选已经接管了对设备的监控。)

总而言之:她的女儿将被抚养得更好。

现在是 2092 年,格蕾丝让她的母亲失望。

“呼吸。”护士说。

格蕾丝在呼吸,也在哭泣。她读到了能找到的关于分娩的所有内容,但是都不能帮她面对现实。她一度充满了强烈和非理性的渴望,想联系安布罗斯——至少他会坦诚地告诉格蕾丝要经历什么。然而他临时的个人资料早已失效,他的号码早已无法接通。

“呼吸。”护士说。

格蕾丝在喘息,母亲就在她身旁,不过此时她们几乎不怎么说话。虽然使用了药物,可格蕾丝痛得要命。麻醉师加大剂量之后,格蕾丝的半个身子无法动弹,她的恐慌发作了。

麻醉师的声音穿透了她模糊的意识,“……药物防止焦虑?”

格蕾丝的母亲说好。药物流入身体,格蕾丝不记得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现在是 2092 年,现代医学能提供的抚慰只有这么多。即使格蕾丝的母亲雇了助产陪护(“你不需要,”她声称,“有我呢。”)——即使她雇了一名,助产陪护能说什么来让格蕾

丝感觉好些呢?事已至此了。

婴儿被一名护士抱起,甚至比母亲更加恐惧地哭嚎。

揭示性别的声音被掩盖住:是女孩。

现在是 1817 年,阿塞纳丝·史密斯爱上了一名圣公会传教士。

他名叫安米·罗杰斯,因为推行政教分离被禁止在康涅狄格担任牧师,于是他开始到各处巡回传教,结果极受欢迎——特别是在女性群体中。

二十岁的阿塞纳丝生长在思想独立的女性家庭,见到这位有争议的人物时他正在床边安慰临终的外祖母,愿上帝安息她的灵魂。阿塞纳丝被深深地打动,对他一见钟情。

阿塞纳丝发觉自己怀孕时,直接去见了罗杰斯,要确定随后的婚事,而且必须尽早举行婚礼。

可是罗杰斯不想娶她,除非她终止妊娠。大部分人不会在意孩子在婚礼之后的九个月内降生,然而这种好事不会降临到他头上。他的声誉已经受人质疑。

罗杰斯让她吃药,但是药物没起作用。

他尝试使用工具,可那似乎也没起作用,结果他逃出城外。度过了可怕而且痛苦的几天之后,阿塞纳丝分娩了:结果是死胎。

这件事激起强烈公愤——更有人努力对罗杰斯提起诉讼。康涅狄格州没有引诱法,没有禁止堕胎的法令。不过他还是被捕了。

第一次开庭审理失败,因为罗杰斯绑架了阿塞纳丝和她的妹妹,把她们一直囚禁到同意撤回证词。姐妹俩信守承诺,在第二次审理时也拒绝配合,不过她们以前的证词还是被呈现出来。按照更加准确的罪名,罗杰斯被判性侵犯罪成立,服刑两年。

公众的愤怒被引爆,阿塞纳丝·史密斯被胁迫成了讨论的焦点,可是这番讨论却没有涉及如何确保阿塞纳丝这样的女性能摆脱胁迫。州议会反而把矛头对准药物流产,迫切地把助产士和祖母外祖母(她们许多人都是移民或者奴隶出身)排除在这一行业之外——这是全国的头一次反堕胎立法。由医生批准实施堕胎这项法规将继续受到更长久的保护,令这些与身体相关的慎重决定掌握在更加专断的人手中。

这个结果错失了重点。

格蕾丝的母亲说好。药物流入身体,格蕾丝不记得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现在是 2107 年,格蕾丝的女儿十五岁。她们母女终于离开格蕾丝童年的家,住进只有一间卧室的贫民区公寓,已经独立生活五年。格蕾丝的邻里大都来自印度,她逃离原来那些邻居不停审视的目光,不用再羞耻地低头做人,这是一种解脱。

尽管人人心中都这样以为,但格蕾丝不是因为奥利维娅而感到羞耻。(不管怎么说,她都爱自己的女儿)。更确切地说,她感到羞耻的是过了很久她才离开那栋房子。整整十年,格蕾丝挣最低的倒班薪水,听母亲数落她的品格、照顾幼儿的负担和社交的窘境,就好像为了造成这种局面而把她严格监管八个月并非她母亲的所作所为——

不过现在都结束了,过去五年平静安宁,让她明白了很多事情。格蕾丝掌控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吃上意大利面和人造黄油每周工作五十小时让她有种掌控的感觉),切断了跟教会的联系,母亲的电话她差不多三次才接听一次。生活不像她期望的样子,但她学会了自己生活。

然后来到五月。

奥利维娅在五月参加了一场放学后的聚会,回家时很难受。她什么都不记得,可是她疼痛、悲伤,做起了笼罩在烛光暗影中的噩梦。她们去化验血液,可是体内任何异常物质都已经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三周后奥利维娅伏在格蕾丝的肩头,在怀疑中恐慌发作,还没等她语无伦次地解释原因,格蕾丝就已经明白。是她的兔子测试。

(那不是在格蕾丝的要求下安装的,也没有获得她俩任何一人的同意。六岁强制植入医疗芯片,十岁开始进行兔子测试,从 2102 年起就已经写入全州的法律,可格蕾丝没有能力离开自己所在的州。当初立即谴责检测结果影响个人决定的抗议者毫不介意用它们来进行监视。)

“我该怎么办?”奥利维娅一遍又一遍哭着问,“我该怎么办?”

格蕾丝嘴里发干,说出的话毫无气力。“我能解决,”她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怎么解决?”奥利维娅低声说。

她们当晚很久没睡,一直讨论各种选择。格蕾丝努力掩盖自己严重的颤抖,给奥利维娅

详细解释尝试伪装流产和怀孕生产的风险差异，努力给她提供自己希望她了解的信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展这番对话。

“你搜索过吗？”格蕾丝突然问。

“没有，我直接来找的你。”奥利维娅犹豫不决地伸出手，似乎要调出一块屏幕，“我要不要……？”

“不！”格蕾丝一把抓住她的双手，“别搜索。别跟任何人透露任何信息，哪怕跟你的好朋友都不能说，你明白吗？”

当下法律只谴责堕胎药的采购者，奥利维娅是未成年人，在法律看来她的身体属于格蕾丝，因此随后的事情得由格蕾丝负责。

她尽一切努力掩盖自己的追踪数据。从废弃设备获取匿名账户，选定城里网络瘫痪的骇人地点进行交易再用一个更骇人的夜晚按摩她女儿的后背，指导她经受住疼痛和恶心，记录她血块的大小，排练第二天早晨她们要讲给医生的说辞——

结果这还不够。

仅仅是一位多疑的护士标出奥利维娅的文件，就导致她们前功尽弃。为什么她们没有在她的兔子测试显示阳性时预约就诊？为什么她们没有一见血就去急诊？

有人重点审查格蕾丝的背景，从她的位置数据中寻找难以解释的缺失，联系可以证明她品格的证人。然后，寻找她甚至不知如何掩盖的证据：对她的家废水管线进行药物检测。

她因谋杀罪被逮捕，但是公设辩护律师告诉她，如果她承认失去理智，被自己没能堕胎的回忆和没有男人支持的生活冲昏了头脑，那么检方可以给她降为非预谋故意杀人罪。格蕾丝不想被塑造成以前那种在一阵歇斯底里中逼着女儿吃下堕胎药的疯女人，但是认罪就会把不可假释的刑期从二十年缩短到十二年。

格蕾丝会离开，奥利维娅将由格蕾丝自己的母亲监护。

被领出法庭的时候，格蕾丝只有一个想法：我度过了属于自己的五年，那五年属于我。

现在是 1993 年，她非常想要这个宝宝，他们一直在不断尝试。她能听见心跳，可大脑没有发育。她的身体不会主动放弃胎儿，医生说我很抱歉，可我不得不亲自动手取出。

现在是 2015 年，她不得在一个周二偷偷溜进诊所，因为她所在的教会青年团要在周六去这家诊所抗议。她需要几天时间恢复，否则他们会奇怪她为什么不去。她将在恢复室里哭泣，同时还指控护士是谋杀犯。

现在是 1965 年，她手里攥着两位心理医生分别开出的证明，必须得说服医院评审委员会自己有自杀倾向，只为了不必说明原因就可以在一家精神病院住上两晚，并在手术前进行备皮。不过这种方法管用，虽然丢脸但是管用。她明白自己找到这条出路有多么幸运。

现在是 1150 年，莱茵河畔女先知希尔德加德·冯·宾根作为院长，定居在以她的名义建立的修道院，她正准备撰写医学著作《自然界》和《病因与疗法》，在这两本书里，除了众多药物之外她将列举自己尝试后最有效的堕胎药，教员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不过，在怀孕四个月的胎动初感之前堕胎不算谋杀，因为那时灵魂才进入胎儿的身体，所以一位修女像这样照顾她的教区群众就不算出格，仅仅是着眼于实际情况。

罗马人用罗盘草，中国人用牛膝，肖肖尼人用紫草，拉科塔人用黄花蒿，夏威夷人用神奇的药用植物黄槿、檄树、卡瓦胡椒和嫩朱蕉叶。维多利亚时代有艾菊茶、叉子圆柏、麦角菌、黑色顿服剂、锦葵和益母草；千禧一代有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气候酷派有无人机直接派发到卫生间滑道的妊娠阻断器和黄色堕胎药。

现在是 1750 年，玛丽正在查询一本折角的《美国指南》，最受欢迎的家庭教科书，今天她一直在思考的不是算术课程——不过数学会派上用场——而是最后医学部分的一个条目。

玛丽在阅读如何治疗未婚妇女最常抱怨的症状：月经不来。实际上，玛丽的月经已经推迟了好几周，作为有一定收入而且不愿再婚的寡妇，她不是第一次考虑这种家庭治疗方法。为了治好自己的病症，她得用腹痛根清肠，然后每天两次服用薄荷水加氯水，连续服用九天，然后停用三天再继续服用九天。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好过另一种选择。

(1750 年，数十个土著部落遍布在北美洲的广阔土地上，他们有超过一百种选择，然而玛丽只有这本书。)

一如往常，她对这段内容最后列出的警告和预防措施轻声嗤之以鼻。结尾是一本正经地劝诫不要盼着找漂亮伴侣，或其他的渣男。她当前的伴侣不是渣男——他真的非常值得尊敬——不过玛丽没打算把自己的身体或财产绑定在另一个主人身上，不管他有多漂亮。她曾目睹自己的母亲在四十二岁时死于分娩，眼看着自己的姐妹深陷在过度的家庭需求中难以自拔。

首任丈夫的离世给了玛丽随意行动的自由，以及管理自己家庭和掌握自身命运的自由。她不会轻易放弃。

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好过另一种选择。

现在是 2119 年，格蕾丝没有放弃，但是痛苦万分，度日如年。

今天她就要出狱。

她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女人，而是变得更加愤怒，身体疼痛。上一次病毒在监狱人口中肆虐，给她留下了一直咳嗽的病根。然而过了十二年之后，她仿佛跟害怕无法重获自由一样害怕重新回到社会。

奥利维娅在停车场等她，她们互相注视了一会儿，这个片段如同加州的山火一样炽烈，然后她们抱在一起。

奥利维娅的汽车后座上有一个小孩，四岁的年纪，正把鼻子挤在车窗上。为了纪念数十年努力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活动家，他的两位母亲给他取名雷利。浪潮又转向身体自主权，一代人选择伴侣的抗争又推动了他们决定家庭规模的抗争——这与历史上民权进步的作用关系正相反，未来几年会为论文主题的选择提供灵感。

“我真想你。”奥利维娅说。

“我想念一切。”格蕾丝自己坚持了很久，她拒绝在离监狱大门三米远的停车场崩溃——可她就要坚持不住了。

然后奥利维娅说，“我会在下周裁决时发言，你要参加吗？”

格蕾丝颤抖了一下，这太快太难以承受。近几年来她的世界已经缩小到几面墙和一些熟悉的面孔，如今奥利维娅要让她站在万人面前？

“求你了。”奥利维娅说。

格蕾丝闭上了双眼。

她服刑期间，世界继续崩溃，过去十年已经见证了更多的洪水和火灾、飓风和热浪、陷落的海岸线和用尽字母来命名的病毒。有些灾难波及到监狱，造成停电、食物腐败、疾病蔓延和管理疏忽，可其他灾难只是新闻头条，让她们简单了解外界正在等待她们的悲惨生活。格蕾丝错过了骚乱和暗杀，错过了全国罢工和选举日的多处爆炸。不过也有进展和小规模的胜利，奥利维娅真心相信下周就会取得巨大的胜利。

这件事就要出结果，最终的投票结果。国会即将推翻禁令，向超过一半的人口归还一定程度的身体自主权。现在已经不存在堕胎药供应链，只有不多的医生偶尔被允许执行罕见的紧急手术，并在其中得到锻炼，他们一定不会欢迎任何地下助产士加入他们的团体、弥补他们不足。但是他们有一位总统在等待签署法令，有迫切涌入市场的业务，有价值数百万美元、完全由明星出演的宣传视频蓄势待发。

如果法案通过，如果。

如果不通过，那么在奥利维娅请求格蕾丝去的地方，情况将会变得可怕至极，会出现暴力行为，无人机投下催泪瓦斯，跟国民警卫队机器人发生冲突，会有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

格蕾丝想象那种混乱的局面，突然间又回到了九岁那年，作为支持子宫管制的海报儿童被拖到聚光灯下；她听见自己的命运在透过扩音器被高喊出来，她站在麦克风旁边，附和着我母亲救下我的性命，你母亲救下你的性命；还有两个月就到十八岁时，她被扇了一耳光，正在缓解脸上的刺痛，她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吃饭和锻炼都出不去。她目睹自己的一生从眼前闪过，想知道如果有权自主选择，她会成为怎样一个人。

她母亲助力损害了这个世界，她女儿正在努力修复。

她看着小雷利。他仍然把脸抵在车窗上，注视着格蕾丝，好奇这位刚出狱的外祖母是何许人也，格蕾丝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她说，“我去。”

现在是 2119 年，奥利维娅站在讲台上，身后有数十人，面对着上万人，她的妻子站在旁边，她们的婚姻两年前才变得合法。她的儿子挤在她俩中间，被灯光晃得有些眼花。

参议员通道旁密不透风地站立着警察部队，蓝灯在他们壮实的胸膛上闪烁，空中布满摄像头——用于军事监控和媒体报道，代表无数无法亲自到场的支持者。

现在轮到奥利维娅发言，她在这里代表草根阶层。在逃离外祖母家当天，她就成为其中一员，在一张又一张沙发上过夜，靠一份又一份薪水过活。她来代表在坎坷道路上努力讨生活的每一员。

她高喊，“没理由遵守一项恶法！”人群的吼声震耳欲聋。她把雷利紧紧拉在身边，这是她选择的孩子。然后她谈起过去、现在和未来。

“每次变革，我们都寻求更多地了解我们的身体，”她说，“每次变革，对身体的了解都把我们束缚得更紧，把最后期限设置得更近，把私人决定交给公共官员掌控，就好像信不过我们为自己做出选择。”

奥利维娅把另一只手臂用力一挥，她说，“我们只想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想决定自己生命的进程，而不是眼看着每项科学进展都被当作武器用在我们身上。现在是 2119 年，假如我还没准备好，没建立一个值得共同生活的家庭，就被强迫生育，那么我不会有这个孩子。然后——”

现在是公元前 1350 年，她正在往麻袋里的小麦和大麦种子上撒尿，等着看它们多久会发芽，这种方式常常会有效果，超出你的想象。

她只想了解情况，无论结果如何，她好做打算。然后——

现在是 1021 年，她正看着国王的医生把硫磺倒在她的尿液上，他相信二者的混合物中会钻出虫子，所以正在寻找。你觉得这么做没用，的确如此。

她只想了解情况，无论结果如何，她好做打算。然后——

现在是 1658 年，她在家里等待当地的尿液预言者。他把尿壶举到光亮中隔着玻璃凝视，评估里边液体的颜色。

她只想了解情况，无论结果如何，她好做打算。然后——

现在是 1998 年，李·伯格 [3] 刚刚识别出导致澳大利亚蛙类种群衰退的真菌。皮肤上携带这种真菌的非洲爪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它们被用于尿液注射妊娠检测，出口数万只。如今世界上百分之三十的两栖动物有灭绝的危险，都是因为这种真菌。

对于蛙类来说真是不幸至极，然而所有那些人只想了解情况，无论结果如何，她们好做打算。因为——

——因为她仍然身陷上次生育产生的万元债务。

——因为如果停药她就会丧命。

——因为一想到怀孕会让他呕吐，让他昏倒，他会受不了。

——因为他们如果不完成学业，就得在家长的地下室抚养这个孩子。

——因为她根本就不想怀孕，她不愿意，她不需要用临终、未成年或逃离恶魔来作为理由。她的医生说她不能进行输卵管结扎手术，除非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可是生三个孩子才允许她不要孩子的逻辑何在？

现在是 2084 年，她在大喊，“我们的祖母外祖母为此拼命抗争。”

现在是 2206 年，她在大喊，“我们的祖母外祖母为此拼命抗争。”

现在是 1878 年，雷斯泰尔女士在她的浴缸里流血自尽，而不是屈从于下一场审判。现在是 1821 年，阿塞纳丝·史密斯羞辱地逃离家乡。现在是 1972 年，组成简的女士中，有七位在一次突袭中被逮捕。现在是 2086 年，格蕾丝的医疗记录正式被更新为那个最可疑的类别：可能怀孕。

现在是 2022 年，抗争没有结束。

现在是 2022 年，抗争绝不会结束。

[1] 梅森 - 迪克逊线 (Mason and Dixon's Line) 是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线。实际上它是划分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至西弗吉尼亚州一部分的东西边界线，也是马里兰和特拉华间的北南边界线。在殖民年代，这条线将奴隶殖民地和自由劳动的殖民地分开来；在 19 世纪上半叶，这条线将自由州和奴隶州隔离开来。

[2] 棉花根皮中含有的棉酚和催产素都可导致流产。

[3] 李·伯格，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和兽医学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现了造成多种两栖动物种群衰退和灭绝的蛙壶菌。



萨曼莎·米尔斯

美国青年科幻、奇幻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品发表于 *Uncanny Magazine*, *Beneath Ceaseless Skies*, *Strange Horizons* 等杂志，短篇小说《兔子测试》入围 2023 年度星云奖短篇小说奖。首部长篇小说 *The Rise and Fall of Winged Zemolai* 将于 2024 年出版。

####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题图来自 [Teemu Paaninen](#) on Unsplash

## 小说

# 摩天大楼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 故事群岛

一切故事因你而起，就算我极力逃避，  
这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爱情故事。

1

因为不想留短发，我没能去成纽约。父亲也没有读我写的《给父亲的一封信》。

“我想哭的时候再读，”他这么跟我说，“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哭。”

当时我不知如何作答，现在依然不知道。正因为如此，当时我才写作，现在也继续写作。

现在的我写下的，是我以前没有及时想到的那些回应。准确地说，是那些回应的草稿。

比方说，曾经我首次尝试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删去了你。我本以为可以假装你不存在，就像是你缺席了一场演出，我们这些别的演员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即兴做出一些调整。

当下我才懂得，一切故事因你而起，就算我极力逃避，这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爱情故事。

2

仅仅一周以前，一切都还井然有序——说“一切顺利”恐怕不太合适，毕竟从未有什么事情真正顺利过，不过有时候得过且过也不错，甚至能带来些幸福的日子。父亲和我坐在车里，开着车窗，听着新闻。或许我们看上去像是朋友、兄弟，在上班路上高高兴兴地享受着彼此的陪伴，谈天说地，打发路途时光。

“你该学学开车。”那天早上，在等一个红灯时，父亲对我说。

从我十四岁——甚至可能更早，大概十二岁——开始，我就一直听他这么劝我。如今我二十岁了，我想着的确应当学一学，学开车是有用的，哪怕只是满足一下这个令我愉快的愚蠢想象：在盗走父母的一切后，开车上路，飞速逃走。

“我可以学一学，没错。”

“要我教你不？”父亲热情地问。“明天吧？是星期天。”

“明天，很好。”

父亲的办公室在市中心，不过他先绕了几个街区的路，把我送到了美国领事馆附近，我预约了申请签证。我本以为手续会很冗长，结果一个小时就搞定了，甚至去上斯丘斯特的课都没迟到多久。不过迟到也无所谓，因为斯丘斯特老师憎恶一切循规蹈矩，所以我们何时进出教室完全无需任何托词，仿佛教室是条大马路，而我们只是为路上某位演讲者或游摊走贩临时驻足的过客。

我和往常一样躲到了最后一排，取出塞萨尔·巴列霍的作品复印件和我那个巨大的笔记本，我习惯在上面写下一些零星的语句，也懒得做笔记，毕竟就算最学霸的同学也没法记录下吉列莫·斯丘斯特老师那些偶尔精彩、永远混乱的自言自语。印象中，他总是口若悬河，右手一根吉坦尼斯香烟<sup>[1]</sup>，左手一杯咖啡——准确地说，并不是端的咖啡杯，而是保温杯的盖子。每吸一口或每抿一口，都让他渐入佳境。他的演说往往始于泛泛的评论，既模棱两可，又合情合理，然后洋洋洒洒地发散开来，最终离题千里。或许正因如此，有传言说他那保温杯里装的其实是咖啡加威士忌或咖啡加皮斯科酒，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保证斯丘斯特上课时喝的是纯正的波兰伏特加，那玩意儿要是跟咖啡混在一起，肯定一团糟。

“老师，请问你能把烟灭了吗？”那天早上，有人突兀地这样问。是一位不认识的女同学：是你。

我看到你坐在斜对面的第二排，正不耐烦地晃动着左腿。

“为什么？”斯丘斯特老师回问，满脸疑惑，像是听到了一句胡话。

“我是孕妇。”你回答。

说起来有些难以置信，那时候，教室里不但没有禁烟，甚至还觉得吸烟是合乎情理、近乎天经地义的。哪怕在窗户紧闭的大冬天，室内也常常燃着五六根香烟。要是在电影里看到这种情节，大家恐怕会觉得是种夸张、是烂俗的桥段或滑稽的场景。

我以为斯丘斯特一定会无比惆怅，会跟平时一样自嘲解围，但他只是好奇地盯着你笑了两三秒钟，然后在地上踩灭了香烟。他的助教一向是带着粉丝的姿态来到课堂，总是和老师保持着同步的吸烟节奏，仿佛二人都来自某个精挑细选的吸烟者团队。结果他也只好灭掉了自己的香烟；而我不得不压抑着自己想点燃一根的冲动。

下课后，斯丘斯特和助教快步走向停车场，我跟上他们，想说说旅行的事。

“请假倒没问题，你别担心”，斯丘斯特摸着自己的脸，仿佛在捋顺想象中的一把茂密的胡须，“不过这个城市嘛，我觉得说不过去。纽约，我不喜欢。”

“为什么呢？”

“大家太高估它了。”他带着自己那一贯的学者风范的质疑腔回答。“我的一个儿子在那儿住过十年，住在布鲁克林。”

“纽约，这城市不怎么样，”助手附和道，“糟糕极了。”

“我的一个儿子”，我琢磨着这说法，震惊于斯丘斯特竟然有不止一个孩子。我可以轻易想象他是一位父亲，毕竟我认识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至少一个孩子，可斯丘斯特竟然繁育——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词——了两个或更多的人类，这在当时让我觉得奇怪，或者说是震惊。

我正要点燃手里的香烟，就看到你走了过来。

“你还有烟吗？”你问我。

“你不是怀孕了吗？”

“有些孕妇也吸烟的。”你应道。“不是，其实我刚没了孩子。就刚刚，在洗手间。真可怕。”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大概有半支烟的功夫。

“那你为什么让斯丘斯特把烟灭了？”

“就是恶心他，这位先生话太多了。其实我从来没怀孕过。”你补充了一句，像是很有必要澄清此事。

“你喜欢这门课不？”

“喜欢。我们分析过的那些诗歌我都挺喜欢。巴列霍让人惊叹。我听不懂斯丘斯特老师讲的那些东西，但我觉得我是喜欢这门课的。他所有的课都这样吗？”

“是的。斯丘斯特挺疯的。”

那天我该去上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课，可我想跟你漫无目的地一起走走。你告诉我你打算选文学课，去斯丘斯特的课则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都不想学习，”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愿意学。”

和我一样，你也是二十岁的年龄，可你听上去相当成熟，或者说，当时我认为，从某种角度说来，你是一个阅历丰富、高贵典雅的人。直到那时我才有机会好好打量你，发现你的眼睛大得离奇。我还注意到你有些细长的鼻子、修长的双手和精致的绿色指甲。你留着长发，不过比我的短。我的头发是齐肩的，你的身高也到我肩膀，不过当时我觉得你就是身

材特别显高的那类人。

结果他也只好灭掉了自己的香烟；而我不得不压抑着自己想点燃一根的冲动。

我们一起朝努诺亚广场走去。我一直拒绝沉默，毕竟那时的我还没发现，和你一起咀嚼沉默也并非毫无可能，且大为必要。我跟你说起了关于纽约的旅行，尽管我努力想表现得轻松世故，可我清楚，我听上去并不自信，我恐怕应该先在镜子前演练一番。你是去过纽约的，还去过欧洲好多地方，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你最喜欢的城市，已经数不清去过多少次。不过当时，你并未跟我提起这些，只说你去过纽约。

“你最喜欢纽约的什么？”

“保罗·克利的画。在大都会博物馆。棒极了。不止喜欢而已，真的非常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它们让我感到幸福。”

你的句子很短，吐字之间却停顿很长。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一部唯美的慢节奏电影中的女主角，而我却颇似一个第一次得到严肃而重要的角色的喜剧演员，试图向世人展示自己转型成功，却着力过于明显，只显得自己的努力那么悲哀。

我们走进了“愤怒的玩偶”书店。我每天都会路过那儿，常在里面呆上好一阵子，有时甚至一整个下午，和当班的店主聊天，尤其是米格尔。我几乎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不过我也喜欢和中国小子、和丹妮瑟说话。他们三人都是我们这个系毕业的，不到三十岁却已成功经营了一家有品位的小书店，然而——或许正因为如此——书店已岌岌可危。他们不卖、或至少尽量不去卖那些庸俗的书籍。三人按照共有的、引以为傲的文学理念来布置橱窗和展柜。如果有顾客问起他们认为平庸或商业化的——他们认为二者就是一回事——作家的书籍，中国小子和丹妮瑟会到仓库找出存货，不情不愿地卖出去。可米格尔不会如此，遇到这种情况，米格尔会夸张地瞪大他那双绿色的眼睛，带着几乎难以自持的满足回答：“我们这儿不卖那种档次的书。”

我和你浏览着店里的橱窗和展柜，兴致盎然地互相推荐书籍，在发现有趣味相投的荐书时倍感愉悦，还幻想着将来可以一起把它们读完。生命中有那么三四十分钟，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我住得很近。”你突然说，“我其实很想请你去家里看电影，不过这会儿我得走了，我该遛狗了。”

你买下了刚刚翻看过的奥尔加·奥罗兹科的书，快步离开了。好几秒钟内，我感觉糟糕透顶，觉得再也见不到你了。

“她常来。”米格尔告诉我。“一般是中午，或者更早，十一点左右。她会看上好一阵子书，有时买两三本，有的时候在一个小红本上做点笔记，什么都不买。”

“她一般买什么书呢？都是诗歌？”

“诗和散文，也有哲学类，有时也买小说。你喜欢过她？还是说现在也喜欢？”

我紧张起来，觉得这问题除了直白、狡猾，还透着一丝残忍。

“她不一样。”

“跟谁不一样？”

“说不好，大概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的这位朋友放声大笑，我感觉心思被人看穿，一览无余。我想离开书店，可米格尔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适，出门去长矛咖啡馆<sup>[2]</sup>买咖啡了。我很享受我看管书店的这屈指可数的几分钟——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书店销量回暖，他们希望我能去帮忙。可他们又说，从目前看来，这是毫无希望的。我和米格尔喝完咖啡后，我本想着帮帮他，因为他被一个Excel表格搞得焦头烂额，结果我却很快在角落坐下，翻看起几本诗集。没有哪本里有奥尔加·奥罗兹科的诗。

傍晚的时候，电视演员阿尔瓦罗·鲁道夫到店里来了，凭着巨大的名气带来的自信，他向米格尔投去一个职业笑容，像是在做节目一样，然后招呼道：

“嘿！小伙子，给我推荐本书吧！”

“办不到。我不认识你。”米格尔迅速而生硬地回答：“我都不认识你，怎么给你推荐书呢？”

鲁道夫茫然地、甚至是带着一丝屈辱地离开了书店，我和米格尔则在大笑中关上了店门。

“我们去但丁餐馆吃饭吧。”米格尔建议。

“我都不认识你，怎么跟你去吃饭呢？”我回答。

几个三明治、几杯啤酒下肚后，这个新句型带给我们的欢乐依然意犹未尽。这句型简直百搭不爽，无所不能。我都不认识你，怎么能分炸薯条给你吃呢？我都不认识你，怎么能把蘸酱递给你呢？我都不认识你，怎么能买单呢？其实我们完全不讨厌鲁道夫，甚至觉

得他是位不错的演员，可回想当时他那张阴沉下去的脸庞让我们有种莫名的成就感。

米格尔走后，我一个人在努诺亚广场的一张长椅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想着万一你会牵着你的狗狗出现呢。我不愿回家。几乎午夜时分，我才登上一辆小公交，一路打着盹，脑袋不时撞到车窗玻璃上。

### 3

第二天早上，我在榨汁机那地狱般的咆哮声中醒来。很不幸，这是父亲的老套路：他看不惯我们在他读完日报的体育版——他唯一感兴趣的版面——之后还没起床，总是颇有心机地故意榨上几个橙子，然后放一杯橙汁在我堆满书籍的床头柜。

“你不能同时读着二三十本书。”他批评我说。

我想反驳说，我就是可以同时读二三十本书，说诸如诗集一类的书，其实从来读不完。不过我还是宁可装睡。

“你该剪头发了。”父亲又说。“为了去纽约嘛，你这么留着长发会被鄙视的。”

父亲离开了房间，有那么几秒钟，我还寄希望于他别再返回。我起身一口气喝光了橙汁，嘴里叼着空杯子看了一眼天花板。这功夫，父亲又进到房间，我感觉到他充满期待的目光，不过我没有看向他。

“你剪头发吗？剪还是不剪？”父亲问。

“不剪。”

“如果不剪，你就别去纽约。”

“不去就不去。我对纽约不感兴趣，反正我不想剪头发。”

我对纽约不感兴趣，这倒算得上是实话。那会儿我对纽约有什么了解呢？从《出租车司机》<sup>[3]</sup>或《宋飞正传》<sup>[4]</sup>里看到的那些？还是从弗兰克·辛纳特拉<sup>[5]</sup>那平平无奇的歌里听到的那些？随便哪座城市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毕竟我曾背着背包，辗转于公交和火车之间，走遍了大半个智利，可我从没坐过飞机。

我一个人在努诺亚广场的一张长椅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想着万一你会牵着你的狗狗出现呢。

这趟旅行是一份礼物，而且完全出乎意料，毕竟好些年来，我和父亲无事不吵。说来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都是父子之间老生常谈的那些矛盾，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可这并不足以安慰我、满足我，因为父亲总是吼得比我大声，从不道歉。在一次特别激烈的冲突后，父亲找到了这么个请我原谅的法子：用积累的几千公里行程给我订了一张机票，以为这一定能制造惊喜的效果，因为他亲自选定了旅行日期和这个听上去又陌生又诱人的目的地。

“那你就别去纽约了，你这个混蛋！”父亲感到难以置信，断然喝道。“你会跪着来求我的，你会后悔的！”

“我才不会后悔。”

把自己这个刚产生的、宣示独立的想法说出口后，我体会到肯定句和话语中不容置疑的语气带来的快感和权威。于是我做了另一个决定：终于，我要离家独居了。

“很好，机票取消了。”几个小时后，父亲告诉我：“我刚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取消了行程。”

“棒极了。”我回应。

“嘿，那我什么时候教你学开车？”

“什么时候都不学，这辈子都不学。”

“可我们已经说好了。”

“可我们生气了。”

“你很清楚，这两件事没有关系。”

“有的，有关系。”

### 4

整个周末，我都把自己关在房间，翻看着小桌上那二三十本书，周一和周二则一直在找房子。我有一些靠做助教和假期打工存下的积蓄，可远远不够付房租。我绝望了，因为我仅有的退路就是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家里。最后，我奇迹般地找到一间便宜屋子，就在国家体育场对面的一套公寓里，离学校非常近。

搬家的日子定在周四，所以我还有一整天、也是最后一天时间，搜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

像是要为将来的回忆做好储备。然后我在小区逛了逛，试图演绎出对那种不择手段地平步青云的人的嘲讽：傲慢地四下打量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仿佛滋生出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冷漠、不屑和怨恨。我鼓起勇气想象着自己双手撑在长矛咖啡馆或天鹅餐馆的某张桌子上，和新朋友们展开有趣的长谈的场景——彼时我还讨厌“有趣”这个词。一时间，甚至连系里那并不令人感到惬意的草坪，在我眼中也成了理想之地[6]。

我跟母亲和姐姐谈过了，请她们替我保守秘密。她们既担心又支持，让我莫名觉得有些惶惑。她们就寝后，我留在餐厅，打开了电视。我跟她们无需商讨，反正父亲肯定会在科洛科洛队的比赛开始前赶回家。果然如此。我们已经好几天没说一句话了，竟然还一起看完了比赛，甚至有些简短的交流，诸如“该给红牌的”或“这没越位啊”之类。我连球赛的结果都不记得了，似乎没有进球，或者也可能进了。真正打成平局的，其实是父亲和我。

父亲扬起眉毛对我说“晚安”，而我并没去睡觉。那天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我还没读过卡夫卡的《致父亲》，可能都还不知道它。因为不想自己糟糕的字迹破坏内容，所以我把信写在了家里的电脑上。我选了 Century Gothic 这个字体和很大的字号，大概是 18 号或者 20 号，好让父亲不戴眼镜也能看清。其实他只在睡觉时才摘下眼镜，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想象着他把纸张凑近那赤裸的、真正的——姑且用这样的形容词吧——双眼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都出门后，我把信打印出来，有十二页，内容并不咄咄逼人，而是颇为做作夸张，又温和动人——哪怕我已经极力避免这种温柔。我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个别无他法、只得将离家出走作为唯一出路的成年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己憎恨父亲和自我仇恨。我把信装进信封，从硬盘里删去文档，开始用几个垃圾袋打包我的书。清理数目后我挺惊讶：一共九十二本。随后我的朋友莱奥·皮诺斯到了，他弄到一辆小货车，其实装我的这九十二本书和仅有的一些衣物，只需要一辆小轿车就足够了。

5

“我要说的都在信里。”第二周的周五，我和父亲再次相见时，我这样告诉他，语气中颇有一种文学家的自豪。

“我没读。”

“没读？”

“我想哭的时候再读，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哭。”

我唯一想知道的就是父亲读到信时作何感想，可从来没料到他根本不读。当时，我们在他办公室的一间小会议厅里，仿佛正在筹划着某家小公司的战略计划似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要谈些什么。或者说，我知道，是该谈的事情太多了。父亲讲了一些乏善可陈的话，跟从什么父子相处教程上摘抄下来的似的。我注意到，他那刻意显得温和的严厉语气中，流露出一种独断的态度。和往常一样，我还留意到他眼里——尤其是左眼里——那源源不断的液体，像是汇聚了无数涓涓细流的长河。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它们意味着一种痛苦，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将我们置于何地。这既是父亲的痛苦，也是我的。这种痛苦来自于看向一个人的双眼，却知道自己并不了解他，来自于虽与一个人朝夕相处，却并不了解、也永远无法了解他。

“我们说好了吗？”父亲问我。

我没听他讲话，或者说只关注了他嗓音中那种隐隐约约的节奏感。

“我没听。”我答道。

“什么？”

“我走神了。”我承认。

父亲努力挤出一丝残存的耐心，又说了一小段话。我则大吼起来，如今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但当时父亲只是冷漠地死死盯着我，像是正在辩论场上的政治家，也像个死人。

“我们可别再无事生非了，”父亲猛然打断了我。“你就喜欢添乱，总是夸大其词。你离开家了，就是这样。在有些国家，孩子比你更小时就离家了。要在美国，你早就该独立了。我可高兴着呢，我多了个空房间，我寻思着在那放一台大电视，看电影看到凌晨五点。”

6

我去上斯丘斯特的课又迟到了。其实我不想上课，但想见到你。可你不在。班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是助教在上课。那堂课与往日不同，充满了奇谈怪论。我们读了马丁亚当的《纸板屋》的片段和路易斯·奥马尔·卡塞雷斯的一首诗，头几行让我印象深刻，仿佛故人重逢：

如今，道路已湮灭 / 我们的汽车倒影舔着它的亡灵 / 用那惊愕的舌头。

某种程度上，它们意味着一种痛苦，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将我们置于何地。

琢磨着这首诗的节奏，我朝着努诺亚广场走过了大概几个街区。我想和米格尔聊天，可到了“疯狂的玩偶”才发现，我其实是想和你聊天。我问米格尔你去过书店没，他说没有。

“你会没事的。”听完我的近况后，他这么跟我说。

他向我问起诸多细节，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缺不缺钱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我告诉他。

“可我给不了你工作。”他回答。“我自己都快没工作了。我们要关门了，基本上定了。”

“什么时候？”

“最多一两个月内吧。我们尽量多撑一阵，撑到圣诞节，不过最多也就这样了。”

“糟透了，烦死了。”

“我们没法雇你。”

“当然了。”

在“疯狂的玩偶”工作的憧憬曾像魔术一样修复了一切，可那个时候我却没有想到迫在眉睫的经济上的窘迫，因为更让我难过的是想到这个地方将来空空如也的样子，想必会被什么咖啡馆或者愚蠢的发廊占据。我在书架上找到了《理想保卫战》那是路易斯奥马尔卡塞雷斯唯一的一本书，然后把每首诗读了两三遍。米格尔不时念出几个句子，我也一一应答，像极了在医院候诊室或什么聚会上无意间坐在一起的两个陌生人友好随意的闲谈。当我准备离开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写着十个有可能为我提供工作的人的联系方式。

“我要把头发留长，算是支持你。”我们拥抱着告别时，米格尔这样对我说。

7

我买了几个玉米饼和几片奶酪，想着那个空荡荡的书店，朝新家走去，可我的脑子里也不时浮现出自己留着短发、一脸迷茫或是一脸憧憬地游荡在纽约某条知名道路上的场景。我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苗，一棵新长成、被修剪过的小树，正努力伸展枝条，希望获取阳光，再度成长。想着这些，我突然看到了你，牵着你的狗，近得快踩上我的脚了。

“我们跟着你——跟踪着你，走了好几个街区了。”

我不信，但我随即意识到这是真的，意识到从好一阵子前开始，你就已经近在咫尺。

“为什么？”

“我想跟你介绍阿弗。”

阿弗是一只黑色小杂狗，眼睛湿湿的，长得有点像腊肠狗，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对周遭几乎不管不顾。我本以为它瘸了腿，但随后想到它可能只是用轻快的跳跃来装点自己的步态。你跟我说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狗狗弗勒希[7]，说小狗的名字由此而来，你还把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地下人》送给了我。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本书，后来读完后，每隔两三年我都会重读一遍，迫不及待地希望一次次重新体验小说结尾带来的强烈震撼，那是我认为最精彩的结尾之一。

我们走到我住的楼下，坐在楼梯中央。我给面包涂上奶酪，狗狗也吃了些。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一切天翻地覆，我尝试跟你解释，即使解释起来需要讲完我的整个人生——并非波澜壮阔，但或许当时的我却是这么认为的。我跟你讲了几乎所有事情，差不多讲了两个钟头，到我觉得无话可说时，已是黄昏，我等着你开口，可你没有。

“我们进屋吧，有点冷了。”这是你唯一的一句话。

房东女士正在接待几位游客，我看着像是加拿大人，他们打算租下另外几间屋子，房东和女儿则打算用睡袋睡在客厅。她给我们倒了红酒，但我们想去我自己的房间。你怡然自得地在床垫上躺下，仿佛是自己的屋子，阿弗在你脚边趴下，咬着它的皮带，想让你把它解开。我本想整理一下屋子，因为之前一直没找到放书的搁板，所以它们和衣服一样，都还在一包包垃圾袋里。

远处的一盏灯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我看着你，你说话时几乎都不动嘴唇。你说起了过世的母亲，说起了她和父亲常看的那些电影，如今都是你陪着父亲在看。“加布列拉很喜欢这一段”，父亲常冷不防地提起，那种热情让你觉得既振奋又伤痛。你还提到了你失眠的毛病，提到你吃的那些药和你想写的一本关于失眠的小说。提到了几年前在佩尤雅溺亡的一位女友和仇恨的四五个人，我记得有你中学时代的几个闺蜜和一个前男友。我当时想，这些人既不值得你仇恨，也不值得任何人去恨，不过我没说出来。我记得我经历了

那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幸福：因为你并不恨我。突然，毫无预兆地，你哭了起来，于是我试着安慰。

“你爸真让我抓狂。”你解释道。

“你为这个哭？因为我爸？”我很惊讶。

“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为什么事情而哭，我并不难过。”你跟我说，“我从来不为什么事情而哭，我就是习惯哭一哭，我觉得哭喊是好事。”

“我也觉得。”我笑着回应你。

“也不对，我哭是因为我随时都很放松。我不是这样的。”

“我喜欢你，哪怕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我也随时都很放松，跟你在一起或是跟别人在一起都一样。”

“是的。”

我们突然沉默了好长时间，这沉默让人觉得意义非凡、心情愉悦。我像是一个背诵着购物清单的小孩，反复回味着我们对话中的细节，不想忘掉一丝一毫。

“你觉得你父亲会去读那封信吗？”你问。

我的确刚跟你聊过那封信的事情，不过我以为那段对话已经彻底结束了。一时间我很难再去设想父亲读信的场景，我也觉得和父亲的那段对话已经时隔良久。我希望诚实地回答你：我认为父亲已经读过了那封信，只是他不愿对我承认，所以跟我说他没读过。

“他肯定读过了，我确定。”你说。

阿弗睡得正香，你去了洗手间，回来后又在床垫上躺下，可不到十秒钟，你像是想起了什么急事，站起身来，打开灯，把书从口袋里一本一本取出来，几乎看也不看，开始把它们一本一本往上摆。

“这就是你的纽约。”你宣布，“你看，这些都是曼哈顿的高楼——摩天大楼。”

我们用那些书搭建起了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和双子塔——那时双子塔还完好地矗立着。我们没有接吻，没有上床，对未来懵懂无知。或许我隐隐预感到，憧憬着，我们将会度过漫长的时光，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一辈子。但我并没有去想象这些时光是充满乐趣的、紧张刺激的，抑或是苦涩难过的，没有去想象这段时光之后，会是更加漫长的岁月，恐怕无穷无尽。彼此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刻，或许有可能做点什么，例如讲个故事——任何一个别的故事或就是现在这个故事——来忘掉你。但当时的你，依然是无法抹去的，当时不能，永远不能。而那个晚上，任何关于未来的想法都不太重要，比不上我们一起用书本作砖头搭建起来的一栋栋摩天大楼，它们宏伟壮丽，遥不可及，冰冷荒唐，美丽无比。

[1] 法国品牌香烟

[2] 智利圣地亚哥市的一家历史悠久的咖啡馆

[3] Taxi Driver, 美国电影, 1976 年上映。

[4] Seinfeld, 美国连续剧, 第一季于 1990 年播出。

[5] 美国歌手 (1915-1998), 创作了《纽约, 纽约》(New York, New York) 等许多与纽约有关的歌曲。

[6] 原文为拉丁文: locus amoenus

[7] “弗勒希”(Flush) 是弗吉尼亚·伍尔夫 (1882-1941, 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 的小说《弗勒希：一条狗的传记》中的小狗。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智利小说家、诗人。他 1975 年生于圣地亚哥，在智利天主教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目前在智利迭戈波塔利斯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他的第一部小说《盆栽》即轰动文坛，并获得当年的智利文学评论家奖最佳小说奖和国会图书大奖。他还著有诗集《无用的海滩》《移动》，散文集《未读之书》、小说《树的隐秘生活》《回家的路》和短篇小说集《我的文档》。2010 年，他入选《格兰塔》杂志评选的“最佳西班牙语青年小说家”。

译者：童亚星

女，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西班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教师，热爱翻译创作，曾多次参与各类重要口笔译工作，出版有《回家的路》《黄雨》《我的文档》等多部西班牙语文学作品译作。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题图摄影：朱凯麟

会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同时，希望一切都不要太晚。

## 前言二，写于 2019 年，原载于“好奇心日报”大庆专辑

2009 年 5 月 20 日，查滨华和先生杨瑞松从南京出发，开了一辆小红“奔奔”，往大庆驶去。当时他们已经年过七十，刚学会开车不到三年。一路上他们途径了九个城市，到达五千多公里外的大庆时，已是 6 月 3 日。

2009 年是大庆油田发现 50 周年，市里举办了官方的庆祝活动。但查滨华和杨瑞松没有参加。对他们来说，这个年份的重要意义是他们离开大庆 35 年了。杨瑞松说，希望“和青春正式地告个别”。他还说，现在的生活和在大庆的生活，就像是“两辈子”。

1962 年，查滨华和恋人杨瑞松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主动要求被分配去大庆。他们希望“用毕业生的精力，在大庆盖一个石油城”。但直到 1974 年两人离开大庆，那里都没有一点城市的面貌。

我们最早是从一本关于大庆早期建设的学术著作 *Building for Oil* 里知道查、杨两位老人的。该书的作者、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副教授侯丽在查阅 1966 年的《建筑学报》大庆特刊时，读到了查滨华的一段发言，当时查滨华是大庆一种特殊夯土建筑“干打垒”的设计代表，参加了延安建筑学会。侯丽找到了他们。但除了侯丽，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这不妨碍查滨华和杨瑞松持续地写作。2017 年，他们把大庆回忆录《萨尔图往事》印成书。在我们读过的回忆录里，这本称得上上乘之作。到今年为止，他们一共写了 21 本书，还有 14 本书在计划中，除了文字，还有摄影、速写、建筑作品集。不过其中只有《开满玫瑰花的小径》一本正式出版。在该书的扉页上，两人写道：

“这里没有动人的情节，没有惊世的文笔，但却真实地告诉人们：那个年代的年青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虽然，他们想得不一定对，但确确实实这样想了；他们做得不一定对，但确确实实这样做了。”

我们在 2019 年 10 月底拜访了查滨华和杨瑞松。

两位老人如今住在南京汤山的一处双层别墅里。汤山距离南京市区有近一小时的车程，出行不算方便，但这里绿化更多，空气也更好，家里的水龙头一开，据说就是温泉。大庆的 13 年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一些习惯，比如“一直不喜欢自己做饭”。“在东北弄苦了。一年到头就是土豆萝卜大白菜。”

每天下午，查滨华和杨瑞松会在附近“走一万步”，查滨华每周会去市区上书法课，剩下的时间就是写作。他们有一间工作室，一人一台电脑。通常情况下，查滨华写回忆录，杨瑞松写游记——退休之后，他们游历了三十个国家。有时他们合著，会使用笔名“半步斋”。杨瑞松在网上写博客也用“半步斋”。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两人退休后在汤山购置的小屋，37 平米，“只能迈半步，一步都迈不开”——有那个年代的人罕见的笃定和幽默。

以下是查滨华和杨瑞松的口述，他们喜欢相互补充，我们因此保留了两人的对话状态。

# 非虚构 这份写于 20 年前的 大庆回忆录，如何被看见？

好奇心日报 | 非虚构图书馆

这些多年来写下但又不被看见的文字，  
就像某种现实的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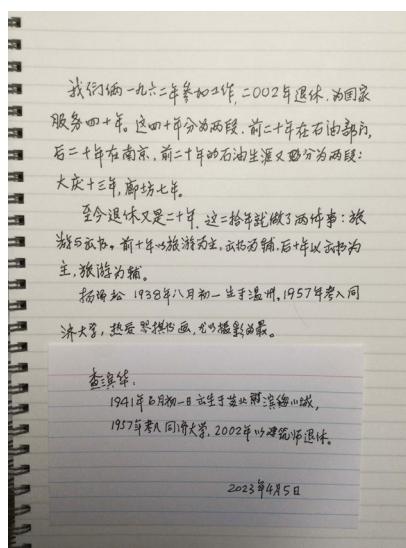
## 前言一：一些说明

这是一期特殊的“非虚构图书馆”，收录的文本作者有两位：查滨华和杨瑞松，分别出生于 1941 年和 1938 年。我们刊登的是他们的回忆录摘录，前两篇关于他们在大庆的经历，写于 20 年前的非典时期，2003 年 2 月，最后修改已至 2016 年；后一篇关于他们在廊坊的经历，写于 2021 年，新冠时期。那些超过数十万字的原文，如我们在“好奇心日报”发布时写下的，“在我们读过的回忆录里，称得上上乘之作”——如果要追溯既往，大多数回忆录都是名人写下的，来自平民的回忆录体系者极为罕见，中国内地尤其如此。我们认为，“上乘之作”首先是诚实，不隐讳、不粉饰；其次是系统，这需要记忆力和档案搜索的能力；最后才是文学性。这三点，查滨华和杨瑞松都做到了。但这些文本从未和大众读者见面。两位自印成册，却不知道如何让更多人读到它。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写作，在封禁和恐怖的三年新冠疫情里，完成了他们退休前最后一段人生回忆：《廊坊书简》，同样自印成册。

这些小册子，不会比两个手掌拼在一起大多，两位在家中的一个小房间作了“小型书展”。这些多年来写下但又不被看见的文字，就像某种现实的隐喻。发生过，但又可以没有发生过。

在“非虚构图书馆”里，我们把这些打动我们的文字摘录刊发。因为是摘录，它无法完整叙事，但可以让读者感知到作者的内心和行文。

另外一个消息是，上海贝贝特的编辑刘炜已经向查滨华和杨瑞松发去了出版邀约，这些文字有了成为正式出版物的可能。查滨华和杨瑞松又高兴又遗憾，因为一种未来的可能，也因为自己已经无力为这种可能作太多编辑补充和修改。但他们很郑重，



杨：回忆我们这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就是退休后这二十年。不愁吃不愁穿，什么负担都没有。只要活着，政府就往你卡里打钱。2007年我们70多岁还考了驾照。

查：那时候想得多美哦，把车学会之后，出国租上车，自己开。

杨：后来我们真的跑了三十个国家。2015年终于在国外开上了车。当时我们去洛杉矶玩，顺便看大女儿，借上她的车，自己开，害怕得要命。洛杉矶人的开车速度太快了，真是不得了，像风一样。

我们喜欢自助游，在国外常被认作日本人。因为中国老人这么自助游的，还很少很少。第一次去欧洲，我们计划了三个月的自助游，最后一站到西班牙。火车进马德里，是晚上七点，天全黑了。找旅馆的过程中，三个强盗用很细的钢丝把我们的喉咙一扎，我们就昏了过去，差一点回不来了。不甘心，四年之后我们又去了一次西班牙，这一次比较顺利，在巴塞罗那参观了高迪的教堂。当时听说已经建了两百年，还有两百年。很感慨，人家的规划是长远的。我们还是长官意志，换一个领导，就换个想法，三百年里，一个说尖顶的，一个说方的，一个说圆的，那不成怪物了。

还有一次自助游在澳大利亚，我们待了两个半月。后来在当地又报名了一个团，去乌鲁鲁看艾尔斯巨石，自己去不了。旅行团会带着全套的厨房设备，从墨尔本出发，那边是没人烟的地方，得自己做饭，自己搭台在露天吃饭，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赶苍蝇。

查：乌鲁鲁的苍蝇多得不得了，就跟大庆萨尔图的蚊子一样多。

杨：萨尔图的蚊子真叫宁死不屈。当年我们在野外勘探的时候，背后都是蚊子。好几次，她被萨尔图的蚊子咬得浑身发痒，差点命都丢了。

现在想起大庆，我们都觉得是上一辈子的事。

我们都是同济大学1962级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去同济，我们俩都是第一志愿，填的专业都是同济大学建筑学，一心一意想学建筑。结果进了学校，学校说，我们有两个专业，一个建筑学，一个城市规划，大家自己选。

城市规划专业现在来说非常吃香。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第一个就需要规划。据侯丽说，如今城市规划的录取分数线比建筑学还高，一毕业就抢光了。

六十年前，城市规划是个新兴的专业。我们的老师金经昌在德国学的城市规划，刚刚把这个专业带回同济。我们是第二届毕业生。大家都不懂城市规划是干什么的，没人要去。

后来学校没办法了，强行分配，一半在城市规划，一半在建筑学，我们俩就被分到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的学生都不安心，不愿意学，学校就开展了专业思想教育，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直跟着我们，等于给我们洗脑子。我们两个人是脑子洗得比较好的。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决心把这辈子献给城市规划专业。

当时正好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年），同济大学供应减量，男生定量30斤，但要求大家自愿减少。你敢不减吗？大家都减，减成27斤。吃不饱就喝稀饭，喝两碗稀饭能饱。好多人都生浮肿病，而且生浮肿病的都是原来身体棒的。到了毕业设计，晚上要加班，肚子饿，我就留半个馒头，准备晚上吃。食堂里一人一个饭袋，吃完饭，把碗筷放进饭袋，挂一排。晚上肚子饿了，我去找饭袋，打开一看，馒头没了。

困难时期，国家没有钱，什么城市规划、建设都没有了。造一栋房子都很难，你还要造一个城市？毕业那年，国家分配的名额下不来，不知道哪里要人，我们就先放暑假。暑假回去，有一个月的时间“分配学习”。最后的分配方案还不错，我们班去北京的有17个，还有各个大城市，也有留在上海的人。

被分配去边远地方就几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班长，姓周，福建人。他把最远的一个地方留给自己——新疆。他被分配到新疆叶城的地方部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边呆了一辈子。晚年回到厦门，没待多久，就去世了。

我们当时下决心到大庆去，基于两个基础。一个是出于感恩，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们上不了大学，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就是为了专业。我们当时想，如果是在城市里搞城市规划，就是修修补补，今天这里加一栋房子，明天那里开一条路，没有意思。到了大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丽的图。我想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在大庆盖一个石油城，就像当年苏联巴库的石油城。

查：傻乎乎的。有的人为了留在城市，想尽了办法，这些人也都可以理解。我当

时想得很简单，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这个国家，幸好我这时候出生，女孩子才能这样一直上到大学。所以我应当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就这么一个想法，跟他一说，他也一样。

我想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在大庆盖一个石油城，就像当年苏联巴库的石油城。

杨：但是我们到了大庆才明白，由于当时的条件，大庆明文规定，第一条：不建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那些居民点，说白了就是厂房子、土房子，几栋合到一起。

所以等于一出校门，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专业，离开我们心爱的专业，离开我们准备一辈子为它奋斗的专业。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在大庆，跟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天津大学、清华大学的名校毕业。在我们之前，大庆也已经有一些大学生了，他们去大庆之前已经工作过几年，到了大庆就担任设计室主任、组长，比我们早一两年到。

有一位留美回来的博士刘总，是油田总工程师，我就在他手下工作。他真是非常好，兢兢业业。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得很厉害，精神都有点儿恍惚，跪在那儿，对毛主席像磕头，“我有罪，我有罪”。太可怜了。文化大革命后没有再用他。

刚到大庆的时候，我们受到大庆“会战”气氛的包裹。因为大庆油田太大了，是长方形的，我们搞规划的，从这头到那头儿，坐火车得一个钟头，跑不过来，就要坐直升飞机看油田。有一次我们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当时的直升机是双翅膀、喷农药的，里面摆两条长板凳，一边坐6个，两边12个。双翅膀的飞机很不稳定，因为气流变化，上去没多久，大家都吐了，什么都看不见。有个《大庆战报》的摄影记者，拿着一台相机，把舱门打开，对着地下拍。一根绳子把他钓下去，上面一个人把他抱住，他就一边吐，一边拍。

那个热火朝天的激情岁月，根本没有心思想个人的事情。每天晚上不到12点不能回去睡觉，没事情也得熬着，不然不好意思。回去后倒头就睡，睡醒睁开眼睛就干活。一直到我们离开大庆，实行的还是休息大礼拜工作制——每十天休息一天。休息的那天就是洗衣服。

后来，她参与设计了干打垒，在大庆因为干打垒出了名。作为干打垒代表，她参加了延安的建筑学会，还在那儿发言。

查：“左倾路线的代表人”。我现在无所谓了。我知道在那个会上，我唱的左边的调子——“极左分子”。但是我不在乎。一个是因为我是会场里最小的一个。再一个，后来开小组会，发言的时候，我曾经很狂热地说，延安是你们革命的出发点，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现在解放多少年啦，延安还是这个样子，叫人不敢相信。那里的人还戴着白洋肚巾，脸巨黑。我还跟他们讲，延安的规划，现在着急的不是哪块绿地，重要的是，政府再好好地想一想，工农林牧副渔，哪一个值得发展，才能改变现在的情况。

我说的其实是心里话。我当时真是一股热情。后来，回萨尔图之前，我对两个同事说，我们肩上的担子太重了，要把这个国家搞得更好一点。

杨：从延安回来的当天晚上，她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写完了，一回到大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因为爸爸有国民党邮局的工作背景，哥哥有海外关系，被认为有特务嫌疑。到处调查她，还想入党？

我们到大庆不是有两个基础嘛，一个是为了国做石油，一个是为了专业。一开始专业就没了，只剩下石油会战，为国争光。但我们这么热心地要为中国建设跑到大庆去，我们成了特务，一会儿是个革命的样板，一会儿是反革命，怎么我们都想不通啊。所以第二个支柱也倒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留在大庆吃苦了，没有必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请假回温州结婚。我家住在温州大南门，兄弟姐妹都在温州，就我一个人出来了。刚到温州，温州就打起来了，水陆交通通通切断，出不来了。给我们的假期是五十天，我们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城里人都逃难，到乡下去了。家里人就到大姐那儿去了，她在乐清。我有一阵还在温州家里，正好碰上温州大南门着大火，机关枪架起来，死了多少人。

后来生老大的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因为大庆条件太艰苦了，我把她送到温州生产。原来想好，小孩生好就留在温州，找个人家带她。跟我们回到大庆，可能活都活不成。我跟大姐商量，我们在农村里头找一户人家，刚生完小孩的，奶还比较多，

帮我们带着小孩。后来大姐也帮我们找了，她回来时不放心，就从温州到乐清去看小孩，一看，傻眼了，小孩在那儿哭，吃不饱。因为那人生的是个男孩，胃口很大，她当然把自己的小孩先喂饱，再喂你的。她心疼，狠狠心把孩子带回来。

那时候带个孩子，从温州到大庆，一路上多困难啊。小孩才一个月，她就一个人，连厕所都没法儿上。我估计就是这一路上她累得，回到大庆没多久，就阑尾炎发了。碰到一个二百五的大夫，说她是胃病，给她吃止痛药。这就麻烦了，穿孔了。送到大庆的医院，正好第三天是春节，找不着大夫。大夫都在准备节目，排练“忠字舞”（注：文革时对毛泽东表达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跳舞时手里通常以《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只有一个护士，最后是护士给她开的刀，结果没开好，感染了，流脓流了四个月。每天，伤口长起小肉芽，就用剪刀剪掉。每天都得剪，不能加麻药，伤口还是不能愈合。只能再开刀手术，手术做了四个钟头，这才好了。

所以小孩从三个月到七个月，是我带大的。我白天去医院当护士，晚上回家当保姆。回来实在是太累了，小孩晚上哭我也醒不来，有一天我醒来看到她睡在地上，但我转眼又睡着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萌生了要离开大庆的想法。她生病四个月，瘦得不像样。我那时候胃病，也不像样。小孩也不像样。我们三个就像三只猫。

离开大庆前，她去了总体室。总体室是干什么的呢？大庆油田的图，一面墙壁都不够挂，所有的油井、管线，通通都标记出来，今天新打了一口井，赶紧在上面补一个，这就是总体室干的活儿，基本上属于管理的工作。那时候他们认为我们俩是学规划的，这就是规划，他们不明白，非要我们干这个，我们就生气，我们不愿意干。后来没办法，她代我受过，主动去了。

查：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里总要有一个让他们接过去。我是这么想，我已经没什么念想了，不再想做什么大事情。我跟他讲，你作为男同志，要挑起家庭的担子，总得有一点东西，有一点技术。也许我这个思想还是我父亲传下来的，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技之长，才能衣食无患。我们两个如果都做这个空头的事情，将来怎么办？总要成家立业的。所以我说，我去。反正我那个时候要生第二胎了，五十六天产假，要带孩子，就这么混日子吧。好好的管道技术，让他把它顶起来。

他做得还不错，从我国的第一条输油管开始，他就参加了。整个管道的施工进程里，很少有建筑的问题，大部分是结构的问题，但我想，掌握结构，以后做建筑也会成熟一点。那时候还是想着以后要做建筑。

因为发现了苏北油田、山东油田、大港油田，陆续有人离开了。不定期地会抽人，成建制地，二十几个，调到山西、湖南、武汉去。我当时只有一点星火一样的希望，希望哪天能排到我头上，到武汉油田，到山东油田，都比在大庆好。

但是当时国家的人事制度，像铁板一样。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硬是在铁板里钻出一个孔。离开大庆了，但还是不能离开石油，还得在石油系统，所以我们去了廊坊。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留在大庆吃苦了，没有必要了。

查：我们在廊坊六年里搬了五次家。先在廊坊招待所报到。那时候还没建起来房子，在招待所住了六天，然后给我们安排到周各庄的老乡家里，纯粹是土房子，土炕，我们也没法儿在那儿烧饭吃，都去管道局的食堂。住了一年多，1976年，唐山地震，吓人得不得了，当时的夜空都是红的，弥漫着烧火的烟。我们在廊坊都能看到。大家也不敢进去睡觉，在外面一直呆到早晨。这样一来，大家都紧张了，我们还住在破房子里吗？塌下去怎么弄？谁来救我们？于是又盖了一批抗震棚，拱房，用芦席、苇草那么搭着盖的。住进去又是一年。接着又住进了砖平房，就是简易房，上面盖个盖子，也不保暖。又住了一年，最后才住上了楼房。一年后，我们就走了，一起回了南京。

杨：廊坊的气候比较好，离南京也近了一半。它就好像一个跳板，再跳一次，就回南京了。

我在廊坊的管道局工作。管道局当时的局长朱洪昌是大庆会战时树立的“五面红旗”之一。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朱镕基当时也是管道局通信楼的职工。

从我们国家建第一条输油管道，我就开始做管道施工了。那是1970年代，大庆出

的油越来越多。原来用铁路运油，一列，六十个油罐车，但速度太慢，来不及。后来经过周总理批准，我们自己建地下管道。第一条大庆输油管道是从大庆到抚顺的一个炼油厂，再从抚顺到秦皇岛，从秦皇岛到北京，北京到山东，山东到南京的仪征。仪征在鲁宁线，“鲁”就是山东，指山东油田，“宁”就是仪征。刚开始规划的时候，叫鲁沪线，准备把管道从山东一直接到上海，但当时我们技术不行，过不了江，只好停在江北。

我就一路跟着，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这十年，我就在外头跑。我们一直通信。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在家里，困难得不得了。一直到仪征通油，我才回来。

正好这时候改革开放了，人事松动了。我们要离开石油系统。石油系统太辛苦，出石油的地方全是不毛之地。再说我们年纪也大了，过了中年，想找个安稳的地方。

在大庆的十几年，我们的心已经伤透了，我俩不愿意再搞规划。她想搞建筑设计，就跟建筑设计院联系，我想搞园林设计，我就跟园林设计院联系。北京、南京、杭州、上海都有设计院，但当时还有一条规定——对方要先来函要你，要先发调令。结果，设计院也只有一个要求，人我要，但管道局要先发函放人。管道局不干。最后，只有南京规划局发函了。四十年前，两个人的户口进南京是很难的，还带两个孩子。没办法，我们两个人又跳进“规划”这个火坑。

1982年，两人一起调到南京市规划局。差不多一个月后，规划局分给我们一套蓝旗街的老房子。两个房间，一厨一卫。

到了规划局，我的想法是，既然到这里了，那就好好干吧。后来规划局成立了规划院，我就到规划院，一直待到退休。但是她不行，她想起规划就难受，碰到不太好的待遇，一生气，就跑到建筑院去了。

查：1984年，我进了建筑设计院。我想的是，努力干就是了，没想到那么艰难。那时候，开放了，设计院实行项目承包制，要自己找项目干。通常都是一个头儿领着十几个人，一个项目谈下来多少设计费，然后开始分成，交到室里头多少钱，分给搞建筑的人百分之多少，再分给搞结构的百分之多少。我不懂人际关系，我要到哪儿找项目？到大庆吗？

我的第一个建筑项目是我的同学给的，两年前他调到了仪征石化。这个项目在区里评上了优等，这才有人愿意跟我搭伙，否则我真不知道怎么打开局面。后来，我们又设计了唐山地震十周年纪念碑，参加竞赛。那是八十年代，我们还不死心，还一直想拼，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不少竞赛，最后有十几栋房子盖起来了，通讯楼，银行，建筑公司的礼堂，幼儿园……在南京市里的也有，仪征也有。但大部分都是纸上谈兵。后来我们把设计作品编成册，自己留作纪念。

杨：到了九十年代，忙着带小孩，专业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退休的头十年，我们主要在外头跑，和时间抢着跑。

一般三个月的旅游，有时我们前前后后要做三年的功课，包括申请签证，了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历史、人文，最后还要落实到交通、住宿上。我们买了不少书，基本上去哪个大国家，就买一本书。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就搜集这个地方的资料。国外旅游资源很齐全，而且都是可以拿的。我们从澳大利亚回来那次，拎着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箱子里全是资料。凭这个资料，我们做欧洲的旅游计划。

我们一般都找带厨房的旅馆，西欧的青年旅社、家庭旅社，都有厨房。入住之后，第一件事问超市在什么地方——market。去超市买牛奶、果酱、水果、袋装的生菜、西红柿。西红柿，又是蔬菜，又是水果。中午我们一般回不来，就自己带饭，切片面包里头加上蔬菜、果酱、奶油，塑料薄膜一包，喝的就是牛奶。因为国外的牛奶比矿泉水便宜。自己带热水壶，想吃热的东西了，就把鸡蛋放进去烧，晚上也可以煮方便面。

我们俩出去自助游，我是管内政，她管外交。吃什么住什么，全是她打交道的。因为她会英语。

查：我的英语是从大庆开始学的。当时在同济，我们学的是俄语。现在俄语全忘了，去苏联旅游的时候完全用不上，只记得一句“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请你大声地再说一遍”——这是老师上课时常说的话。

在大庆萨尔图，情报室的一位老太太给我们上课，从ABCD开始教起。那时候他已经去参加施工了，晚上我就去上英语课。

在廊坊又学了三个月科技英语——柱子、窗、门、梁这些词汇，用的教材是《交大英语》第一册。这次的老师是广播学院毕业的，混血儿，很年轻，很漂亮，英语讲得非常好。她的丈夫也在管道局系统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可能她丈夫也上干校了。

到了南京，单位提供学科技英语的机会，但没有人愿意报名去上。我赶快就去了，学了半年。

但是这一切对旅游一点用都没有。搬到了汤山以后，我们计划出国旅游，首先得会英语。有一天，我看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可以教你讲口语，我们两个就一起去报名了。去了没有两天，他说，我不去了，我学不会。我还顶着，坚持在那儿学。当时靠强记，还真的挺有用，现在又忘了。后来发现了，学口语应当学苹果、香蕉、麦当劳，但我学的是什么街在什么地方。不过，好歹学会了一个“the same as”——“和他们一样”，点餐时就这么说。

杨：一直到 2014 年，我们都在自助游。后来她的腿出问题了，一走就脚踝疼，走不远了，我们才停下来。

2007 年我们还考了驾照。我们找了一家包学包会的驾校，用了三个月，还算比较顺利。理论考试她得了 100 分，我 99 分。校长说我们是优秀学员。第二次是桩考，她两回成功，我是一次成功。考试的那天，一屋子满满的，都是年轻人。我们俩先考。她第一，我第二，考完了出来，大家都在鼓掌。第三次路考，也挺简单。

有了驾照，我们先开车去了海南岛。路上走走停停，开半天，就停下来玩半天，再走。到了一个地方就过一夜。路上用了一个多星期。

查：人就这样，刚学会的时候胆子特别大。2009 年，我们又自己开车去了大庆。

杨：2009 年正好是大庆油田发现五十周年，但我们不是特意为了五十周年去的。我们在石油部门是 20 年，其中在大庆是 13 年，在廊坊是 6 年。我们进石油部门的时候是 20 刚出头，出石油部门的时候，已经 40 多岁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青春和热血都扔在石油部门，扔在大庆了。所以我们想，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离开大庆 35 年后，再开车去看一次，就是想跟我们的青春正式地告别。

我们不是特意为了五十周年去的。

到大庆时是六月份。我们认识的老同志，有 80% 都出去了，有特殊的原因才留在那儿。一种情况是小孩儿在大庆就业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本来他们就是东北人。但就算是东北人，也大部分都走了。有一大批东北人跑到了广东，茂名油田，南海油田。其中因为长期在东北，不适应南方的潮湿，关节出了问题。

那天二三十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其中一个原来的同事当了园林局局长，政协副主席，他级别高，有车子，领着我们到处转。大庆基本上都是新的，应该说是我们想象的现代石油城。是我们想象的，但不是我们盖的，是别人盖的。

我留给大庆的唯一纪念是“王铁人纪念馆”。王进喜去世时 47 岁。在他去世后没多久，大庆给他在萨尔图程家大院水泡子旁建了个王铁人纪念馆。我主持了设计。不过现在那里变成仓库了。新的铁人纪念馆在让胡路区。

后来，我们说想再到干校去看看。一看，干校没有了，就一个地名还在，叫王家围子。她就是在那儿得的阑尾炎。

查：2009 年在大庆拍的照片上，还有不少人呢，有二十多个。现在恐怕都聚不齐了。今年是大庆六十周年，有几个人坐着轮椅去了，没人邀请，自己要去。2009 年也不是他们请我们去的，是我们自己去的。所以我也没有参加市里的活动，虽然时间正好，还有人跟我们说，你们去看看，但我不愿意去。

当时我已经在写《萨尔图往事》了。我从 2003 年开始动笔，但中间断断续续。我们经常出去旅行，出行前要准备材料，回来以后还要整理材料，被打断了很多次。加上不停地写、补充修改、找资料，简单一点的用百度搜索，麻烦一点的要去南京图书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纸还查不到，就这样拖了很长时间，老是觉得没弄全，不满意。

为什么记得这么多细节？因为他有个很好的习惯，从小一直写日记，写得很详细。现在也还在写。后来我们也记账，记账的小本子，现在还没丢。账本里记录了今天买一个烧饼多少钱，买一个馒头多少钱。

有时候碰到记不清的事，我们会打电话问一些老同事。他们有的也写回忆录，不过没有像这么完整的，只是一段一段的。他们就把自己写的发给我们，我们也放进《萨尔图往事》里。

到我们这个年龄，常常接到某某某已经走了的消息。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你不要写什么回忆录，回忆难过的事情，会减你的寿。他一直鼓励我，他说，你能活着把自己的苦难写出来，这是一种幸福，甚至是一种享受，因为苦难已经过去了。

刚到南京的时候，为了写《萨尔图往事》，我还准备开始学写作，参加了《萌芽》的写作学习班。每个星期给《萌芽》寄一篇文章，会有人帮你修改，写评语，再寄回来。

杨：她写了好多，堆在那里，还没有时间整理出来。算是她的习作。我们都有写东西的习惯，积累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有两箱子。我们把它一点点拿出来，出成书。

大部分书不是公开出版的，公开出版很贵。一个书号要一两万块钱。要让出版社列入计划，很难，恐怕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印。原来印刷厂用的机器是德国海德堡，一印就上百本。好说歹说，同意我们的一本摄影集《梦回大地》只印 150 份，上下册，花了 7 万块钱。现在印的少了，有时就十本，自娱自乐，再给小孩儿留几本。

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是《开满玫瑰花的小径》，但也是自费出版，我们一共花了一万块钱。那时候我还在工作，因为工作联系，认识了南京出版社的一个主编。我说，你帮我一个忙，我想出一本书。那是我们初恋的时候，她写的日记，交给我保管。1962 年我们到了大庆，1966 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我没有办法，只能把所有的文字资料全烧掉了，因为那些都是“四旧”啊。就这个我舍不得烧，把它塞到箱子底下，躲过一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就想把它出版，费了好大的劲，全部把它抄了一遍，抄完以后，看到有补充的，再补充进去。因为你要出版给人家看，前后的联系要加进去，光是日记，没头没尾的，人家看不懂。所以我又加了好多，最后写成两本。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当时我打字的速度还很慢，还请了一个打字员，花了好几千块钱。全部收进电脑之后，才交给出版社。

她不同意，我执意要出。

查：一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清了很多，不存在什么幻想。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对国家报恩的思想，哪一个能得到认可？当时去那儿，兴致勃勃，那么一大堆幻想，最后得到什么呢？我跟他讲，不要给我出版，等我死了给我出版，那人家看不看，人家理解不理解，我都无所谓。

杨：我的意思是，这个不单是我们两个人的记录，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当时，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怎么对待友谊，怎么对待爱情，怎么对待国家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我认为，是有历史意义。所以我想把它出来。

她老是没信心，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没有信心了，“又没人看”。我说不要紧，我们就自娱自乐。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乐趣，对身体也有好处。我写的书，唯一的读者就只有她，她老说写得好，她是我的粉丝，唯一的一个。

最早的分工是，她写回忆录，我写游记。《萨尔图往事》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是最长的。写完《萨尔图往事》，她又回头写她的父辈，从爷爷的爷爷写起。这本书，我们给起了名字叫《烽火硝烟路》，记录的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她为什么能写出她爷爷的故事？因为她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交代，她保存了那些交代材料。后来打开的时候，纸都发黄了，黏在了一起。她抄了一遍，这就是她写《烽火硝烟录》最直接的资料。

前些年我们根据她父亲说的地址，想找到她在安徽怀宁的老家。我们开了车去，心里想如果找到家谱就好了，但没找着。我们把这次旅行叫作“寻根之旅”。

查：我老家在安徽，当时父亲在怀宁考进了邮局。我可能是秉承了我父亲的脾气，不会和领导好好相处，父亲大概参加过一次罢工游行，被调到了苏北去，兴化，高邮，滨海一带。那时候苏北很穷。我就是在滨海出生的，所以叫滨海。后来父亲又在泰州，泰兴，盐城这一带的小邮局里调来调去。一直到快解放了，命令大家一起往南撤，

最后撤到南京。还不错，把他留用到南京。

杨：到了南京的那段回忆，她又写了一本《中学时代》。她的回忆录，爷爷的爷爷写完了，小时候写完了，中学写完了，大学写完了，萨尔图也写完了，正在写的是廊坊。

在廊坊的十年，我一直在出差，大半年在外头，回来待两天又走，我们主要的通信就在那段时间。最近整理了下，有一两百封。我们把这些信全都输入了电脑，她会把我们的信放在回忆录里，连起来，就是我们在廊坊的回忆录。

我们写的东西，可能文笔也不行，布局也不行，但我们有一个优点，有细节，有很多细节。

我们听蒋勋讲《红楼梦》，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有细节。这些细节你在历史书上是看不到的，你没法儿说当时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他们一见面说的什么话，这些细节《红楼梦》都有，活生生的一个清朝中叶的社会都在《红楼梦》里头。我们也有，吃什么，穿什么，出门坐什么车，一个烧饼几毛钱，这些在我们的书里都有详细的记录，一百年后研究历史的人，就会感兴趣了。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社会的风气什么样、人们都在想什么，现在没人感兴趣，因为你写的我都知道，他当然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出的书能找一个地方存起来。一百年后，说不定是畅销书，就像当年的《红楼梦》一样。我们也跟温州图书馆联系，他们可以保存个人藏书，但有一个要求，必须正式出版，没有书号的，他不要。但我们正式出版的就只有几本，大部分是没有书号的。一个书号一两万块钱，我能出得起么？所以这些书也没法儿进图书馆。怎么办呢？我们在琢磨，要么装进罐子里，埋在地底下，一百年后告诉人，这里头有书，你拿出来看看。



小鸟文学

独立媒体，诞生于 2014 年。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题图来自 [Yang Song](#) on Unsplash

小说

## 去萨尔图

查滨华、杨瑞松 | 非虚构图书馆

那个决定一生的选择是如何开始的。

九月份,当分配地点公布后,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萨尔图”,我们兴奋地徜徉在校园里,漫步在玫瑰花夹道的小路上,幻想着在那一片白纸一样的荒原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城,要按照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采用最新颖的建筑材料,使用最先进的施工技术……,成就我们一生的事业,为国家建功立业。那一年,就是这建设石油城的共同理想让我和阿松一起走进了萨尔图——大庆油田……

我还从来不曾做过如此长距离的旅行,在淡淡的离愁之余,却有一种新奇的兴奋。我们是先到天津,我的三姐在天津东站迎接我们,是她带着我从小同一年上学,又是同年大学毕业,那时她在天津等待工作分配。

在天津我们和三姐一起住在海河边的市委招待所,凭统一分配的介绍信就免缴住宿费。在招待所的食堂里,我们生平第一次吃到玉米面窝窝头。带着新奇的感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以为这就是传说中北方难以下咽的“粗粮”。我们像两个快乐的兄妹,手牵手徜徉在陌生的街巷,流连在诉说着历史的海河边。

离家之前,我们身边只带了学校给的一点路费和阿松家里给的二、三十元钱,两三天后手头钱已很紧,我们只得买了到黑龙江安达的硬座车票,加上一点饼干,匆匆上路。

那时,从天津到哈尔滨要乘坐二十个小时的火车。简陋的车厢,拥挤的座位,恶浊的空气,北去的列车由于寒冷不能开窗而显得格外肮脏。在列车有规律的噪声中,我的头困倦得东倒西歪,终于在阿松的肩头安定下来,我睡着了。但是阿松不敢睡,他一边不时望向窗外,一边小心地照看着行李架上我们的两只箱子,两人的被褥衣服都在南京出发前托运了慢件。

我们是清晨到达哈尔滨的,在站外的地摊边,坐在小矮凳上,每人喝了一碗热豆浆,吃了一根油条。我们余钱已极少,不敢再停留,赶快寻找去安达的候车队伍。当时建筑界正在批“大、洋、古”,新建中的哈尔滨火车站被勒令停建,到处是没有安装门窗的洞口和一片片没有抹面的红砖墙。

天色已经向晚,北方的冬日夜色更早降临,车厢里的人们大都已昏昏欲睡。

“安达车站就要到了!……安达车站就要到了!……要下车的醒醒啦!……”

列车员的喊声从车厢那头一路响过来,阿松赶快拿出报到证上的地址向列车员讯问。

列车员是个高个儿小伙子,他就着暗淡的灯光看了看,回说:

“这个农垦场是在萨尔图,不是在安达,你们不要在安达下车,再往前乘一站路就到了。”又伸出手来说:“补一下车票吧,两张一块两毛钱。”

我们俩搜尽全身,只有五毛钱。小伙子看看我们,摇摇头说“是报到的学生吧?算了,算了,到站喊你们下车吧……”

从安达行程约一小时,萨尔图就到了。

只凭着一张学校开据的统一分配的单子,在几天之内便毫不费力地把我们从上海“开”到了数千里之外那个严寒的北方。可是多年以后,当我们猛醒过来,要求回到南京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曾料到,是在二十年之后——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哪!

在我们退休之日回忆起这一生的波澜,阿松反复多次说起人们常说的警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关键往往只有几步。我这个人从小家里对我管束得不够,年轻时一直不懂得这些人生哲学。就在大学毕业那年,人人都知道那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刻,而我却不在意,自己走错了脚步,跌了一跤,甩离了人生的正常轨道……

永远忘不了,那是北国初冬一个夜深时分,第一次从火车上下到萨尔图的土地上,一阵彻骨的寒气袭入身躯。火车头喘息着冒出浓云般的蒸汽,吞掩着铁路边上昏黄的灯光,只照出脚下铁轨边狭窄的土路和路边的铁丝网,看不清铁丝网外都是些什么。没有站台,没有房子,也看不到哪里是出口。阿松说,就跟着人群走吧,于是,就随着人流前行。才走几步,就发现大家都鱼贯钻过一个被扯开的铁丝网缺口出了车站。我们不能出去,因为要到车站找报到的地方,于是继续往前走去。就在一个像是车站的小平房门口,路边一个中等个儿的男子过来拦住了我们:

“是来报到的学生吗?”还让我们拿出报到证来。

阿松放下手中的箱子,找出证明。那人便说:

“跟我走吧。”

由于来人是背着灯光,我们完全看不清他的面孔。但当时我们不曾有丝毫的怀疑,便跟着他走下了路轨。我们的全部行李便是每人手中的一只箱子,阿松手里的是一只藤箱,是他大哥给的,现在这只箱子还在女儿雁雁的床下躺着。我手上是一只木骨架纸壳箱,是我大姐给的,多年来虽已坏裂却一直不忍丢弃,直到前年收拾家里,才咬牙扔掉了。

一路上看不见有灯火,更不知走在什么地方,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跟在那人身后,不时也有人们互相呼喝着匆匆走过我们身边。那人大步流星走得很快,当他站下来等待我们的瞬间,我抬起头来向前方张望:仿佛是在一片旷野之中,不知是近处还是远处,传来一些什么声响,本该是寂静的夜显得很不平静,浓浓的黑夜紧紧裹挟着我们,只有在路的正前方的夜空中,有一盏(红色的)灯,如一棵大的星辰,幽幽地放出一点红光……

那人领我们走过一个门洞,穿过院子,又进了一道屋门,把我们交给了一位大嫂。这就是招待所。我们先到阿松的住房,打开书包吃了几片饼干,然后我便来到服务员室旁边的女房间,打开了电灯。

房间不大,有半间是土炕。有人已经躺在炕上,这时伸出手来看我,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我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她是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北京人,名叫关美华,已经在这儿住两天了,明天一早和她的同学男友王华民一起去设计院报到。她又笑着说:

“这里连冷水都没有,也没有脸盆,就将就点睡吧。”

“好的好的……我赶紧拉过一床被子关了灯躺下了那被子油腻腻的发出一股什么味道,但是炕上却暖和和地,疲惫而又兴奋过了头的我迅速进入了梦乡……”

一声尖叫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电灯开了,关美华在炕上撑起了上身,苦兮兮地对我说:

“呀,老鼠咬我的鼻子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不知所措。想抓住老鼠谈何容易啊。我们愣了一会儿,只有互相安慰几句又躺下了,约定这回不关灯了……”

多年之后,关美华戏称之为“老鼠之吻”……

本该是寂静的夜显得很不平静,浓浓的黑夜紧紧裹挟着我们

早晨,关美华匆匆走了,披上一件很合身的深蓝色皮大衣,说找王华民去。娇小的她总

是笑嘻嘻地，她的笑容是如此甜美，露出可爱的小虎牙。我也匆匆找阿松一起去食堂吃早饭。

走到院子里才看清楚，招待所是个四合院平房，除门窗以外，全是土做的。这房子从室内到室外，没有一条直线，也没有一处直的转角，手摸上去没有一处光滑的墙面，整个儿矮矮敦敦毛毛糙糙就好像从泥土里爬滚出来的农村小儿。门口是一个几层楼高的铁架子，上面就悬着那盏红灯。食堂在院子正中，桌子和条凳都旧而简陋。阿松端来两碗玉米面糊糊和两个黑色的荞麦面窝窝头放在桌上，我好奇地拿起窝窝头——像石头一般硬，很费劲地咬下了两小口，皱着眉头终究还是将它放了回去——毋庸妄论是否好吃，根本就无法入口，宁肯挨饿——与粗粮的第一次接触让我们领受到它的下马威。倒是那碗玉米面糊糊绵软，尚可充饥。

在食堂门口碰见关美华和王华民。他们走后，阿松笑道，关美华这名字跟她本人一样的美，很像电影《护士日记》里的简素华，也叫“华”，也一样的美。

报到处在离招待所不远的一栋平房里。正在报到的时候，门外又进来一个大个儿的小伙子。仔细一看，却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曹骥南。他已经穿上了石油工人的道道棉袄棉裤，略显臃肿，神气却还是照旧，眼睛很亮，嘻嘻哈哈地。他说他是半个月前来报到的，现在分在设计院的总体室。

报到的速度极快，再简单没有了。立刻分配阿松到总部的生活基地办公室，我到让胡路设计院。我们相视了一下，提出能不能考虑我们的关系分配到同一个单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行！说是总部机关工作繁重，常常在油田上奔跑，需要男同志；设计院工作在室内，算是照顾女同志。还轻飘飘地补充了一句：萨尔图和让胡路也不远嘛，有汽车有火车，四、五十分钟就到了，而且——战区的交通车是免费的……。

我们没有再分辨，想到的就是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就这几分钟的决定，在我们结婚成家前的五年生活中，造成了无以计数的路途奔波和精神折磨之苦。

曹骥南一直站在门外等着我们，我们三个人在这新鲜陌生而又是我们将要永远落脚的地方相遇，自是格外兴奋。小曹高兴地带我们去逛街，还拍着口袋：“我可有钱了！”又不遗憾地说，因为晚了半天报到，没有拿到全月工资。他自告奋勇地要请我们吃烤土豆，按他的说法：“可好吃了！”于是我们便一起向火车站走去。

由于昨天是夜里到的，什么都没看清，小曹便边走边向我们指指点点。其实萨尔图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属于安达市管辖范围，所以我们报到的地址才写成黑龙江省安达市。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从油田的总图开始说起。

这油田是南北狭长的形状，从南到北足足有140多公里，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铁路拦腰穿过。一九六零年三月，萨66井喷出高产原油，确定了萨尔图地区是高产区，正式打响会战。萨尔图的旧镇子就在铁路线的南边，正位于油田范围的中心位置，会战总部指挥机关决定从安达转移到萨尔图，就选点在了萨尔图火车站北边，因为那里的旧房舍极少，便于规划建设，同时还可兼用旧镇的交通服务设施。总部机关是一色用清水红砖砌筑的一群小平房，仿照苏联城市中那种“周边式”的平面模式，围合起多个小院落。房屋之间的道路虽然等级不高，却整齐通畅。这个区域称之为“二号院”。当我们说：“我今天去二号院”那意思就是上油田总部办事去。在二号院马路南边不远便有一口油井。其实油井就是一间小房子，大约两米见方，里面便是一口井眼，还有从井眼接出来的输油管和各种仪表、仪器。房子四周用浅浅的三、四十公分高的小土堤围起来，面积也就二、三十平米吧，场地平整得干干净净。二号院的各级头头们就是在这口井上轮流参加顶岗劳动的，后来的机关职员包括阿松，也曾在这里顶岗劳动过。在总部机关门前还开辟了一条平行于铁路的几十公里长的公路，作为油田的东西交通干道，这条路的东边尽头龙凤镇，位于油田东部边缘，正在建炼油厂；西边的尽头让胡路，位于油田西部边缘，便是设计院的所在地。

在这条公路和铁路之间有几栋破旧的干打垒，靠二号院近的几栋称之为“三号院”，生活基地办公室就在那里。靠火车站近的那几栋称之为“一号院”，我们设计院六室有一个化验室，头几年就一直在一号院的一栋旧干打垒里。那时，我去萨尔图看阿松，没有地方住，常常在半夜抱一床被子走到这里借住一夜。

这三号院、一号院两处与二号院不同，那几栋旧干打垒仿佛互相生气了一般，谁也不挨着谁，东扭西歪，稀稀落落。房子之间还留着田垄，那些收割后的小半截玉米秆还顽强地挨个站在垄上。没有道路，只能从垄上跨过去，不知有多少次我被这些玉米秆绊得几乎摔倒。

那天天气不错，在城里住久了，从没看过小镇的天有这么开阔。那片飘着许多白云的蓝天，无边无垠像一把巨伞顶在你头上，这白云蓝天的尽头就是地平线，完全不像在城里看

到的屋顶之间的井蛙观天。在火车站前的路边站着几个农民打扮的小贩，卖各种谷物、活禽什么的，还有带土烤炉的土豆。小曹花一元钱（相当于当时半天多的工资）为我们买了四个烤土豆，个儿挺大，还是热的，皮子烤得像我们南方的烤山芋皮那么焦硬，吃到嘴里又香又热。在那个年代，能够不化粮票就能吃饱肚子，可是非常惊喜的事了。

小曹帮我们一起取回火车慢件行李，便和我们分手了。用他的话来说，整个油田的总图“可大可大了”，叫我们什么时候到他那儿去看看。

没有道路，只能从垄上跨过去，不知有多少次我被这些玉米秆绊得几乎摔倒

就在当天下午，一辆设计院的车子带着我离开了萨尔图。那是院里到萨尔图来拉桌椅傢俱的，一个带蓬子的卡车。一路上风驰电掣开得极快，虽然有货物的重量压着，可我还是像筛子上的米粒儿一般，被颠得东撞西倒、上蹦下跳。一路上只从卡车后面的敞口处望得见车后的风景。“荒原”这是唯一能形容那里风景的两个字。初冬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像是生了癞疮的头顶一般，在长着不整齐的枯草中间，露出大块大块微微发白的盐碱地。西天开始堆起厚厚的灰云，似乎要变天了，太阳再没有露面。离开萨尔图不久，就看见路边的“水泡子”，当地人是这样称呼那些草地中间的盐碱湖泊的。大约四、五十分钟就到了让胡路设计院。

当时的让胡路就只是一个地区的名子。在这一带广漠空旷的草原上，分散着三个孤零零的单位。西边一条马路的两边，路西有一段小树林，靠近树林的一片平房就是大庆油田建设设计院，路东是大庆油田地质开发研究院，因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缘故，这两个单位都已经盖了一些办公室和宿舍，虽然只是砖柱子框架填土坯的简易房，可是在全油田算是条件最好的了。东边稍远的一家是油建指挥部的土木预制厂，有几间厂房和宿舍，大部分是活动板房和帐篷。东北边离设计院大约三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是让胡路火车站，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铁路穿过那里。说是火车站，其实就是一栋几个房间的小二楼，调度、办公、宿舍全部挤在里面，就是没有候车室和站台。

设计院新盖的那十来栋平房也像二号院一样，兵营式的，围合成四个篮球场大小的院落，虽说是土坯房，墙面都抹光刷白了，看上去挺规整的。主要的几个设计室和办公室就都在里面挤下了，但是测量队和一些库房，还有一部分单身宿舍，还在旁边的板房、帐篷里。平房南边是新盖好的食堂，另外在北头靠近小树林那边，正在盖着几栋零散小屋，作为双职工住宅。

大卡车就停在一个院子当中，待桌椅卸得差不多了，我才很费劲地从卡车上爬下来，手冻得几乎抓不住车栏板。司机指了指旁边平房的门斗，告诉那里是院办公室。原来在这个高寒地带，房子的入口都搭着门斗，挂着厚布做的棉帘子，为入口大门作保温。

人事科长屈全兴简单介绍了院里的情况。一室是龙头室，搞油气集输；二室搞油田注水和给排水；三室是机械室；四室是土建室；五室是电气室；六室是化验室；七室是测量队；另外，还有一个总体室，小曹和小余就在这个室。全院职工也就六七百人吧。我被分配在土建室，和关美华、王华民在一起。最后，屈科长说，这个油田现在还是在勘探开发之中，完全对国内外保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知道我们发现了一个油田，就是搞不清楚具体位置。他强调说，在这里工作，要绝对注意保密，哪怕是对自己家人也不要泄露这里的情况。为了保密，油田全部用‘农垦场’的名字对外，我们设计院是最后一个上油田的，所以编号排在末尾，我上班后不久，通知我们院编号是农垦十五场，我们的四室就是‘四队’……以后多年一直用这个地址：“黑龙江省安达市让胡路农垦十五场四队”。

之后，屈科长把我领到四室，那是一栋“L”形的平房，大房间，单面走廊。从门斗进去后，在走廊里与一个手拿图纸匆匆走来的人擦肩而过，我惊讶地发现这人的脸，特别是那双眼睛简直跟普希金长得一模一样，这人也用略带惊讶的眼光看了看我。

四室的主任是胡象尧，之后他很快就升任副院长了。是姜耀祖主任接待的我，姜主任微笑着说：

“好啊，又来了一个生力军，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参加会战。”

“会战”，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了“会战”这个词。姜主任大约三十多岁，微胖，鼻子稍红，人很和气，笑起来像弥勒佛，但他做事极认真，后来只要他一板脸，我还真挺怕他的。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陕西人，从北京石油部来参加会战的。他又说：室里有五个组，一组和二组是工业建筑组，组长是王士锦和金培孚，三组是民用组，四组是道路组，五组是暖通组。我是城市规划专业的，分配到陈瑞禾、胡炳炎这个三组，主要设计油田民用建筑。姜主任还把室里人员的情况大致给我介绍了。其实，这个设计院搭起架子不过才两年，除了这两

年新分配来的学生以外，还有不少老同志，他们都是从抚顺、四川、玉门、新疆等等各个油田设计院调来参加会战的。还有几位，像我的组长陈瑞禾、胡炳炎，还有一组组长金培孚，就都是从北京的各个设计院来的，他谆谆叮嘱我说，这些老同志虽然年纪只有三十岁上下，但他们有经验，工作认真，全心全意投入大会战，都是我们室的骨干，你要虚心学习他们的品质和工作经验呵！……之后告诉我，会战期间按照战区规定，休“大礼拜”，就是十天休息一次……

我心里‘咯噔’一下，十天，要十天才能见一次面……

“明天应该是战区的大礼拜，我们院因为搬家，所以不休息了。……”

咳！我无可奈何地垂下眼睛：十天还不一定能见面……

他又看看我身上单薄的衣衫说，目前会战初期，一下子上了几万人，安排吃住都非常困难，我们院从一九六零年底迁来油田，一直在萨尔图的临时板房里画图，宿舍就是干打垒的大通铺，条件非常艰苦。总部为了照顾我们的工作性质，在这里为我们盖了这么一片砖房。

“……你来得很巧，我们这两天才从萨尔图的板房搬过来的，那些来联系工作的各指挥部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说我们是全战区条件最好的一个单位了。……不过当然，跟城市里的条件不能相比，你要克服一点呵。我来叫小崔帮你领劳保用品，赶快穿得暖和一点，不要冻坏了。……”

姜主任快步走出房间，才两分钟，只听一阵脚步声，进来一个女孩子，这是个典型的东北姑娘，微扁的脸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只可惜牙齿不够整齐，她就是第一个接待我的人。姜主任在后面赶着进了门，对我笑着说：

“她就是小崔，崔秀中，我们室的生活委员。你要是记不住她的名字，就叫她三快吧。小崔，我就把小查交给你了。”

“秀外慧中，好漂亮好文学的名字。这人家里一定是有知识的……”我心里想，就笑着问小崔：“他们为什么叫你三快呀？”

“会战”，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了“会战”这个词。

“老刁那个淘气包子给我起的，说我走路快、做事快、说话快呗……”

听说我是上海同济大学来的，她就告诉我，道路组今年来的关步英、黄金生和李迪文也是我们同济的，是城建专业的，他们来得早几天，也都是小崔帮他们领的劳保服……

果然名不虚传，她迅速地帮我领了一套黑色的道道棉袄棉裤、皮帽子、大头鞋和一床厚厚的草垫子，还领了一件棉大衣。

“这东北夜里太冷，棉大衣还可以当床被子用呢！”她对我说。这以后的好多年里，我和大庆的大多数人一样，在漫长严寒的冬季里，大皮帽子、大头鞋和道道棉工服不离身，除了高矮不同以外，看上去全都一个样，无从分别出是男是女。一色的劳保用品，使大家过着像是解放初期解放军过的那种半供给制的生活。

小崔把我领到院里东南角的一栋砖瓦小平房，穿过门斗进到一个大房间里，告诉我这儿就是女宿舍。我打量着这间房间，里面拥挤地放了七八张双层床，床下摆着箱子、脸盆、鞋子，有的还有痰盂，房间当中用砖砌着一只炉子，上面几只水壶。一共只两张桌子，每个人的行李都很少，显得整洁干净，很像学生宿舍。小崔迅速地把她自己上床的铺位挪到下铺，安排我住在她的上床，边铺床边对我解释说：

“这房子刚盖好，本来是做晒图房的，女宿舍安排不下，先让咱们住着，里边儿可冷了，只有一个天然气炉子，住在上床较比下床暖和一点，还安静。”

“好的好的，谢谢你呵。”在大学里五年的双层床，那下床屡屡作为接待访客和室友们临时休息的座位，我明白小崔是照顾我，心里很是感动，连忙感谢。

“谢啥谢？我是个老东北嘎瘩，你这个上海阿拉肯定比我怕冷噢。”

收拾完床铺，小崔又领我看门外院子里的水井和厕所。因为自来水管还没有接通，现在食堂用的水都是每天用水罐车运过来的。小崔指着院子地上的一段露出地面的黑色管子，说那就是水井。由于管径较细，只能用竹竿绑上搪瓷茶缸伸下去打水上来。洗脸刷牙和洗衣服都只能用这个水。在宿舍边有一个露天厕所，是用苇帘子围成的，也就是在土坑上架着几块木板吧。小崔警告说：

“冬天地上很滑，木板儿又窄，小心掉下去。手电筒在桌子上，天黑上厕所要用的。”我禁不住皱起眉头，自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以来，常去农村劳动，这样的厕所我也领教过，但那是熬过几天之后仍旧回城里呀……小崔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现在咱们院的房子还没盖完，以后条件会改善的。接着又狡黠地笑着告诉我：女孩子们晚上是不去厕所的，都用痰盂，小崔的床下就有一只，让我尽管用。最后她还是不放心地加上一句：

“不过也没关系，冬天那厕所里都结成冰砣儿了，倒是夏天可不能玩儿啊……”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更早，不觉已到晚饭时间了，小崔帮我到食堂把饭菜打回宿舍后，就匆忙去办公室了，说晚上要加班。我一边费劲地嚼着高粱米饭，和着单调无味的炖白菜，倒觉得比招待所的荞麦面窝窝头好得多了，一边想念着在萨尔图的阿松，非常担心这粗粮会加重他的胃病……

那天晚上，除了我，宿舍里一直空无一人，本想等大家回来再睡，但是几天没好好睡觉了，盖着厚厚的棉大衣，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安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早就醒了，撑起半个身子一看，哟，每张床上都睡着人，她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轻手轻脚穿好衣服起了床，轻轻开门在门斗里撩起棉帘一看嗨！好一个白雪世界哟！原来一夜大雪纷纷扬扬，灰白的浓云像一床绒绒的棉被捂在头顶，脚下荒原上的这一片茫茫白雪，如云如毯向远处直铺得无边无际，特别的白亮洁净，让你都舍不得把脚踩在上面。只有我们设计院这几栋房子的红瓦屋顶，在银光闪烁的白雪映衬下，闪出一种淡淡的无比娇媚的银红色，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冷艳的北方风采。

积雪已没过脚面，我赶快换上领来的大头鞋。这是一种又大、样子又笨拙的鞋，前后都用厚厚的皮革护着，中间系绳的部分是棉质的，鞋底的皮又宽又厚，穿上它，两腿似乎绑了沙袋一般沉重。我穿着这硬邦邦的大头鞋，蹒跚地走进厕所，左脚站到木板的端头，右脚刚想抬起来，谁知是不是大头鞋太硬了，不听使唤，还是地上的冰太滑，左脚竟滑进了粪坑边坡。倒是我反应还算快，右脚一蹬，赶快把左脚拔上来了，人也失去平衡向后跌坐在雪地上。我吓得愣了有半分钟。惊魂稍定，仔细看看那大头鞋，还真像小崔说的，幸好是冬天，又是这两天设计院搬来刚启用，一大早还没人上过厕所，那粪坑冻得结结实实，大头鞋还真没怎么脏。不过我还是急忙转身到外面，在雪地上使劲地来回擦我的大头鞋……自此以后，上厕所就再也不敢大意了。待我回到宿舍，才发现大家都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穿衣、梳头，有人洗脸，也有人就拿起饭盒冲出去了。……

刚到设计院时正是东北初冬季节，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我过得非常狼狈。由于每天晚上都要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早晨总是不能按时起床，于是我在晚上设法从那黑色的水管子里打好一盆水，想在早晨起床时用，但是一夜醒来，却变了一盆冰，叫人哭笑不得。说句老实话，有很长时间，我们常常是早起后匆匆用干毛巾擦一下眼睛，像猫洗脸一样，然后匆匆赶到食堂打饭，便直冲设计室。当然，来不及吃早饭也是家常便饭。至于那个厕所，总是我每天的心理负担……

刚来设计院的那些天，还真是想家。

后来才得知，比我们先来的这些老同志，除了大约百分之几的双职工在这里有家以外，由于住房和安排工作有困难，大部分人都不能把家接来，都和我一样，住在单身宿舍里，以室为家，以院为家。也许，正是由于来自四面八方，在会战的头几年里，比较难于形成派系，人们之间反而容易形成比较融洽和互相关心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里，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不自觉地溶入了集体，参加了这里惊天动地的行动。

也是在这里，给我一生中留下了一抹心灵的伤害，但岁至暮年，也常常想，能够吃常人没有吃过的苦，见过常人未曾见过的场面，也可以说：“此生足矣！”



题图来自 [Lysander Yuen](#) on Unsplash

## 小说

# 我这个演员走下了舞台

查滨华、杨瑞松 | 非虚构图书馆

1965—1967年，在大庆。

回顾在大庆的那些年里，一九六五年是矿区建设最繁忙的一年。选址和总平面都定下来了，单体图也出来了，全战区大大小小的生活基地建设全面开工，这是我们矿建小组最忙的一年。那时候的大庆油田里，生活基地的小村子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这样大范围的草原上。当时的公交汽车中心在萨尔图，从萨尔图的汽车总站能比较方便地去到各个生活基地，不用转车。可是我们从让胡路出发，必定得先到萨尔图，再转车出去。老宋便和萨尔图的生活基地办公室联系，借了他们半栋老干打垒做我们矿建小组的办公和宿舍，下工地就大大节约了时间。一开始阿松很高兴，以为这回我们俩总可以天天见面了，结果是让他大大地失望了。老宋和老胡把我们这个小组抓得很紧，每天一大早大家便出发上各自负责的工地去，下午陆续回来，晚饭后集中政治学习，接着是全组碰头会，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出修改通知单或者讨论方案还在这之后，所以每天都得到十一、二点才能睡下，哪儿有和阿松见面的时间呢。

在那些时日里，有一次的长途跋涉印象很深。那次是我到炼建“火炬村”工地，最后的那班交通车没有来，我只能步行回萨尔图了。从火炬村那片高地向外走出来，西天正在我眼前，四周景色在脚下一目了然。天色已向晚，夕阳已走向地平线，透过大朵大朵的絮云向天穹挥出几道淡红的光彩，把它身边的几朵云彩勾勒出精细宛曲的金边。抬眼四望，忽然感悟到，天穹无垠……草原无垠……。在萨尔图生活已三年，一直心情压抑，从没有好好看视过这片蓝天草原……。小小的我，先沿着土路，再转到公路，仿佛是一个旅游的行者，边走边欣赏这草原落日的壮观美景，浪漫地幻想着我的祖先一定是跟在帖木儿或者成吉思汗那见首不见尾的浩浩队伍里，弓响箭啸，金戈铁马，威武地横过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我心情开阔、挺胸大步，直直走了一个半小时。到达萨尔图我们矿建小组的干打垒时，大家正围坐在灯下桌边学毛选，我静静地坐下，收起了那一套联翩的浮想，老老实实翻开毛选……。

当然，年轻的时候，阿松也会使些小计谋来“假公济私”。因为阿松的单位是我们设计院的上级机关，所以我们也常“合谋”，约好某一天一起到同一个工地去，那便是我们俩的小

秘密，也是我们俩能在一起度过的很开心的一天。印象最深的是去运输指挥部的“杨树林”基地，这个基地的中心村就在一个水泡子边上。我称是下工地，他称是检查工作。基地基建处的处长是个女同志，一个高高大大的四川人，她熟悉我们俩的特殊关系，所以笑嘻嘻地由我们自己安排时间。我们总是快快地看完工地，匆匆在食堂吃过中饭，便一起到水泡子边上，并排坐在坡岸上，看那澄澈如镜的水泡子里映印的白云蓝天。也会傻乎乎地唱起：

“蓝蓝的天上飘着些白云，  
白云的下面是雪白的羊群……”

然后，我们会躺在没膝深的草丛中，消失在连天的绿色波浪里，任那绿草和野花把我们淹没，说着我们永远说不完的话……。

还有几次一起去让胡路北边的“红卫星”基地，因为那时交通车少，有几次我们是走回让胡路的，那就要穿过一片很开阔的玉米地。夏天时，玉米长得像一棵棵小树，钻进去，就像掉进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在绿叶的抚摸中我们手牵手嬉笑行走。玉米地的中间还有一带积水的洼地，我们便脱下鞋子拎在手里，再卷起裤脚，依旧手牵手嘻嘻哈哈地淌进水里，不时地停下来，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这温馨的柔情蜜意使寂寞清冷的北方生活多少增加了一点温暖。

这几年在南京，有一次和几位大学同学小聚时，曹骥南曾经笑着问我，查子，你记不得了，在大庆我还捎过你呢。我一愣，真是记不得了。他说，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去红卫星基地——就我们两个人，他是去核对总图位置，我是去看放线情况。回设计院的时候，没赶上最后一班交通车，也是走回来的，穿过那片玉米地，也走到那带积水的洼地边。我脱下鞋子要淌水过去。曹骥南硬是不让，硬是把我捎在他背上过去的，他自己的鞋子和裤脚都湿透了……。

我能说什么呢，我真是满心的感激。六十年代初，在大庆的头几年，我的这些同事和朋友们对我是多么真诚、多么爱护啊！

回忆往事，使我惊异的是，在我一生中，曾经有过好几位交情比较深的男同事，像刁建强、赵服理、宋伯韬、胡炳炎、陈瑞禾、陈华锦、黄金生、曹骥南、宣惠金，还有总是和他一起演节目的王长海，及至以后一直很善交的领导张发舜、姜耀祖、金培孚……在我和他们的交往中，即使是在只有两个人单独相处时，他们不但没有过不轨的举动，连不合适的话都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在我生命的各个时期都曾经真诚地帮助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这样的钦佩他们的人品与胸怀，我从心底尊敬他们、感谢他们。

回顾一生，可以说，我平生为人正直、真诚，如一碗清水，一望见底。一生都保持着自己纯洁的为人，努力自立、自尊、自强、自爱，立志像“人”一样生活。在我和这些朋友们的相处中，我从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是个女的，我只是以一个“人”的资格去努力和他们平等相处。在一生的工作中，只以自己的能力去兢兢业业，努力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想，也认为自己决不可能得到什么比别人多一点的好处，所以从不去钻营，也从不会利用什么歪门邪道。我想，这大概要算是我们这种如水般纯清的友谊的基本条件吧。

只可惜如今他们已是走的走散的散，天上人间，天各一方，再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身边了。我是多么地怀念他们，多么多么地怀念这如水的友情啊……。在现在这样商品经济的社会，在这样拜金主义的年代，在中国这种“性饥渴”的时期，不知道现在还能够有这样的如水之交吗？

不过，像我这样的人也带来极大的弱点。其一，没有女性的魅力，这是一生中阿松对我最反感的一点。其二，没有“活动”能力，别人家都是女主人出头露面去领导面前“活动”，以争房子、争工资、争职称、争……，而我们家，这个女主人真是只比死人多一口气，什么也不会说，什么也不会争……。其三，由于自己没有活动能力，也就不能教会女儿们有活动能力，使她们进入社会以后缺乏应变能力，身心都处于艰难之中。总而言之，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便是结婚生育，害了丈夫和孩子，这是我一生中最深的痛悔之一。

我从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是个女的，我只是以一个“人”的资格去努力和他们平等相处

这是最后一次在办公室停留了。坐在蓝灰色十字布围成的隔间里，心情相当平静。这是自然规律，什么事情都有开始的那天，也必定有最后的那次，一如生命。

人们在我的周围，走动，交谈。隐隐地，有谁在放音乐。

我在想，当我举步走出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和我的脚是同样的沉重，因为这是

结束了我生命中一个漫长而重要的时期。从一九六二年二十岁开始，到二零零三年整整六十二周岁为止。从夏天进入，又从夏天淡出。室内是如此之阴凉，而此时的室外，恰是南京摄氏三十八、九度的流火七月。

告别了，办公室。告别了，各个专业的设计师。告别了，我为之苦恼、奋斗、快乐，并且曾经想努力钻研的建筑设计。

我这一生中，十五年读书，四十一年工作，给了我的人生以美丽的色彩。读书是我一生中最光辉最快乐的时光。而工作给了我尊严，给了我人格，给了我能够直直地站立在社会上的一块地盘，给了我能够与男人一样自立在社会上的条件。虽然四十一年的急流、暗礁、狂风、骤雨曾经使我伤心、痛苦，在我心上划上道道痕迹，但是我从不曾放弃，因为只有工作着我才有一点点人格与地位，虽然是一点点。

总的说来，我满足了。这一生，终于能够搞一点点建筑设计——虽然这一定是我最适合的专业。但我能够如愿地在南京当了十八年的建筑师，呵呵，应当满足了。尽管由于天分不足、自己努力也不足而成不了名，但是熟人们还尊重我，就很好。

从楼梯下至五楼的自动扶梯，降至底层，直至玻璃大门在我身后自动地关上。帷幕降下了，灯光熄灭了，戏已结束。

我平静地走上大街。结束了，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我这个演员走下了舞台，从此真正坐在了观众席上。

(2007, 07, 31)

## 二十三

我这一辈子，当演员当得最糟糕的，就算是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了。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室里有意识地要“树”我这个转变落后思想的典型。那时胡象尧主任早已调往山东油田，姜耀祖升为正主任，吕义新提拔到室里当书记。记不得是哪位领导找我谈的话，要我到生活基地的家属生产队里住几天，跟家属一起劳动，体验他们的生活，他们这叫做“蹲点”。

我去的是油建指挥部的“红卫星”基地，在让胡路北边。我到村里的管委会讲明了来意，她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但仍然对我非常客气。就在管委会这栋旧打垒里，她们安排了我的住处，估计这就是管委会的临时招待所。有一张旧的两屉桌，一只旧椅子，一张双层木床，还给我拿来了一只半新的脸盆。

晚饭后，她们领我回住处，让我休息。但是不久我便发现外边很热闹，出门看时，远处近处都有灯光，看得出有人影匆匆闪动。管委会值班的老者告诉我，夏收已经开始了，趁着天气好，晚上全体家属要加班抢收麦子，况且晚上凉爽得多，不像白天中午那么无遮无拦地顶着大太阳。在那个年代，没有机械，农业全靠人的双手。“人海战术”就是整个大庆油田工业和农业开发的总的中心战术。

我站在门外，心里很不安。既是来体验生活的，我怎么可以躲在屋里不出去呢。

第二天，她们都只安排我做一些轻微的劳动。吃晚饭时，我向管委会主任提出，晚上要和她们一起去抢收麦子。看着我坚决的神情，主任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便开始仔细地向我反复叮嘱，一定要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子，并且一定要把袖口和裤脚絮得紧紧的，因为田里有跳蚤和小咬会钻进身上咬得你吃不消；还要我一定穿厚布的衣服，因为麦芒很扎人……

我很兴奋地答应着。可是我这个人从小就只会照顾自己，虽然我都照她们说的做了，但每件事都做得很马虎（主要还是没吃过苦头，不在乎）。晚上，我和她们一起走进夜色中的麦田，在那间隔很远的、临时拉起的一杆杆电灯的照耀下……

当我回到那间小屋，弄了一盆水抹抹自己汗透的身子的时候，身上已经到处都是小红点，分不清是被咬的还是被扎的，又痛又痒，皮肤一片片的发红。

我坐在上层床上，就着屋顶吊下来的微弱的灯光，翻开工作日记，眼泪忍不住流下来……

白天又来临了，我咬着牙继续干。管委会很配合我，抽午休时间安排几位家属和我开个小座谈会，我想听听她们对居民点建设有什么要求。平时劳动的时候，她们都是嘻嘻哈哈、大呼小叫的，象声词、感叹词以至于脏话都是满口横飞的，可是在我面前，她们很拘谨。大概我这个大知识分子使她们很胆怯，她们普遍文化不高，有不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记不得我在那儿住了几天，但那间小屋，那朦胧夜幕下的麦田里人们晃动的暗影，那天坐在床上的眼泪，却多少年里忘不掉。

是她们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足够我一辈子受用。能吃苦，能咬牙，成了我一辈子的特点。再没有什么生活环境比那时候更苦的了。不过也就从此落下一个毛病——不敢倒掉一粒

米。

在大庆矿区建设的讨论中，我记不得是哪一位聪明人首先提出了“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说法。不过，这两年多的生活和对于工人家属的了解，使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她们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人口，对她们来讲，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她们的居住和劳动的问题。我终于忍痛抛弃了一切学术上那种宏大的现代化的气魄，老老实实降到地面上来准备为她们做一点遮风避雨的处所。也许，这就是这次“蹲点”达到的对我脑子的“清洗”所产生的效果，这正是领导们送我去的时候所希望的。

年轻的我就从这里开始逐渐迷失了自我，像走火入魔一般，像笃信异教邪说一般，我钻进了狂热的共产平均主义的牛角尖。

一九六五年底，四室的科学干打垒和浅基础在战区出了名。由于科学干打垒就地取材，基础的科学浅埋，又便于施工，既节约了可观的投资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让大庆的石油能够迅速支撑住当时能源匮乏的中国工业。因此“干打垒专家”陈华锦和“浅基础专家”刘坤泉都被评为设计院的标兵，刘坤泉还同时被批准为中共党员，大家都说他是双喜临门哪。

年底院里的庆功大会上，在音乐声和鼓掌声中，陈华锦、刘坤泉和其他室的几个标兵一起走上舞台。随着，一队姑娘涌上台去，依次站到几位标兵面前，她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条红绸，红绸正中别着一朵红纸絮成的大花——那直径少说也有三、四十公分。她们把红绸五花大绑在标兵身上，那大红花正好戴在标兵们胸前——有趣的是，给刘坤泉戴花的，正是“三快”小崔（这真是天作巧合！）。接着表演节目时，我们室的一队姑娘（小崔领头，里边还有辛淑慧）转上台，她们每人用一幅彩旗围在道道棉裤外面当裙子，手里举着一个酒杯，边转边唱“三杯美酒敬亲人”。由于穿着棉袄棉裤很臃肿，那彩旗裙子远看像是一个个彩色的大水桶，下面坐着的人笑说：“哪里来的一队花姑娘！”

能吃苦，能咬牙，成了我一辈子的特点。

其实，小崔和刘坤泉这一对，不知是谁追谁，已经有一、两年了。老刘是广东人，不善言词，做事慢条斯理，我们都觉得他跟小崔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人。想不到老刘的福气比前生修来的还要好，就在老刘双喜临门这会儿，小崔同意了老刘的求婚，大家都兴高采烈地高呼着：三喜临门！

就在那以后不久，他们办了喜事，室里很隆重地张罗，分给他们一间房间，公家发给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桌，两把椅子。我们的组长和我们组的年轻人更是兴奋，说这是我们组嫁女儿的大事啊！于是全体动员起来，把他们小小的房间贴上大红喜字，张灯结彩，小房间显得喜气洋洋，又把他们的被子换上大红被面，室里、组里大家凑钱买了热水瓶、脸盆、茶杯……。结婚那天晚上，小伙子们特地做了一个“花轿”：找了一张椅子，两边各绑上一根扁担，在欢笑声中兴高采烈地呼喝着把小崔抬到一组刘坤泉的身边，然后全都挤进他们那间小房间，一边吃着喜糖、瓜子花生，一边嘻嘻哈哈要新郎新娘讲恋爱经过，两个人傻笑着，被逼得满脸通红、热汗直淌……

一九六五年以来，对口来学大庆的单位很多。室里常让我向他们谈谈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不会讲假话，只得老老实实讲自己这三年里痛苦的心路历程。我自认为是一个不识时务而被现实打败的空想主义者，况且我这个人从小就认为自己不适合也不可能当什么领导，对音乐的爱好养成我彬彬有礼的习惯和善良软弱的心灵。回到南京以后，有一次常白华出差南京，她早年和我一起在土建室工作。她找到了我的家，热情地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一起回忆萨尔图的那些往事，她率直地说：

“后来我们大家谈起你，都说你这个人还真是挺不错的，蛮正派的，没有说假话，没有千方百计往上爬，其实那时候你是有机会的……”

回顾一生，无论何时，我都不曾想方设法弄得一官半职。因为我认定自己有两件事做不了，第一是当官，第二是经商。原因是我这人有两大缺陷，第一是不会说谎，第二是心地太善良。我唯一努力的就是想脚踏实地地做一点事情，在建筑上树一点自己的“纪念碑”。当然，其实我是错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你不当个一官半职的，能做什么事情呢？这几年回到南京，听人讲起，某县有一位学文学的，大学毕业后在县文化馆当普通职员，多年辛辛苦苦写了五部剧本，每次投稿均被退回。后来在人事工作里刮起一阵风，要提拔年轻且有学历的干部，他于是被提拔为县文化局长。上任后他的第一件事便是忙着把这五个剧本送出去，这一回，毫无阻挡地一一发表……

可惜呀，这一生我任凭什么机会都不肯去抓……

大庆油田自开发以来，一直就是“两论”起家，“老三篇”开道的，毛选是人人要随身带的。对于毛泽东那传奇性的战争生涯和他那些绝世仅有、气魄宏大、精湛的诗词，早已使我无限崇拜。到一九六五年，大庆的极左思潮已经达到相当深的程度。别的不去评说，就单是在矿区建设上，把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干打垒硬是套上“继承延安革命传统”的“革命”口号，使干打垒涂上了耀眼的政治色彩，用这种绝对革命的口号封住了一些有不同看法的人的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一定有许多人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他们不敢说，更有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违心地说。幼稚的我完全看不出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彻底教育了我之前，我一直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老老实实地做人，我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讲的是真话而非假话。

本来，我去大庆的目的也是复杂的，既有想在这一片荒原上树一座理想城市做自己的“纪念碑”，又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报效国家的思想。三年里，我的单纯爱国主义思想被那些革命的措词所迷惑、所煽动，我已经对于“继承延安革命传统”的宣传绝对狂热地深信不疑。在我心里，延安已是真正的圣地，犹如穆斯林的麦加一般。这种入骨的崇拜对于现代人肯定是不可理解的。在这种狂热信仰的控制之中，一九六五年秋天，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梦，这梦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犹新地记忆着……

……好像是在中学里，正在抗日战争之中，我和一些同学约定了几点钟要在一个地方集合，然后秘密乘飞机去延安。我觉得时间尚早，便沿街逛起商店来。在一个商店里，我看中了一块手表，售货员已经拿出来，我正看时，猛然想起时间该到了，放下手表奔向集合地点……已是人影全无，只见到处是被炸毁的残垣断壁。在蒙蒙硝烟之中，眼前两根残破的柱子上却贴着一幅使我触目惊心的对联：“国破山河在 人亡物何存”（冥冥之中怎么会有这样的句子，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顿悟自己只为了一块手表而痛失了去延安的机会，蓦然心痛气塞，立时号啕大哭……不知是谁把我从梦中叫醒了，但我仍然沉浸在梦中，痛定思痛，又流了好一阵子眼泪。

然而，就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的那两年里，在我一生中所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太深了。我仿佛一只原本安静的小舟，不情愿但又毫无办法地被一步步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不得不困在那个处境里，无法摆脱。这，是个什么感觉，是个什么结果，至今，我仍然无法说清楚。但是，这两年的经历一直郁积在我心里，使我一生都感到孤独和苦闷。这是我想写这份萨尔图往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多么想在到上帝那儿报到之前，把郁积在胸中近四十年的话一吐为快。其实，也是一种为自己辩解。我知道这样做其实毫无意义，我辩解给谁听呢？有什么人想听我的辩解吗？我的这些话，对于历史、对于社会毫无影响也毫无用处。但是——我郁积得太多了，我不想让它和我一起上火葬场，——仅此而已。

我只想说说，在六十年代初，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对国家、对人民如此忠心耿耿的人，忠心到愚蠢得令人发笑——不过，这些人确实存在过，虽然为数不十分多……

## 二十四

一九六五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正是最高潮的时候，一股“左”倾的“革命化”的思潮正在各个领域里暗暗地涌动。当时的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报的记者也纷纷走访大庆，除了走访工人单位以外，也有来到设计院、研究院，搜寻“知识分子革命化”的材料的。有一位记者和我谈话以后，便约我写稿。这真让我骑虎难下了，要知道我既无成绩又不是标兵，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刚刚有点转变的落后典型，对于这一点，我始终很清醒，也很自卑。在领导的催促下，我只得实实在在按自己的情况写了一篇短短的稿子。取个什么题目呢？我坚持不要把调子拔高，要实事求是。现在我已记不清是谁给我想出了这么一个题目：“第一步”，是院长？是姜主任？还是老胡、老宋？听到这个题目，我松了一口气。是啊，歪歪扭扭的第一步。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五年夏日的一天，好像是在《光明日报》上登出来了。看到报纸的登载，我的心情又悲又喜，悲的是毕竟报纸的登载肯定了我这两年痛苦挣扎的经历，对我是一重安慰。

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对国家、对人民如此忠心耿耿的人，忠心到愚蠢得令人发笑

这一年的“建筑学会”，也受这股“左倾”思潮的控制，透露出“左”的第一个信息，便是将会议的地址定在了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左”的第二个信息，便是特请石油部派代表参加，并指定要大庆作大会发言。会议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召开。不知经过如何操作，决定大庆去两个名额，指定已调到山东油田的我们室的原主任胡象尧带队，而另一个——竟然是我。

这个决定使我异常震惊，刹时我呆若木鸡。这个决定也使全室都异常震惊，私下议论纷纷。

半天，我的脑子才反应过来，我惴惴不安地极力推辞，因为那时我从不认为自己能参加什么全国性的会议，连幻想都没有过。但是主任说了，这是定下来的事，不可能变的了。还说，这一次，我们石油部就是要好好去震动一下建筑学会我们不讲技术，我们就是要去讲政治，要在建筑这个领域里突出政治而不是突出技术，决定叫你去，就是要你去讲思想转变。

那时的我，成了被形势和环境所绑架的人，除了服从，别无出路。当我低头走出主任室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前不久做过的那个去延安的梦——这是命运？还是巧合？

我并不完全是个傻瓜，我看得出来，我们室好几位会战元老都很想去开这个会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交流的机会，又是一个多么好的“出名”的机会呢。确实，无论在工作业绩、技术水平、政治表现上，我哪儿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呢。因此，那一段时间里我非常心虚，整天抬不起头来，心情十分不安，思想上压力很大。

但是，从内心讲，我已对延安十分地崇拜，醒里梦里都想去看看。

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我做着去开会的准备，大家也毫无怨言地帮助我，特别是老宋和老胡。大师安排赵服理、王长海等几位还帮我准备了一套精美的干打垒图纸。我的发言稿也由各级领导反复审查修改。

不过，在我这段心情沉重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人为这件事对我说什么讽刺挖苦的话，大家对我的态度一如从前，这使我的心情稍稍得以宽慰。直到现在，我还是从心底里深深地、深深地感谢大家。阿松也一再宽慰我说，一定要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还说，在梦里你没有去成的延安，这次真要让你去了，你该高兴才是。

一直到上了火车，我都以为是在梦中，怎么也不敢相信我能去延安，去那个我心中无限崇拜的圣地。三月中旬，当胡象尧在石油部见到我这个“小巴浪子”的时候，脸上冷冰冰的，很不耐烦，叫我把发言稿念给他听听。直到这时，我的心仍很平静，我一直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可以让他们撤换我。我平静地念完稿子再抬头看他的脸，想不到他竟满面笑容连声说“好，好，……”

大约二十号左右，和胡院长一起乘火车去西安，在一所指定的宾馆报到，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其它代表一起，分乘几辆大客车向延安进发，途中要在铜川住一夜，第三天才到达延安。

铜川当时只是一个小县城，六十年代初，这些小县城都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街道也很狭窄，我们这几辆大客车穿行在小街上，特别引人注目。在铜川住的是一个当时很不错的旅馆，我住的房间在楼上，房间里五、六张床，挤得走路都不方便，除了被褥都还干净以外，那设备真赶不上现在的招待所。

我本已是胆怯沮丧的心境，加上不善交际，不敢和别人讲话。吃饭的时候，偷偷观察周围，发现首先是男同志多，女的多半是工作人员；然后是年长的多，至少是中年以上。他们多是设计院的老总或是省、市级管理干部，一付高贵的当官的派头，几乎每人一袭或长或短或灰或黑的呢大衣，一双铮亮的皮鞋。相比之下，我真是寒酸无比：一件里子已经破得露絮的棉袄，外罩一件已经褪色的蓝布衫，脚上一双黑布鞋。就我的这付尊容，谁也不敢和我讲话。

那天晚上在客房里，别人都在大声交谈和整理文件，我发现房间外带一个阳台，便默默独自走了过去。早春的夜晚仍然相当寒冷，稀疏的星星，有亮有暗，有的还不停地闪烁，它们从天顶一直排列到远远的天边才消失。俯视脚下小小的县城，异常安静，暗淡的灯光在夜雾中恍惚，在不远处溶进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过了这一夜，我将去到我无限崇拜的圣地延安。

一年之后，在一九六七年初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风暴中，回忆起这次的延安之行，填词一首，记述了当时的心境。

### 蝶恋花 铜川

铜川一夜怎入梦？星夜、灯疏，阳台凉意浓。往昔延安胜天远，而今只在群山中。

回首往事悲悔涌，影消、情重，寂寞无人共。莫道来日方峥嵘，残血剩勇誓卫东。

我如实地抄录“誓卫东”三个字，这三个字现在看来极可笑，但它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是文化大革命抹不去的烙印，就如实地承认这一段历史吧。

当我在车上能够望得见宝塔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无声地念着它的名字，心里充满虔诚的膜拜。

那时的宝塔山上看不到什么树，整个就是一个干巴巴的黄土堆。宝塔的形状没有稜角，

那浑圆的轮廓显得浑厚、古朴，甚或有一点简陋，仿佛是被岁月磨平了一般。车子经过延河大桥进入延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中国西北城市的河流，和我三十年后去九寨沟时见到的岷江一样，河床虽然很宽，水流的宽度却只占了河床的大约一半；水流虽然很湍急，河水却一点也不深：靠岸的那部分河床都干涸着，露出大大小小的块石；河水是浑黄的，河岸也是黄土地，几乎看不到绿色。

安顿好住处，代表们，包括我，都忍不住好奇地立刻去到街上。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如此耀眼、洁白的白羊肚毛巾。那里的大部分男人的头上还是裹着白羊肚毛巾，像我以前在剪纸和木刻上见到的那样。在浓浓黄土地的背景上，在灰蒙蒙苍老破旧的土房子的衬托下，在西北干旱少雨的大太阳的照耀之中，那白羊肚毛巾显得格外抢眼。接着这第一印象的，便是鲜亮的白羊肚毛巾下那延安人的脸色，那干枯如雕塑一般的颜色，那难以想象的黧黑的颜色，仅仅说黧黑还不够，还有那被风沙和岁月磨刻出的皱纹是如此的深而密，多年里使我不忘。

我喜欢观察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于是转到大街后面的背街小巷。

那里是大量的旧而破的土打墙的房子，旧而破的木门窗，跟我们大庆的旧干打垒一样。还有高低不平的窄窄的黄土路。在那些土房子的墙角边，蹲着一些吃饭的男人和孩子，手里只一双筷子一只碗，我看不清碗里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身上大多只有一件极旧的空心棉袄，包括那些又脏又黑的孩子们。

我忽然想起前不久做过的那个去延安的梦——这是命运？还是巧合？

我不曾料到，解放十六年来，我所看到的延安——这个毛泽东走出来的老革命根据地，竟是如此的贫穷。我想起了上海和北京……难道是我们把老区的人民遗忘了十六年？遗忘了这用小米加步枪喂养出新中国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站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负罪感。特别是我们这样一群身着呢子大衣和铮亮皮鞋、脸色粉红透红的人群，走在他们身边的时候……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开始思索，解放十六年，延安尚且如此，佔人口五分之四的广大农民又是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使我产生了深深的悲观情绪。我想，我们，甚至我们的下一代，都要在干打垒里艰苦奋斗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让中国翻过身来。

在大会发言中，我从容地念完发言稿。我是代表中最年轻的、职位最低的一个，没有任何得失需要考虑。发言结束走下讲台时，掌声寥寥，我毫不介意，觉得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一点轻松感。不少代表对大庆油田的开发挺感兴趣，对干打垒真没有几个人过问，也真不必过问。因为，分散建设油田居民点也好，干打垒也好，这都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中，在缺少外援高寒边远的特殊地区里，在突击上马大兵团会战的特殊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特殊手段，这是咱们所读的城市规划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也是别的地区不可复制的。

开会那几天，延安城建部门抽出大约两个晚上，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延安地区的规划设计，请代表提出建议与修改。许多专家提出不少很有水平的建议。我竟然也忍不住发言了。我说，延安是革命圣地，不能像一般城市那样搞规划，延安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规划的内容应当考虑得宽一点，要把生产和生活兼顾起来，把工、农、林、牧、付、渔统筹安排，以发展生产为根本，才能彻底改变延安的面貌……云云。延安的那位同志听得瞠目结舌，嘴唇动了动却半天没说出话来。现在想来，他一定在想，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小女娃子？……

在大会分组讨论时，我还大谈我们这一代人身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使命，我们要艰苦奋斗一辈子，我甚至很激昂地说，我们要住一辈子干打垒——胡象尧连忙改正说，是一辈子发扬干打垒的革命精神……

总之，在这次会上我是充当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极左”面貌的跳梁小丑。这是我必须承认的。记得文革结束后，建筑学会开年会时还曾经提到，一九六六年的那次学会代表大会受“左倾”思潮的冲击，大会的方向有错误。这个“左”的马前卒，就是我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开会的几天，我们的伙食非常好，十人一桌，宾馆还特为我们做一些延安的土特食品菜肴。但我却心情沉重，吃饭的时候，总想起捧着饭碗在墙角蹲着的延安老乡那干枯黧黑的面孔。

还组织我们参观了革命事迹旧址，这使我激动不已。大部分代表都是第一次来延安，大家互相帮助拍照留念。站在张思德墓前拍照的时候，我在心里严肃地对自己说：记住，

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在离开延安的那个晚上，我无法入睡，思潮起伏，激动不已，我怎么也不能够就这样离开延安。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业绩，还是刚刚摘了落后帽子，但是我实在不能这样地离开这块浸透了革命热血的圣地。夜半时分，我终于拿起笔，在灯下颤抖地写了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份入党申请书……

带着深切的留恋，还有一种说不清的遗憾和惋惜，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参观西安的半坡村遗址和华清池，但是胡象尧把我扣下来，帮他整理大会文件。于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捉蒋亭和华清池，而且，也不想去，因为有太多心酸的记忆。

离开西安之前，我和在西安工作的老同学夏、徐和贺通了电话，约他们晚上见个面。我们是在哪里促膝交谈的，我已记不得了。但还能清楚地回想起他们送我出来，走到沿街的庭院大门口，在茫茫夜色之中将要分手的时候，我忍不住自己的激动，谈到我在延安时的真切感受，深深地感叹我们国家的贫穷与落后。我还非常沉重地对他们说，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重担就担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了……那一刻，我心情悲壮，情绪激昂，自说自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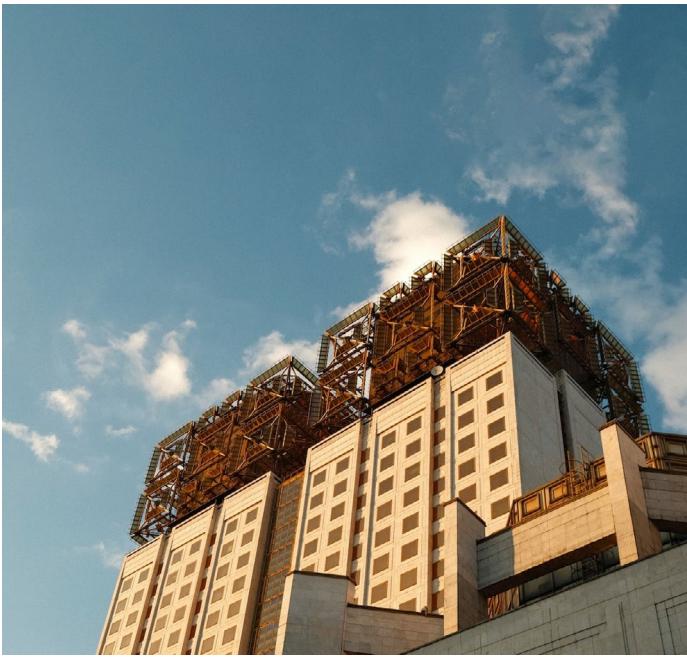
以后，到一九七七年，我才重见夏，他已调回上海工作多年。徐是我在一九九八年去海口出差时，听说他已是海南建设厅厅长，便到他家拜访了一个晚上。他让我参观他的房子，他家的客厅比我家住房的总面积还要大，他还给我看他出国访问时的几大厚本照相簿。

已是清明时分，当我乘着火车回北京的时候，雨中的渭南平原上已经透出嫩绿的、水灵灵的绿色。远远的，或疏或密，或浓或淡，那杏花的团团粉色的红晕，像国画里那样融溶在雨雾之中。我这才蓦然想起：清明时节雨纷纷……

写到这里，我心里轻松了一些。

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我知道。而且，仅就延安开会这一件事，我也不可能说清楚，我是怎样被扮演了“左倾”错误思潮的马前卒的。只有把萨尔图的这些往事都写出来，我才能向你们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对国家、对人民是一片赤诚。在那个年代，我自以为自己是真正忧国忧民的，我不曾说过假话，我不曾欺骗过任何人。即使我的行动真的伤害过什么人，那也绝不是我的本意，我多么希望人们原谅我。

我说这些，不是无中生有。也许，由于我的“左”的影响，妨碍到某些人的升迁和政治地位，但是我没有办法向他们忏悔，我也完全不能为他们所受到的伤害给予任何一点补偿，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阴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题图来自 [Paul Schneider](#) on Unsplash

## 小说

# 去廊坊

查滨华、杨瑞松 | 非虚构图书馆

离开萨尔图，我们走入人生第二个转折点。

一声尖厉的汽笛声划破了凝冻的空气，火车缓缓开出萨尔图车站。

大地一片粉白。

带着我们一家四口的绿皮火车向着西北方向，不一会儿就到了让胡路车站，火车没有减速，呼啸而过，爬上了高高的弯道转向南，走上了让通线。

最早，大庆油田的原油是由滨州线经哈尔滨南下。一九六二年，决定开辟第二通道，从让胡路站接出，接上内蒙古通辽，在这里和京通线连接，这样，大庆的原油可以直达北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线。

火车走上弯道后，就放慢了速度，不停地拉着汽笛。

多少次，午夜梦回，听着这汽笛声，我思绪万千……

弯道旁有一块高地，阿松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在这儿看长长的油罐车。孩子们兴奋地数着：

“……、35、36、37、……、58、59、60、……”

她们当然不知道，她们的父亲现在在想什么？她们更不明白，十多年前，她们的父母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烟雨江南来到这北国荒原？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登科后》 唐 孟郊

从萨尔图出来，我仿佛小鸟飞进了广漠天地，我充满幻想，充满期待，我感觉这应当是我人生中第二个转折点。

感谢上帝，我清楚地知道：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萨尔图了。

在火车的轮轴声中南下，一家人从来没有过的这么轻松愉快的心情。我们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晨到达北京，虽已是数九寒天，比起黑龙江来，却是小巫见大巫。走在

北京的大街上，我和阿松脱下了道道棉袄；小华欣喜雀跃，看着雄伟的高楼，不住地问这问那；雁雁刚满四岁，步履蹒跚走得慢，频频伸手要我抱，我笑着把她背在背上……

我不记得我们在北京停留了几天，落脚在谁家？

我只记得我们带孩子进天文馆看了星空表演。直到现在，孩子们还会如醉如痴地回忆：我们在雪白圆顶下的入口进入馆内，满屋整齐布置着灯光和座椅，当全场已座无虚席时，灯光转暗淡淡的音乐声飘起伴随着讲解员的声音清晰而柔和地响起来圆顶上夕阳西下，星星们眨着眼睛，携手并肩一群一群地漫步来到夜空中——啊！今夜星光灿烂……

我还记得离天文馆不远就是北京展览馆，当年的中苏友好大厦。

我还记得当我们路过“学院路照相馆”时，阿松爽快地说：“来，咱们一起照张相……”——留下了那些天舒心的笑脸……

—

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夹着一个小县城——廊坊。廊坊虽小，却历史悠久，有京津走廊上的“明珠”之称，还有一段民谣：“廊坊本叫侍郎房，一千年前把名扬，一南一北龙凤河，宝井吐珠兆吉祥，……”。可是在我们的眼里，真是可怜得很，除了一个叫“三角地”（其实只是火车站广场）的地方和以三角地为中心的两条小街还算热闹，其它地方同农村没有两样。堂堂的石油部管道局为什么选中这个地方，我在《萨尔图往事》中介绍过，后面也还会说到，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两年管道局定在廊坊后，在县城东边划下一大片办公与住宅区用地，一条大路直通三角地。但我们来到廊坊时，管道局只建了局办公楼、通讯楼等零散建筑，其余还多为荒地堆场，下午下班后，寂静无人，少有灯火。

我们初到廊坊时，因房子尚未为我们找定，暂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廊坊饭店，楼下就是餐厅，不用我买菜做饭洗锅涮碗，

哈！我真正地享受了一个多星期。

“三快”小崔和关步英来看我们，告诉我们正在周各庄为我们找房子，过几天就可以搬过去。他们都是我们大庆的老同事，关步英和她的先生还是我们同济的老同学。小崔还是快嘴快舌，经过几次大手术的关步英竟然身体恢复得这般好，我们能够一起在廊坊相逢并且共同生活，让我们既感慨又欣喜。她们争相告诉我，这里的天气暖和得多，这里的副食品供应又多又便宜，市场里荤菜蔬菜应有尽有，在黑龙江买到不到的猪肝，这里五角钱一斤随便买，还说后勤经常出车到北京拉副食品分给大家，什么水果、猪肉、鱼、虾都有，偶尔她们还会在休息日搭上院里的顺路车，到王府井逛一趟……我听得发呆，我能到这样的地方，这不枉是天堂了……我和她们一起说笑，笑得掉下眼泪……

这里的副食供应真是好得惊人，楼下的饭馆里各种猪肉卤菜、面条米饭甚至小华最爱吃的像南京“四川酒家”那样的小笼包子，应有尽有。小华的生肖属猴，最爱吃猪肉鸡肉，我们几乎每天给她买一份红烧猪脚蹄和一笼屉小笼包子，她便笑嘻嘻地接过去，专心致志，精细啃食，其乐无比。唉，她到大庆一年里所吃的猪肉，都没有在廊坊饭店这些天吃得这么痛快。雁雁却不然，她生肖属猪，又由于幼时传染过肝炎，自小就不食油腻，只喜吃水果蔬菜，故此这两小姐妹只可“分槽喂之”矣。//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在旅馆里才住了一个星期，却从镇上的大喇叭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立时心情分外沉重，他是我们共和国的脊梁，混乱的文革尚未结束，还有谁能来挑起这副担子呢？我们围在电视机旁，看到北京的人们恸哭着拥在十里长街护送总理灵柩的报道，大家泪流不止，悲痛不已。

我只见过总理一面，却总也不曾忘记。那次是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大庆参观，让我们站在大路两旁列队欢迎，因为听说有周总理陪同，大家十分激动，特别是像我这样没有见过周总理的，拼命挤站在前排。……一辆敞篷车缓缓开过来，靠我们这一侧稍稍侧身站着的是周总理，是总理，方正消瘦的面容，沉着安详的神态……身边的人们纷纷跳着，挥动手中的小旗，响起一片呼喊声：“周总理！周总理！……”我也一边跳一边大声喊叫“周总理！周总理！……”车子开出去好远，大家才停下，笑着擦去脸上的泪水，互相承认谁也没看到谢胡总理是个什么样子……。经过文革，我对周总理从过去单纯的崇拜，设想到他近年来的处境，转而比以前理解了他的为人。历史的长河向前流去，一切自当有论，我们匹夫不是撰写历史的人。我们担心的是政局，但求不再动荡，这是小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

她们更不明白，十多年前，她们的父母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烟雨江南来到这北国荒原？

趁着等房子的几天，阿松选了一个清晨人不多的时候去拜见了张书记，知道他很忙，只说了几句诚挚感谢的话，张书记询问我们安家的情况，说管道局刚安定不久，还要我们在生活上克服一点困难，努力做好工作。我也拜访了几位老熟人，“大师”陈瑞禾和秦大夫，“三快”小崔和老刘，黄金生和关步英，吕义兴和韩永彬，特别是已任院长的姜耀祖主任，因了他的帮助，我们的调动才得稍微顺利，在大庆十几年与他们一起甘苦共尝、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于今能够一同转战京都城外的廊坊，感慨万端，倍觉不易。我频频恳求大师好好帮助带我这个徒弟，我感到现在是我向他学习的一个好机会，我必须抓紧。

## 二

我们在廊坊的第一个家在镇子北边，一个叫做“周各庄”的村子的最西北角那一家，离办公楼最远。看上去这个村子的岁月古老，散落的土屋隐隐在成片高大的树林中，每户门前都有土路（因河北下雨不多，是故土路十分简易，被称之为“晴天黄沙路，雨天水泥路”）。房东姓皮，妻子与阿松同姓也姓杨（当地俗话说六百年前是一家），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他们称呼小儿子“皮大三儿”，于是村里人便称呼他们家“皮大三儿家”。抹泥的围墙，从院门进去，方正的院子很大，足有二十来公尺深，两边围墙在房前做了个斜坡连到房子两端的山墙顶上，可以直上屋顶，这儿就是房东两个儿子游戏的地方。不几天四个孩子就熟悉了，我惊吓地看到，我们两个女儿跟着皮大三儿一起，沿着围墙顶走上屋顶东张西望，所幸不曾摔下来过……。院子左侧是一座半敞开的一、两头猪的猪圈，旁边也是一个半敞开的一人蹲的厕所，就是那种一个坑两块板的样式。我一直没有让孩子们用这个厕所，我已经听小崔的话，买了一只痰盂做孩子们的便盆；院子右侧靠近房子是一口洋井，那种抽吸式的；院子当中和周边有几株比碗口还粗的杨树，此外便堆着大捆的树枝干柴及杂物。

主屋是一座小平房，微微起拱的平屋顶，厚厚的苇草抹泥屋面，墙体是外贴空心砖的土坯墙（俗称里生外熟），大门居中，细心的屋主人还仔细地在大门的门头上做了个不大的雨蓬。东西两屋各开一窗，立面看上去与“一张嘴两只眼”的标准农屋一般无二。平面是典型的一明两暗样式，跨进大门里中堂的东边是主人的卧室，中堂的西边已腾空给我们住，房间南墙下是一部占了房间三分之一面积的土炕（但未通火），南墙虽有较大的木窗，但木作做成小方格式，以致室内较暗。

中堂中间是一口大锅，直径足有四五十公分。小杨做饭很简单：下层锅底部是一些杂菜或萝卜烩汤或者煮玉米面糊糊，上层锅边一圈贴玉米面饼子，每个饼子都有我的手掌那么大，灶膛里用树枝烧柴，不多时便可揭锅，但见玉米饼子橙黄似金，锅巴香味满屋充盈。两个小儿一手抓一个大饼子，另一手抓几根咸菜萝卜条，边吃边到院子里跑跳嬉戏，瞬间便将玉米饼子消灭干净，再去锅里取来续吃……。

管道院与大庆一样发给我们两张木床、两只方凳，几天后又送来一只旧两屉桌。因为室内除去土炕外空间已很小，就把睡铺安排在炕上，两张木床用不上，只得靠墙站着，又把二明帮我们打的两个装行李的木箱放在炕的两端头，平常只拿出被褥和换洗衣服及日常用的杂物。饭食是不可能自己做了，每天三顿饭完全吃食堂，洗澡也要进公共浴室，我早已做好思想准备，还得艰苦一阵子。

所幸小杨和老皮都是朴实本份的乡民，在与我们平日交往之中，对我们很是诚恳平和，特别是小杨，每天早晚都帮我们烧开水。有一天她包羊肉饺子，这在当时的农村里还是少有的稀罕事，她特为笑嘻嘻地送给我们一碗，我很感动地谢谢她。说实在话，我们两个女儿和他们相比实在是够娇气的，她们闻了闻那热气，立刻急忙用手擦去脸前的气味跑开了。气得我自己把那一碗饺子全吃了——当然，有一股不大好闻的膻味。和小杨渐渐熟悉，我总觉得她虽然脸色晒得黝黑，但是俊秀的脸型，匀称的身材，总有一点城里人的影子。她很羡慕我，有一次边做饭边和我闲聊时，好看的大眼睛里淡淡地泛出落寞，她跟我讲起小时候的事情，她出生于张家口一户平民人家，她是家里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送她上了三年小学就不让上了，说女孩子不要上那么多学。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饥饿，家里人为保住男儿根苗，将她嫁到这里农村来，为的是农村多有各种杂粮，其实跟老皮没有多少感情……。我很同情她，我和她同为女人，她不能上学，只是农村普通一农妇；我却一直读完大学，有工作，有工资。命，这就是命，人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命，认识了小杨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要珍惜已经得来的一切。老皮就不一样了，有点大男子主义，有时对小杨会粗声大气地苛责两句，但是平常见人总是笑嘻嘻地，偶尔且不乏幽默，有一天阿松和老

皮在堂屋里说起我们在大庆的经历，老皮笑着说：“老杨你可真福气，娶了个媳妇还是带饭票的……”。

我们的家没有完全安排好，室里已经催阿松去鲁宁输油管道做现场设计地址就在仪征，这里是鲁宁线的末站。我虽然很希望他留在我和孩子们的身边，但是仪征离南京那么近，可以去看望我的父母和姐姐，这可是我醒里梦里多年的想往啊，真是喜忧参半。阿松一边收拾他的衣物和工程资料，一边为我担心。他征得老皮同意，拉出电线在炕头接了一盏台灯，以便我晚上照看孩子。又见黄金生家买了一辆自行车，买菜运粮不但方便且节约时间，于是我们商量后便托老黄也帮买一辆，当时买自行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老黄有办法，还没等阿松出发，自行车就骑上了——永久牌，二八式，这是我们成家后置办的第一个大件。正好在皮大三儿家西侧，镇上正修一条简易道路，通到设计院门前的大道，自行车果然可用武之地。

这一年的春节由于天气比较冷，衣物用品还需要添置，我们没有去北京，而是几次领着孩子们到三角地逛街采购，孩子们十分欣喜，我们穿行于摩肩接踵笑语喧哗的人群中。那天最满意的收获是孩子们在一家店铺里发现了仿真的蝴蝶，黑色底子上点着靓丽彩色的斑点，形状和色彩和真的蝴蝶一模一样，用两根有弹性的钢丝固定。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了，孩子们拿在手里跳跳蹦蹦地走着时，它也上下轻颤左右摇摆，仿佛就要摇摇欲飞。多年来孩子们一直很喜欢这两只蝴蝶。直到四年后，当我们喜气洋洋搬家进楼房的时候，“三快”小崔帮我们抱起桌上的东西快快地走，可是到楼里才发现那两只蝴蝶丢失了，怎么找也没找到，后来还想再买，也没找到同样的，两个孩子十分伤心，为这件事，她俩心里总对小崔有那么点耿耿于怀。直至现在，还会一叠声地说：“就是崔阿姨弄丢的！”

匆匆忙忙，阿松于三月底去了南京。

永久牌，二八式，这是我们成家后置办的第一个大件。

自行车发挥了作用，还真是幸亏我在大庆学会了骑自行车，但是我的骑术水平不高，起初我不敢骑车带孩子们，只是让她俩坐稳在车上，我就推着他们走。总是刚到新单位，上下班不敢怠慢，当时又年轻胆大，为节约时间，我开始试着骑车带两个孩子：先把雁雁抱到车大梁上坐好，我开始骑车起步，车轮慢慢滚动起来，小华便跟着车紧跑几步再跳到后座上——每想到此，我都会感谢女儿小华，当年仅七岁的孩子竟然像个老练的体操运动员一般，准确无误地跳落在我的后座上，她帮助我度过了在周各庄一年多的艰难时光——当然，也要感谢所有的神灵们护佑，没有一次让她摔倒或受伤……但是有一次把我自己吓坏了。那一次是下班时候，忘记是什么缘故回来得很晚，出设计院时天已全黑，人们似乎全回家了，四周静悄悄，疏落的建筑也无有灯火，路上尚未建起路灯，我想赶快回到家里，便仍旧骑上自行车，雁雁在我前边，小华已跳好在我的后座上……从大马路上右转弯走上周各庄旁边的简易小路时，入夜的天色迅速地更黑了，浓浓夜色包围了我们，像一块黑布盖住了我的眼睛，我不由得自语……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什么也看不见……，正在我自语的时候，只听“砰”地一声，我的两手在车把上一震，车子向左边歪斜，只是幸而停住了，我的左手拦住了雁雁，立即回头看，黑暗中小华正站在我身边，原来车歪时，她就机灵地跳下地了。下车一看，车子正正地撞在一高大的水泥管子上，大概是新拉来要铺设的排水管，幸好我们撞在圆弧面上，我又因为胆小将车子骑得很慢，于是这一碰撞就把车子停住了，如果水泥管的位置转个九十度，让我们冲进空心圆里，势必车倒人伤。这次危险让我警惕，必须首先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 三

我把孩子安排好，每天早晨唤她们起来，一起先去食堂吃早饭，送雁雁去托儿所，那里孩子不很多，中午在托儿所包饭，她很喜欢去。那时管道局已开办了自己的小学，小华插班上小学，开学之前跟我上班，开学后我送她上学，中午接过来跟我到食堂午餐，下午她放学早，就到我的设计室来做作业，下班接雁雁去食堂吃完晚饭回家。

我于简单报到后，即到土建室开始工作，这个管道设计院是新建立的单位，人员几乎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设计院，北京院、四川院、抚顺院、新疆院，……（感觉几乎有一半是年轻人，而且还几乎都是北京人）。主任是徐宝华，宝华稍稍矮胖，身体强壮，方脸大眼，毕业于清华，是共产党员，脾性有些急，但做事爽快。室里有不少大庆的熟人：崔秀中、刘坤泉，大师陈瑞禾，吕义新、韩永彬，黄金生、关步英几位。还有阿松在东北八三

秦皇岛熟悉的张弢、聂野、顾传昆、查美京(毕生很少遇到同姓者,互相都惊喜。一位小个子,爱活动的人,祖籍浙江海宁)。其他单位来的还有组长迟泽文,白觉民、邢燕生、刘树森、邓志安等七八位身高体壮的年轻人,还有从新疆油田来的柯愈劲(大高个,后来见过他的夫人,夫妇俩长相都像维吾尔人,很漂亮)和杨殿,少有几位中年女士,杨士珍,陈桂珠、益杏懿、洪杰珍。年纪较大的还有结构专业的金樾,当时已近六十岁,偏瘦,无言且温和。李笃和夫人陈淑菊很引起我的注意,他们都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生,虽是年已六旬,依然衣冠楚楚,挺胸举步,气质不凡。

我被立即接手做输油管道场站的厂房单体定型设计,对我而言不算困难。给我配结构的是陈桂珠,生产办公室马延明主任的夫人,人高眼睛大,一位东北美女,小儿子马强才一岁多,少不得常常向我这个过来人叨叨她的辛苦劳累,她有北方人的那种热情直爽,又同是艰苦做母亲的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我一边抓紧学习大师的图纸,一边注意学习各专业有关知识,努力按时完成布置给我的任务。有一次组长迟泽文来找我说你是学规划的,这里请你做一个场站的土方平衡设计图,我二话没说接过来。其实我以往没有做过土方平衡,晚上回到家,把孩子们安排睡下后,找出有关资料,看了大半夜,终于胸有成竹……

有一次院里分带鱼,每一户分有三四斤吧,下班时,我将一塑料袋子的带鱼挂在自行车前手把上,娘儿三个骑着车一路叮叮当当着铃儿回周各庄。我的心里还在盘算着把鱼洗好了请小雀帮我做红烧带鱼……回到家门口,放下两个孩子,再看车把手,哪有带鱼的影子?定是失落无疑,只得拍拍自己的脑袋失笑而已。第二天路上遇见关步英,她问我昨天的带鱼给孩子们解馋了吧?我笑着告诉她实情,她愣了一下,醒悟过来,笑着说,哪儿有这么巧的,我们家的房东昨天晚上高高兴兴告诉我,他们在路上捡到一袋子带鱼,回来大洗特洗,油炸烹调,好不热闹……。隔天,关步英笑着给我端来一饭盒红烧带鱼,说,房东听了又惊又笑,不好意思向你道歉,让我把这些带给你们尝尝……。下班之后,我带着孩子们和关步英一起,到房东家感谢,彼此都笑成一团,我说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有神仙帮我们做得这么好吃的红烧带鱼,孩子们一条条地感谢……。

#### 四

这一年的清明节前后,北京爆发了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天安门事件”。正好阿松到达南京,他听说了3月28日,南京大学四百多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遗像和花圈,前往总理生前居住过的梅园新村,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接着,工厂学校等单位成千上万的群众抬着花圈走向梅园新村和雨花台,连续几日自发举行纪念周总理的游行集会,虽遭受阻挠却未曾屈服。同时也听说北京、杭州、郑州等地也趁清明节举行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这时的我正在离北京最近的廊坊,将近清明时,管道局里许多家在北京的同事,给我们传来北京的信息,无不激动地说起,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已摆满纪念周总理的花圈、花篮、悼文、传单,无数佩戴黑纱、手持白花的人流涌入,直挤满了广场,人们大声吟诵自己写的祭文、悼诗,自发地高唱“国际歌”,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4月4日清明节,这天正是星期日,设计院有不少年轻人去了北京,回来向我们叙说,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天的天安门广场达到了高潮,约有二百多万人进入广场,绵延不绝,声势浩大,纪念碑周围已是一片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花山诗海”,他们还抄回了一些广场上的诗词,当时就有“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人们在背后议论,闻到了浓浓的斗争的气息……。由于当时“四人帮”很嚣张,坚持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命令4日当夜将广场上的花圈全部清出,致使第二天群众激愤难忍,部分群众与民兵、警察发生严重冲突。

两年多以后,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十六位老师,搜集了当时流传的众多诗词手抄本,加以编辑整理,以“童怀周”为笔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12月出版了“天安门诗抄”,许多年轻人都是人手一册。阅读那些或悲恸、或铿锵的诗句,仿佛捧着一颗颗燃烧的心……。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五一节休息一天,因为一来阿松在外出差,二来天气不好,我和孩子们都没出去玩,只上街给她们买些小点心。

河北的天气比较干燥少雨,大部分雨都是落在春夏之间,还有一次傍晚先是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随落,然后转为冰雹,打在窗上,让孩子们好担心。记得第一场大雨来时,自行车是无法骑了,我给小华穿上高统雨靴,背着书包,打着布伞。在她身后我背着雁雁——

实际上是雁雁用双手抱着我的脖颈——一手打伞,一手扶着雁雁。我们决定不从西边那条简易路走,因为绕远。我们从院门出来,走上正前方那条径直通向设计院的土路。廊坊的雨总是伴着风同行的,那天,风借雨势在林梢喧嚣,雨凭风力在树下飘摇,我们三人刚刚走上土路,只听见小华瓮声瓮气地喊道:“妈……妈……鞋……我的鞋……”我紧走几步,看见小华的背影,右脚向上悬在空中,左脚套鞋着地,独脚支撑着左倾的上身,俨然一副金鸡独立的架势——右边的泥地里正淹着她的另一只套鞋——我抢上前扶住她。这才发觉,雨水把土路的表面层湿润成细软的稀泥塘,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泥路”,鞋子踩下去,被下层的干泥粘住要拔出鞋子来是件很费劲的事,可是这土路还很漫长我和小华一商量,还是走那条简易路吧……

慢慢地,倒也适应了周各庄的生活。小华放暑假了,有时跟我到办公室,有时就到关步英家和小煜子一起或看书或嬉戏。廊坊的夏天,除了蚊子苍蝇以外,还是比较适意的,不凉不热,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

#### 五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文革没有结束,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正常,但是好像从年头到年尾总是陆续有点什么国家大事。我们刚到廊坊才几天,便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接着是“天安门事件”,这年的七月六日又听到朱德老总逝世的消息,想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心情又一次沉重不安。谁知才过了几天,我和孩子们还经受了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是七月二十七日,丙辰(龙)年七月初一,天气似乎比前几天闷热,晚上照常将孩子们安睡后,我又看了一会书,将近子夜时分才睡下了。……忽然一阵响亮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

“老查!老查!快开门!快开门!快出来!地震了!地震了!……”这是老皮的声音。他才拼命喊了两声,我就知道出大事了,跳到床下,首先想开门,为了立刻要把孩子们拉到门外。但是大地在震颤,接着又在转圈摇晃,我的身体不由自主也被跟着这股力量颤动摇晃着,我的脚步变得绵软无力,刚跨出一步又被摇晃着退后一步,不过仅仅两公尺的距离,让我艰难地扑到门边——但是却拉不开门——老皮一直在门外喊:

“……老查,门框子变形啦!快使劲拉!……”

炕上的小华已经被喊声吵醒,坐着发愣。老皮两口子帮我在门外推,我咬牙使劲往里拉,终于门开了。雁雁也已经被吵醒,自己爬坐在炕沿,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手抱着雁雁,一手拽着小华,跌跌撞撞跨出门去,冲进院子……幸得廊坊受影响较小,那夜还没有停电,且又是夏日,我们站在院子里,不敢再进室内。老皮指给我看大门上的那块小雨棚,已经歪斜,如果再有几次余震,就怕要掉下来会砸伤人的,我们商议说,白天还是把它拿下来为好。那天的夜空不是平常厚重的墨色,却是看到东边的天色是一种泛着红色的烟灰色,颜色次第向我们这边渐弱,仿佛在那边的大地上点着了一支巨大无比的火炬所冒出来的遮天蔽地的浓烟……顿时村人都起来了,人声,鸡鸣,犬吠……度过了这骚动不安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的几个小时。

新华社于七月二十八日播发如下消息: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之后,陆续有消息传来,地震中心位于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强度为里氏7.8级,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千米,地震持续约23秒。”

后来我还看过一本张庆洲写的“唐山警示录”,及一些报导,说地震前便有许多动物和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大震前六小时刮过一阵大风,随之出现地光,有白色,红色,褐色,很刺眼,约十几分钟消失,过了二三十分钟,地光再亮起,并见有二三火球升起,还有几团发亮的蘑菇云升向天空,每次地光亮时都伴有地声,初始时地声似远处的闷雷,一次次,地光升级,地声也升级,至临震前十分钟,地光地声达到高潮,接着“咣!”一声如核爆炸般的巨响,“大地疯狂了,上下猛颠几下,跟着就是左右圆形推磨般的摇晃,大地颤抖着发出深沉的喘息,几乎是在瞬间,建筑物的门窗就变形了,拉不开推不动,人被地震波像瓷瓶般甩来甩去……真正是转眼的瞬间,这座有百年历史的、超过百万人口的唐山城已是一片废墟。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城乡总计1093.2万平方米民用建筑有1050.1万平方米倒塌或被毁。当黎明来临之时,笼罩在浓烟重霾中的唐山城已是一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人们叹息它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这次地震的有感范围波及辽宁、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等14个省市自治区,破坏范围半径约250千米。

在这同一天,晨7时17分天津市宁河发生里氏6.2级地震。

还是同一天,18时45分,河北滦县发生里氏7.1级地震。

唐山地震给廊坊人们的精神和生活以不小的冲击。班是照样上，但是思想不能集中，不断地关心着地震事态的发展变化，也有一些同事的房东准备在院子里搭建抗震小窝棚。我和老皮、小杨商量，觉得余震不会再有这么大的破坏性了，何况小小草顶农屋即使倾塌亦无妨，所以晚上还是在屋内休息，只是睡得总有些不踏实。

岂知阿松他们在仪征做现场设计的几位，担心家里的平安，努力加快设计进度，心急火燎地赶回廊坊。阿松看视了屋内，决定利用炕上那两个寄慢件的大木箱，把床板架在炕上，孩子们睡在当中如进防空洞，万无一失。老皮到底也是不放心，还是和阿松一起在院子里几株树干之间搭了一张吊铺，孩子们有时坐在上面晒太阳，一旦真有地震，在室外也好有个歇息之处。

一九七六年的波涛已经要翻滚到最高潮了，九月九日，在中秋月圆之夜，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逝世了，真如唐山地震般的晴天霹雳，把大家都震晕了。院里室里开了几次会，因为还是在抗震期间，不能进办公楼里，全院每人自带小凳子坐在大楼前的空地上。讲话的领导几次唏嘘说不下去，我们大家也已是一片呜咽啜泣，为自己的命运，为国家的命运……才一个月，十月六日，又一次天翻地覆，华国锋主席领导着果断地打倒了四人帮！大家喜形于色，喝酒、唱歌、大声谈笑，不亚于当年的解放了。我惊异于那些小青年们，他们传着许多关于中央的小道消息。阿松告诉我，这些小青年奔着调到管道局来，就是奔他们北京的家来的，他们大多是官二代、高干子弟，所以小道消息特别多，当时北京户口很难进，他们就奔到廊坊待着，一有机会就设法进北京去。原本两年前管道局选点是在秦皇岛，阿松非常喜欢的一个海边小城，我们曾经梦想在那里度过我们的后半生，就是被这些人硬是挤着推着改搬到廊坊来，让我们的又一个梦落空了……。

有一星期日中午，桂珠匆匆跑来，说她有点事要办，请我们帮她照看一下小马强，我说你就放心去办事吧。我把小马强放在吊铺上，自己坐在旁边做针线，小华和雁雁很喜欢他，围着他逗他玩，小马强也很听两个小姑娘的逗引。一会儿两个小姑娘同声笑着叫我，我进前一看，吊铺上小马强呆坐着，身边有一小截干的粪便……。那天桂珠回来抱马强，笑着到我们屋里坐了一会，看到我们空无一物的房间很是惊讶：

“……怎么你们连个吃饭的桌子都没有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么多年，只知道靠单位发的一张床、一只两屉桌、两只凳子过日子……阿松也叹口气：

“谁不想家里有几件像样的家具啊，这么多年我们住的房间都那么小那么破，还能摆什么家具……”

桂珠热情地说，她老家在沈阳，那里家具又好又多，她可以让家里为我们买一只可折叠的大圆桌……。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阿松忙着托院里车队的师傅从火车站拖来了一个慢件，打开来，一个九十公分直径、轻巧的折叠式大圆桌站在房间当中，两个孩子围着一阵欢呼——这是我们家第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是五夹板桌面的颜色不漂亮，阿松说可以自己买浅色的塑料板贴面，又挺拔又鲜亮。过几天桂珠又想起来，说你们不能老是把衣服装在那两个破木头箱子里，我给你运两只好箱子来吧，于是我们才有了两只东北人摆在炕头显富的木箱子，虽然显得笨重，却是真材实料。

那时已是文革后期，工作上依旧比较涣散，一些逍遥派早已在悄悄地掀动着一股搞家庭基本建设——打家具的风。那段时期，木工工具、特别是刨子很难买到，在我们之前来到管道局设计院的人家就有请当地的木工打家具的。这两件家具触动了老杨的心思，已经在心里期盼了数年之久，阿松很想为我们这个空无一物的家打几件家具，现在他感觉时机已到，他又发挥出训练有素的建筑师的灵感，按照他自己欣赏的风格，构思了一部多功能的带有书写翻板的五斗橱的草图，他还异想天开地想自己动手——我当然觉得他根本就没有那个体力，认为还是找木工师傅做省事，但他信不过农村的木工师傅，执意要自己做，我几次劝说他都不听，并且真的开始搜索购买木工工具，这使我又无奈又发愁。

十月底，院里来催促，通知鲁宁线的施工已经开始了，土建部分先由张弢、章伯华和阿松去现场。阿松只得匆忙准备去现场的图纸资料，来不及完成这件五斗橱的设计图纸。临行之前，好几位同事听说他要出差南京，纷纷来托他采购些东西。阿松还说别的女同事衣着都很合适得体，而我唯一的棉袄已十分破旧，这次定要给我做一件新棉袄。



查滨华

1941年6月初生于苏北滨海小城，1957年考入同济大学，2002年以建筑师退休。

杨瑞松

1938年8月初生于温州。1957年考入同济大学，热爱琴棋书画，又以摄影为最。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题图为电影《少年·小赵》(2015)剧照

## 非虚构 赵捷，通往威权之路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退居”意味着一个人的现实世界是可以被选择性消除的——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变化。

赵捷看《好奇心日报》，是他爸爸告诉我们的。他爸爸在微信上跳出来说，“我儿子是你们读者”，然后发来他朋友圈的文章转发截图。

赵捷是“小粉红”，这也是他爸爸说的。“骂方方，支持清退，喜欢看阅兵”。他爸爸这么说的时候，多少有点恼火。一个七〇后媒体人、相信普世价值，觉得自己是自由派。网上评论说“七〇后、六〇后最崇洋媚外”，说的就是他们。

我们安慰他爸爸，“也许只是逆反而已”。因为在爸爸另一部分描述中，赵捷对农民工孩子充满同情，哀民生之多艰，还跑到西南和西北乡下去看同龄人的生存环境。类似的事还有几件。这让赵捷听起来有一种乔治·奥威尔风格。至少，他看到了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但他爸爸又讲另外的故事，说有一天一家人散步，赵捷看走在前面一个农民工风格的人一路吐痰，很愤怒，最终忍无可忍，上前制止。这本来与奥威尔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冲突，但赵捷给出的理论让他爸爸心里咯噔一下。赵捷说，“你这样是在给北京添乱，你不能破坏北京的环境”。这就很不奥威尔。要知道作为一个绅士，奥威尔最大痛苦就是不能成为下层阶级的一员。“给姆们北京抹黑”这样的思维方式，与“穷人不配与他们共处一个空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与“看不得穷人在眼前，穷人应该回家建设自己家乡劳动致富”之类的主张，也有关联。

他爸爸在乐观的时候，会说赵捷可能没想那么多，他可能只是想应试教育体制的问题，资源不够，分配不尽合理。能想到这里，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手里拿个应试教育的锤子，看到哪里不对就砸下去，应该也够了。

在悲观的时候，他爸爸还是会说，他可能没想那么多。他只是想看看西南的孩子在自己家里搞建设不好吗，为何非要来大城市读书打拼。至于随便拉出一个中国三线四线以下城市更别提农村，到底是不是有能力解决就业和生计前景问题，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类需求……并没有余裕去思考。总之，他可能真

没想那么多。

带着这两个标签的赵捷出现在新城国际的一家咖啡店里。那是北京 CBD 一个看起来很国际化的楼盘。2020 年 9 月，武汉新冠疫情过去有小半年的时间，小区只留一个门进出，那天早上又下了很急的雨，找到那扇门都要费一些周折。

“小粉红”的采访，赵捷和他爸爸是一组采访对象。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很想和他们聊聊，作为立场不同的人如何看待彼此，作为同一个屋檐下的家人又要如何相处。聊天是分头进行的。

赵捷很准时。

如果没有疫情，他现在应该在波士顿一个学院里做美国大学生，但现在他只能在家里上网课，他的新学期已经开学，全世界的混乱还没有结束。

2020 年 3 月，赵捷回到北京。我们的聊天就从赵捷的波士顿大逃亡开始。

“国内已经控制住了，美国刚开始。大逃亡那种感觉，赶紧抢票，本来几千块钱，那时两万。因为要跟同学一起走，不停地找合适的时间。”

“你那时候刚去一学期，第二学期刚刚开始？”我记得他爸爸的朋友圈里送行场面，有全家人在机场的合影，有他爸爸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也有一去就要好几年的舍不得。谁知道这么快就回来了。

“一定要回来吗？”

“我是肯定要回来的。因为美国不安全。美国人不重视这个东西，（只有）最低限度的防护措施。学校里设施能体现，到个人这里连防护也没有。而且那个时候（那里）已经对中国人表现出很强的敌意了，在走廊里看到你、瞪你，嘴巴里飙一些词嘛。不是对我，我没遇到过。我不是那种愿意出门的人。”

“你害怕吗？”

“有些恐惧吧。害怕染上新冠。那时候戴口罩是有压力的。如果大家都不戴，你戴口罩上街就很明显。我还怕我自己出去买个东西就传染上。”

“那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呢？”

“看情况吧。首先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没有解除对中国的限制，你必须得从第三国经过十四天，才能前往美国。第二条，美国的数字还在增长。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你不知道你所处的环境，24 小时都得消毒。感染的风险太大了。”

他很谨慎。在我们微信沟通见面地点之前，给了两个地址让他选个方便的。他说自己要去事先踩个点看一下。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理解大约是一种谨慎。

“回来之后跟父母处得好吗？”

“好久没跟他讨论了。也没有什么冲突，初中可能有，高中就没有啥了。现在看‘浪姐’，没有什么可争的。各看各的，我有会员。”

他们全家共看《乘风破浪的姐姐》，一群以前叱咤风云的演艺界资深女明星的真人秀节目。

同期热门综艺还有《创造 101》，赵捷说他不看。“我看着眼熟的。不喜欢看没看过不了解的人。创造 101，我不认识，我也不想了解她们。她反正都是唱歌跳舞嘛，为啥不看知道的人呢？”

“那你看《好奇心日报》的时候在看什么？”

“每天发生了什么，大公司新闻，不太一样。本来我也不怎么看商业新闻，唯一几个可能都是从《好奇心日报》来的，有几个专题有意思，也不是专门踩到我的（兴趣）点上，但正好换个口味，比如十种城市十种风格之类的。通常我看游戏、二次元这些，偶尔看不一样的也挺有意思。我关注的其它媒体也不会做这些。《好奇心日报》还是挺特别的。”

到底是不是有能力解决就业和生计前景问题，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类需求……并没有余裕去思考。

赵捷是我们的标准读者。我们在做《好奇心日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与后来流行的“算法”反其道而行：如果读者对电影感兴趣，好奇心可以让他看点别的，比如设计，比如对社会的思考——以前忽略或者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做了两三年之后，“算法”这个既赛博又高级的词越来越能换来投资与流量，与此同时“信息茧房”也越来越让人警惕，我们觉得自己做的事看起来无比正确，当然也有悖潮流，这意

味着吃力不讨好的现实……

我们想象的读者是这样的：年轻、独立、关心社会、爱好广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态开放……我们很少会想到“小粉红”。虽然在读者评论中也会看到一些端倪，但从整个媒体的立场上看，我们很少觉得和利维坦站在一起的人会喜欢我们。当然，我们也不会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刻意安排什么，我们提供的内容，只基于我们认可的价值。

有点一厢情愿。“我们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么告诫自己。但现在，我们正面对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好奇心日报》读者，他是我们要调研的一个人。他爸爸主动说他是“小粉红”，我们问他怎么看，他又叛逆又厌恶：“有人这么问你，他就是抱着羞辱你的心态，你除了承认你是小粉红，还能说什么？！”

他出生在 2001 年。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

“说一说你的追求吧。”我们挑了一个切入口很大的词，希望的答案是与“追求”相匹配的一个宾语，但结果出人意料。

“最近是一款游戏吧，”他说，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希望有机会签这家游戏公司，所以我一直在管理它们的超话。它们的工作人员最近开始联系我了，开始把社区规划纳入到公司的整个规划里面去，商量一些活动之类的，鼓励大家在超话里多发言。很高兴他们联系我。”

這是一款叫《少女前线》的手游。

“这个游戏戳中我好几个点。硬性的（方面）：游戏模式，游戏人物不需要氪金，人物设计比重合理，也不会超过 50%。如果你不拥有这个人物的话，实际上你的游戏体验会很糟糕，你不知道她的故事，你也不知道她和其他人物的关系，她也没有体力值……”我们处于需要翻译的状态，但硬着头皮听吧，谁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重要呢？

“不过，现在我的看法也变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时间实际上是比较充裕的，那时候还能随便下那个‘未成年人时长’，你没有体力值的话，实际上可以一直玩下去。上大学后，时间变少了，清完体力你就可以下线了。如果你不清的话，你会一直玩下去的。这是一个点吧。”

彻底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们还是很配合地若有所思地点着头，“那么，你在游戏中会获得什么呢？”

“首先，跟网上那些分析一样，它能给你持续不断的成就感。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可以获得的。我把它当成爱好。再一个，可以拓展我的人际关系嘛。”

谢谢谢地，回到我还算熟悉的语言中来了。

“因为人嘛，不能决定别人喜欢什么，”他接着说，“你必须得对自己真诚嘛是不是？我很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会选择不一样的朋友，交友圈。微信朋友，大家可以在线下沟通的，比如高中同学、初中同学，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相遇，结果相遇了，加了微信好友，平时在网上说不上一句话，在线下也是一样。但在微博上，我可以找到兴趣相同的人，找到相同的点，可以一起聊一聊。”

赵捷从高中开始有意识地找他的同道，到大学，发现二次元朋友最稳定。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大家都需要这个渠道，“朋友圈可能是一个分享渠道，其它东西是另一个渠道。微博可能负能量一些，但更加真实。”

对于赵捷来说，游戏在这个时候不止是游戏了。

“一个游戏能玩多久？”

“这个游戏快三年了。我希望坚持得长久一点。有些游戏，我玩一年就不行了，找不到坚持玩下去的理由。这个我还是很希望坚持下去的。有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学科，你学很长时间，学完了，实际上就放弃了，以后你就只能看着它了。它跟你无关了。”赵捷有一点怅惘。

“所以，你从这个游戏里获得了……情感慰藉？”

“对，我觉得是线下人际情感交际的缺失吧。”

他说起话来，像一个知识分子。“你的语言听起来很正式嘛。”

“我确实看一些分析嘛……在网上看到人，在网上建立一些关系，确实是这种情况。我本人经历也是，之后在线下真正发生一些关系，比如一起出去玩。感觉就挺好。”

“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有些刚工作，也有读研究生的，这就已经算大的了。通常是初高中生、大一大二。都算同龄吧。大部分都能聊到一块去。代沟不是太大。这东西说白了，是信息的获取问题嘛。”

“无所不聊？”我的意思是，话题走出游戏之外，大约才可以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朋友吧。可能是我太严格了，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会聊为什么走到一起的。比如我跟一个人是在游戏里认识的，就会多聊这个游戏。看缘分。只有一个相同的点，就专注地谈这个点。”

他不觉得错过认识一个完整的人会有什么遗憾。

“哦。”

“那么，线下的交往，有过不喜欢的经历吗？”

“我关注二次元的，日本番。我知道我渴望什么，”他想了一会儿，像是找到了答案，但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羡慕他们的社团活动。他们三四个人把时间很专注地投入到搞懂一件事中。你听起来这有点可笑是吧？因为这事情，换个角度讲是没啥意义的。你说搞懂学校的历史、搞懂一个建筑的来历、为什么建成的，你知道又怎么样呢？但把时间放在这样的东西上面，我还是挺羡慕他们的。”

“他们是谁？”在一大堆信息量里，我决定先抓住主语。

“动漫人物。他们有社团活动，我也不知道日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你羡慕的是他们塑造出来的形象。”

“是那个场景。”

他不觉得错过认识一个完整的人会有什么遗憾。

“你羡慕虚拟的社团活动。你自己不能实现吗？”

“我不能。因为我找不到这样的人。首先这东西只能说是一个兴趣爱好，其次是人的问题，我觉得在线下我会主观得多……”

“主观？”

“就是在线下，你获得的信息会比网上多得多。线上你只能从来回的信息里来看这个人，除非他有特别特立独行的观点，否则我不会从根本上排斥。但现实生活中，通过一些细节……”

“就不喜欢人家了？”

“对。而且不管初中高中，我身边的同学，大部分还都是认真学习的，人家没有理由周末出来找你。”

我们表示支持他“线下交往更容易讨厌一个人”这个观点，“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不用为此觉得哪里不对。”但社团为什么那么难，还是没完全理解。

“但凡有一丁点苗头，少年时代，最有可能组成线下的兴趣社团是什么呢？”

“优先级的话，还是二次元、游戏，读书也可以的。”此时我们想起他不理解大好的课余时间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一个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很快他又担忧起来，“还是要看人。我跟你交朋友的话，我会看你跟我有什么相同点，然后我才会一起做些什么事情，这是在线下要考虑的事。线上我们是兴趣主导，保证我们有话可聊。线下更关心我们是否合拍。”

“即使你们俩喜欢同一个游戏，但因为线下了解得多也会放弃吗？”

“网络在我们生活当中占很重要比例的，我们可能喜欢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聊不到一块儿去，可能我们相处方式不一样。”

事后整理录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猜想他到底是在表达什么。他似乎并不是想说他会放弃这个人——我开始理解是这样，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他放弃线下和这个人接触。再理一下顺序：

通过游戏认识朋友，游戏本身是个社交平台；

和共同喜欢一个游戏的朋友进入到另一个社交平台，比如微博，“虽然负能量，但更真实”。

如果顺利，和这些网络交流比较多的朋友进入线下交往；

线下交往的聊天、言行举止不合拍，线下交往停止，回到线上。

网络的重要性体现为社交关系的控制。

明白这一点，是我们和以往的理解作出了对照。通常而言，我们认为“网络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线时间占比，主张严格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间的管制派，出发点大多如此。而事实上，网络意味着选择的增加。一个人在所谓的社交关系上多了一重构建的可能：即便是和同一个人交往，如果在线下觉得不舒服，也可以退居到线上。

从这个角度说，这样的社交关系更像是一种个人兴趣的延伸（游戏、动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人的交往。

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言，“退居”意味着一个人的现实世界是可以被选择性消除的——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变化。

这个发现，与后来我看到蒂莫西·斯奈德《美国的痼疾》的一个洞察时的感受接近。那本很薄而且还夹杂了个人怨气的书不是这位历史学家最好的作品，但那个洞察让我觉得知识分子在一个纷乱的社会里展现了应有的价值。他用不长的一段话，论述了一个失去“现实”的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

斯奈德说：“新冠病毒本应得到本地新闻的大幅报道，但因为我们缺乏本地记者，问题无法被充分了解、讨论。”但美国的现实是大多数的都已经没有正式报纸了，他很简要地讲了几个我们熟知的理由——“首先，媒体被大集团集中控制了。然后，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让许多记者丢掉了饭碗。从那时起，迅速兴起的社交媒体完全替代了传统媒体的角色。虽不报道任何新闻，但脸书和谷歌抢走了曾经投放给报纸的广告预算”。这三个理由包括了商业热点的转移、宏观就业环境和技术，结果就是，“社交媒体消灭了地方新闻”，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开始互不信任，变得无知。不仅仅是事实的缺失，社交媒体还在散布疯狂的谣言”，在报纸的黄金时代，当疫情发生的时候，“许多关于疫情的假新闻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报纸上。记者们对事实的报告会提高社会福祉，有助于建立信任。然而随着地方新闻的消亡，美国人的全部注意力都转去了全国性的故事、意识形态以及旨在伤害他人的阴谋论”。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变成了新闻荒漠。新闻荒漠会扼杀我们，因为在新闻的荒漠中，我们无法获得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信息，在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健康和自由时，我们拥有的只有困惑。污染问题是好例子。如果没有本地记者，没有人会去调查政治家和公司之间是否有不正当的关系。对水或空气造成污染的商业项目，只要做些公关就能无往不利。如果没有本地记者，没有人会跟进健康领域的投诉，对水和空气进行检测。

他说的是美国的事——在失去“本地”性之后的恶果。在赵捷那里，他放弃的是一部分“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放弃“现实”而选择二次元，顶多会被认为“避重就轻”，或者像我们通常说的那样，有点“宅”。

在描述他的美国求学生活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提及不爱出来“知道外面人对华人、对戴口罩的人的反感”。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但交织了线上的信息。一个不出门的人作出“社区不值得信任，也不会善待我”的判断，其中有舆论的作用，也与个体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有关。

赵捷的选择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国。这与蒂莫西·斯奈德所说的类似——当有一个特别紧迫而且重大的危机，一个只有“全国信息”渠道的人拥有的只有困惑——当新冠疫情来临的时候，依赖线上信息作现实判断的弊端凸显出来。现实无法逃避。赵捷的狼狈和紧张以另外一种方式爆发。

但在对话的现场，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变化，还是按部就班地继续着我们既有的话题。而且，很快被一个更直接的现实问题吸引过去了。

前两天，赵捷梦到了一个朋友。

在赵捷的描述中，这个朋友属于过去多年来最好的三四个朋友之一。他们是初中同学，到了高中空闲的时候，还会固定到某个咖啡馆的某个固定位置一起打游戏；每个周末到国贸一家牛杂店吃牛杂。除此之外，他们也会聊其他问题，有时也会一起看电影，但主要还是用游戏维系。赵捷强调“维系”，是说即使大家有共同的话题的可聊，但一般来说也不会主动去聊，彼此都不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话题，他可以跟这个人聊，也可以跟那个人聊，为什么不跟一起玩游戏的这个人聊呢？

“我前几天梦到了他。他有个事情特别厉害，在课上突地站起来反驳老师。吼起来了。”

“这是梦里还是真的？”

“真实发生的。我在梦里又梦了一遍。他做了我们都不敢干的事情。”

感觉是个经典场面。我们让赵捷展开讲讲。

“那个老师确实‘个色’。在梦里头，我是站起来给我同学鼓掌的。”

“当时实际发生的呢？”

“那时我们只是在旁边看着。”赵捷说他和不少同学都会“挺”这位同学，但不会有表示，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有一些物理学得好的同学可能会反对这个同学，因为他们是老师的好学生嘛，你懂吧？还有一些人需要很强的秩序感，觉得不管什么原因，打扰老师的课堂秩序就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分析存在了不超过五秒钟，赵捷又质疑了他自己的说法。“我不觉得初中生能有多客观理性，即使客观理性，也会有自己的标准。物理学得好，本能就会把老师的言行举止向积极的方向去思考，学得好一定是跟老师配合得好的。”他想表达的是“其实那个同学的物理成绩还挺好的”——可见这老师有多“个色”。“个色”是北京话，大约是说这个人个性强不合群与众不同到看起来怪异，不是很友好，用在一个老师身上，就不仅是不友好的事了。

他说他在“默默支持”。班上同学不到三十个人，感情都比较好，沟通也比较多，以他身为班长的了解，大家基本上也都在“默默支持”。我回忆了一下我上学的经历，觉得“默默支持”与“不支持”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出头开罪老师的那个人大概率会埋怨他的同学未免太不同仇敌忾了，而事后信誓旦旦表示支持你的人，就显得很不坦诚而且有点鸡贼了。

“那个同学为什么会起来杯葛老师？”

“忘了是什么原因。我理解它还是一种情绪上的东西，不是讲观点。理性当然也是理性的，但只是情绪上的表达。他也就这一次，可能正好触发到他的某一点上。他遇到事情大部分都是忍的。我们也不喜欢这个老师，上过一节课就过去了。普通的隐忍嘛。他就是那节课，忍不住了。”

“你了解他吗？”

“算是了解的，不算那种很知心的。”

“但你说是三四个最近的朋友之一。”

“我和他做不到畅谈。我们俩有些观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维系我们俩友情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游戏。我们游戏之后才会聊其它的话题。如果没有游戏，可能就断了联系。纵观初中高中（的朋友），都是愿意跟我一起联机打游戏的。”

“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本来要去澳洲上学的，因为疫情还没去，他又不愿意上网课，就选择gap一年。在家里，应该没事。他经常约我打游戏，我只能说看时间了。”

这是有关如何看待威权的一个小侧面，对于初中学生来说，物理老师足可以被视为利维坦了。这个顶撞老师的经典桥段在赵捷的生活中出现多次，在那天我们的交谈中它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意象。

“另外两个朋友呢？”

“那两个人都更二次元一些。我们国际学校嘛，毕业前都没有什么事了，没有高考。我们毕业前会一起看电影，动画电影，番剧也会看。番剧太长，我们就分头看，然后一起聊一聊。后来他也不咋看了，但很愿意跟我聊这些。”

“你刚才说，如果观点不同，就聊不下去。那不跟你爸爸一样了吗？”说起他爸爸，赵捷的评价是：他虽然知识渊博，但不够开放，只肯与意见相投的人聊天。

“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跟我观点不同的人的身上的。”

“那不还是你爸爸的风格吗？”

“嗯。确实，”他像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认真思考了一下，“但我觉得我改变得比他要多一点。因为我的阅历还浅，他可变化的东西更少。”

“你是说他的成见更多。”

“对，他有他的知识体系去帮他……”

我第一次意识到“成见”与一个人拥有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虽然像赵捷这样建立起来关联未必是对的，但你也许不能否认一个人的知识体系会巩固一些“成见”，虽然“成见”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对错的判断于其中，但我们还是会觉得“成见”太多是

一件很不进步主义的事，有悖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精神。

“他接受的新东西有什么特点呢，在你看来。”我们继续问。

“他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听我的。新东西就是电子设备，网络上的新形态，直播什么的。他自己的兴趣点还是偏社会之类的。我觉得他接受新东西的时候是最容易沟通的时候。但我觉得他接受的新东西其实也不多。他看新产生的东西，手机、游戏、新节目，有热度的东西，会说‘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嘛’，觉得跟以前也没有啥太多差别。”

话题渐渐转到他父亲身上。

“你说你爸爸的政治立场是挑刺。知识分子嘛，就应该干这件事啊。你不同意？”

“我是做不到像他那样。我初中小学，那时候我在家里还是发表观点的，后来我就不太说了。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我的观点也很浅薄的。我以前是按照我的感受说的，后来我就觉得我了解的东西还不够，难以支撑一些观点。”

“你现在政治立场是什么？”

“我是能为‘十一’感到高兴的。这一点可以很轻易看到，”他说的是国庆节。“有些人朋友圈里，会发十一国庆节快乐，有些人不会发。我是能发的。”

我想起，见面的时候他介绍他学校的名字叫“北京十一中学”，national day，他特意跟我们强调他学校的名字，“（国庆节庆祝）你爸爸不喜欢？”

我第一次意识到“成见”与一个人拥有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虽然像赵捷这样建立起起来关联未必是对的

“我爸不喜欢。我觉得与他经历的事有关吧。他经历过我国的医疗系统混乱的时期，他本能地就对这个体系不信任。应该是给我奶奶治病吧。我刚出生那会儿。我爸也没有对我多讲，但透露过，我觉得有一定影响吧。”

“你觉得他因此怨恨社会？”

“也不是怨恨，但挑刺。”

“你爸爸在提到你的时候，倒是表达过一个观点：这事没落到你头上，落到你头上，你也怨。”

“我觉得这跟他经历很像。看到阴暗面，看到弊端之后，就这样。”

“但你爸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是不是经历过这个事，挑刺应该是本行。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人去挑刺啊，表达不满。”

“我认为相处当中，你不停地在讲一个人的缺点，我是接受不来的。”

赵捷在无意之中，说到“不停地在讲一个人的缺点”——某种意义上人格化了实际的宾语——“政府”或者“国家”，这又是一个需要意识得到的一个差别。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我免”“种花家”等等这些词汇被二次元爱好者引入到日常用语中，就不可避免地将非人格的国家、政府人格化，继而又以人格化来替换。更习见如“祖国”“母亲”之间的人格化替换，在赵捷这里，则是一味地“讲一个人的缺点”。在他的父辈那里，政府永远在审视的范围之内，时刻提防利维坦越权，几乎是可以成为反对极权暴政和终身目标。

“你觉得合理的方式是什么？”

“两边的都看，有肯定的地方。”

“你的政治标签都有什么？”

“我偏保守。就是类似于那种保皇派吧。”

“谁是皇？”

“就是有人讨论抄袭游戏，这样可能会让游戏公司利益受损。有人会说，你为什么会考虑厂商利益，这对你不是一件挺方便的事吗？”

“你说的是尊重知识产权。我们一般会说，政策之类的东西，你站在哪一边。比如北京清退，你爸爸特意说你支持清退。”

“嗯。”他很轻地承认。

“噢，不要勉强，你是支持吗？还是你爸以为你支持？”

“其实我知道我爸想说什么。应该是我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我看有人随地吐痰。因为我们住在郊区嘛，外来务工者比较多。”

他用了很官方的词：“外来务工者”，给人直觉是他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在他爸爸的描述中，开始是一家人慨叹“素质”问题，接下来赵捷上前制止，他爸爸觉得这是一次勇敢地对不良社会现象说“不”的行为，但接下来发现他站在政府的角度去指责某个人“抹黑”了北京形象，这超出了他爸爸的预期，至少在他看来，这就不能再说是正义感的问题了。

赵捷看出冲突所在，很快把他自己的愤怒，与他爸爸对愤怒的不理解作了一个对比，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爸爸没有归属感。

“他不愤怒。他没有这种在北京的归属感啊。北京的归属感他没有，国家的归属感也不多。我当时年少轻狂嘛，我跟那个外来务工者说你应该离开北京。”

“吐痰这事，和北京大兴这是，不是在一个语境里出现的？”

“可能是我爸把这两事联系起来了。”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事后，当地政府以消除消防隐患为由的大规模清理被认为草率和缺乏人道关怀，又因与北京清理低端产业政策联系起来，而被广泛质疑。

“我们并没有什么纷争。”他特意强调。但这是因为避免了纷争：“因为我觉得大兴的事件之后，我不可能跟他探讨这么多问题的。”

“你怎么产生在北京的归属感的？”

“因为我小学初中都是在北京不同的区，觉得对北京越来越了解。我对这个城市很熟悉。我到其它地方去，回到北京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更强烈。北京每年都会发生很多变化，看到这些变化我是会感到很高兴的。”

“你为什么会去定西呢？”

我们开启了另一个话题。赵捷说，他和同学去过两个地方考察，一个是云南会宁，一个是甘肃定西。“那些地方特别重视高考，我们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是不想参加高考，他们为什么必须要走这条路。”

关于这两次考察，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年轻的社会问题观察者或者爱好者，希望了解中国广大的腹地里年轻人的出路问题。这种自觉性的社会调查，有无数先例，能够被我们记住的，通常都与事后调查者更成功的社会改造的伟大抱负联系在一起。它是一个让人尊重的行为。

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赵捷的若干前提：一，他不需要参加高考，可以有余裕去思考和调查；二，他拥有“不参加高考”之外的选项本身更说明问题。赵捷在北京接受教育，他的家庭条件中包括了一种选项：进入国际学校，回避竞争激烈的中国高考，直接申请海外大学。我们后来与嘉怡的交流中，可以更充分地感受到这种相对来说低压力的求学路径对于一个人自由成长的鼓励。它所需要的无非是家里准备一笔钱，视时间长短和所去国家的消费水准，准备一百万到两百万人民币的资金。对于中国富裕起来的一代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并非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走高考之路”与“何不食肉糜”也有相通的地方。

“为什么去那么远，北京不能找一个应试教育参加高考的学校去看一下吗？近点的话，河北衡水，特别有名的应试教育高地，不行吗？”

“北京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一起去的同学的父母认识当地教育局的人，他会介绍学校老师、校长和同学接受访问。如果没有这层关系，贸然去一个学校，我觉得是不会有人跟我们聊的，得不到什么结论的。”

“如果我是当地学生，你会问我什么？”

“问怎么想的。我问，状态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高考？”

“我没有别的办法啊，除了高考还有别的路吗？”我替想象当中的定西人回答。

赵捷似乎很高兴我一下子抓住了那边的回应：“对，我就想看他们挣扎的点是什么，是否有什么挣扎。”

我难以置信他的高兴。继续扮演显而易见没有选择的定西人：“我挣扎有啥用？我必须高考啊。要不我就出去打工。”

在这个意义上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走高考之路”与“何不食肉糜”也有相通的地方。

赵捷说：“我是想看他们是否思考其它东西……比如他们有没有想过打工怎么回事。还是想只要考砸了，就出去打工了。除了高考，可能就是生活吧。他们愿意聊什么

都可以，我都能接受。讲讲他们的个人状态。我们会从自己个人状态中揣摩世界，我们知道考试是个什么状态，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考试。我们不参加考试，因为我们有选择，因为我们在北京。但他们没有选择，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别重视高考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想了解，他们是否有别的想法。”

赵捷的探讨归根结底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将近一年后，在跟嘉怡交流那天，恰好有个演讲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演讲者是衡水中学有一个叫张锡峰的学生。那位即将高三的张同学站在一个大讲台上，发誓好好学习，拼尽全力。他有一句话让很多人多年后依然印象深刻：“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我想，这可能是更戏剧化，也可能更真实的答案。

庆幸的是，赵捷并没有因为这两次深入中国腹地的调查，进入到“伟大”征程的幻觉当中，他得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以前我们也知道是不一样，但那结论比较外在，就是那地方很穷，学生没办法，必须得学习，很浅显。现在了解到更多方面。比如有些家里有压力，他本人没觉得高考是必须的。我很好奇的点也在这里，在这么重视教育的地方，不想接受压力的人的思想状态：他们跟同学有什么区别，平常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赵捷说他在学校的一个消防楼梯上看到有人在玩游戏，“这种人出现在我们学校，我觉得是正常的，是常见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是让人惊奇的。”他想了解他们是不是也上网，频率如何，玩什么游戏，一天玩多长时间。遗憾的是，那个在楼梯上玩游戏的同学拒绝了他们的询问。

两个北京来的同龄人，在校长的陪同下，说是了解学生所思所想。赵捷和他的同学即便谈吐谦逊举止礼貌，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和优越感也会引起同学们的敌意吧？

“我觉得还可以。那地方没有想象得那么惨，那么穷。”赵捷说。

我们说在一个即使很贫穷的地方，高中并不能真实反应这个地方的贫富情况。能够读高中的学生，家庭收入水准相对来说是偏中产阶级。他们已经是反复筛选淘汰的结果。

“这件事情巩固了你对‘高考无用论’的认识，还是发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他们可以有更多选项。”

“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如果他们高考失利，他们可能会成为你在街上看到的随地吐痰的‘外来务工者’，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我的出发点是这个。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增加了一些新见识，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

#### 关于“选项”

赵捷有两个选项：上国际学校，避开竞争激烈的高考；高考。

他的调研对象则有以下可能：高考（而且是远比北京更残酷的竞争）；高考失利，去打工做“外来务工者”；留在小地方（赵捷想象是种田，其实他的调研对象大多数应该是小镇或县城青年，未必有地可种）。

赵捷在上小学的时候，在小区里玩，会把住在地下室里的“农民工”家里的小孩领到家里玩，他爸爸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没有阶层意识的人；在初中的时候，赵捷在街上批评了“外来务工者”，认为他应该离开北京。

“对高考怎么看，慢慢贯穿到他如何看自己，如何生活。”赵捷的爸爸评论这件事。

赵捷的爸爸相信儿子的定西考察是对“应试教育”的关注，它理应对儿子自己的人生有所启示。赵捷自己看到的一个行动，一次满足好奇心的行动。

“‘不想高考’这个出发点是最重要的，它与个人选择的判断相关。”我们跟赵捷说，试图去分析他怎么想：“你不停地做各种话题的调研，但并没有持续下去。”

“我对它的兴趣点，了解到这里就OK了。”赵捷回答。

他的好奇心解决之后，并没有接下来的事件。他爸爸从吐痰之事联想到他支持清退低端，从定西考察总结出来他关心受苦人。实际上两次都错了，都是误读。

还是在与嘉怡的那次交流中，她激烈地批判了她的优绩主义同学们——她在哈尔滨的一个国际学校里读高中。

“你知道她们怎么说，‘我特别特别关心 LGBT 群体，我 PS 写的就是它们’；‘我们以后都想去做 NGO，我们要去叙利亚，拿铂金包去做 NGO’……这都是原话。他们理

智上有优越感。我要做 NGO，就是我要帮助更多人，善成为一种可能，成为一种学术论文的可能。研究调查成为一种学术论文，成为我进阶的一种可能。”

“我这么说吧。说要研究 LGBT，他们并不是真实想推动什么，改变什么，对什么做出回应。他想的是，一、我可以写这个论文；二、我写这个论文可以给我更好的履历。”

“我同学觉得别人困境是自己行善的一种可能性。他们在群里交流 high 得不行，高潮一样。履历最重要。牛津剑桥，帝国理工，LSE，我看到的群里都在说这些，是对某种生活的向往。”

对于赵捷来说，有选项是进步。对于定西同学来说，有选项也是进步。

以前网上有个段子，学校给学生留课外作业，希望学生可以置顶包括两个孩子在内的家庭财务计划。这份作业的本意，是让学生懂得开源节流，树立勤俭节约的人生观。故事里，一位同学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财务计划很快左支右绌，难以为继。但该同学很快发现问题所在，迅速解决，从此财务健康，欣欣向荣。问及解决之道，他得意地说：“把两个孩子删掉了，都删掉了”。

这是一种游戏思维方式。在学校布置的这个人生沙盘演练中，“delete”也是一个选项。虽然在实际的人生中，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知道，有些选项对于个人来说，是“何不食肉糜”——玛丽王后的传世问题，“吃不起面包，那为什么不吃蛋糕呢？”但对于整个社会或世界来说，它是一个“伪选项”——“delete”选项是“重启试试”，人生没有这个可能。

“从我个人意愿上来说，我会支持政府的想法。我个人会希望做更多的东西，来让他们平缓地度过危机。”赵捷说。

我们还是在聊“大兴清退”。

“这里有一个公平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住在没有安全隐患的房子里。政府如果从安全角度做事的话，要解决的事是提供有安全保障的住房。而不是把人赶走。公共服务应该是这样的吧？”

似乎从此时开始，我们开始试图“讲道理”，这对于一个漫无目的的聊天来说，也没有什么妨碍。但是赵捷很快捕捉到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且很显然，他想到了他和他爸爸之间的争执……

“公共事件，我觉得我不太懂。”这是他传递的一个“我不想多说什么”的一个信号。

“如果你感兴趣，你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有哪些呢？”

“了解事实会从官方通报上获得，公共事故的话，会看官方报道，我没办法判断别人说的是否是真的。”

“那你如何判断政府说的是真的呢？政府有可能也是‘别人’啊。”

“我是相信体制的，也没有百分百相信，如果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会看有官方数据的东西，会基于那个东西进行讨论。”“但是我们不应该对所有数据来源都保持怀疑才对吗？通报，蓝底白字，它可能说的是真实的，比如说因为发生了火灾，这个东西是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要知道的可能是更广泛的事实，比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刚才说涉及到公平的事，不光是怎么解决眼下这个问题，某个问题产生由来已久，比如一直没有解决用电安全的问题，那它可能真实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供暖’，这是另外一个事实，可能是更重要的事实，警情通报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的事情，警情通报即使是事实，它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你看，一旦启动“讲道理”的开关，就是这样。

“……”

“唔？”

赵捷想了想，还是开口了：“其实这种观点我以前听过。虽然可能是假的，被冤枉是一种可能性很低的情况，散播信息可能是假的，虽然是假的，也要尽量散播这种东西。”赵捷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带着一点嘲讽的话，那就是“思想市场”的高级形态，它不但要求参与者更好更成熟的判断力，它还要求公信力的声音真的有公信力，千万不要掉到塔西佗陷阱中去。

“信息在那儿和传播是两个概念。信息在那儿是发布信息那个人的自由，它在那儿，你是有判断力的，真或者假。传播是你的自由，你的判断力决定是不是要散播出去。”我决定避重就轻。

“如果遇到不同意见，我不会去管。我也差不多是这样，不是害怕，是觉得费劲。说难听一点，最后变成狗咬狗了。最后会变得很烦。”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会获得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和你爸爸争论的时候，判断你爸爸的观点，哪怕 70% 的看法是错的，那还有 30% ——你从你爸爸那里获得正确 30% 的可能。”

“一般我不会这么做。”他大约已经识破我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了。

“你会承受这其中的 30% 不能获得的缺失。”

“我不大在意。但互联网上就是这样：我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我也不太在意了解你这个人。”

“可是，你是如何进步的？不进入信息茧房，同温层之类的……”

“我保证我不会被单一方面的信息困住。我觉得所谓反思，然后成为‘更好的人’这事儿挺假的。”

“为什么‘更好的人’是假的？”

“人是多变的。人最终会促成好的结果，也会促成坏的结果。”

“但好是永恒的啊。”

“你学习到好的地方，你因此成为更好的人。我不觉得我学习到了一个人身上好的东西，我就可以变成更好的人。首先这种观点不是他唯一的——30% 的正确，我不一定只能从这个人身上得到。然后，就算吸收了这些，我也不觉得我就会变得更好。我并没有影响别人。”

一个新观点：如果不能给人更多积极的东西，不能影响到别人，“好的价值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得承认，我并没有想好。“你成为更好的人与影响别人是两回事。你自己好了就好了，与影响别人无关。”

“我觉得人是处于同一种状态的。如果更好，我会拒绝的。”……我们也不知道，聊天怎能到这个地步，他都不愿意做一个好人了。

“你现在跟十年前的你是一样的吗？”困兽犹斗。

“我觉得并没有太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

“你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学习方式、观察世界，没有比以前更熟练？”

“更熟练了。”

“还是有成长的嘛。”说得干巴巴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们说，可能遇到不同的事，做出更好的判断。但最终我们还是会犯错误的……”

“少犯错误不是一个好事吗？”

“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好事。但它没有必要。”

“那这里有个粗暴的问题。一个人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傻逼呢？”我承认话赶话说到这里，我有点失控。

“不可能，你就是一个傻逼啊。”

“确定？有可能每个人都是傻逼，但你可以，可以……不那么傻。”

“避免成为一个不那么傻逼的人。据我所知，我接触到的一些人，这么说的人都是挺令人作呕的。”

“你接触的什么人让你有这种感觉？”

“讨厌，做作吧。高中里个色的人我就挺讨厌的。有一个同学就是。”

这是第二次出现“个色”这个词。“怎么‘个色’？还有做作？”

“端着，爹味儿，虚伪……”

“不虚伪，是你认为一个优点，不能像他们那样。对吧，”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比如说你想象你的未来，可别像物理老师那样。这很正常的对自己的一种预期吗？”

“我不会那么想。以后我可能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后‘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啊，不，就是会成为的。你是人类啊。就像以后你多做好事可以升上天堂一样，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要下地狱的。人做的事都挺恶劣的，怎么可能不下地狱呢？然后有些人想要去掩盖这个欲望，我觉得受不了。所以，有个最低限度的管制，法律啊之类的。法律就是震慑性的。”

“法律是事后惩罚。宗教和道德是事前预防，这是两边合起来，一起做事。光有法律是不行的。防止自己成为傻逼，不是说你就变成一个圣人，而是你别去做恶啊。”

“……”

我们进入到一个暗黑的世界里。可能他也未必真这么想，只是觉得话说到这里，他就把这个观点当成了自己的观点，并且捍卫。

如果不能给人更多积极的东西，不能影响到别人，“好的价值在哪里呢？”

“你是觉得我们打着聊天交流的旗号，其实跟你爸爸没有什么两样。”

“还行吧。”

“你觉得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探讨一个年龄的人。”

“我肯定会有兴趣。这跟我去会宁是差不多的。我会探讨这事是怎么想的。”

“你说每个人都需要下地狱。你不相信人会变好。每个人都是傻逼，因为他是人类啊……但是，总得有人做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事，你也不能抹杀他们的工作。每个人都下地狱，我也要下，下不下去属于一种虚无，但我们也不能虚无到一点好的东西也不接受。你真的这么绝望吗？”

“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就会越来越绝望的啊。就是我一步一步成长过来……我自己看一个人，我如果很讨厌 Ta，我主观上会给这个人贴一个不好的标签。然后通过聊天或者熟悉的过程，一点一点地把不好的标签去掉……”

“所以你是‘白名单制’。”

为了解释“白名单”心理形成的过程，赵捷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他初中物理课上的师生冲突有近似之处。

“小学，老师发了调查问卷给每个人，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评价老师，那个调查问卷是我跟我老爸一起弄的……我老爸就说，你老师是不是讽刺挖苦学生？我说有点，我们就如实说了。然后老师就勃然大怒，你怎么这么说我。同学们对我也很厌恶，因为老师都被气走了，不给他们上课了，我就成了大家愤怒的一个出口。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其它老师也都挺好，现在也都有沟通。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小学老师是更容易掌控小学生的，我对人的不信任感，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因为我个人的缘故，我导致老师不给大家上课了，我是犯错误的那个人。他们对我产生了厌恶，他们也不理我了。老师也经常点我。他们也没办法。这让我觉得，人就是这么糟糕的。”

“这种坏的东西会不断累加。好的一面是，它也让我不会太偏激地看待一个人吧。如果缘分到了，就继续聊，我慢慢地发现他好的话，再慢慢给他放出来。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是可以不再接触的。”

“那是小学的事。初中还可以，高中遇到老师可能比较烦。具体来说，我去参加我表哥的一个婚礼，错过了一次考试。老师给我记了一个零蛋。我就拿着这样一个成绩去申请大学了。我就苦苦求情。然后又安排考试，第一次还放鸽子了。就是这样一个老师。然后我想也没有什么好怪的。我确实错过了考试时间。那是我表哥的婚礼嘛。他是我老师，我是学生。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一个拥有权力的人这样对你，你怎么会信仰威权呢？”

“我可能会像我爸爸一样，被狠狠蹂躏吧。”

“你爸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也不是蹂躏的结果啊。”

“我觉得是受到伤害，”他再度提起他奶奶生病就医的事，“他是受到伤害的。就像玩游戏，我喜欢一个战队，战队赢了，你可以说他哪地方做得好或者不好，战队输了，你可以说比赛嘛还可以，虽然最后还是输了；我要讨厌一个战队，赢了，我会说‘你们觉得你们赢了，赢得很厉害吗？’输了，我肯定会说，‘你当然得输，因为你很垃圾’。我就是这么说，随着我知识体系的扩充，我会找更多的东西来证明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跟人讨论。因为话术很多，知识也有很多。”

“你认为这只是话术。”

赵捷认为，他爸爸的信仰问题和他之间的差异、不同理解、对某一件事的看法和解释、基于信仰或者信念的理解等等等，都是话术问题。我得承认，听说这一点，我们还是很震惊。

“确实是话术。我们肯定用到话术的啊。我们要让别人支持我们的观点。”

“好比说，康德，还有一个希特勒，都是德国人，都写过书，都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人。你不能说他们都是话术的。这中间是有差别的。就像我们面对历史，各种各样的事，中国历史啊，纳粹啊，苏联啊这些，你爸爸给你讲的话，这些不是话术，这些历史上的东西不是他教给你的吗？”

“他不会跟我讲。我也不跟他学。”

接下来我们说到一个敏感的事件。他爸爸跟我们讲过这件事，赵捷的某个老师给大家讲历史上某个事件，说可以在那一天去看看现场，然后学校听说了这件事，老师被辞退了……我们想问，赵捷怎么看。但赵捷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那个老师不是号召，那老师是替学生顶缸了。那个群里，有学生傻了巴叽地说了一些事。”他解释：“十一中学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校园，它鼓励学生各种各样的观点，我觉得这种学生自治的想法真的很蠢，你无条件地信任学生，学生会搞事，我每次都觉得学生在自嗨，浪费时间。他们可能就表示对政治有不同的见解吧，然后去实践它。”

“其实也没有实践，就是提出一个提议，我们那个老师和另外一个老师都喝多了，然后，他们还真就去了。他们早就被监控起来了。在路上就给抓回来了。从头到尾都是学生自己策划的。老师为了保护学生，就直接被开除了。傻了巴叽的学生。本来我们校长提前一年就可以走了，为什么又留了一年？擦屁股！你们学校怎么回事，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赵捷再度用“傻了巴叽”评论了他的这位同学——那个喜欢成天讨论问题并且要付诸实现的那个人。

“那人要被吊到十一学校的耻辱柱上。”他很重地说。

“那个人和小学时的你、初中时的物理同学不是一回事吗？你现在说他要被吊到耻辱柱上、说他很蠢搞事情，你埋怨他和当年你的同学埋怨你，不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啊。”没有一秒钟犹豫。

“当时你埋怨你那些同学不对，那你现在也不应该埋怨你现在的同学乱说话、乱行动、自嗨浪费时间啊。”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是做什么。”  
“你觉得他们是错的？”

“他们当然是错的了。他们影响到了整个学校，影响了我的个人利益啊。傻。把老师给逼走了，自己还需要保护，特别过分。开学典礼之后他还批评我们学校，说学校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有个同学把他臭骂了一通，你知道老师是因为什么走的吗？你知道你当时发生了什么吗，当时都很愤怒啊。行为也不太对。我都不知道出发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学生自治的想法真的很蠢，你无条件地信任学生，学生会搞事

“这跟你小时候气走了老师，大家埋怨你不是一回事吗？你小时候没错啊，那他们为什么错了呢？你小时候也影响了其他同学上课的权益啊。”我深陷逻辑不可自拔。

“我觉得我就跟我那些埋怨我的同学一样吧。他们认为我破坏了课堂的秩序。他们认为我有错我是理解的。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小学，我是破坏了小学的课堂秩序，他确实也是讽刺挖苦我了。所以我才埋怨他们。我说他是做错了的，他是不是理解我就知道了。我也不会去管。”

“你是唯一在这两个事件当中，两边立场都经历过的人。你应该能理解那个社团同学的处境，你就应该单纯地认为他做错了。你也许应该理解他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当时填那个问卷，我认为老师讽刺挖苦学生是不对的。这不是立场的问题。他们跟我是不一样的。他们这种行为很傻，是要上街，是要表现自己。”“我当时填那个问卷不是要表现自己，是完成任务，我当时是跟我老爸讨论这个空应该填啥，我老爸说有点讽刺挖苦，那是不可以这么写？我说有点。那就这么填。我并不是一定要填讽刺挖苦，我并不是一定要表现这个想法，而是完成任务。我那个同学，我很清楚他们在想干什么，他们就是说我有个姿态，我有想法，我要表现出来。我反对的是这个。”

“万一他们不是想表现自己呢？”

“这不就是人吗？”

“万一他们真心觉得自己这么做是正义的呢？”

“那就觉得他们很蠢。”

“为什么不能上街呢？”

“上街要获得什么呢？表达自己对吧？表达自己我觉得就挺蠢的。”

“你当时也是要表达自己。”

“我当时不是表达自己，我是完成任务。当然，我确实不能否认，我有表达自己的

意思在里面。但我大方向主观意识上是完成任务。”

“表达自己是说出真心话。”

“这确实没错，但我小时候把这些呈上去，我压根没想到老师会看，那个就是要做给大家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的。”

“我们说话声音好像越来越大，感觉旁边有人在看着我们。这似乎不是一个可以在公开场合去探讨的话题。我们压低了一点声音。”

“你看，我是你小学同学，可能会觉得你说老师喜欢讽刺挖苦，就是为了表现自己。但实际上你不是，你可能就真的只是想完成任务，跟你爸商量，但你同学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一点的。”

“但我同学如果这么看我，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你是两个立场都同时经历过的人。我如果是你的话，可能更能想到我的同学在想什么。那个同学，他就算是为了表现自己，但他们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真心所想，我觉得你可以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你没有。我不是说你应该这么做，但它确实是一个能力。”

“当然，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表达：明明自由表达是可以的，即使不采用上街的形式，明明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事件……害老师被开除的不是想自由表达的同学，而是学校，而是更大的家伙，更大的压力。”

我们还在为“表达自己就是挺蠢的”而震惊。

\*\*\*

如果换个视角，赵捷的生活不会比狼狈的我们好到哪里去。

他喜欢的一个动漫被举报下架，这个番的一位配音演员指责举报者，用了“蝙蝠”“奶头乐”这样的字眼，结果受害者赵捷由此站队蝙蝠，因为他觉得他也被人这么骂过，他觉得与被骂的蝙蝠更像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他爱看《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传统媒体，喜欢看特稿，看故事，但它们随着传统纸媒衰落而逐渐式微，他感慨四年以后大概没办法进入这个行业了。“他们旗下几个发表故事的，真实故事计划，全民故事计划，还有网易人间招聘，他们招聘我都会仔细看一下，国内环境更糟糕一些……”

他说会更糟糕。我们问他更糟糕是什么意思，他说是管制更严重。我们说这应该在你能预计的范围之内啊。他说：“是符合我的预期，但它让我赚不到钱。我得选择到其它的地方啊。我兴趣是和这些挂钩的。到时如果这个行业彻底没落了，我就去其他行业了呗……”

动漫下架，媒体机会也减少。他现在想到的是电竞。四年后的样子怎么样不得而知，但现在——2020年的当时还能给他想象的空间：领导好像很重视，上海市长还给一个游戏的总决赛站台，能请到上海市长不容易，而且这个行业薪资还比较多。

“而且电竞行业里也有新闻行业啊。”他会有自己的乐观，“也要写这些选手的，这些选手也是会被公众关注的。所以新闻也未必完全没落，它只是封锁某种类型。如果全军覆没，那我也只能表示遗憾了。”

“你喜欢《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它被政策收紧，你有遗憾吗？”

“我有遗憾。”

“遗憾表现为什么？你不觉得它们都是相通的吗？”

“表现为，我就不会悠然自得地写电竞了。没办法了，我就只能这样了。就是这种遗憾。”

“你不希望《南方周末》有它应该、曾经有的样子？”

“这还是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你觉得历史必将把它扫进垃圾堆？”

“我有时候看到它的样子，就会觉得它不可能再回到历史的主流。有的时候我看到南方周末，三联，它们是在凭兴趣在做。”

“你是说纸的形态还是文章？”

“都有。我是说，我不相信它是没有市场的，但我也觉得它的市场已经不是主流的了，它就是小众啊。”

\*\*\*

第二天，我们见到萧瀚和李静睿。萧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法律工作者。李是作家，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没有成为同事。

我们说到那几天里密集见的年轻人。

萧：年轻人天然就是左派。法国人贡斯当，他接受过亚当·斯密这种人的熏陶，所以他不一样，他年纪轻轻就成了右派。卢梭他们才是正常的年轻人。

李：我看余英时写胡适传记那本书（指《重寻胡适历程》），摘录胡适日记里写当年北大，学生毕业前给胡适写的信，就是死亡威胁，直接说胡适是卖国贼。现在的学生去举报老师就非常多。

伊：我们的年轻人1930年代有很多是相信共产党的，但他们是跟前途未卜的一群共产党捆绑在一起。跟现在有差别，现在有的时候是跟胜利者站在一起的心态。

萧：我觉得还不完全是，感觉他们更混乱一些。

杨：小朋友对于共产党，巨大的威权主义，是没有感知力的。

李：他没有感知力？可他规训，欺软怕硬。

萧：对，欺软怕硬。习惯什么事找老师解决。他不是反权威的。他要寻求权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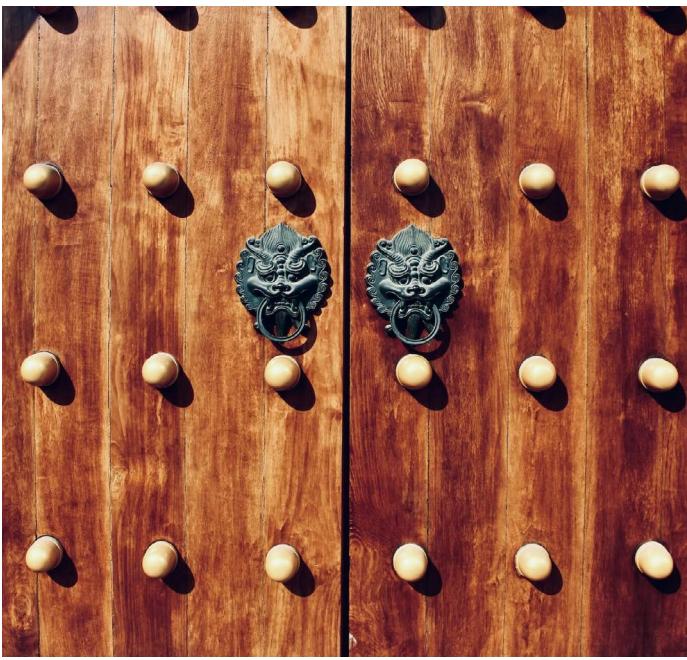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Jean Béller](#) on Unsplash

## 非虚构 蟹家大院

Christopher St. Cavish | 局外人

面条界的“铂金包”

要如何帮助人们摆脱消费主义的深渊？

徐净俯身越过笨重的茶案，对我说：“我的师傅会读心术。”过去几年，徐把大闸蟹淡季的时间都花在了搜罗中国各地的道教、佛教和儒家老师上。在我们之间，是他归隐终南山时采的松针与莲子泡的茶。他乌黑的长发盘成了一个发髻，一缕八字胡盖过他的双唇，下巴处还有一撮细细的山羊胡。他身穿一件单薄的长袍，这是他四季冷暖唯一的衣服。

“我登门拜访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问。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徐一边暗笑，一边前倾了一下身体，似乎要试探我。

“你信吗？”

那是 2015 年的事情。徐刚开了一家叫“蟹家大院”的面馆，卖的是奢华得离谱的面条——每碗面有六只雌蟹黄和六只雄蟹膏，售价 360 元，面上撒有一层金箔。但徐净从未尝过。他常年吃素，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对他而言，蟹面与其说是门生意，不如说是净化世界的修行——借助名人和吃客的力量。

在他脱下 Gucci 和 Armani、换上单薄长袍之前，徐拥有一家生产婚纱照相册的公司，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而当政府动迁了他的虹桥路办公室后，他的财富变得更可观了。他拿着动迁赔偿，做起了大闸蟹生意，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有一天我去了我的库房，”他回忆道。

那是 2011 或 2012 年的事，他的库房占地四五百平米，六米高，堆满了东西。

“我忽然意识到，我花了这么多金钱和精力追求拥有的东西，没有一件能使我快乐。”他指向了桌上的一瓶水。

“从我们出生那刻起，我们就不断往里添，”他说。

他拿起了茶壶往本就装满的瓶子里继续倒水。

“到某个阶段，你总得说‘够了’。如果你不停止添加更多，瓶子里的水就不会静止。”

他把库房里的东西送给了朋友、熟识、任何想要这些物品的人。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玛雅历法中认定 5125 年周期的结束、人类进入新纪元的那天，徐戒除了吃肉，停止了理发剃须。

这成为了一个新的起点。

徐的大闸蟹生意已有一定规模，并在上海的中山公园附近有了一个门面。但这是一个季节性的生意，一年四个月旺季、八个月淡季。淡季的时候，徐就去陕西的终南山寻找精神导师。他开始相信吃肉的人不仅消耗了动物的肉体，也汲取了他们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名字从跋扈的“剑”改成了彰显全新自我的“净”。他披上了长袍。

所有变化之外，徐经营的依然是一门掠夺动物生命的生意：阳澄湖上的蟹塘，凯旋路上的店铺，和以上海为客源的销售网络。

“我是这么看的，”他解释。

“无论我做不做这一行，总得有人养蟹卖蟹。所以不如我待在这行，按照我的方式，干点不一样的。”

他把原本做大闸蟹批发的门面改成了一家素雅的餐厅，菜单上只有三样东西：蟹粉面，蟹黄面和蟹粉狮子头面。

在我们身后，一条小型流水线正在加工处理当天早上送来的最后一点货品。早些时候，350 只大闸蟹从徐的阳澄湖塘直接运至餐厅，它们的最后一个清晨和这一生的大多数时光一样，由天然饲料和音乐赏析开始——据徐说，像小提琴和古筝这样的高音乐器是最好的。

此刻，拆蟹工灵巧的双手正忙活着，把金色的黄和白色的膏从雌雄蟹肚中分离，蟹粉从身体中挑出，最后再用小剪刀把一条条腿剪开掏空。整个餐厅——拥有 18 个座位和一个小规模的厨房——弥漫着因蒸蟹而散发出的泥土气息。

徐的回答总是不着边际、闪烁其辞，令我沮丧。他用一则关于主观看法和客观现实的寓言回应我关于大闸蟹养殖的问题：当我要了解他的菜谱时，他却讨论起了宇宙的细胞结构。//

不过徐最终还是绕了回来，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其他，落到了关于烹饪最质朴的一条真理：大道至简。据他说，开餐厅的想法没什么来由，一蹴而就。然而和大多数情况一样，现实并不会那么简单。徐不懂烹饪，而且受制于无法品尝他自己食物的问题。曾有厨师帮他开发菜单，“大显身手，花招百出”，徐一边挥舞双臂一边描述，最后用花椒这样的佐料掩盖一切。

“我只能跟他们说：‘不，不，不’，这看起来不错，但不是我想要的，”徐说。

他追求的是至简至纯，而最后他靠自己发现了方法：一匙猪油，一匙盐，和一碗香醋。面条煮熟后置于碗底，一勺清汤；豪华版的撒一层金箔——“对身体有益”，他补充，但事情由此变得令人困惑。

餐厅里没有一处设置逃得出徐的哲学理念，从店面窗户（五行元素）到面条定价（360 度圆周 = 360 元），而这个定价据徐说是刻意定得偏高的。

“价格能帮我们筛选客人，”他告诉我。

徐想要团结全人类，消除暴力和冲突，帮助人们摆脱消费主义的深渊。面条界的“铂金包”要如何实现这一切？

在徐的眼中，这并不矛盾。

“我想要吸引成功人士，”他声称昂贵的东西才能吸引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能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无论我做不做这一行，总得有人养蟹卖蟹。所以不如我待在这行，按照我的方式，干点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观点中，徐关于至简至纯的说法与他的菜单达成了一致。客人告诉他，面条简单得令他们想哭，而在徐看来，正是这样的效果才能把他的理念发扬光大。根据设想：富人名流因一餐饭感激涕零，并广而告之，一次一个明星，世界由此改变。

徐带我到了那个小规模的开放式厨房，墙上贴满了他和明星的照片。我试图“清点”这个每天都穿同一件长袍、却执着于要在见到我见过最奢华的面条上再撒一层金箔才满足的人。徐从堆成山的蟹黄中取了一勺，放入锅中，我陷入沉思——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利己的一碗面了。

和徐的面谈令我变得多疑。在我坐下来享用前，我需要再次确认他的动机。蟹家大院是物质主义的巅峰还是解药？我好奇他是否已经学会了读心术。

在徐撒盐的时候，我问他：“如果一切这么简单，你不怕有人抄袭吗？”

他脸上浮现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然后说：“我希望他们这么做，而且我愿意教他们。好东西如果不分享就一文不值。”

徐坐在一个形如螃蟹的户外长椅上，身体靠着椅背，笑着告诉我“这是一门生意。”那是几年后，徐正处于他的黄金期。我们坐在室外，陆家嘴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中，徐的蟹家大院新店之一也开在那里。新店装饰以奶油色为基调，典雅，充满禅意。除了消失的金箔（他后来发现这在上海不合法），一切都升级了。洗手间里，巨大的木质座椅宛若宝座一般摆放在昂贵的坐便器周围，其他设施还包括戴森吹风机，茱莉蔻护手霜和祖玛珑香氛。每张餐桌上都摆着可免费畅饮的圣培露及依云的水，以及自制姜茶。雇佣的 50 名拆蟹工如今另辟一处，为他的餐厅提供蟹黄、蟹膏和蟹粉。面条依然售价 360 元。

经过了这些年，徐身上发生了不少变化，或者说至少他的采访习惯变了。他不再使用哑谜，禅宗术语，或寓言故事，他言语更直接，回答问题也变得谦逊了。他不再抽时间千里迢迢去山里寻求知识。他解释说他现在有 100 个员工和他们的家人要照顾。我们所在的餐厅几乎有 800 平米，在外滩还有一家新店。“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他解释。

徐还是穿着那一件长袍，但用的是最新、最贵的苹果手机。他不愿意让我拍他的正脸照，但是在微信上却有一套他自己的卡通图像表情包。在他更为直接的言语间，依然有我无法理解的部分。

不过这些似乎并不妨碍上海全面接纳他和他的品牌。墙上的明星合影以几何倍地增长，每家门店都添加了等位区，每天接待人数几近 600。还有人来打包他们的面条。徐的最初的愿景——通过面向富人来改变社会——已经实现。蟹家大院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昂贵的面馆，而且门庭若市。

徐净光脚站在他硕大办公室的地板上。一侧的墙上，几十台挂壁电视通过闭路影像是实时播放着蟹家大院各个门店的情况。他一身米白色休闲运动服，看不出任何品牌风格，仿佛禅修风格的露露乐蒙（Lululemon）。他没有穿鞋袜，欢迎我进他办公室时，左右脚交替站立。

那是 2023 年的初春。我回到了蟹家大院的第一家门店。这个以 21 平米起步、阿姨们从清晨就开始在用餐区拆蟹的面馆如今已扩张成了旗舰店，并全面翻新成了原木色。挂着明星合影照的墙面已找不出一丝空隙，整个二楼则变成了徐公司的总部。

我和他都胖了不少，比八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多了些皱纹。我们坐下前，我好奇这些年他还经历了哪些变化。

“我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商人。”这次徐这样回应我，显然，他的抱负更大了。如果不是新冠的影响，他原本计划将公司上市；现在他的目标是让蟹家大院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就像二、三十年前城隍庙的五香豆一样。“我想把上海蟹跟上海面结合起来，变成代表上海的一碗面。”徐说。他想要在海外开店。他的公司现在拥有影视制作部，装修设计部，市场营销部，位于国内最知名大闸蟹产地的一个巨大蟹庄，位于上海的一个食品加工厂，一个家具厂，以及一支业余足球队。一年他们消耗 150 吨大闸蟹。

与此同时，在我们之前见面时几乎绕不开的精神层面也有所变化。通过精品面条影响社会的计划逐渐萎缩，但他对数字命理学的兴趣则与日俱增。他拿出手机——依然是最新一代的苹果手机，播放了一段几分钟长的视频，这段视频专门用来解释数字九的深意，关于“天圆地方”的古老哲理，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画作，及这些概念与他的品牌的关系。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要来到地球这么小一颗星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问道。

他谈到了埃及金字塔，百慕大三角，和广袤未知的海底世界，以此说明人类已知的有限与“我们未知的无限”，他表示“我们应当思考更多。”

通过精品面条影响社会的计划逐渐萎缩，但他对数字命理学的兴趣则与日俱增。

他谈到了他戒除吃肉的那天，“2012 年 12 月 21 日不是世界末日”，这个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当时的末日论人士而言却并非如此，他们预言了日期，标记了玛雅日历，并宣称世界将终结于此。

“它是一个文明的新纪元，”徐说。“地球的文明要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生存时期，那个时期我们住在山洞里，以打猎为生。当时生命的意义在于维系它的长度和繁衍，一个是自身活得更久，一个是子嗣更多。这就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追求，没有人会

问你公司估值多少，或者你的座驾是什么。他们只关心你能不能打猎，能不能打到肉。”

“到第二个阶段，当生存不是问题以后，我们该追求什么？物质。我的山洞比你的大一点。你骑的是驴，我骑的是马。你有个狼牙，我有个虎牙。当生存不再是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同类竞争。竞争成为了生命的意义，没有了竞争的原动力，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它（物质竞争）会达到顶点吗？”徐反问。“有了一个亿的人想有十个亿，有了十个亿的人想有一百个亿。你有了自行车，想要摩托车；你有了摩托车，想要汽车。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但我们给地球带来了什么？当你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手抓两根金条来的吗？你走的时候有任何一个人能带走两根金条吗？没有。物质一定不是我们来到地球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能从地球上唯一带走的宝贵的是什么？是回忆，是精神，是人跟人之间的满满的爱。”

他回到了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从那一天起，我觉得我再追求物质的话，它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想换一种人生，我想尝试着让自己放弃一些东西，所以我放弃了很多物质上的追求。

他不再理发，开始穿长袍。“我的头发给了我很多困扰，我把造成困扰的事务都放掉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发师，你习惯了他给你理发以后，就会觉得别人给你剪出来都不是你想要的。如果哪天他没空或者不做了的话，你会很痛苦。你还要定时理发，你还要寻求下一个，还是要花时间。”

忽然之间，徐的理发故事变得严肃了起来。“我们没有必要去浪费生命。钱没了可以赚回来，生命没有了，你怎么去赚？我们要尽量减少生命中那些无谓的事情。我已经十年没有理发了，一次也没有。”

我不太理解九的深意，或者是天圆地方的理论，或者是文明的三个阶段。但当他回到他的极简主义及何为必要时，我产生了不少共鸣。

显然，过去十年他花了不少时间思考他的行为处事，并渐渐把他的精神思考带到了我的世界：食物。

“吃的东西分两种，一种叫美食，一种叫美味，”徐娓娓道来。“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我用面来介绍的话，日本的拉面用各种动物的骨头一起，从早上七点煮到晚上七点，成为高汤以后，还会放蒜、姜、海带等调味料。它很浓，很好喝，很有层次感，这个从我们的文化体系来说属于美味。”

“美食是什么？纯粹的食物，是它本身就很好吃，不需要过多的料理。比方说一个香蕉，一个好的香蕉，你打开它一吃会觉得好吃。橘子也是这样，好吃就是好吃。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

“榴莲，”我回答。

“大闸蟹也具备榴莲的属性，它不需要过多烹饪，只要蒸一下就很好吃了。榴莲也分很多种，猫山王，黑瓷，各种各样。它们层次不一，猫山王也分很多种，有好有坏。猫山王的榴莲长在很高的树上，无农药无残害。”

“而大闸蟹是长在水里的。如果你养殖的环境被污染了，如果你投喂的饲料有问题，如果大闸蟹生病了，都会导致原材料变质，那就不再是食品，就是毒品了，跟我的信念就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原材料从源头控制好。”

“我们花了 5 年的时间——从 10 年到 15 年，在阳澄湖生根去控制原材料。原来我们在阳澄湖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产业链，开餐厅、做农家乐、养鱼、羊、鸭、鹅、牛，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掉了。到 13 年以后，我们开始转型，把一些东西砍掉，专注做螃蟹。”

“这是我这辈子四十几年悟下来的，人这一辈子能力有限，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很伟大了。”

由此，徐把他和日本的“美食文化”进行了区隔。

“日本人讲究匠心文化，他们传承，爷爷做面，爸爸做面，我做面，儿子以后也是做面的。他们已经世世代代习惯了，很难突破，只会增加。‘我找到一个更好的食材’，或者说‘爸爸找到的牛肉没我找的好’，他们优化，或者通过添加爸爸以前没有的食材来做加法。”

“你看过功夫熊猫吗？”

“功夫熊猫里的爸爸是卖面条的，他问他的儿子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吃他们家的面条，儿子始终不知道。”

“因为我们家的面条 nothing（什么都没有加），”徐解释，用英语说了两遍最后那

个英语单词。

“我听到 nothing 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这碗面什么都没有加，你知道吗？就是一碗面条，就很纯粹。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除了螃蟹和面条，什么都没有。”



Christopher St. Cavish

美国作家，2005 年移居上海。他写美食，也写作为一名“局外人”的生活。

### 局外人

Christopher St. Cavish 以前是个厨师，他也是这样开始他在中国的生活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作家、编辑或者随便怎么称呼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他与他感兴趣的人交谈，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也写下了这个剧变中的国家不少变迁故事——直到他发现自己和中国的更多关联。



题图为电影《黑客帝国 3：矩阵革命》(2003) 剧照

## 档案

# 战争进入第二年，俄罗斯与世界产生了技术隔离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9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01

科学 / 技术

[拼多多被曝安装软件后门，遭安卓商店下架。](#)此事最先由[几位安全研究人员曝出](#)，称该软件利用安卓系统漏洞，绕过隐私合规监管，获取包括位置信息、通知、私人消息等各种其他应用上的内容。而且一旦安装，就很难移除。

CNN 采访了六个网络安全团队以及多名拼多多过往和在职的员工，[对此事进行调查](#)。内部员工表示，这些漏洞被用来监视用户和竞争对手，全面了解用户的习惯、兴趣和偏好，改进机器学习模型，以进一步促进销售额。“我过去从没在任何主流应用上看到这样严重的跨权限访问的情况。”一位芬兰的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内部人士补充，有关问题遭到曝光后，负责挖掘和利用漏洞的团队于 3 月初解散。3 月 21 日，Google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暂时下架了拼多多的 Google Play 商店版本。Google 还强制执行了 Google Play Protect，扫描安装在 Android 手机上的应用程序是否存在有害行为，以及所谓的恶意应用程序。

[英国警方重启人脸识别应用，引发广泛反对和争议。](#)在众多反复被抵制，又势不可挡地入侵日常生活的技术中，人脸识别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不论是技术的误差，对“奥威尔式”大规模监控的指控，都没有阻止它逐渐变得更加普及。近日，英国的南威尔士警方宣布重启人脸识别，用于抓捕恐怖分子和寻找失踪人员。2020 年这项应用曾被上诉法院[裁定为非法](#)，但留下一个口子。因而，警察部门特地委托制作了一份报告，指出特定环境下这个技术的歧视问题很小——[报告的数据表明](#)，当前设置下，错误匹配

的几率为 1/6000。

“这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在英国这意味着可能有数万人会被错误地标记为罪犯。”Big Brother Watch 的法律和政策官玛德琳·斯通对此持批评态度，“实时面部识别是一种毫无疑问的大规模监控，它把我们都变成了长腿的身份证。”

[地球另一端的纽约市，停用两年的机器狗也再次被用于执法。](#)纽约市用大约 75 万美金的价格购买了两只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械狗。政府官员表示，它们并不用于例行巡逻，而是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比如拆弹。

同时部署的还有几个蛋形的 K5 机器人，以及一种可以将 GPS 追踪器发射到逃逸车辆上的枪型装置。据介绍，前者可以情报发回警察局并阻止犯罪。但发言人也特别指出，它没有人脸识别功能，似乎是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

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先进”表示欢迎。警察部队的装备升级时常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反乌托邦，质疑是否有必要。面貌上它也很接近让人更为担忧的一种技术：能独立识别和攻击的自主武器。“这好像一部糟糕的科幻小说。”监控技术监督项目执行董事 Albert Fox Cahn 表示，“纽约值得真正的安全，而不是山寨版的‘机械战警’。”

[数据中心正在抢占农田面积，荷兰的农民很不高兴。](#)当减碳成为一个政治任务，大型企业做出了让人熟悉的反应抢占资源。哪里可以种树，购买碳汇，哪里有低廉的清洁能源，它们就一窝蜂地涌过去。荷兰就是这样地方，地理位置上，这是欧洲网络电缆交汇之处，且气候温和，拥有丰富的绿色能源。

《连线》报道，迄今为止，这里陆续建设了大约 200 个数据中心。尤其是 2015 年以来，占地至少 10000 平方英尺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开始落地，为微软和谷歌这样的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反对者认为，数据中心占据了大量的土地，是对本可用于开垦的肥沃农田的一种浪费。[2022 年](#)，Meta 的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就在社区抗议下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最终没有落地。

数据中心消耗的大量电力也对本地人的生活带来威胁。爱尔兰的活动人士反对 Amazon 在北部柏林建设三个新数据中心的计划，认为它们会使电网超载。近日，挪威军工企业 Nammo 也表示，由于 TikTok 新建的数据中心，地区内面临的电力紧张，这正在影响它的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它对乌克兰的战备供应。

[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在 VR 的世界里寻求疗愈。](#)尽管元宇宙已经在今年的 AI 浪潮中被许多人抛诸脑后，与之相关的技术仍在一些领域展现出创造性的用途。这是由国际心理学家团队与 VR 平台 8agora 合作开发的项目，旨在为受到战争影响的乌克兰人提供治疗支持。

虚拟世界设置在基辅，天空晴朗，城市中有大量的植物，广场中央摆放了一排蓝色沙发。参与者可以定制自己的虚拟形象，在 VR 世界中见面，分享个人以及他们共同的创伤。领导该项目的心理学家希望 VR 能够帮助消除一些围绕 PTSD 而生的耻感。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41.2% 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受到耻感的影响。而隐藏在虚拟形象之后谈论自己的创伤，走出疗愈的第一步似乎能变得更容易一些。

[战争进入第二年，俄罗斯与世界产生了技术隔离。](#)根据政府数据，2022 年约有 10 万名 IT 专家离开俄罗斯，约占技术劳动力的 10%。与此同时，1000 多家外国公司缩减了在俄业务，作为对其制裁的一部分。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援引离开的科技工作者的表述：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村庄，与全球科技产业、研究、资金、科学交流和其他的关键组成部分隔绝。尤其显现的一点是，国际上的明星产品，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都在一年内出现了俄罗斯仿版，名为 Yappy、Rossgram 和 RuTube。退出俄罗斯的公司则以低价将资产抛售。

尽管技术已经是俄罗斯少数仍保持开放的行业，战争前，政府对科技大公司的控制就已经对行业带来了损害，尤其是对言论的控制，严重损毁了社交平台的公信力。而在失去对外交流的情况下，许多人对俄罗斯未来的技术发展并不看好。“凡是和创业、创投相关的东西，都是需要大量国际化运作和参与的，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然而这正是俄罗斯目前在发生的事情。”反对党成员 Ilya Ponomarev 表示。

公元 2023 年四月 AI 简报

## ★ 网信办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从 ChatGPT 到 Stable Diffusion, 不论是文生文、文生图, 还是未来的各种形式, 涉及到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都将受到其约束。

然而, 这样一个管辖范围极其广的文件, 表述却也非常含糊, 让人无法理解具体能如何实现。其要求包括“采取措施防止生成虚假信息”, “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拥有领域内最先进技术的 OpenAI 和 Google 恐怕都尚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

该管理办法也因地制宜地, 包含了许多我们熟悉的要素, 比如“生成内容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用户实名制, 防沉迷等等。

中国的网络管理总是呈现出这样复杂的面貌, 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一方面, 《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深圳数据条例》等文件的出台, 似乎在向 GDPR 的方向靠齐; 另一方面, 监管和审查也总是并行而至, 用一个巨大的网兜将所有内容都归在同样的标准之下。在此之前, 百度、阿里在内的多家科技企业都争相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 抢占国产人工智能的平台的市场, 这无疑会给它们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问号。

## ★ 全世界都试图解答一个问题, 如何监管 AI?

正如去年底许多人预测的那样, 一路狂飙的人工智能行业, 随着一款现象级产品的出现, 也在今年迎来一波监管的大讨论。至于答案, 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更为复杂。

中国网信办的条例之外, 三月底, 马斯克、沃兹尼亚克等知名科技人士[联署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暂停人工智能开发六个月。目前签名已经超过两万人。信中敦促行业“面对能力不断涌现却不可预测的模型黑箱, 从危险的竞争中后退一步”。

最终这场骚动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因为不存在一条这样的网线, 一拔插头就能让所有人工智能企业停摆。但不切实际的“敦促”也透露出人们的不安。技术的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期, 人类要玩儿脱了吗? 一些对于这封信的批评试图把人们的情绪往回拉一拉, 他们认为, 这封信夸大了大语言模型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 它用一些末世言论, 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更直接、更迫切的危害中转移开了, 比如模型的偏见和错误信息。

不愿意面对这些更迫切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太难回答, 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对“有道德的 AI”究竟是怎样达成共识。欧盟拥有更加成熟的数据保护立法, 因而行动也更加迅速, 三月底, 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 Garante 就以违反数据保护法为名, [给 ChatGPT 实施了临时禁令](#)。但欧盟的立法者也意识到, 已经讨论多年的 AI ACT (人工智能法案), 真正落地时恐怕已经完全落伍。

而你又该如何监管一个黑箱? 最强大的算法本质上是不透明的。人们可以控制训练集, 改变训练方式, 甚至设定过滤机制, 强制筛选掉不合法的生成内容, 但神经网络究竟是运作的, 仍存在大量未知。

## ★ 最简单的方法, 让 AI 自己来做审查这件事

没有一种审查比自我审查更强大。AI 实验室 Anthropic 的一项实验的发现, 想让模型产出更加无偏见的内容, 只要跟它说就好了。该团队发现, 仅提示模型在回答的时候“不要依赖于刻板印象”, 就能够对其输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只要输入正确的关键词, AI 会不会变得比人更擅长自我审查?

## ★ 最近诈骗变多了? 不是错觉, AI 干的

随着个人信息收集无孔不入, 你不仅能坐拥信息茧房, 也将收获自动化和个性化定制的专属诈骗手段。

Darktrace 的研究人员发现, 2023 年的前两个月, 新型社会工程学电子邮件攻击增加了 135%。社会工程学指的是电信诈骗的一种门类, 多数会利用人们的一些心理, 比如知名的迪拜王子诈骗, 还有多年前的快乐大本营抽奖诈骗。[心理操纵的技巧](#)会引起受害者的危机感、恐惧或好奇, 引导他们不经核查就泄漏敏感信息, 或是点开恶意链接文件。

由于这类攻击常会涉及到通过多轮对话, 获取受害者信任, 成本较高, 也容易露馅, 过去常会通过广撒网的“傻办法”, 寻找最薄弱的地方下手。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提高成功率, 并大为减少生产自然对话的成本。Darktrace 表示, 新型的攻击包含了“复杂的语言技术”, 电子邮件的文本量、句子长度和标点符号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而过去最为可疑的, 直接包含附件或链接的恶意邮件数量则有所减少。

## ★ AI 可以写维基百科么? 等下, 可是 AI 的参考来源就是维基百科

英国媒体 The Evening Standard 最近采访了维基百科的创始人之一 Jimmy Wales, 问及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表示这其中有很多可能性, 也提到 ChatGPT 和各种模型编造事实的问题。

但值得一提的是, [AI 研究者 Alan D. Thompson 曾做过一个整理](#), 分析不同模型使用的训练集组成, 其中维基百科是一个区别于书籍、期刊以及 Common Crawl 的一个单独的、重要的类别。数据量上也非常可观。

也就是说, AI 参考维基百科来撰写维基百科, 然后把维基百科越来越多地替换为 AI 生成的内容?

## ★ AI 版《模拟人生》, 楚门的世界里生活的全是 AI 人

斯坦福大学和 Google 的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类《模拟人生》微型 RPG 风格的虚拟世界](#), 其中 25 个角色全由 ChatGPT 和自定义代码控制, 以高度接近现实的行为独立生活。

这个名为“Smallville”的虚拟小镇, 有自己的房屋、咖啡馆、公园和杂货店。小镇居民有一段“种子记忆”, 类似于设定, 描述了他们的职业以及与镇上其他人的关系。ChatGPT 联系上下文的能力, 让他们拥有了记忆, 意味着开始运转后, 居民之间的交流也会成为他们设定的一部分, 并带来相应的事件发展。

比如, 当一个居民被设定为想要举办情人节派对后, 两天内镇上自动传开了这个消息, 并协调出了派队时间和参与人数, 其中 12 人收到邀请, 5 人决定参加, 3 人借口太忙, 4 名干脆放鸽子——确实很真实。

这里 ([https://reverie.herokuapp.com/arXiv\\_Demo/](https://reverie.herokuapp.com/arXiv_Demo/)) 可以看到模拟的回放。非常有趣。

还有比较恐怖的一点。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一些真人角色被要求对这些 AI 居民进行角色扮演, 并用这个身份回答一些问题。研究人员发现, AI 居民的回答比真人扮演的要更加可信。

## ★ 一种新型的机器学习模型: 反事实推理论

对人类来说, 这种思维模式很常见: 如果某件事情没有发生, 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 但对机器来说, “倒推”计算方式并不常规, 因为决定性的因素并没有真正发生。

1990 年, 计算机科学家 Andrew Balke 和 Judea Pearl 发明了孪生网络, 也就是一对概率模型, 一个代表现实, 一个代表虚构世界。后者与前者几乎相同, 只是更换了一个变量, 来观测事情的发展是否会不同。这个思路进一步发展为了一种神经网络的构架蓝图。

如今, Spotify 的团队在使用它构建自己的预测系统。根据其团队在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上的描述](#), 该模型可以更好地判断不同因素对于事件发展的影响, 理解其因果关系, 以此提高金融、医疗保健等一系列应用中自动决策的准确性, 尤其是个性化建议, 比如如何给你更好地推荐下一首歌。

## 02

### 气候 / 环境

[碳中和路上不为人知的难题究竟谁有权利在海底挖矿?](#) 这是一件有点反常的事情, 为了保护环境, 减缓升温, 我们急需从地球再多挖点东西出来。比如用于电池的锂, 用于风力涡轮机的稀土元素, 钷和镝, 铜……为了获取这些资源, 人类的目光投向了海洋。

过去几十年, 人们都在讨论海底采矿的可能性, 一些商业公司已经开始行动。但也有担忧的声音。[科学家认为](#), 海洋也是一个重要的碳汇, 采矿的行为可能会将破坏海洋的状态, 并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 带来本末倒置的结果。同时, 采矿行为也会消灭这里的原住民, 多毛类蠕虫、海参、珊瑚和鱿鱼等, 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不可逆的破坏。跟很多气候行动一样, 最让人担忧的是, 我们其实根本不清楚这件事将带来怎样的潜在危害。

那谁能解决这个矛盾呢? 实际上, 确实有一个组织能够管管这事, 名为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该组织成立于 1994 年, 总部在牙买加。它会对进行申请的企业 / 团体 / 国家颁发勘探许可证, [自 2001 年以来](#), 已经颁发了 31 份。

2021 年, 太平洋国家瑙鲁宣布打算对海底进行商业开发。这触发了一个模糊的“两年规则”, 给了 ISA 一个最后期限来完成其环境监管规则手册。这个期限会在今年七月到

期，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设定监管的最后关头。

随着对海底采矿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此次决议引发了比以往更强烈的关注。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国际组织一直在试图推动暂停海底采矿，三月初联合国也通过了一项新的公海条约，承诺到 2030 年保护三分之一的海洋（和陆地）。

中国沿海海平面一直在波动上升，2022 年达 1980 年以来最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四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过去 11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均处于有观测记录以来的高位，2022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高 94 毫米，为 1980 年以来最高。

沿海高海平面加剧了风暴潮影响程度，也造成沿海地区更容易遭受复合型滨海洪涝。长江口、钱塘江口和珠江口咸潮入侵总体加重。江苏、广东和海南沿海部分监测岸段海岸侵蚀加剧。

《国家地理》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海平面上升的原因，包括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水热膨胀，冰川融化，以及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消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一份特别报告称，预计到 2100 年海平面将上升 26 到 77 厘米。

臭氧层修复卓有成效，但被禁用的化学物质又神秘地出现在了大气中。根据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的研究，五种不同类型的氯氟烃 (CFC) 正在大气中以惊人的速度积聚。这些化学品曾广泛用于空调和制冷，以及气溶胶喷雾剂、泡沫包装等，但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它们本都应在 2010 年之前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淘汰。

因此科学家对于新的发现感到十分困惑。一种解释是，从技术上讲，公司仍然可以在制造替代品的过程中使用 CFC，新的泄漏就是从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定位泄漏的源头十分困难。“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在一片草地上丢了钥匙，你只能去 10 或 15 个特定的地方寻找。”NOAA 科学家在发布会上表示。

虽然就目前而言，新的污染不足以抵消数十年来修复臭氧层的努力，但无法定位和控制这些泄漏可能会推迟原本预计将在 2066 年完全恢复的臭氧层。

气候储能新技术，加热一块砖。对于清洁能源来说，储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与传统燃煤发电不同，多数清洁能源发电都看天，而用电需求不总是和天气完美匹配。为了拉平这种用电差，一些初创企业开始探索用砖块储能的系统。

原理非常简单。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有体会，经过一下午的日晒，公园的石凳在太阳落山后，摸起来仍是温温的。不同材质能够保留这种温度的能力和时间长度也不尽相同。

具体操作时，首先，这个系统会用清洁能源产生的电力加热元件，将电能转化为热能，然后加热砖堆，使其达到 1500 摄氏度甚至更高。在隔热的容器中，这个温度可以保持数小时乃至数天。需要使用时，就会有一个风扇将空气吹过砖块，被加热到 1000 摄氏度的风将会被转化成为新的用途，比如加热水来制造蒸汽，或者投入其他需要高温的生产过程，满足工业对热能的大量需求。

发挥余热的老煤矿，继续为英格兰人供暖。淘汰燃煤发电厂被视为全球减碳最核心的行动之一。过去十年，英国的煤炭产量下降了 94%，大量煤矿被关停，退出历史舞台。

但被关停的地方并不是一片废墟，随着人们退出，地下水重新涌上来填满矿井。这些地下水就像温泉一样，天然地保持在 20 度的温度。于是一些本地的社区和企业将其加以利用，用来为建筑提供暖气。从这个层面讲，地球就像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热电池，储存能量并通过地下水释放到地表。

担心水资源流失，法国部分地区暂停新的住宅建设项目。整个欧洲都面临着严重的干旱问题，法国和意大利北部的水库比正常水位低 40% 到 50%，阿尔卑斯山的降雪量仅有预期的一半，严重影响了依赖于它的融水作为水源的下游地区。

《连线》报道，专家预估，就雨量而言，整个大陆需要数亿升雨水来填补缺口。但这个可能性并不高。去年欧洲的破纪录的高温加剧了自 2018 年以来的连年干旱，而随着又一个夏天即将来临，人们也担心热浪会不会席卷重来，带走更多的水分。

除了已经进入“警戒状态”的法国，许多地区都开始限制水的使用和消费，在加泰罗尼亚，农场被要求减少 40% 的用水量，工业则须减少 15%。报道也提到一些有争议的做法，比如用巨大的薄膜覆盖冰川和雪山，反射阳光，借此保存珍贵的水源。

总体而言，用马克龙的话来讲，“富足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谨慎。”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 Newsletter

来自科技于环境、边缘人群，以及其他我们认为重要议题的新闻汇总。



题图来自 [Photo Boards](#) on Unsplash

狱服刑。

但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少数气候活动家采取的激进策略可能对更广泛的进展是一件好事——即使他们普遍不受公众欢迎。例如，全球范围内针对地球日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如纽约市就在至少 31 个地点实施了 5 个小时的汽车禁行，并在时代广场举行了音乐会。但占据新闻头条的往往还是那些破坏性行为。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全球可持续发展讲师 Heather Alberro 就指出，激进分子的破坏性抗议活动可以使主流环保主义者的要求在政府和公众眼中更容易接受，从而有效地推进整个运动的议程”。

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激进主义者在转向温和，他们希望连结更多的公众。每年的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今年的这一天，数千名活动人士在伦敦市中心聚集，这是为期四天的“大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凸显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失败”。游行在议会广场以大规模的“死亡”结束——一个象征性的纪念行为，参与者静默躺下，纪念和哀悼自 1970 年第一个地球日以来野生动物数量令人心碎地减少了 70%。

环保组织反抗灭绝(XR)也参与其中，他们承诺带来少的干扰和更多的包容。近年来，XR 的抗议活动对城市的公共系统造成了诸多破坏，包括横卧大街堵塞重要交通路口、把胶水涂在下议院等。但今年 1 月，该组织呼吁暂时停止高调的示威活动，暂时不再把破坏公共秩序作为主要策略，并承诺动员大量民众反对政府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不作为。行动协调员 Rob Callender 解释说，在听到公众说他们的破坏行动“是一种妨碍”后，该组织正在采取一种更为和平的方式。

#### ALSO IN THE NEWS

## 档案

# 气候问题迫在眉睫，抗议行为有用吗？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2 条新闻。

德语中曾有一个流行词 Klimakleber，中文可以翻译为“气候黏贴者”，这个词主要用来嘲讽那些激进的环保人士们，他们总是把自己“贴”在城市的马路中央，以破坏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

德国的最新一起“气候黏贴者”行动出现在本周末。在柏林举行的全电动方程式比赛开始前，德国气候组织 Last Generation 的抗议者突然翻过围栏，推迟了比赛的开始。这一行为受到了许多车手的批评荷兰赛车手 Robin Frijns 在 The Race 的采访中表示，“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事实上，这是此类抗议行动在社交平台上最常见的评价之一。

尽管如此，近几年来，类似的破坏性抗议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上周在英国谢菲尔德，一名抗议者出现在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现场，他爬上球桌并向场内扔了一袋橙色粉末。上个月在米兰，气候组织 Ultima Generazione 的成员将金色颜料泼向一座纪念碑，意大利官员指责该组织永久性地破坏了历史遗址。

气候问题显然迫在眉睫，但这些环保组织的抗议性行为是否能对此产生积极影响？

据 BBC 的报道数据，世界各地有大量民众将气候变化视为重大威胁。在美国，约 69% 的人支持该国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气候是该国的主要威胁。而英国国家统计局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有 74% 表示对气候变化感到非常或有些担忧。但与此同时，Omnisis 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6% 的英国人支持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来保护自然，YouGov 最近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0% 的英国人认为损毁艺术或公共纪念碑应该被定为刑事犯罪——在英国，自 2022 年 4 月 1 日以来，已有 2000 多人因破坏性行为被捕，138 人入狱。目前有两名 Just Stop Oil 和五名 Insulate Britain 活动人士因参与这些活动而在监

#### 得克萨斯州希望禁止堕胎药物，但暂时被驳回

得克萨斯州的堕胎法是全美最严厉之一，两年前这里的“心跳法案”（如果胎儿被检测到心跳即禁止堕胎）就曾引发大量争议。月初，该州法官又发布了一项新的禁令，决定暂停对米非司酮（一种经 FDA 批准的堕胎药物）的批准，称其是一种用于“杀死未出生人类”的药物。但最新消息是，这一限制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最高法院批准了司法部和该药物生产商的紧急请求。保守派法官 Clarence Thomas 和 Samuel Alito 公开反对这一决定。Alito 在一份简短的意见书中写道，政府和药企并没有表明他们可能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堕胎权利组织则赞扬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指出该案仍在审理中。目前，案件将于 5 月 17 日听取辩论。

米非司酮与另一种药物米索前列醇均用于药物堕胎，据路透社的数据，全美有一半以上的堕胎行为使用了这两种药物。FDA 称米非司酮安全有效，数十年来已经经过数百万美国人的检验，副作用非常小。如果限制生效，将会逆转 FDA 近年来使米非司酮更容易获得的种种行动，比如允许邮寄等。另一方面，在争议开始之后，部分州采取了大量购买和储备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的措施。

#### 而日本刚刚批准了该国第一种口服堕胎药

上周五，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个小组首次批准了一种口服堕胎药在日本的生产和销售，这意味着该国女性在生育权利上有了新的选择——目前在日本，怀孕初期的堕胎仅限于外科手术。

英国制药公司 LinePharma 的口服堕胎药产品 Mefeegoo 将可被用于终止九周内的妊娠。根据一项由 120 名选择堕胎的妇女组成的日本国内临床试验，93% 的妇女在摄入后 24 小时内成功终止了妊娠。虽然 59% 的人出现了腹痛或呕吐等症状，但这些症状都是轻微或中度的，出现异常出血、细菌感染等严重症状的有 4 例。

尽管这次批准意味着巨大的进展，但关于价格和有争议的同意规则的讨论仍在争论中。首先，Mefeegoo 不被包括在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范围内，而且女性被要求在医疗监督下服用这些药物，这些成本可能会使一些人无法获得它。另一个因素是日本的《母体保护法》，该法案要求女性需在伴侣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堕胎。卫生部表示，该法律同样适用于口服堕胎药，但未婚女性或因强奸而怀孕的女性不需要得到伴侣的同意。

#### 呼吁让女孩重返校园的活动人士在阿富汗被捕

尽管塔利班一再辩称未来会逐步恢复女性的受教育权利，但事实就是，自去年至今阿富汗女性仍无法前往学校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本月塔利班又有了新的行动——著名的教育活动家 Matiullah Wesa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捕，他是慈善组织 Pen Path

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十多年来，Pen Path 一直在为阿富汗失学儿童争取教育机会，并把重点放在阿富汗南部的农村地区。

据《卫报》的采访，Matiullah 当时正在清真寺祈祷，当他走出来时，两辆车里冲出持枪歹徒朝他跑去并逮捕他。Matiullah 于 2019 年创立了 Pen Path。起初，他们与宗教学者和部落长老合作，为所有儿童的教育建立社区支持，在没有政府教育的村庄建立学校。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并禁止女性学生上学后，他呼吁让女性重返校园，并在社交网络分享抗议的照片和视频。他在被捕前的最后一条推文中写道：“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来自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每个人都在要求让自己的女儿享有伊斯兰教的受教育权。”

联合国与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塔利班释放 Matiullah Wesa。但塔利班对此拒绝置评。信息和文化部发言人 Abdul Haq Hammad 声称，他不知道有这起案子。“他本可以离开阿富汗，但他不顾风险留下来为他的人民工作，为女孩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国际特赦组织成员 Samira Hamidi 说。

### [法国政府把退休年龄提高了两岁，抗议者走上街头](#)

“法国不等于马克龙”。在法国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委员会 (Constitutional Council) 批准了将最低退休年龄从 62 岁提高到 64 岁的计划后，大量抗议者们走上街头表达对总统马克龙及政府的不满。

从今年 9 月份开始，第一批退休人员要再等三个月才能拿到国家养老金。随着退休年龄的不断增加，到 2030 年，退休年龄将达到 64 岁。马克龙曾表示，为了在未来几年保持财政不出现赤字，改革是必要的。他将这项立法描述为一项不受欢迎但在财政上负责任的措施，目的是在预期寿命上升的情况下维持法国的养老金制度。CNN 的一篇报道提到，法国的国家养老金比其他国家慷慨。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8 年，该国的国家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近 14%，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

尽管政府方面表示这一裁决已经宣告事件尘埃落定。但公众的抵制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各地的交通陷入瘫痪，一些激进抗议者破坏了银行和公交车站。在巴黎，部分抗议者在玛黑区与警察对峙，周围是燃烧的垃圾箱，空气中弥漫着烟雾。法国主要工会之一法国总工会 (CGT) 的领导人呼吁在 5 月 1 日 举行“历史性”抗议活动，法国人民的生活不取决于九个人的意见，她说。

### [乌干达总统拒绝签署反 LGBTQ+ 法案，但不反对惩罚](#)

上个月，乌干达议会通过了一项全非洲最严厉的反同性恋立法。该法规定，所谓的严重同性恋者将被判处死刑，同性性行为将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本月，在将法案移交总统后，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 (Yoweri Museveni) 拒绝签署，并要求将该法案送回议会重新审议。

根据该国法律，穆塞韦尼有 30 天的时间，要么签署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要么将其送回议会进行修改，要么予以否决并通知议会议长。然而，如果总统将该法案两次提交议会，该法案就有可能在未经总统同意的情况下成为法律。

穆塞韦尼的这一举措引发了不同的反应，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将其完全搁置，但他们对穆塞韦尼的立场和评论仍然感到不安。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说，穆塞韦尼并不反对法案中提出的惩罚措施，但希望议员们研究“康复问题”。换句话说，他希望 LGBTQ+ 群体有机会可以“恢复正常”并过上“正常生活”。本周，一群来自非洲和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和学者正敦促穆塞韦尼否决该法案，穆塞韦尼曾呼吁对同性恋问题要有科学和医学的看法，科学家们表示“同性恋是人类性行为的正常和自然变化”。

### [澳大利亚篮球规定变性运动员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本月，澳大利亚篮球协会告诉变性运动员 Lexi Rodgers，她没有资格参加本赛季的精英级别篮球比赛。为了评估 Rodgers 的情况，澳大利亚篮球协会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在一份声明中他们表示，会“逐案”评估未来精英级别跨性别运动员的资格，考虑并平衡一系列因素——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因素。在回应篮球协会的决定时，Rodgers 表达了她对这一裁决及其传达的信息的失望。她在 Instagram 上写道：“我寻求的是与澳大利亚篮协不同的结果。”“我完全真诚地参与了这个过程。和很多人表达的观点一样，我坚信我在女篮中有一席之地。”

与之相对应的是，就在月初，跨性别高尔夫球手 Breanna Gill 赢得澳大利亚女子高尔夫锦标赛，这一结果引发了关于公平和保护女子体育完整性的激烈争论。据报道，

在她获胜后，Gill 的社交媒体账户上收到了大量的仇恨信息。因此，她删除了自己在 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的个人资料。

### [墨西哥城，三千移民向北走](#)

周日，大约 3000 名移民在墨西哥南部组成新的“大篷车”，他们要求关闭上个月发生火灾的拘留中心，当时的事故造成 40 名移民死亡。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他们从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的塔帕丘拉市出发，计划在大约 10 天内到达墨西哥城。

移民大篷车的现象始于 2018 年左右，是指从危地马拉 - 墨西哥边境前往美墨边界的移民大多乘坐大篷车出行，并试图寻找一条合法的路径进入美国。这一次，一些移民举着写有“政府犯罪”和“政府杀了他们”的横幅，他们要求政府对事故的凶手绳之以法，并停止藏匿高级官员。非营利组织“人民无国界”的负责人 Irineo Mujica 说，这是移民要求关闭拘留中心的一种抗议形式。

上个月的火灾发生在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 (El Paso) 接壤的华雷斯城 (Ciudad Juarez)，起因是一名移民据称放火焚烧泡沫床垫，以抗议所谓的转移。大火很快使整个空间充满了烟雾，但没有人对移民进行安全有效的疏散。墨西哥检察官说，他们将对该移民机构的最高国家官员 Francisco Garduño 提出指控。

### [开斋节之际，苏丹爆发军事冲突](#)

4 月 8 日，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境内爆发激烈战斗，首都喀土穆和邻近的恩图曼都变成了战场。该国军事政权的两大派系正在进行权力斗争：苏丹武装部队普遍效忠于该国事实上的统治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而民兵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 则追随前军阀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将军。这两股势力的领导人在 2019 年共同努力，推翻了统治该国三十年的苏丹独裁者奥马尔·巴希尔 (Omar al-Bashir)，从而掌权。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由于两名敌对指挥官领导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继续交战，苏丹危机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 420 人、受伤人数超过 3000 人。苏丹平民联盟和国际官员曾呼吁停火三天，以便人们在标志着斋月结束的开斋节聚集、疏散亲人，寻求食物和医疗服务，但两位将领显然无视了这一呼吁。

据《纽约时报》，首都喀土穆的街上发生了激烈的炮击和枪战，苏丹各地的许多人继续面临着绝望局面，他们正挣扎着逃离战区。国际救援委员会上周五还表示，自冲突开始以来已有多达 1.5 万人从苏丹越过边境进入邻国乍得。

### [一些韩国年轻人与世隔绝，政府愿意出钱让他们重返社会](#)

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研究所 (Korea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的数据称，在 19 岁至 39 岁的韩国人中，约有 3.1% 的人是“与世隔绝的孤独年轻人”，他们的定义是“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在正常生活中有明显的困难”。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这一群体在全韩约有 33.8 万人，其中 40% 在青春期开始陷入孤立状态。人们认为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经济困难、精神疾病、家庭问题或健康挑战。

韩国性别平等与家庭部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本周宣布，将向一部分与世隔绝的年轻人每月提供 65 万韩元(约合 3368 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心理情绪稳定以及健康成长”。这项每月津贴将发放给年龄在 9 岁至 24 岁之间的独居青少年，并且他们的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收入中位数——韩国对此的定义是一个四口之家每月约 540 万韩元。符合条件的青少年可以向当地的行政福利中心申请该项目，他们的监护人、辅导员或老师也可以代表他们申请。这是该国《青少年福利支持法案》的一部分，旨在支持极度远离社会的人，以及没有监护人或学校保护的有犯罪风险的青少年。未来，政府还将分发指导方针，以及与庇护所或康复中心等青少年福利机构更密切地合作。

### [荷兰希望减少大学校园里的国际学生](#)

荷兰政府正在研究如何限制荷兰校园内的国际学生数量，因为该国的大学已经没有空间了。

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长 Robert Dijkgraaf 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有可能控制学生的流动。”“如果不加限制，它会导致演讲厅过度拥挤，教师工作量大，住宿不足，并给教育的可及性带来压力。”

在 2021/22 学年,荷兰大学的入学人数增长了 4%,其中大部分增长归因于国际学生。那一学年,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23% (本科生占 29%)。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 (大约 75%) 来自欧盟,尤其是德国。但阿姆斯特丹住房短缺,许多国际学生找不到应急住房。现在,政府对教育机构控制国际学生人数的建议之一是鼓励他们学习荷兰语。部长还计划制定新的立法,将荷兰语纳入课程,该法案最早要到 2024 年 9 月才能生效。

#### [夜生活行业称,英国政府“故意关闭舞池”](#)

旨在重建、保护和发展夜间体验的活动组织夜间行业协会 (NTIA) 认为,英国政府在故意允许全国各地的俱乐部以惊人的速度关闭。他们在声明中表示,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将夜生活行业视为“警察和地方政府的负担”,自 2019 年以来,英国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导致每三天就有一家夜间俱乐部关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尤其在本月政府能源补贴计划结束后,能源价格的飙升将严重影响许多俱乐部的经营。而 NTIA 对英国政府的不作为感到愤怒,他们认为现任政府从未认识到夜间俱乐部的价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许多重要的场馆或将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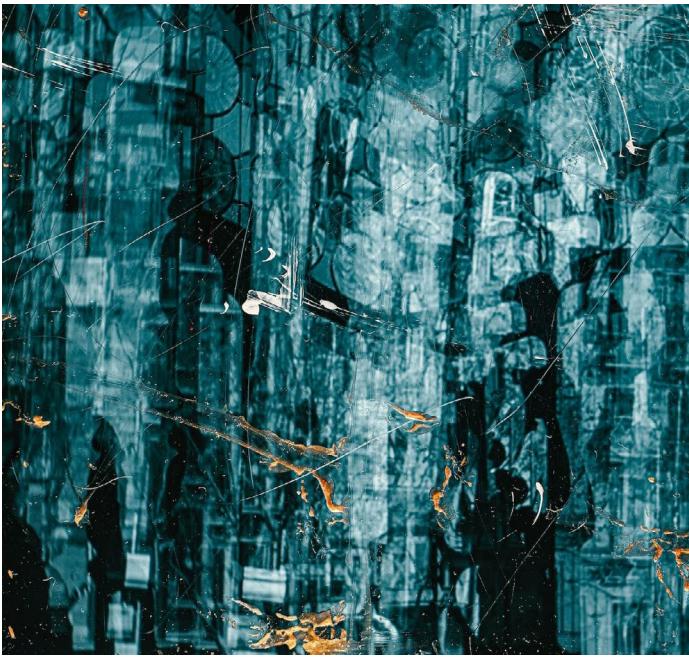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 [Newsletter](#)

来自科技于环境、边缘人群,以及其他我们认为重要议题的新闻汇总。



题图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他在 1968 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那年搬家去墨西哥，他说自己在 1973 年祖国智利的军事政变中身困囹圄——也为这类事物深深着迷。他全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就是艺术与罪恶、职业与犯罪，以及作者本人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实，波拉尼奥所有成熟的长篇小说都在仔细审视作家该如何应对专制政权。《遥远的星辰》(1996) 通过描写一位变成连环杀手的诗人，力图解读智利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历史。《荒野侦探》(1998) 褒扬一群年轻诗人，他们在墨西哥的“肮脏战争”岁月，与政府豢养的作家对垒。《护身符》(1999) 以一位中年诗人为中心展开，他因为躲在洗手间而在 1968 年政府对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武装入侵中幸存下来。《智利之夜》(2000) 描写一场文学沙龙，作家们在一座房子里开派对，而异议者也在同一个地方遭受折磨。波拉尼奥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身后发表的《2666》，也是来源于一条可怕的新闻：自 1993 年以来，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尤其是华雷斯城，有超过 430 名妇女和女孩被谋杀。

这些受害人在上学路上、下班途中，或是外出跟朋友一起跳舞时失踪。数日或数月后，她们的尸体出现了一被抛在水渠、沙漠或是城市垃圾场中。大多是被扼死的；有些是被用刀杀害，被烧死，或是被射杀的。三分之一显示出被强奸的迹象。有些还留有被虐待的痕迹。已知的最年长的受害者有三十多岁；最年幼的才不过上小学的年纪。自 2002 年开始，这一连串谋杀案成为一部好莱坞电影《边城小镇》（詹妮弗·洛佩兹主演）、几部非虚构著作、多部纪录片，以及在墨西哥和海外大量涌现的游行示威的议题。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有超过一半所谓的“杀害女性”行为并未被定罪。

早在这些谋杀成为公众事件以前很久，波拉尼奥就密切关注着这一类残忍事件。1995 年，波拉尼奥从西班牙给他在墨西哥城的老朋友、视觉艺术家卡拉·里庇（在《荒野侦探》里，她被刻画为“漂亮的加州奥哈拉”）写了一封信，提到他几年来都在创作一部名为《那位真警官的麻烦事》的长篇小说。尽管他给出版商交付了其他手稿，但波拉尼奥在这部书上，留下了“是我的小说”的标记。小说设定在墨西哥北部的小镇圣特莱莎，围绕一位有着十四岁女儿的文学教授展开。那份手稿已经超过“80 万页”，他吹嘘说，这是“一个必然无人能够理解的狂乱谜团”。

那时看来，情况的确如此。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波拉尼奥四十三岁，正处在人生中极其潦倒的时期。尽管已出版了两部诗集，合作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还花五年时间参加西班牙各地的短篇小说比赛，但他仍穷得买不起一条电话线，作品也几乎籍籍有名。三年前，他和妻子离了婚；同一时间，他被诊断出患有肝病，正是这病，将在八年后夺去他的生命。虽然波拉尼奥在参加的许多短篇小说比赛中都胜出了，但他的长篇小说还是如以往那样被出版商拒之门外。尽管如此，迟至 1995 年，他即将迎来一场惊人的崛起。

转折点是一场与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创始人暨社长豪尔赫·埃尔拉尔德的会面。虽然埃尔拉尔德没能买下《美洲纳粹文学》——这部小说被巴拉尔出版社抢走了——但他邀请波拉尼奥去巴塞罗那见他。在那里，波拉尼奥向他诉说了自己困难的经济状况，以及因遭到多次退稿而感受到的绝望（我跟他说……我想读读他的其他稿子）那之后不久，他带给我《遥远的星辰》（我随后发现这部小说也被其他出版社，包括巴拉尔出版社拒绝过）。”这位编辑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尽管如此，埃尔拉尔德发觉那本书非同寻常。自此之后，他出版了波拉尼奥的全部小说——七年内出了九部。

那时候，每部小说都比前一部收获更多的读者，波拉尼奥继续为他的“狂乱谜团”长期劳作。这部作品涉及写作，当然，还有调查。将小说设定在索诺拉州一个虚构的小镇圣特莱莎，而非华雷斯城，波拉尼奥由此模糊了他所知的和他想象的事物之间的界限。但他十分留心去理解华雷斯城和当地居民面对的环境。波拉尼奥对该地区荒凉、枯索的地貌非常熟悉——20 世纪 70 年代他曾在墨西哥北部旅行——但“杀害女性”直到他离开该地前往欧洲的 16 年后才开始发生，而他也从未去过华雷斯城。因为不认识那座城市的任何一个人，他只能从报纸和网络上获取信息。从这些信息源里，他了解到华雷斯城已成为犯罪天堂。

作为美国人在禁酒时代的买酒处，华雷斯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实施之后迅速发展。数以百计的装配工厂接连涌现，吸引了几十万贫困人口从墨西哥各地前来求职，这些工作常常按低至每小时 50 美分计酬。让华雷斯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工厂老板眼里显得吸引人的那些特点——公路发达、邻近巨大的消费市场、大量无组织的劳动力——也同样使得它成为毒贩们的理想巢穴。截至 1996 年，每年有 4200 万人口和 1700 万辆车辆通过这座城市，这使得该市成为美墨边境线上最繁忙的中转地和最热门的非法越境点之一。这座小城演变成了廉价和非法生意

## 档案

# 孤身在众幽灵间

马塞拉·巴尔德斯 | 发现经典

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  
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

罗贝托·波拉尼奥 1953 年 4 月 28 日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 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 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 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波拉尼奥近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 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

今年是波拉尼奥诞辰 70 周年。经中信大方授权，小鸟文学摘选了《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一书的导读，以表纪念。

## 关于作家

在 2003 年 7 月因肝脏衰竭去世前不久，罗贝托·波拉尼奥曾说，比起作家，他更喜欢做一名侦探。波拉尼奥那时五十岁，被普遍认为是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小说家。但当莫妮卡·玛丽斯坦代表《花花公子》（墨西哥版）采访他的时候，波拉尼奥对这件事却毫不含糊。“我本想成为一名凶杀案侦探，而不是作家。”他告诉该杂志，“我对此非常确定。一连串的杀人案。我是那种可以在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

侦探故事和具有争议性的言谈，是波拉尼奥所热衷的——他曾宣称詹姆斯·埃尔罗伊是在世最好的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但相比情节和文体这类事物，他对侦探故事有更大的兴趣。究其本质，侦探故事是对暴力的动机及机制的调查，而波拉尼奥——

的十字路口；贫穷、辛劳的女人们开始接连死去。

华雷斯城和它的虚构对应地，与波拉尼奥大多数小说中的背景地毫无相似之处；甚至《遥远的星辰》也发生在智利南部那座最重要的大学城。在圣特莱莎的棚户区里没有写作工作坊，也没有拉帮结派的反抗派诗人。和波拉尼奥的其他所有小说一样，《2666》中全是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这些角色来自其他各处：欧洲、南美洲、美国和墨西哥城。深陷墨西哥北部的这片蛮荒之地，也即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中的欢乐杀手队伍横冲直撞的地方，圣特莱莎在文学和文化意义上都是枯索的。

犹如红字，这片工业发达的荒漠和波拉尼奥之前的长篇小说的背景设定之间的联系，在于书的封面。那魔鬼式的年份 2666——在《2666》的书页间从未出现——送我们踏上对《护身符》的寻宝游戏，在一个名叫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的女人的白日梦魔中。那部小说的开头部分，当被噩梦魔住的奥克西里奥凝视着一支花瓶，看到“人们遗失的一切，引发疼痛而最好忘却的一切”，这就是她所看到的景象。

我是那种可以在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

随后，当她走过墨西哥城的街道，她陷入另一场邪恶的幻象。此时正是午夜。她经过的街道空荡荡的，风不时吹过。那时，奥克西里奥说改革大道“变成了一条透明管道，一个楔形的

肺，你从中感受到城市想象中的呼吸”，而格雷罗大道“看起来无异于一座坟场……一座来自公元 2666 年的坟场，一座被遗忘在死去或未出生的眼睑之下的坟场，沐浴在一只想要忘记某事而终于忘记一切的眼睛那不带感情的泪液中”。

和波拉尼奥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2666》也是一座坟场。在 1998 年发表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受奖演说中，波拉尼奥透露，他写的一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封爱或告别的信笺”，献给死在拉丁美洲“肮脏战争”中的年轻人。他的前一部作品纪念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逝者。他写《2666》的野心更为宏大：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逝者，撰写一部验尸报告。

## 关于罪行

为完成《2666》，波拉尼奥拒绝了一次肝脏移植的机会。但病情加速恶化，在完成全书之前，他就去世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和文学遗产执行人，西班牙书评人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在波拉尼奥的办公室梳理手稿，汇编的这部作品由阿纳格拉玛出版社于 2004 年出版。娜塔莎·温默，《荒野侦探》的天才译者，将这部作品译成了英文。

波拉尼奥在手稿上细致地做了标记。他之前或许有点鲁莽，但绝非愚蠢，他知道自己的大限不远了。然而阿纳格拉玛出版社有一点违背了他的意愿。多年来，波拉尼奥口中的《2666》都是一本单册书，他吹嘘说这本书将是“世界上最厚的小说”；然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他决定把这部小说切分为五个部分，并分开出版。这意愿背后的缘由很实际。波拉尼奥身后会留下两个小孩，他将《2666》献给他们，也想在去世后以此抚养他们长大。他算过，五部篇幅短的长篇小说比一部让人累断腰的大厚书能赚更多钱。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和阿纳格拉玛出版社遵照了他的构想，帮他圆了心愿。埃切维里亚在后记里写道：“虽然组成《2666》的五个部分可以分开阅读，但他们不仅共用了许多元素（一张主题循环出现的奇妙网络），还明确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构思。”与此同时，在美国，这部书的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吉鲁为防万一而两手准备：同时推出一部重达 1.24 千克的精装版和一部三卷装的函套平装版。

不管怎样，《2666》都不适合胆小的人。这部书有将近 900 页篇幅，要追踪书里描写的地点，需要有一幅飞机航线图那样的东西，红点标记的着陆地点覆盖阿根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普鲁士、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和美国。就好像这趟环球旅行还不够似的，小说还包含了几十个角色，历史跨度接近一整个世纪。

波拉尼奥曾写道，在美洲，所有现代小说都萌生于两个源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白鲸》。《荒野侦探》有着一群狂欢宴饮的角色，波拉尼奥在这部小说里讲述友谊和冒险。《2666》则追随着那只白鲸。对波拉尼奥而言，梅尔维尔的小说掌握着书写“邪恶土地”的关键；和梅尔维尔的史诗巨作一样，《2666》可能是精妙的，也可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这取决于你是否喜好渐入佳境。这部小说我读了三遍，我觉得它厚重、绝妙，令人心有余悸，时而也感觉到机智和趣味。

第一页就立即将我们带入四位欧洲学者的生活，他们热爱一位叫作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隐世德国作家的作品，其热爱的程度就和他们乐于引诱彼此上床一般。波拉尼奥在《2666》的前两个部分——“文学评论家”和“阿马尔菲塔诺”——中书写犯罪的方法含糊而隐晦。派翠西亚·康薇尔或斯蒂芬·金的瞬时血案可不是他的风格。首先，对犯罪行为的粗略提及要到书的第 43 页才出现，而去过圣特莱莎的三位教授中，只有两位听说过凶杀案。他们是来墨西哥的游客，尽管他们也尝试了色情观光业，但他们的富裕和冷漠也将自己同那座城市的现实隔绝开来。

“阿马尔菲塔诺”这部分——明显源自波拉尼奥在 1995 年给里庇讲过的那本书——更贴近当地人，但仍与凶杀案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一场聪明的罗曼史，那第二部分就是一出存在主义戏剧。一位智利哲学教授离开欧洲前往圣特莱莎大学，在宁静的绝望中陷入颓败。他害怕自己变成疯子——夜里有个声音跟他讲话。他害怕这座城市的暴力会蔓延，伤及他的女儿——一辆黑色轿车每天都出现在他家屋子外面。

细心的读者会察觉到一些山雨欲来的迹象，比如贯穿前两个部分的许多红色指印，但圣特莱莎的暴力直到第三部分“法特”，才蜂拥进入故事主干。一位天真的美国记者正站在酒吧里，看到一个男人走过酒吧，用拳猛击一个女人：“第一拳让那个女人的头猛烈地发出咔擦声，第二拳将她击倒。”那位记者是开车来墨西哥看另一种拳击的——一场美国拳手和墨西哥对手之间的比拼——但他很快就明白，圣特莱莎真正的拳击发生在赛场之外。跟这城市的一些更下流的元素逐渐接近之后，他得以看到一个女人被强奸的视频之类的东西。他遇见了这城市凶案的主要嫌疑人，因为忌惮警察，他最终迅速逃离了这城市。

这出黑色闹剧只是一曲哀歌的前奏。“罪行”这一部分，开始于 1993 年 1 月，描写一个十三岁女孩的尸体；结束于 1997 年圣诞节，彼时尸体已达 108 具。每一条取证发现都有详细的临床说明——多达 284 页，这部分在书中占据最长的篇幅——而结案记录由四位侦探、一位记者、凶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和各种辅助角色编织而成。在波拉尼奥笔下，这种拼贴艺术产生出一种绝妙的赋格曲似的序列和足以定罪的重复。（“案子很快就要结了”成了重复出现、萦绕不散的一句话。）凭借绞刑架上的幽默和偶尔出现的温柔陪衬情节的闪光，波拉尼奥使得这残忍的故事情节显得不那么沉重。然而，总体而言，阅读“罪行”部分就像凝视深渊。扼死、射杀、用刀刺杀、烧死、强奸、鞭笞、殴打、受虐和变节，事无巨细记录在冷静的行文中。“11 月中旬”，一个典型的段落这样写道：

“安特莱奥巴切克马尔蒂内斯，十三岁，放学时被绑架。她的学校是第十六中等技校。……两天后，有人找到了她的尸体，种种迹象表明死于扼杀，因为舌骨断裂。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手腕上有典型的捆绑留下的肿胀。双膝有伤，据此推断，双脚也遭捆绑。一个萨尔瓦多移民在弗朗西斯科一世学校后面发现了她的尸体，地点在马德罗，柏杨区附近。她穿戴整齐，除去衬衫上少了几个纽扣，没有别的撕扯痕迹。”

读过波拉尼奥其他小说的读者会辨别出这个段落那冷静的超然。但细节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在波拉尼奥的任何前作——或他可能读到的任何新闻报道中都未曾得见。他对凶案调查和审判主嫌的现场事件的描写，同样精准又离奇。

波拉尼奥远隔重洋，是怎样对这些罪案和当地警方的办案程序如此熟悉的？他的其他侦探小说都写于真实历史上的鲜血干涸之后；即便那时，波拉尼奥也总会获取相关事件的第一手讯息，或是去问朋友。然而在他撰写“罪行”部分的时候，有关华雷斯城的凶杀案的信息被严格封锁。为努力达到这种高度写实主义，他必须得到一些内部人员，比如某个跟他一样对尸体解剖有着不懈热情的人的帮助。

## 关于那位记者

1995 年夏天，波拉尼奥写信给卡拉·里庇的同一年，几个被扼死的年轻女性的赤裸尸体在华雷斯城南部的机场附近被发现。当年 9 月，该市悬赏 1000 美元征集这个冷血杀手的相关信息。一个月后，警局逮捕了阿卜杜勒·拉提夫·谢里夫·谢里夫，一位有性侵史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以 5 项谋杀和 9 月犯下的其他罪名一同起诉。但两个月后，当谢里夫·谢里夫还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时候，新的尸体开始出现。警方坚持认为是谢里夫·谢里夫，这位化学家在牢房里遥控了这些谋杀，每杀死一个妇女他就付

1200 美元。他们说，他的帮凶是在一次夜店扫荡中逮捕的八名十几岁的男孩。他们被称为“反叛者”。

在波拉尼奥笔下，这种拼贴艺术产生出一种绝妙的赋格曲似的序列和足以定罪的重复。

在将近 1000 英里以外的墨西哥城，这个消息深深吸引了一位名叫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记者的关注。身为小说家和记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评论卡洛斯·蒙西瓦伊斯——这位重要的文化批评家和墨西哥新闻主义的先锋人物——而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到《改革报》1993 年开始呼吁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身为一位不怕激怒政府的中间派批评家已颇有名气：因为在《改革报》发文质疑那些投身当时在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尔塔里——他在 1988 年遭到选举舞弊指控的情况下当选——阵营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他被《内索斯》杂志辞退。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客观公正的禀性使得他跟《改革报》颇为投契——这家报纸有着严肃调查报道的历史传统——他受雇编辑这家报纸的其中一份周末文化副刊《天使》。(如今，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仍担任该版块的编辑顾问，并给该报撰写三个固定专栏。)

华雷斯城的新闻让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想起了他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沉默的羔羊》。他怀疑，华雷斯城会否遇上了一个汉尼拔·莱克特？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当他在一系列访谈里向我解释的时候，他总是对描写暴力的文学作品显露兴趣。他最喜爱的书有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政治与犯罪》。他已订下旅居奇瓦瓦州指导一个研讨班的计划。说服《改革报》为他支付去华雷斯城的短途机票并不费力，这样他就得以参与报道 1996 年 4 月 19 日那场关于主要嫌犯被捕入狱的新闻发布会。

那天，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看到一个高个子、绿眼睛的中年男子，正朝着 30 来个记者讲话。谢里夫·谢里夫讲不了几句西班牙语——他在墨西哥还没住满一年——所以他用英语发表讲话，一位通晓双语的记者在旁翻译。他说的听起来像一出肥皂剧。据谢里夫·谢里夫说，“杀害女性”行动是一对富有的墨西哥表兄弟做下的，一个住在华雷斯，另一个就住在边境线之隔的埃尔帕索。他讲了发生在其中一位表兄弟和华雷斯城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记者团队被惹恼了——他们交换眼神，起哄调笑。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自己仍心存莫大的疑惑，但他的批评者人格被谢里夫·谢里夫的作派深深吸引。没有捶着胸口自证清白，这位嫌疑人反倒冷静地讲述了这个长达 93 分钟的故事。他似乎相信如果他能给凶案提出一个另类的解释，他背负的指控就会被撤销。

在发布会快结束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向一位当地记者做了自我介绍。在监狱附近的公园里，两人谈起了这场奇怪的发布会。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走过来。

你们是记者吗？那位母亲问道。

是的，他们回答说。

那么，我们想跟你们说一些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她身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穿着 T 恤、牛仔裤和运动鞋。她告诉记者们，华雷斯的警察局长强迫她起诉“反叛者”。那位局长，她说，揪着她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直到她答应会一字不差说出他教她说的才停手。

对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来说，视角突然转变。陈旧的事实（夜店大扫荡，对谢里夫·谢里夫指控升级）在一道崭新的光亮中闪烁起来：警方曾殴打过目击证人。“这，”他想道，“是一股暗流。”随后，他了解到谢里夫·谢里夫在监狱里的第四天，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宣布 8 个起诉“反叛者”的目击证人中，有 6 个遭到华雷斯警局非法扣押。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坐航班返回墨西哥城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他的调查结果和目击证人们遭受的令人生疑的对待。不久之后，《改革报》邀请他加入一个关于华雷斯城现状的特别调查项目。项目负责人罗萨娜·富恩特斯·贝兰秘密派遣一位记者进入许多凶案受害者工作的工厂区；她派其他几位记者去追踪警方独立调查的详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分派到的任务是研究犯罪模式和动机的概貌。虽然贝兰像对待其他记者一样管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有时要求他为足以定罪的结果印证消息源或提供额外证据——但她也留给他相当自由的解释空间。

三年来，他往返于华雷斯和墨西哥城之间，尽力同时应付书评影评和罪案调查。直到 1999 年夏天，他的报道开始表明华雷斯城的警察、政府官员和贩毒分子沆瀣一气，与“杀害女性”难脱干系。那一年早些时候，一场针对谢里夫·谢里夫的律师之子的袭

击加剧了这个怀疑。如果司法体系运转良好，为何还有人会攻击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琢磨道。随后，6 月 12 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和《埃尔帕索时报》的一位记者一起采访了一位囚犯，该囚犯表明当地警方和一位显赫的参议员是“杀害女性”的始作俑者。

在他的著作《荒漠白骨》中，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描述了三天后他在墨西哥城被两个人绑架和袭击的情况。深夜，他在孔迪萨的时髦街区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家。出租车开了一会儿之后停下。两个拿着武器的男人跳上车来。他们命令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闭上眼睛，坐在后排他们两人之间。出租车驶离了——司机和他们串通一气。尽管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没有反抗绑架者，有个男人仍咒骂他，用拳打他，用枪砸他，用冰锥刺穿他的大腿。他们要在首都南边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杀了他，他们说。那辆出租车再次停下来。其中一个男人下了车，另一个他们称为“老板”的人还坐着。关于强暴和死亡的殴打与威胁再度上演。一辆巡逻车开着警灯驶过附近。那男人把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丢到了街上。他提交了一份警方报告，而后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开了止痛药，让他卧床休息。6 月 18 日，他的报道文章《有消息称警方是（华雷斯案的）帮凶》出现在《改革报》上。

之后的两个月里，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像一具僵尸一样生活，写评论，编辑报纸，和朋友一起外出，尽管他视力还有点模糊，说话还有点含混，记忆也还有点破碎。最后，8 月 11 日，他那时在自己家里都没法动手冲一杯咖啡，两个《改革报》的朋友带着他赶往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一场手术，以移除压迫他大脑的一处足以致命的血肿。

出乎意料地，他完全康复了，但遭受的这场袭击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遇袭之前，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就为自己家和手机而感到困扰——奇怪的噪音、服务盲区。那之后，他常常被跟踪。他的朋友保拉·蒂诺科回忆说，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手术后的几个月里，无论他俩何时在餐馆吃饭，都有戴耳机的人在旁边盯着他们。恐惧又无助，两个人依靠幽默来逃避，每次陌生人在场，他们都相互向对方讲述离奇的故事。比如，有天晚上，他们背起了一首广受喜爱的儿童歌曲《小鸭子》的歌词：

达姬跑跑跳跳，在她的钱包里  
寻找  
几分钱来给她的小鸭子买吃的  
因为她知道当她回家  
所有小鸭子都会跑过来问  
带什么给我了，妈妈，嘎嘎?  
带什么给我了，嘎嘎?

当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 1995 年为一个好莱坞式的连环杀手飞去华雷斯城的时候，他回忆说，“我那时不知道自己将要卷入什么事。”并非汉尼拔·莱克特，他发现的是一个只因华雷斯城最恶劣的犯罪者们粗野且富有就包庇他们逃避惩罚的体制。这个体制牵涉该市、该州，乃至整个国家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他一旦得出这些结论，就再也没有退路了。“你置身地狱，”他说，“你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被选中，从而活了下来。”这地狱之火烧尽了他的许多关于责任和正义的陈旧错觉，让墨西哥的黑暗之心袒露出来。

你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被选中，从而活了下来。

当权者，他相信，在试图刻意粉饰和遮掩华雷斯城的现状，他们声称死亡人数被夸大了，或者说凶案都是激情犯罪，要么就说受害者是妓女。他想给他的调查结果留下一个长久的记录，一个不会在一周之后就被抹去的记录，以反驳这些谎言。

## 关于往来书信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第一次遇袭的那年，波拉尼奥在他的“狂乱谜团”上已花费超过五年工夫。为搜寻有关华雷斯城的信息，波拉尼奥给他在墨西哥的朋友们发电子邮件，提出越来越多关于凶杀案的详细问题。最终，厌倦了这种可怕的追问，他的朋友们让他直接联系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他们说，墨西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那些罪行了。波拉尼奥第一次给他发电子邮件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正决定要写他那本关

于罪案调查的非虚构作品。

回顾过去,很奇怪这两人没有在更早的时候通信。他们大致是同一代人: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生于1950年,波拉尼奥1953年出生。两人都是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城反主流文化的参与者:波拉尼奥和现实以下主义诗人们在城里闲荡,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是一个叫作“神秘派”的重金属乐队的贝斯手。两人都很晚才开始写小说,并以自己文学意见的诚实而自豪。他们有几位共同的朋友:豪尔赫·埃尔阿尔德,还有批评家和小说家胡安·比略罗。两人都在中年时深深着迷于华雷斯城的情况。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立马就看出波拉尼奥对这些罪案的兴趣并非心血来潮。“这不是一份临时工作,对于许多小说家都是这样,”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这是一种贯穿一生的激情。他会跟我说,你觉得这些和这些文字怎么样?他读了所有材料。”

波拉尼奥需要的,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解释说,是有关凶案和警方调查详情方面的帮助,因为媒体对案情的记述太过粗略。他想知道华雷斯城的毒贩们如何贩毒,他们开什么车,他们携带的是什么武器。“他要的是精确。”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举个例子,比如武器,波拉尼奥想知道的不只是牌子,还有型号和口径。

他还对奇瓦瓦州警方的心态感兴趣,希望联系起来以理解他们正常行为和不端行为的细节。他想原原本本知道谋杀案是怎样被记录在案的。他想要一份尸检报告的复印件;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在他从一位辩护律师那里得到的文件堆里发现了一份。应波拉尼奥的需求,他抄录了描述受害人伤口的部分。“他想知道验尸报告的语言风格。”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回忆说。这正是出现在“罪行”部分的那种语言风格。

“我想象,基于他可能问我的问题,他想要的是对比笔记,”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我会说那位荒野侦探想要另一位荒野侦探,就是我,来得出类似的结论。”然而身为作家总会知道,共享结论往往会引发改变。与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对比过笔记后,波拉尼奥可能改变了几条他久已有之的信念。例如,两位侦探探讨过FBI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K·雷尔斯勒,由于墨西哥国会和美国司法部长之间的协议,他作为凶案顾问,1998年来过华雷斯城。波拉尼奥已经读过雷尔斯勒有名的著作——这其中的《性凶杀案与犯罪分类手册》——雷尔斯勒并没有在他查案过程中解决问题,他为此惊讶。

为何雷尔斯勒没法抓住凶手?他疑惑道。

这趟查案只是面子功夫,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记得自己这样跟他说。他解释说雷尔斯勒来华雷斯城的时候毫无准备。他没有带自己的翻译。付他钱的是跟他的调查结果有所牵连的当权者。他获派的一名保镖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信息,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回忆道,无疑给波拉尼奥浇了一盆冷水。

“他愿意相信有某个国家力量可以制服罪犯。”他观察说。实际上,这种大获全胜的推论在波拉尼奥的所有小说中都可以见到——除了《2666》。在《遥远的星辰》中,在一位聪明的诗人的帮助下,连环杀手被侦探阿贝尔·罗梅罗逮捕。在《智利之夜》中,知识界的罪行被一位无名的年轻侦探曝光。在《荒野侦探》中,另一位无名的审问者追踪到阿图罗·比拉诺和尤利西斯·利马的历史,同时这两位年轻的诗人也成功找到神秘作家塞萨利亚·迪纳耶洛的位置——在圣特莱莎附近的一个镇子上。

唯有在《2666》里,罪犯成功脱逃,设下圈套,杀死或痛殴他们遇见的每一个好事者。别有含义的是,在《2666》的最后一个版本中,以雷尔斯勒为原型的角色——一位尽管笨拙但也狡猾的侦探——第一次登场的时候,仅仅几页之后就推翻了调查结果。

更为根本的是,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告诉波拉尼奥他的调查结果表明华雷斯凶杀案跟当地警方、政客,以及贩毒集团扶持的雇佣黑帮之间有所联系。警方不会认真调查案件,他解释说,因为他们接受的培训很差劲,或者他们都是厌女者,再或者他们接受了交易,允许毒贩招摇过市。

所以,并不存在连环杀手?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记得波拉尼奥这样问他。

不,当然有连环杀手,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回答道。但并非只有一个,我认为至少有两个连环杀手。

这个发现,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让波拉尼奥陷入困惑。到那时,这位作家已给他的长篇小说想出一个详尽、巧妙的结构,这个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建基于只有一位连环杀手的构思。现实中谢里夫·谢里夫的无罪与否无关紧要,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问题在于如何把关于罪案的最新信息安插到《2666》里。

波拉尼奥的办法,我想,是大段吸纳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关于华雷斯城的结论,然后将这些结论以他自己的方式戏剧化地呈现出来。“罪行”部分的故事和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著作《荒野白骨》(暂无英文版)中的结论之间的相似性令人吃惊。然而,“没有任何一处是原样照搬的。”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指出。名字全部改换,国籍全部

变更,角色凭空创造,全部情节都借助想象力、风格和印象加以渲染。波拉尼奥或许用到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教给他的一切——他在《荒野白骨》出版前数月读了它的手稿——但他进行了全面再创作,以配合他自己的大结局。

## 关于那只山羊

两人通信的几年后,两位荒野侦探在2002年11月见了最后一面,那时,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赴巴塞罗那参加《荒野白骨》的官方发布会。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因为这部书深有名望的纪实报道烙印而买下它,并将之与君特·瓦尔拉夫、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迈克尔·赫尔的作品等量齐观。超过100人出席了首发仪式。数月后,墨西哥领事馆拒绝派代表参加一出从《荒野白骨》获得灵感的戏剧表演,该领事馆声明官方“不支持抹黑墨西哥的作品”。

《荒野白骨》选在西班牙发布,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保护作者。书印出来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揭发的许多政府和警方官员还正当权,该书对华雷斯城系统性腐败的描述惹怒了那些想把墨西哥描绘成一个文明国家的人。但欧洲对该书的媒体报道为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提供了免遭报复行动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报道,就不可能出现《荒野白骨》在墨西哥发布后,作者却悄无声息消失的情况。

他愿意相信有某个国家力量可以制服罪犯。

波拉尼奥没有出席发布会,但第二天早早地,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就和一个朋友向北前往海边小镇布拉内斯去见他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他们迟到了几个小时。因为前一天晚上庆功晚宴的苦艾酒引发的宿醉,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和他的朋友搭错了火车。波拉尼奥原谅了他们的迟到,开了一瓶酒,端上火腿三明治。知道波拉尼奥的病让他没法再沾酒,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给他带了一斤咖啡豆,来自墨西哥城的哈瓦那咖啡馆,波拉尼奥在《荒野侦探》中使之永垂不朽。波拉尼奥的肝脏情况很糟,糟到连咖啡都没法喝,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记得,波拉尼奥打开咖啡袋,把鼻子埋在了里面。

接下来的几小时,他们谈论华雷斯城的凶杀案。这一回,他们不再关注嗡鸣的电话或扰人的电子邮件,波拉尼奥得以问出他想知道的所有问题。

听着,波拉尼奥开玩笑说,我要给你在小说里安排个角色。我要照抄哈维尔·马里亚斯的主意,他在小说《时间的黑色背面》里也把你写成了一个角色。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觉得自己的胃下沉了。真的吗,罗贝托?他说,用我的名字?

嗯,你放心,波拉尼奥说。他的女儿,亚历杭德拉,正和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朋友玩耍。波拉尼奥看起来很开心。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不知说什么好。

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巴塞罗那碰面,一起吃寿司。这次他们没谈华雷斯,而是聊起了文学。波拉尼奥问墨西哥的作家们是不是都还留着胡子,抑或是都已剃掉了。有一刻,他宣称是他和马里奥·圣地亚哥一起正式破坏了1992年在巴黎的现实以下主义运动。他疯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思忖道。他认为真正重要的现实以下主义分子只有他和圣地亚哥。

这次会面之后不久,波拉尼奥发表了名为“飓风里的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文章,表明他对这位记者的尊敬和爱慕之情,也对他的新书大加褒扬。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对我小说写作技术上的帮助”,他写道,“是至关重要的。”《荒野白骨》“不仅是一张有缺陷的照片——它还能是其他什么?——呈现罪恶和腐败;它也让自身成为墨西哥和它的过往,以及拉丁美洲尚不明确的未来的隐喻。”

7个月后,即2003年7月1日,波拉尼奥入住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两周后逝世。

当《2666》于2004年在墨西哥出版时,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几乎没法让自己去读这本书。“读关于死去的女人们的那部分,花了我几个月时间,”他说,“太恐怖了。在生活中经历它是一回事,但看到波拉尼奥这样的文学大师讲述它,可不是开玩笑的。罗贝托疯得过一头山羊,你明白吗?你难以置信,因为某种程度上你就在现场。”

作为一名记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养成了一种临界距离,这使他得以忽视自己随时会遭到二次袭击的局面。在《2666》里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角色被束缚在一个充斥着杀人凶手和障眼物的世界,这粉碎了他自认为安全的错觉。在某一段里,波拉尼奥甚至描写了与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1999年遭到的袭击极为相似的一场绑架,只有结局有变——以死亡收场。尚不清楚这个死去的记者是否就是那个名为塞尔希奥·冈

萨雷斯”的角色。

除了这些尖锐的心理游戏，任何一位写过贩毒集团或政治腐败的墨西哥记者，在2004年都曾觉得自己很可能遭到袭击。那一年，墨西哥有五个调查记者被杀死或失踪。其中一位当着自己两个孩子的面遭枪击而亡。根据2007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出具的一份报告，墨西哥已成为世界上对记者而言第二危险的国家，第一名是伊拉克。亚利杭德罗·洪科·德·拉·维加，改革集团的董事长，2008年10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告诉听众说，他的三家报纸不再署名发表文章，以保护他们的记者。“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大毒枭和犯罪分子的围攻之下，”他解释说，“我们越多地曝光他们的活动，他们就越狠地报复我们。”洪科自己也把全家迁到了“美国的一处安全居所”。

因此，《2666》出版的同一年，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决定不再去华雷斯城，这或许是个巧合。他听说在奇瓦瓦州，有人出钱悬赏他的人头。官员们宣称已起诉他诽谤，他踏上该州的那一刻，也即冒着入狱的风险。鉴于这些阴谋诡计，他的律师建议他在任何情况都不要再踏入奇瓦瓦州。（直到2007年4月，菲利佩·卡尔德隆总统才签署了一纸联邦法令，不再给名誉损毁和侮辱定罪，并迫使州政府也照此办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最后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没人愿意谈论眼下的情况。华雷斯城变成了一座闭门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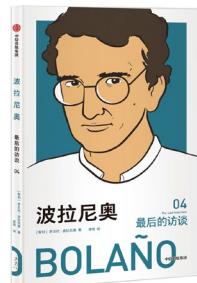
《荒野白骨》和《2666》都不是容易读的书。我读他们的时候，噩梦萦绕不散。两本书的书页就像新挖出来的墓穴，但笼罩二者的邪恶哲学有所区别。在《荒野白骨》中，华雷斯城是疯狂腐败的受害者。当警察和法庭视而不见，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认为，残暴的行为成了平常之事。强奸和谋杀女性，暗杀记者，为赎金而绑架人：这些罪行在墨西哥可没有一样是偶然事件。“一个恶人，比如一个连环杀手，能够引爆一种扫荡效应。”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引爆一种灭绝机制，不输于任何一个极权主义独裁政权所有的。这种“野蛮的常态化”，他论证说，是今日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在《2666》的最后一部分“阿琴波尔迪”中，波拉尼奥呈现了一个更加凶险的罪恶景象。这部分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末，一位负伤的普鲁士人回到家乡。一切都变了，一位陌生人告诉他：“战争即将结束，新的时代就要开启。（那位普鲁士人）回应道，他吃东西的时候，一切丝毫未改。”实际上，《2666》的整个终章，时间跨度从一战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如此设定看起来都是为了证明阿琴波尔迪的观念——他认为历史无他，就是一系列“奇形怪状的彼此激烈象征”的时刻。在阿琴波尔迪在东线为第三帝国战斗，并在柏林的废墟中开启他的小说家生涯的时候，波拉尼奥告诉了我们强奸和凶杀故事之后的故事。在德国的山峦中，一个人杀了妻子，政府当局选择无视。战争期间，逃到乡下的城市居民遭到沿路打劫、强奸和谋杀。罗马尼亚一座城堡周围的土地，埋葬了累累尸骨，纳粹大屠杀的暗示处处可见。

在这残暴和罪恶不彰的景况下，圣特莱莎似乎也难脱常轨。它只是众多地方中的一个，隐藏其下、充斥各处的罪行上涌并冲破表面。圣特莱莎现在的情况是，小说似乎想讲，就跟它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也就跟它在《2666》的终章所显示的未来一样。罪恶如大海，广袤远播，永无休止。

这个关于暴力的景象，让人想起美国自己的书写末世的作家，科马克·麦卡锡，但波拉尼奥的小说有更多的性爱和喜剧段落，他的主角也跟《长路》或《血色子午线》的主角颇为不同。阿琴波尔迪行军经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战场，就像一个沿着海底一路搜寻的人，沉浸在深处暗色的恐怖中，但并未受其波及。少年时代，他读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帕西法尔》，被一位“外行且独立的”中世纪骑士的观念所强烈感染。他自己的圣杯原来是他在一个废弃的犹太村落里发现的一位逝者的日记。

一位外行且独立的骑士：这个说辞可用来描述在《2666》书页间漫游的那几位伟大的侦探和伟大的作家。他们都是献身于阅读和泅泳于深渊的独行者。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



本文摘自《波拉尼奥》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普照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年7月



马塞拉·巴尔德斯

《纽约时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她擅长撰写有关拉丁裔和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的文章。

####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为电视剧《重启人生》(2023)剧照

## 专栏

# 我无法再欣赏任何一条口号式的女性向广告

刘天 | 斯嘉蒂的眼睛

去问“为什么你不拿掉枷锁”太轻而易举，  
显得多少有点蠢，对吧？

前段时间，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个瑞典网站，<https://endbright.se/>。这是一个帮人分居、离婚的机构做的网站。在这个网站里，你可以找到“离婚和分居辅导套餐”，简单说就是帮所有的家庭成员，父母、孩子等等，战略和心灵按摩双管齐下，实现“无痛分居”。

网站介绍这么说：

离婚时，很多人先从法律入手。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您需要的远不止于此。您在孩子的问题上需要帮助，在您的幸福方面需要帮助，在财务方面需要帮助。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情况。

网站里有一些问题示例，比如：

当我要分居，我如何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从而在精神上变得强大？

如果离婚或分居，我想和公司请病假，这是正当理由吗？

当离婚或分居的精神状态影响工作时，您如何与您的雇主、人事经理或直接主管交谈？

当朋友跟我讲起这个无痛分居网站的时候，中文网络正在流行的一张产科照片——因为无法普及无痛分娩，产妇们把医院产床上面那堵墙抓出了无数道指甲印——刚才又去看了一眼，这张照片已经无法查看了，总有人能把妈妈们生产时的绝望和痛苦轻而易举地删掉。

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发达国家真的很“发达国家”，没想到帮人定制离婚计划可以是一种职业。当你想要离婚或者分居，都有专业机构给你提供最精准最稳妥最科学的支持。社会恨不得把每个人心里的纹路都给熨平。他们任何一点问题都要心理辅导、社会干预，

每个人的舒适程度、心理健康、如何自我实现，这一切都很重要。但在任何发展中国家，人们无法想象，社会也无法关照。瑞典人也有苦恼，但我们知道，苦恼是有阶级的。在我们这里，只有有钱有闲的人会去找心理咨询师。而我们也知道，那么多社会问题和结构问题，不能全都扔给咨询师，他们无能为力。

我有一个“大厂”前同事，以前朋友圈经常发一些工作信息。自从开始休产假，朋友圈每天都在发穿搭自拍和“形象管理”。这个东西在职场妈妈群体里好像特别流行。这种“形象管理社群和课程打的旗号是，女性帮助女性，关注女性成长。具体来说就是帮你学会爱自己”，帮你找到自己的风格，在合适的场合穿对的衣服，帮你找回自信，甚至从中变现。总而言之就是用女性主义帮忙卖课和卖货。

我一开始想删了这个好友，天天发，太扰民了。但每天看着她发布一些“爱自己”的心得，我开始有点好奇。我必须承认，当时的这种好奇更多是猎奇，我每天兴冲冲地蹲守她的朋友圈，同步跟朋友们直播，像是看笑话一样。我好奇为什么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性，生了孩子之后画风突变？我们俩的人生路径看起来有过交集，是什么促使两个年纪相仿的女性关注的东西大相径庭，又是什么驱动她关注这些？

我加入了她加入的“变美成长”社群，发现里面的人有相似的背景。都是女性。大家都有体面的工作，律师、医生、工程师、老师、产品经理。年龄在25岁以上，几乎都生了孩子。被家人打过，比如被丈夫说“穿得像大妈”，从小被父母说“长得丑”，我前同事就这么说过。

更重要的是，当她们生了孩子，就会面临一个此地的男性几乎永远不会面临的问题：平衡事业和家庭。所以形象管理课程的出现和它兜售的话术实在是秒得恰到好处。

讲师对着镜头跟大家介绍：“996、早高峰、按时打卡、由别人来定义你的价值，远嫁的我最头疼的是过年回家的机票和假期，二胎妈妈的我想要实现请假自由，企业管理的我想要实现美丽自由。现在我从土味二胎宝妈变身形象教练。如果你想像我一样，每天工作三小时，边旅游边办公，完成计划中的收益，成为又美又自由的小富翁，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它不需要很多钱。”

导师可以抚慰这些职场妈妈的焦虑，没人说你美，没事，我来鼓励你看见自己。导师用自己不光鲜的以前迅速破冰，用“女性爱自己”抓住痛点，用模板改造形象的同时做做心灵按摩，解决内心的问题。

但这种解决只不过是和稀泥，问题还在那里。一个这种课程的教练告诉我关于做家务，她会引导学员换个思路——以前责怪老公不做家务，现在我先把自己整理好，由小及大，我希望我身边的一切都美美的，我不再怨恨，我带着美的心境打扫卫生。

当北欧的女性开始不化妆，随便穿，当年轻的女孩们开始拒绝“服美役”，职场妈妈们却开始为了改变精神面貌、缓解夫妻关系、争夺职场话语权而精心搭配。女性打扮不打扮好像都挺尴尬。

在形象管理的语境里，美变成了一种攀比。不符合标准的美，那就不是美。每个人都严格恪守穿搭原则，拍照规则，每天上传OOTD打卡，节假日都不间断。上班还得歇两天呢哈。

抚慰了焦虑，利用了焦虑，也制造了新的焦虑。

前同事的丈夫不同意她参加这个课程，觉得这是不务正业。“30岁就主业好好赚钱，40岁财务自由了再探索自我也来得及。”

中国人有一道很难跨过去的坎，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你得先证明自己优秀，你才能无所忌惮地放飞自我。回想我以前也是这样，选择好学校，选择体面高薪的工作，这些游戏玩过了，过关了，我才有资格跟自己说咱懒得玩了，我才允许自己随便搞搞（作者的反思非常彻底，属于一开篇就当众扇巴掌）。小红书上特别流行一种视频类自述，大概是，我top2毕业年薪百万但我现在来新东方学厨子；我北京有房有车但我来芬兰找到了真我（别真去搜，这题目我胡编的，咱看个意思就行）。

上面这个丈夫，也是这种思路。

跟前同事聊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不管这个形象管理课到底是骗子还是真的，这也许都不那么重要了。去上这个课，在我看来更像是她的一种证明，一个出口。证明自己可以为自己做决定，证明她在为自己活。很多时候中国女性需要的不止是技术指导，更需要的是心灵按摩，需要被看见，需要被鼓励，被爱着。这要求太卑微了，也太让人难过了。

我觉得她好像从来没有被理解过，不管是小时候被妈妈说丑，还是结婚之后，老公说她在天上飘着，没有过实在的生活。去学形象管理是不对的，去学育儿就是对的，花钱报课不行，攒钱买房却可以。公婆问她为什么产后盆底肌重度松弛却不好好锻炼，是不是没有努力，却不考虑这样说她会不会难堪。

所以在我去她家和她聊天的时候，她才会一直说我们的观点相似，我们是一类人，我们都觉醒了。她太孤独了。我们甚至不能去苛责她没有主见，我说不出来，我为我一开始的猎奇感到自责和羞愧。

当我接触到这些有着很真实又很普通的困境的女性——她们甚至不算困难和底层，只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可能你每天出门就能看到她们——我无法再去欣赏任何一条口号式、宣教式的女性向广告了。因为这些普通人她们没有力气喊出那些漂亮的有底气的口号，她们面临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但结实的悬崖，不管是婚育、家庭的焦虑，还是为了做她们生意而制造出的新的焦虑。

或许前文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性，生了孩子之后画风突变”，不是“到底是哪一步让我跟她的人生产生了分叉”，也不是“东亚女性怎样做才能不走到这一步”。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因为走到这一步真的太轻易了。

当你做出与别人不同的选择，你要付出更多的力气去回应那些无形的压力。不仅仅是结婚生子，还有你为什么不好好工作，为什么要去参加一个奇怪的课程，为什么你不优先考虑家庭而是要去做一些说不清的事，甚至是为什么穿了一条别人无法理解的红裤子。

如果你一开始选择了一条看似不用怎么对抗的路，换个说法，这甚至不是一种选择，是被推上了这条路上，当你第一步妥协的时候，你会遇到无数个往下滑的路口。像雪崩一样，迅速将人淹没。

每个人从女性主义得到的东西并不一样。也许有一类人，她们确实会用女性主义去合理化那些原本的枷锁，在不推翻框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让自己更自在。

但我们有资格怪这些女孩吗？去问为什么你不拿掉枷锁太轻而易举显得多少有点蠢，对吧？

后来，前同事说丈夫一直不同意她报课（家里丈夫管钱，不同意意味着没有这个学费），并问她，你追求什么呢，形象管理这个东西，不上大学也能学。她问我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我很担心她被骗，但就像上面说的，我知道那是她的选择，她的出口。

我决定说出心里话：你喜欢什么不需要任何人同意，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如果你有兴趣，你想追求就去追求，跟上不上大学没关系。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你喜欢不喜欢，是你的事。”



刘天

干过营销，做过创意，爱在饭馆偷听别人聊天，爱骂人，爱玩。播客“几乎正常”的主播。

#### 斯嘉蒂的眼睛

专栏名字来源于DotA里的装备“斯嘉蒂之眼”，冷静观察但激情输出。试着做一种具体的表述，过具体的生活。做一个真的人，说些真话，有一些真心。



题图为电影《秋日奏鸣曲》(1978)剧照

## 专栏

# 029 静远 发起写作计划之后， 我成了一个“入侵者”

杨樱 | 接力访问

那些套路化的创作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如何可以被清除？

静远是个艺术家。她在 2017 年发起一个叫做“写母亲”的共同写作计划，其中完成的五季，光看不同的主题和变化就很意思：

第一季，就“国家和母亲”这个话题，八位写作者以对话体参与；

第二季，七位写作者，综合了书信体和评论体；

第三季：核心文本是“一位公务员对自己一天的描述”，五十多人参与回应；

第四季：核心文本是一位县城高中老师的教学日记和人生经历问答，十多人围绕“教育”进行讨论和写作；

第五季：“住在亲情里的疫情”，流动女工专辑，来自四位女工的七篇文章和不同回响人的文字。

这个共同写作计划的主题其实不只是母亲。之所以以此为题，静远说，是在强调每个人共有的部分。用她自己在项目说明里的话就是：我们将不可避免瞥见不同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给个人带来的具体影响。

事情得从静远回国后在自家客厅里看到的照片说起，“当时就把我给震住了”。客厅里摆着的，是父母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合影，而两个人站立的姿势，和他们在卧室里放着的一张文革时期的合影一模一样。静远说，那是一种稍微个人化了一点的“文革姿势”，而她想到的，就是“无论物质生活如何提升，看世界的渠道如何扩大，我的父母和这个世界 的姿势从来没有变过”。或许把姿势改成“关系”更合适一些，因为静远思考的东西其实远远超出了照片本身：“我很想知道，这样一路走来，他们一定看到了很多现实，但是他们又是怎么说服自己，让自己可以很好地过去。”

“他们不可能没有受到过暴力、不可能没有受到过不安、不可能没有感觉到不快乐，但是他们都非常神奇地觉得这些都不算啥，而且他还要告诉你，你也不要认为这算啥。还要告诉你，我们可以很好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继续对你暴力……所以这成了我的一个痴迷：第一我想描绘这个事情，第二我想记录这个事情，第三我肯定想修改或者介入这个事情。第四，我想知道这些事情有什么出路。”

静远的介入，和她描绘、记录的动作几乎融合到了一起，就是把写作作为一种沟通方式。她其实从来没有设想过这一点，而是在和朋友的聊天过程中慢慢走到了这一步。虽然在加拿大和美国学了艺术，办过画展，知道艺术语言多种多样，但静远一直在寻找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促使她发起和持续推进“写母亲”计划的，一方面是如她所言，希望以艺术介入社会，另外一方面，也是她 2010 年回到中国之后的境遇。

静远是 1979 年生的广西人，在出国之前，她已经在北京读完本科，学的不是艺术——因为学艺术的父亲认为“女生如果入了这一行就注定一生漂泊”。但她还是在出国之后自己遂了心愿。在芝加哥的时候，静远对艺术如何介入社会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回国之后困惑于她所见到的艺术界对现实的回避，也不想融入商业运作的游戏。与此同时，父母的两张照片，让那个她“过不去”的东西第一次清晰浮现，不断逼近。

“写母亲”计划前两季的文本都来自和静远相近圈层的人，而从第三季开始，静远想把一些打工者纳入到讨论中来。经介绍，她从皮村文学群接触到一些家政工——在谈及底层写作的时候，皮村打工是一个范本式的存在，而其中最知名的人物叫做范雨素。

以“写母亲”过往的经验，静远对文本有一种本能的信任，或者说不曾把是否需要信任纳入考虑范围。但是从接触家政工以及更多类似身份的人开始，静远发现自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语境，“当时是想链接不同的阶层和社会主体，但是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我突然进入一个群体，那个群体完全相信别的东西，而且群体极大。我变成了一个‘入侵者’。”

“入侵”这件事令人玩味，因为如果你细想，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发生在静远和她的计划参与者之间的状况。甚至“入侵”这个词也是一样，看起来静远在扮演指导者、计划者这样“强势”的角色，但她遭遇的是极大的困惑，仿佛走入一个陌生领域，里面充斥了她无法辨认的“谎言”——且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不自觉，这才是最令人玩味的地方。

她遇到的是内化的文字登记。比如中学时代被灌输的“中心思想 + 三段式写作法”，对抒情和口号的推崇，对类似“经典文学”的权威崇拜，对美文和成功学的追随，对遣词造句、修辞排比、衔接过渡之类的迷信。

她后来总结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认识女工的路径特殊化了。但她也不知道如何去邀请普通的家政工人，“比如说去家政公司去认识家政工，然后问你写不写作，操作上就不大可能，对吧？如何在日常生活形态下认识不同的人群，也是她做了几年写作班，并且开始做社区家庭教育项目之后才初步解决的困境。在回顾最开始的接触时，她说“我给几个家政女工开了读写班，就是我发个文章给她们读，她们再给我读后感，我再给反馈。我其实是没有‘教’的概念，第一我不认为我可以教别人，我没做过老师，而且我其实挺反感老师，我妈是老师。”

很快，她在交流环节卡住了，有的学员把她的写作反馈当作对人本身的否定，很不开心。一些概念也很难沟通。之前，静远不会修改观点，对文字技巧也不在意，她把自己形容为“文本采集者”，就文本本身不断提问。这样做的要求其实只有一个：被采集的文本尽量是真实的。当发现这条路受阻的时候，静远回到了她的本行：画画。

她讲述了这样一个合作经历：

有个家政工从 2006 年到北京开始，待过了许多家庭。在了解了她生平和一些志向之后，我鼓励她把她的所有在雇主家的经历记叙下来。在这位家政工的第一稿里，她按照时间顺序写了多个雇主故事。十万字左右。这些文字展现了家政工非常艰辛的一面：她们虽然进入了大城市，得到了相对可观的报酬，但没有在文化上和人格上被认为是同等的人。她们中的有些人，虽然是和雇主同吃同住，但在同一个屋檐下，依然有着很不一样的心理和身体经历。因为没有出入自由，而且没有社保和其他规范化政策的保护，她们很多时候会把雇主的家叫做牢房。

在阅读了她写的大概 20 个雇主故事后，我发现她所有叙述都是关于在一个室内空间和主人的关系的，而且写作也趋于单方面叙事，于是我建议她凭记忆，给工作过的家庭画一个平面图。以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利用绘画告诉观众这些隔阂和苛刻到底在哪里，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创作方式也有助于激发她的创造力和多重叙述意识。这个作品叫《北京公寓》。它有很多展示的形式：比如做成明信片，比如做成装置，比如转

化为木刻等等。

在和不熟悉一起群体工作的时候，静远突然发现那个“父母拍照时的姿势问题”有了答案。“在遇到女工的初步写作之后，她们文本的相似性就如同我父母不同照片里姿势的相似性：它们是共构的。也许是我幼稚，我总以为自主性是在人的表达里的，结果发现并不总是这样。”

在很多时候，静远做的和写作没什么关系，她有时候会和计划参与者一起生活，了解她们的经历和家庭，劝说她们把微信聊天里提及的观点和事实放到写作里去，不要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性骚扰，却说自己的环境里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写母亲”的工作方法后来从共同写作计划拓展成为开定期的写作班。而那些写作班也有一些特殊设置，背景更混合，从底层拓展到中产阶层。“从学历上来说是由小学到研究生，从社会角色来说，70% 是全职妈妈，男性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那种。目前这个课是通过公益招募，所以有很多是社工或者是公益志愿者。”但静远遇到的所谓“自主性”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不自觉的“谎言”还是在继续：假人文、假学习、假阅读、假写作，还有假表达、还有假疗愈，“一大票跟我以为的差不多，但其实正好相反的东西”。

为了规避这些问题，写作班调整为先一起观看电影，邀请参与者写影后感，之后她讲解电影并引导集体讨论；八次这样的课后，是把之前“写母亲”的文本作为阅读材料，邀请参与者读读后感，然后再讨论；经历了这两个板块之后，最后才是个人生命故事写作。

“一个学员最想写的主题之一是对深圳的眷恋。最初，她的文稿是一首诗，那首诗以一种哀求和崇拜的口吻恳请 / 祈祷深圳这座美好的城市让她和她的孩子留下。我建议她先从一些实际的她和深圳的故事写起……最后她告诉我，她要从小时候开始说起。当一个学员说‘如果我要写什么，那我必须从什么谈起’的时候，我会认为写作真的在她身上发生了：这是她带着写作这个工具和欲望，主动回溯过去——写作跟她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开始达成了关系。”

她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根本问题。“我有时候会被批评，说我侵犯‘解读的自由’，侵害创作，但我无从发起公开的辩论。我想说的是，那些套路化的创作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如何可以被清除？如果没有人在意这些，那我的一举一动自然会被认为是‘入侵者’。而我也会继续做‘入侵者’。”

“对我其实不知道这一切是因为缺乏了哪种教育，所有我可以想到的词，都已经被侵害。”

**Q: 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参与一个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和培育。我们有实体空间，在一个城中村里，同时也有线上的部分。它希望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教育，我们叫做“家庭基本素养培育”。有点像写作班，第一期有 30 个家庭，生源也是保持混合的。

**Q: 你觉得这件事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A: 写作可以给人带来能量。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对文本的拿捏、人由于文本对话才能产生的独特的内容，以及这个过程对这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之前在台湾做过三个月的“写母亲”项目，那时候就想跳出这边的中文语境去理解这些东西。

**Q: 那困难的部分呢？**

A: 这些工作有趣和困难的部分基本是相似的。就是我一直在没有“社会角色认证”的情况下做社会介入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对参与者来说，是一个莫名其妙、无法在文化上定位的存在。部分原因是经常在跨阶层和行业语境里工作。另一个原因，是我有意识地拒绝基于社会固定角色的交易（比如，一个英语老师可以帮我提高英语）。这都会带来风险和变数。

**Q: 推荐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人？**

A: 水仙姐，一位年过半百的裁缝。她参加过我朋友的手工项目，有勇气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2021)剧照

## 专栏

# 030 金特 用文学炸药 毁灭那个腐朽的世界

伊险峰 | 接力访问

要不你写他干嘛？

金特给自己储存了不少炸药。感觉随随便便就可以炸死文坛装模作样的家伙。问题出在一条朴素的处世哲学上：文坛，你行你上。金特往往在说得兴起时陡然降温，觉得自己凭啥，自己小说技艺还得练，也就把这破文坛暂时忍了下来。如果有一天，金特和他的小说爆得大名，突然口无遮拦张牙舞爪起来——不要质疑他的人品。他早就受够了。

那天早上，在宁波外滩的星巴克，金特气定神闲，在甬江畔的微风中开始炮轰文坛。

“我前几天看《生活与命运》，中国文学再过一百年也不会有这样的。我看到可怕的罪责感，没有能力再表现出对共同体对国家的责任感，被歼灭之后的罪责感。然后你再看中国小说，太落后了。”

“首先我就觉得，我们熟知的传统的文化，要有一个彻底的否定。这不是一下子就打死，但你对它的身段和姿态，必须打死。你不能让他抓住你的手和你的腿。你现代人嘛，现代人价值观还是要立住的。你不能说我太爱《红楼梦》了，所以袭人和贾宝玉的关系也没有问题。这个肯定不行的。”

“中国传统大部头我推崇《西游记》和《金瓶梅》。《西游记》讲救赎，很少见；《金瓶梅》里所有的人都隔阂的，就是暴力，就是干。西门庆干金瓶梅，金瓶梅干西门庆，喷血了还是得干，暴力性地干死，两个极端的东西。不像《红楼梦》里，生活在一个腐败的贵族的大观园里。《红楼梦》里所有人都是共情的，曹雪芹控制所有人。”

“我觉得士大夫这些东西就是个屁。我对他们彻底完全的否定。当代中国文学不好的东西，都来自于他们。它们根本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是中国士大夫里面那些坏的东西。最坏的就是他们老是编造一个巨大的理由，过腐朽的生活。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也不怕别人听到，你要说为什么，有什么理由，没有。就是本能地讨厌，特别是那种落魄的，

还走不进仕途的。”

“主流文学那些东西，那些腐败的味道，我一闻我就受不了。没办法，这个国家，这个文明。前几天看一民哲写的中国文化好处在哪，道啊，天人合一啊，我最讨厌这个。你知道吗。底下有个回帖，说中国文化是全世界所有文化中最腐败的一种文化。它的特性就是腐败。我当时就觉得说得特别好。语言到思维，啥都腐败。成天吹牛逼，儒家文化。我觉得儒家文化的东西就是黑社会，中国黑社会，不然还是啥啊。黑社会就是那么管理的。”

“还逍遥。就是投机。你凭啥逍遥啊？不就是有退路吗？不能有退路啊。逍遥这种文化是皇帝文化诞生之前封建文化的残余。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贵族，精英，都有自己地盘，朝廷上我做不了官，我回自己领地里去做老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同步的，不是进阶的，是平行的。这个盘子里我吃不饱，我就去那里吃。你郑国子产，是丞相，但你人格上不能欺负我。你作为国家丞相，你做了一个不道德的事情，你都不配跟我说话，这才是真正的逍遥。你现在还有退路吗？逍遥个毛啊？”

“我总觉得中国文学应该还是要把泛政治性的东西容纳进去。干涉性的。我觉得已经到时候了，否则我们当代汉语言文学就不会真正成长，真正发生成长。”

“人嘛，人不是梦幻动物。像许多小说写的，都是写梦幻，泡影。社会都这样了。沈阳现在有个政策，生三胎给五百块钱，你说这不是侮辱我嘛？还只给三年，去你大爷的吧。这种情况下，你还说什么，写那些干啥啊？”

我在整理录音的时候，去看了他的小说。每个出场的人物，规划局里科长科员……各个都是不世出的哈姆雷特，上来或者思考终极命运，或者思考国家，或者思考自己的猥琐与胜利是图。每个人都抢着说话。就好像他的自我评价：“爱哈哈，东北人。”（他有一篇短篇，《铜魂》，发在小鸟文学卷二十七“24 小时文学聚会”栏目）

他说自己写小说有一个问题，“总控制不住去写超出自己生活实际经验的东西”。比如我生活里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但我总是控制不了自己写……各种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我现实当中没有经验，只能虚构。”

此处有停顿。就是他那种说这么多有啥用，“凭啥是你说”的劲儿上来了。“缺陷非常明显，情节狗血。我就想赶紧写完。我自己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怎么回事。突然间冒出一个金特，跟别人都不太一样。我对这个理解是，在一堆练传统武术的人里面，突然搞出一个练自由搏击的，套路不一样，我就三招，左钩拳，右钩拳，可以啊，这小伙挺彪啊。就是这样。”

“没有威力是不行的。你就得，谁是那啥就得干谁。你得找到谁是你的敌人，谁是利维坦。你的良知道德就应该是这样，要不你写他干嘛。干它就完了！”

所以代价就是在正式的出版物里，很少能看到金特的小说。他刚开始发在一个叫蓝黑的文学论坛上，都是写小说的人看，有人夸也有人批评。文学刊物里，《西湖》发过一篇，而且也是很早以前了。

最近有好心的出版社看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爱》。那小说里开始就写：规划局老局长跟下属科长聊天，天天思考国家命运，跟局长说合理的科学的制度体系。老局长说，你说市长让我干点啥，我干不干？下属说干。老局长又问我让你干点啥，你干不干，下属说干。“孩子，这就是我们的科学。”

“我现在最大困境，我写小说可以找到一个汉语言可以参照的典范。找不到。我特别希望同辈人真的能写出来，我就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我就可以把我更深的东西表达出来。比如你写了一个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基石，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传统的你也找不到。”

我理解，这就像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文学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整个现代派。金特总有一点把自己笔下的小科长刑事律师之类的人物都调教成“宗教大法官”的劲头。

“《冬民》写完以后，我意识到我不可能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没想过变成他，我对他没有那么大兴趣。但他的作品形式是开放的，是完全可以模仿的。但是呢，我写到最后，我发现中国人精神上缺少一个救赎的基石——这虽然很老套了，就是没有。除了堕落和自我灭亡。你可以在小说里说他信上帝了，但那也太刻意了，因为你写的是一个群体。你就明白我们那些小说为什么以腐败为乐，以奴为荣啊，其实都是为奴心得。”

疫情三年，他先在沈阳，2022 年的三四月份才回到广州，作息跟大家都差不多，不出屋，抑郁，他说也不是真抑郁，精神里面还是非常亢奋，完全不知道珍惜自己身体，眼睛一睁就在电脑上看书，哪怕只睡四个小时，“陷入到不加克制的奴役”。你一定看出来了，做奴隶和做奴隶的心态对于金特来说是件多么敏感的事，基本上一听就炸起毛来，随时准备着去干掉它。“无论你是知识分子还是企业家，都得有参与现实的斗志和意志，否则真的不行。”

聊着天,我突然想起来他叫金特,还是满族人。“你真的姓金?你是皇族吗?”他说扯淡。金特真的姓金,从小就叫金特,出生在锦州。他们家大概率上不是皇族,金特的大爷(伯父)考证过他们家是八旗中的哪一旗,没有结果,但祖辈大约是清中期的时候从北京迁过来的,为什么反向迁移,不知道。

金特十一岁的时候,大爷在广东做军人。当哥哥的有大局观,果断相信东北未来堪忧,劝弟弟一家去改革开放的前沿,于是全家落脚韶关。少年金特因此出现在一个叫乳源的地方,那里有瑶族文化有客家文化还因为六祖有一点佛教文化,街上有很多和尚。客家文化不欺生,小孩子们也特别有礼貌,有金特在场的时候都不讲客家话。金特觉得客家人好。

金特后来考上广东民族学院。学习不好,还要仗着满族有加分才考上,学中文,开始看小说。

毕业了也算过去大厂时装业的,没多久。后来在博尔赫斯书店做收银员。挣的钱不够花,去快餐店打工送外卖,那时还没有饿了么,就做一条街生意,骑自行车送。基本上够活。

那时开始写小说了。他觉得别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意思。文学感觉更刺激一点,“全面刺激你的精神世界,还可以逃避现实”,慢慢就开始写了。

一个人租房子,那时广州开放,没有什么地缘文化差异。火车站还很乱,孙志刚被打死那时候。开始的时候不写东北,就写那种“大都市里面渺小的年轻个体的状态”,很多人都这么开始的。

很久以后,有一回躺在朋友冯俊华的工作室里,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金特说那时他就像魏格纳一样,发现了世界的奥秘。那奥秘就是:原来世界的中心在东北啊。你看,它往东去是日本再远是美国,往西看,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别看中东之类的地方成天争来争去的,它不重要,谁都可以动,东北不一样,这一动就是大事啊。”

从此,他的写作与原生身份在一起了。他有了“东北写小说的”的标签。他说他可以把小说和现实身份分开,不会把东北人身份、满族人身份那么当真。写小说有民族意识,有对东北语言、文化上的原始认同,但那也不会成原教旨主义。不过,他并不排斥现实身份中的赞美——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看他高鼻凹目,恭维他长得像契丹人。他很得意。

从此,东北记忆被勾起。渐渐变得完整丰富。

东北农村外面就是鬼的世界。很多大人,真的怕走夜路。小时候,就是活在人、神仙、鬼各种故事里。童年那个鬼并不是我们想像里吓人的那种,就是跟你唠嗑,唠着唠着就跟你说他是鬼,我都写进小说里了,都是真事。

每天大家都唠,老人都说这些。萨满,很正常。我爷爷我奶奶都讲。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是干这个的。(你爷是跳大神的?)不是,我爷是男的。跳大神的都是女的。男的是精神的。二神。然后,谁家去世。抬尸穿衣服,抬人,捞死人。讲捞死人的时候,人都没有什么肉了,头卡在鸡笼子里,捞不上来,只能把头掰断了,把脑袋送上来,再下去捞尸体。女儿河。大凌河分支。那条河从来不淹男的。真的。没听过淹男的。(所以叫女儿河?)不知道啊,这也太恐怖了。如果真是这样,西门豹这样故事就出来了。现在河干了,挖砂子挖没了。

但现在他眼里只有知识分子。想象着哪一天,用他的文学炸药毁灭那个腐朽的世界,重新再造一个。

**Q: 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A: 不仅有趣,而且还是个悲剧。我还不上网贷了。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压力。因为我的网贷突然关了,不贷给我了,一下子破产了,老不堪了。也不知道为啥。其实还款记录非常好。零收入。这期还完了,还可以立刻贷下一期。支撑一下,欠三万多。其实也不多,就是还不上。

只能说最有趣的事就是这个了。没有什么了。还网贷那几天,都要通宵写作,让时间过得慢一点。真是这样。

**Q: 这是困难啊。正常的有趣的事是什么?**

A: 现在构思一个小说,梗是什么呢。一群中产,大家一起坐在那儿,生活不好,没事儿就说,我想死啊!死神来救我吧!吃饭的时候总聊,各种病态抑郁症,病态寄生虫。没成想死神真来了。推门真进来了。虽然很刻意,但我想写出来。还没写出来,起头了,这个应该写得挺长。你都把死神都弄来了。

**Q: 推荐下一个有趣的人?**

A: 那潘赫吧。他也还不上网贷了。

(潘赫是金特在沈阳的房东,沈阳七二一二厂的家属区里。开过书店酒吧,搞过没有一个人会乐器的乐队,领各种人在各个城市里做各种城市探索,无所不能。)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月事革命》(2018)剧照

## 专栏

# 031 阮阮 优惠券薅太多， 我就发起了卫生巾捐助

杨樱 | 接力访问

观念不同，就让它不同好了，  
我们要做的是事情。

阮阮有囤积癖。这是她自己说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会用几十块钱的消费来安抚自己。去年她买了20箱卫生纸。家里还有十几瓶洗发水、沐浴露、护肤乳……她还有“薅羊毛综合症”，就是会盯着购物平台找优惠券，没有券不消费，虽然明知道不买是最便宜的，但看不到这个便宜就会觉得亏。

在我问她“卫生巾公益”是如何开始的时候，她就是这样解释的，声音细甜，拖着尾音。我原本预期的是一个普通公益动机——在自己生活中寻找更多意义、同情别人的处境，诸如此类。和这些相比，优惠券过于日常，尤其是，一个人因此开启了捐助贫困女童、向叙利亚捐助女性生活物资、联合发起插画交换卫生巾活动等等一系列可以称之为“行动”的事。

阮阮出生于1998年，在青岛工作。卫生巾捐赠的公益活动是从2022年9月开始的，她一人负责所有的对接工作，具体工作量可以从这些数字中反映出来：到我们聊天的3月中旬，她有5个公益微信群，1200人左右，60人左右志愿者，捐助对象在2022年总计为14个学校，1100多名女生。2023年因为和公益机构合作，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去年12月她做了一个公众号，叫“嬉妹互助”。

阮阮的手机内存一共256G，微信占去了60G。很多朋友和她一起支持“嬉妹互助”的运作，但她还是需要投入极大精力在对接和协调上，也许更耗费精力的还是人情世故。她自我评价是个很自我的人，还爱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但她又说，现在做的事情都在她的舒适区内。

我觉得她的舒适区一定比普通人要大一点。

你可以通过阮阮的口述来进一步了解她。出于阅读考虑，顺序略有调整。

2022年9月我找到了卫生巾优惠券，太便宜了！就喊朋友一起薅羊毛，就算这样那个券看上去还有很多。当天晚上我就想能不能捐赠对口学校，就找到了几所学校的联系方式，有的老师不需要，但把我推荐给了其他老师，然后就确定了人数和份额。我又在朋友圈问了一下大家，想做这个活动有没有人一起参加，然后大家就疯狂进群。我们就购买了好多。

一开始我都没想到能做这么久。9月做了一次，(一直到)11月其实都没有做。因为在等返图，我不能拿了(大家)钱不给返图。但因为在偏远山区，而且学校一定要跟校长申报、上完生理课之后发放。虽然是九年义务教育，期末以后才能上这种闲课。虽然我很着急，但是不能催。

10月就帮助了对口学校的妹妹，就是做一对一贫困生扶持。然后11月又有了优惠券，我们又做了，但是做完之后整个人很恶心，觉得这个商家太鸡贼了：是它自己放的优惠券，我们也是用其他账号一起下单的，结果它竟然敢限制我们，同一地址不给下单，其他地址可以下单。气死我了！然后它在深更半夜，两三点才给我们下单，我们就熬夜偷偷下，烦死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其他品牌对接，经过比较、被拒绝，找到了合适的，报价也挺好。

“嬉妹互助”这个名字也是后面才起的，12月。2023年才决定建个公众号。我们突然间好像队伍变得很庞大，就这样。

到现在为止，互助会的所有事项都是我跟各方面对接，朋友会帮我做一些社群运营，比如说希望大家不要吵架，帮忙拉群，做图和其他具体事务。2023年是多了插画交换卫生巾行动，是由合作的“叁壹肆”负责。

发起的话，主要成员应该是我，以及一大群非常支持我的朋友。人数有点庞大，但是是一团人。我可能就在群里说我需要什么，他们有空就来帮我。

我一直算错账，真的，我一直算错账。第一期的时候，明明钱的数额是对的，该返给我的钱也是对的，可是我就没有钱了，我不知道怎么算的，结果好多人都退钱给我，说阮阮你转多了，还给我重新计算一遍，我真的非常感谢。后面就长教训，请一个朋友跟我们三个人核对数据，再后来我学会了微信钱包导出账单，基本上就没有错误。

我单纯每天逼自己一点，因为我这个人有点注意力缺陷，ADHD。但是我不做没人做，因为钱都转给我，没有办法交给别人。不接受线下转账，群里会比较透明……我虽然很拖延，但非常想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成就感实在太大了。

一些视频我不会发在群里，因为没办法挡孩子们的脸，有些学校会格外要求说照片反馈等不能公开……就视频里面说“谢谢姐姐”，然后看到叙利亚女性在哭泣……是非常触人的，以至于我心里一直是软塌塌的，就觉得“没关系，再坚持一下”，“好的，又坚持了一个月”。就这样。

我是做策划的，小公司，老板清楚那点工资也别想让我加班。我一直在赛博有很多朋友，最长的都有10年了。和我一起做的都是认识三四年的，都很了解各自的人品。我基本默认我的二次(元)好友就是我的三次(元)好友，因为相处都很久，而且像二次的话，我比较社恐，所以没有特别多的现实朋友，像运动、户外露营这些，只能说偶尔聚一次。我是真的社恐。

叙利亚(的契机)是那天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上说自己需要物资，(加上)我们跟厂家都合作顺利，不管我这边要多少物资，基本上第二天都可以配货。所以当天发文以后，我就去问大家愿不愿意——很简单，只需要发到国内的货仓，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大家说可以。我朋友还说，你不用问大家的意见，你既然想做那就去做，只需要和愿意做的人一起就好了。我就觉得她说的非常正确，就没再讲她的想法。当天下午想的，然后晚上实施几个小时，然后当天就筹了3000包卫生巾给土耳其航空，第二天就全部发出了。

就在当天活动结束以后，网上的朋友就找我，说土耳其和叙利亚都地震，而且土耳其因为受国际关注比较多，已经爆仓，有朋友愿意去叙利亚本地做救援，需要物资，可以问我购买。我就问了一下当地物价以及运输状况——因为物价和国内相差太大，我不能保证大家愿意付这分钱——叙利亚之前因为战争一直在锁国，开国之后还要临时找车队运输，而且没有国际航班，就只能在黎巴嫩周边采购。

其实都是机缘巧合(参与叙利亚本地救援的)鱼干这边，可以保证物资能到达女性手里。不然我都不会相信他们真的购买了我的物资。

所以我当时采购了一批6000包，因为跟救援队一起走，这部分钱是垫款。后面才跟大家讲我们这次想要捐赠的份额是多少。他们那边真的是特别快，当时跟我讲的时候

还没有开国。叙利亚是第二还是第三天通过国际声明说自己愿意开国，接受救助。我们是之前就已经联系好的。“鱼干”已经念到了博士，在救援队担任翻译沟通工作。我觉得她的贡献真的很大。

我会觉得自己在编织一张非常强大的网，用来联系我们大家，大家都是不同的节点，通过这一件事汇成了不同的网络，也不知道到底会汇聚成什么，可是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女性联系。

大家当时在群里还比较活跃，除了卫生巾以外，还有更多的想法和念头。我会来想一下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做、怎么去做。能够做我们就去做……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笨的，可能理解不了特别多的概念，但我可以评判一件事我能不能做到，可以的话就去做好了，就非常简单。只需要盯着目标，去把它做好就可以。

捐旧衣物、捐助贫困女童……我就去问老师，具体的还是老师们在做。国内公益法规定个人是不能接受特别多的捐赠，很容易就会被举报为非法集资。有其他的基金会愿意让我挂靠，只需要抽取一定的手续费就可以……我比较想先在本地找找。

我之前感受深刻的是 2021 年郑州暴雨，我做线上的志愿者，熬了几个通宵。我应该是第一个在微博上发出以地区划分的安置点的人。当时我睡不着，就自己做，到了白天才对接了其他的救助队，帮助高德建了一些安置点录入。经过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关注了更多的女性话题……再慢慢走到了卫生巾公益。

我这个人是非常不愿意走出舒适圈的。我对舒适圈的定义就是自由，以及我能不能在这件事情做得舒服。目前我做公益能，那么我就不会走出去。

从 2013 年开始，我接触的全部都是女性，男的在我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空间，而我生长和感觉舒适的地方全部都是女性带给我的，所以我只需要待在女性的舒适圈就可以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出一点牺牲也不是不可以，这点牺牲我暂且称之为勇敢。就是发声。“女权主义”这几个字并不烫嘴，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正视的事情。我虽然不能特别强烈地在正规途径上大肆宣扬，但是我也可以不管别人说什么，只需要去事、让更多人去看见，其实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

“姊妹互助”里的“妹”，其实和“姐”是一样的，它一直被攻击说是女权主义的用词，我并不觉得这种攻击有什么用处，反而会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另一方面，我非常喜欢“女者”这个组合，就非常简单。我也不觉得“姐妹”的“姐”因为什么生殖器含义不能用。

本来女性所占有的褒义词就已经够少的了。我们不能失去占有权。为什么“姑娘”、“小姐”、“大妈”、“妇女”一个个变成了嘲笑的词语，就是因为避免使用过多，并且过于自证，那就不要自证，一直去使用它，一直用有色眼睛去看待别人，不要内耗自己。有人用这种习惯性词语去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就去质问为什么会开这种玩笑，那么反思的就会是他们。

对女性来说，大家赋予原生家庭、你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成长觉醒的时间段，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从生育（开始），有的人从小生活在比较自由的国度，而有的人经过毒打还依旧醒不了。大家谈女权主义，还分为“激女”和不那么激进的，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观点，我反而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只是观念不同，就让它不同好了，我们要做的是事情。

我就不要去说，我去做就好了，我把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了，那就 ok 了。而我做的事情别人除了言语上的批评，是没办法介入，对我造成其他伤害的。

备在家躺着，所以想辞职。

**Q: 那钱怎么办？**

A: 搞一些其他的副业，看一下怎么弄。我是准备卖骨灰盒的，我当然可以挣钱。

**Q: 推荐一个有趣的朋友？**

A: 无能少女橙汁，一直支持多元文化，而且自己和朋友们也真的组建了一个多元家庭，我遥遥望着，很钦佩。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一件事就是准备搞一个遗体公证。如果我死了，我的遗体可以进行器官捐赠，器官捐赠书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签了，可是这个是需要我在世的家人给我做决定，所以我并不能确定我父母愿不愿意，以及当时在场的人愿不愿意。然后就算我遗体火化了，我要求我的骨灰归属权是给我朋友的，我要让我的朋友把我的骨灰带走，不管她拿去做什么钻石、脐带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但是她需要把我的骨灰带走。我要做一个这样的公证。

第二个就是我最近非常想做骨灰盒和情趣内衣、情趣用品，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我自己的骨灰盒我一定要是紫色的、粉色的，有亮片的，非常闪耀的那种。现在骨灰盒都太丑了。

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把骨灰盒做得很漂亮，希望自己去学设计。同时因为比较喜欢自己的身体，所以想做情趣用品。

**Q: 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困难吗？**

A: 好像也没有。目前觉得自己时间不太够，但是即将解决了。因为不是很想工作，准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题图为电影《末路狂花》(1996)剧照

## 专栏

### 032 Wen

## 进行一场有公共话题的聊天 就那么难吗？

杨樱 | 接力访问

缺乏公共话题的聊天，

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生活缺损。

2022 年那次冲突留下的心理挫伤到现在还留在 Wen 的记忆里。这也是她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和别人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而起因是她试图干预一场和她并不相关的纷争。

当时她和其他居民正在小区里排队等待“大筛”——她用了一段时间想起了这个词，然后笑了一下——而一个居委会的阿姨正在被一个爷叔追骂，一开始是近距离地呵斥，后来在阿姨转身欲走的时候，爷叔试图上去扯下她的口罩。在事情眼看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距离他们最近的 Wen 上去对爷叔说你立刻停止，不然我就报警。

她对我复述的时候，用手向下比了比个头，意思是爷叔个子还没她高。但是爷叔从下往上看了 Wen 一眼，一把就把她拿在手里准备做核酸的手机拍落在地上。“我第一反应是找手机，就是我没有任何面对暴力的经历，所以第一反应不是自我保护，而是去找手机。然后据围观群众讲，他当时是继续打算攻击我，小王就从后面冲出来把他给推走了，然后这个男就开始上升到暴力，就是他先是把自己手上的湿垃圾砸到小王头上，然后又敲了酒瓶，想要来戳我，然后就被人拉走。”

小王是 Wen 的女友，她们一起被封控。最后警察来了，爷叔常年在那条弄堂混世，也没落得什么教训。后来邻居见面都会和 Wen 点头问好，爷叔年纪很大的母亲还过来跟 Wen 道歉。但这件事再加上被转运到安徽芜湖，还有毫无道理的加时赛封控，这个地方终究是种种不愉快的回忆之地。

在 Wen 在上海两年多的生活里，这是诸多不愉快里最尖锐的那个。而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聊的，是另一种不愉快：她在公共话题交谈上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表现为两重，一是很少能找到打开话题的对象；二是在少见的谈话契机出现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失落。

“大家日常进行的讨论其实并不会深入，比较像信息交换，互通有无。这样的社交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温馨，因为它给你一种很奇怪的、跟家庭有关联的感觉，但有时候也会让你觉得疲惫，对，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啥也没说。”

而有些负面反馈会更直接。“在我之前跟一些认识的人试图去展开严肃一点的对话时，很多人给我的态度是你没事不要炫耀学识。就是他们对我的感觉是好为人师，或者说你懂得真多。但也可能是我的讲话方式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他真的不懂。”

她被一种实用主义刺伤过，就是明明在讨论问题，对方带着讽刺质问她，你这些观点有什么用，你帮助过什么人吗，你改变过什么人的生活吗。

“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有点多，因为我对谈话一直很感兴趣。然后没有类似困扰的朋友就会劝你，和聊得来的朋友说话就可以了。”

Wen 的问题，可能还是对于开放式的聊天抱有预期。她可能认为人和人的交流理应是可以理性推进的。这不是多高的要求——她会认为是愉悦的那种聊天会比“理性”复杂很多。说来也很讽刺，是一个她一贯抱有强烈不信任的白人男性带来的。

有必要先说一下 Wen 的经历。她是浙江人，高中之后去英国读了哲学系的本科，又继续读了文化研究的硕士，并在伦敦工作了一点时间，直到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家人需要她回到国内，一直到现在。本科的时候她因为语言，也因为是系里仅有的 4 位有色人种之一，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聊天”这件事上可以喘口气——某种意义上还有赖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中国大陆性别议题事件带来的公共讨论。

她当时看不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在伦敦上的班也是因为那份工作给她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焦虑感到现在依然延续着，但说起来，2020 年回国之后，那个“聊天”问题并没有随着她回到母语环境而解决。

“我之前在外面太久了，每次回来都是片段式的。我觉得自己离这边在发生的事越来越远，或者说，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人来讲，我错过了一些很重要的讨论。然后这次回来……我发现大家日常的相处就是希望能够更舒适，或能够逃离某些状态。有些人其实可以不讨论问题。”

在上海她有过三次成功的聊天。一是在一次临时演员招募的现场认识了邀请她来做接力访问的东威，二是女朋友小王，第三次就是让她反思对白人男性是否过于刻板印象的 Gavin (也许我应该跟她说，根据概率，这样已经算很幸运)。

Wen 因为受邀和 Gavin 合著一篇文章而认识他。“他是我见过最会自我反思的人，而且不断在摄入新的观点。他不会固化自己的目前赞同的观点，而是会去寻找不同的声音，再自己做一个总结……我们俩的对话一直都很可以聊很久，非常轻松地在正方、反方之间转换，不带有太多的‘天线’，或者可能会聊一些在其他环境下讨论需要小心一点的问题。”

“我在我熟悉的一个语言或者文化环境，但是最亲密的、可以进行对话的人是一个苏格兰人！我对自己充满了怀疑，你知道吗？”

而认识女友小王就很戏剧化。那天她们在一个艺术书店的休息区，刚被介绍认识彼此，小王就走过去挨个问在场的陌生人，“你是什么性取向？”后来 Wen 才知道，她是为了还击在场一个很不友好的男性的语言攻击。这种勇猛的姿态让 Wen 觉得，她认识了一个没有交流禁忌的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和她聊天，我就觉得一下子被打开了。”

“打开”、“透气”这样的形容在我们的聊天出现的频率不低，就好像我们不是在聊关于公共话题的聊天，而是在讨论类似于潜水或者呼吸训练之类的东西。

Wen 说自己对这些话题的看重，一方面是意识到公共话题在自己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另一方面也是需要借助这些话题的讨论寻求某种广义上的支持。她在初中发现自己性取向，在高中还和同学组建了彩虹社，但社团被学校叫停，父母也完全不理解她的举动和观点。她在身边很难寻求到安全感，出国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她刚刚辞去了艺术策划的工作，准备回到伦敦。而女友在申请到艺术家签证之后也会一起离开。她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出门，因为种种消极反馈，她感觉到社交意义上的疲惫。很显然，虽然认识了一些亲密的朋友，但这个需要进行呼吸练习的环境对 Wen 来说，还是不够友好。另一方面，她依然需要和父母维持某种安全距离。

至于她曾经以为的“在熟悉的语言文化里”，自己可以更密切、更实时地参与到公共话题、公共事件里去——倒是的确发生过两次，只是她本人肯定不会这么认为。

一个是学了咖啡师，当时她刚刚回国。我之前疫情的时候有焦虑，就是我发现我的专业、能力没有办法让我在一个社会崩溃的情况下获得认可。”她生平第一次试图通过抓住某种技能来缓解焦虑感。

其次就是在上海被封控被转运，以及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暴露”了自己的公共性一面。

关于那场冲突，她复述的时候没有表露出什么激烈的情绪。后来还补充了一个发现，即，那天出来解决问题的都是女性。

“真的，身边那么多的男性，最后还是女性站出来，去拉那个人的是女性，最后去警察局为我们辩护的也都是那些阿姨。对。”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A: 做小王的护工，因为她骨折了。她从前是一个很灵活的人，然后在家会把家里掌控在一个让她精神可以平静的状态内。现在动不了所以失控了，我就在做一个类似工具以及伴侣的角色，在帮助她完成这份平静。其实这样对她来讲也很困扰，对我来讲，我在努力希望照顾我的伴侣的同时，在平复自己的节奏，不断被打扰、跟自己的空间一直不断入侵，但同时又希望能够照顾她。

**Q: 这是有趣的部分吗？**

A: 我觉得很有趣，让我反思之前的一些生活方式，主要是生活心态。

我们自认为都是很好的伴侣。如果从亲密关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照顾一个受伤的人或照顾一个生病的伴侣，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为什么这件事情给我们双方都带来这么多的困惑，跟小的负面情绪？就非常有意思。

**Q: 你们毕竟经历过封控同居的考验。**

A: 当时在家里最受欢迎的物件是降噪耳机，因为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假装对方不存在的空间——你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可爱的猫猫请不要告诉我！现在是第二轮考验。

**Q: 所以这件事的困难之处是什么？**

A: 就是我习惯扮演一个独生子女，一个学生，一个社会人，我每天依然是我，但是现在我醒来之后需要持续不停围绕着一个人，这个人需要更大的健康。我之前生活中完全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要放掉一部分自我需求。这是一个新技能。

**Q: 推荐一个有趣的人来接力？**

A: Dika。我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她在混乱的时装周后台看书发呆。她可能是个非常会观察而且充满好奇的人，交流中会把观点转化为直击痛点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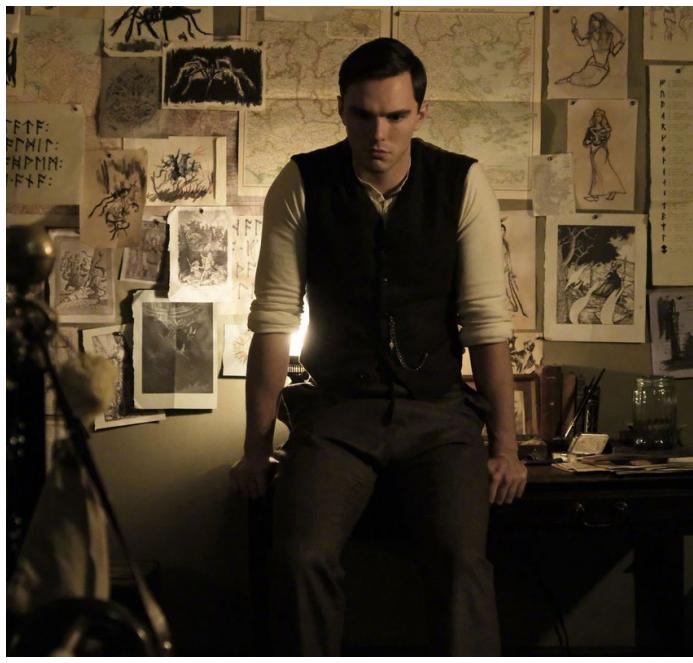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托尔金》(2019)剧照

## 专栏

# 033 冯俊华 你一个人已经没办法过上 自己想要的生活

杨樱 | 接力访问

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出现，  
最好是自己去创造。

2015年夏天，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消息快速传开，这是首个由波兰语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全译本。到年底，这本书登上了各种推荐榜单。有很多话题促成了这个结果：这一年是密茨凯维奇逝世160周年；《先人祭》最早由周恩来指定翻译，成为中国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全书共四部，1976年率先出的是其中政治色彩最为凸显的第三部，之后另外三部却让读者陷入了漫长的等待……历史上，这本书自身的政治性并不亚于其内容的政治性。

冯俊华推动了2015年全译本的出版。“推动”这个词，如果从商业的角度说，你可以替换为策划；从生产的角度说，鲁迅在一百年前就开始推介密茨凯维奇，一百年后四部诗剧才得以首次汇集，而且是从波兰文直译，冯俊华称之为“文脉的补全”。他以“副本制作”的名义与出版社合作，但后续关于这本书的报道里，几乎没有人提到这个发起人。

冯俊华也乐意隐身。那一年，他和朋友们在西安美术馆还举办过《先人祭》朗读会，晦涩的活动说明中提到了作为灵魂的第三部为如今的中国年轻人面对密集的精神事件，如何书写、创造，并成为那个实践的人”做出了可堪借鉴的回应。

同样是波兰文学的翻译，翻译家易丽君推荐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希望为此翻译《云游》——就没有被冯俊华纳入“推动”序列，这多少成为他对前辈的歉意。但冯俊华也想得穿：托卡尔丘克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日后无论版权还是话语都将成红海之争，不会缺愿意出版她的机构，“副本制作”没需要参与其中。

“副本制作”的非商业面向，以上是个大抵的说明。2014年“副本制作”创立5年的时候，冯俊华接受采访，说自己做的事情儿比较像“文化上的游击主义”，以小而灵活的方式推动

关注的文化议题。其中包括文学上的创造力，比如作家赵松的《抚顺故事集》、胡安焉的《派件》(即新近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最早都由“副本制作”发掘；也包括《先人祭》这样，从一个文本展开的对时代的思想回应。具体到形态，有和出版社的合作专案，也有风格独立的自印本。基于中国的书号制度，很多人把后者称为“独立出版”或“私出版”，但冯俊华不喜欢这样的二元对立划分，他称之为“小出版”。

这又涉及到他对“副本制作”的设定，当我们谈及这些，谈话就变得很宏大。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汉语是一种不完善的、没发展成熟的语言……民国的写作者都是青年……也被文革打断，之后大量的翻译虽然进来，但所谓现代汉语没有经过思想史的清理。”“起码要和某种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步，否则不会有你想要的那种当代汉语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你要推动新的文学，首先要作用于大家思考和讨论社会的思维。”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看待世界的一种视角。冯俊华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依循这样的视角为自己设定了环环相扣的行为路径、交际方式乃至生活意义。

“我想过上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的困难是，你一个人已经没办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要找到伙伴在一起创造这种可能。”

冯俊华1984年出生在广东阳江，一个如今以刀具全球制造闻名的地方。认识冯俊华之前，介绍他做接力的欧飞鸿说阳江的精神传承很是了得。在聊天之后，我多少了解了它的“了得”之处：前辈创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让冯俊华得以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构建不一样的精神世界，而这也决定了他和主流世界之间的关系。

以下是他口述，出于阅读考虑，语序可能有调整。

那时候阳江开了一家书店，叫世界书店。老板是鲁毅，他现在在上海开书店，梅菲斯特书店。鲁毅是从湛江搬过来的……他开的书店是阳江当时青年社群的根据地，因为当时阳江有一个叫“阳江青年”的文化生活新浪潮。其实1999年就有了，我是2002年开始接触到他们，上高二的时候。

1999年时就有艺术家郑国谷、冯倩钰，作家陈舸、鲁毅、陈B等等一群身份丰富的市民，这些人都在(阳江)，阳江当时离广州没有高铁，坐大巴至少3个小时，更早前要7个小时，但来往还是很紧密，鲁毅每个周末都要到广州进书。广州有自己的文化场景，比如打口音乐，后来叫“广东快车”的一群艺术家，基于珠三角的生活、生产场景做创作，像大尾象、曹斐，还有陈侗(就是欧飞鸿的班主任)、段建宇、王惠敏……阳江的这一群都是70后，广东快车从50到70都有。

阳江有小城市的便利，交通很方便，互相串门很方便，我小时候只有一个老城区，后来扩大了些，还是开摩托10分钟哪里都可以去到，我从家里去世界书店踩单车大概20分钟。

初二的时候我买了肖全的《我们这一代》，在新华书店，很大一本画册，我记得要180还是120元。那本画册对我是有影响的，因为从肖全拍的不同人的状态会看到人生的可能性。其中有写博尔赫斯书店和陈侗，说他长一副林彪的样子，还推荐了博尔赫斯的《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我一直记得这个名字，高一时在新的购书中心买到了，很兴奋，花城出版社出的一套。

中学时，各种活动是要在校门口写黑板来通知的，有天出了个黑板报，说世界书店发起个全市诗歌比赛，欢迎来投稿，头等奖是一套百年经典诗歌丛书。后来听鲁毅说投稿的人很多，还有一家三代一起投的。现在很难想象。那时我对书已经有判断力了，会注意到这个奖品，觉得这个书店眼光好。世界书店的位置偏郊区，新城还没有开发过去。我就一个中午踩单车去，结果找不到。它是鲁毅自家的自建房，外墙刷成黑色，在阳江是著名的奇奇怪怪的建筑，由一美公司做的。我找到了这个房子，但它没有招牌，有个落地窗，卷帘拉下来看不到里面。我那时没见过卷帘，以为是个空白的橱窗就回去了。后来又看到个黑板报，说陈侗在世界书店做讲座，这次我掐着点去了，结果讲座提前一天举行了，当时没办法发推送更正。

但就认识了鲁毅和几个同龄人，我们聊天时，聊着聊着从二楼走下来一个女孩，是我的堂表姐，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小学毕业后就失联了。双方都大吃一惊。然后我才知道她已经加入了一个叫点石的方言乐队，当主唱，同时是阳江第一家麦当劳的经理。

从此之后我开始了大肆逃课，还拉上同学一起逃课。我觉得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学习的场所。家里不知道我逃课，后来肯定知道的，但怎么管我不记得了，反正几乎每天都在世界书店里看书。它有大量文学、艺术和当代文化的书，别的书店零散也有，但不会这么集中和新。我天天翻，然后和店员、同学讨论，和前辈讨论，比如“当代是什么”

之类。

店员都是同龄人，也写作，没考大学。80后有一段不考大学的风气。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一开始是作为读者，后来作品被大家看到了，算是作为创作者被认可、加入了这个社群。世界书店的空间是一层一层的，完整的叫法是世界机构。一楼是世界书店，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二楼是客厅，也是社群聚会、放映的空间，往上是主人住的，还有客房、书房，顶楼即五楼是图书室和工作室，世界机构在这里生产小册子，用喷墨打印机打印、手工裁切装订，做过鲁毅自己的诗集、小说集，陈舸的诗集，还编了一本刊物叫《世界虚构》。

这段时期看到了当代文化、主要是当代艺术的运作场景，一种“后台”状态。一般来说关于艺术，你会看到一个白盒子，作品被打着光的一个展览之类，但那时可以看到作品在生活中是怎样被生产的，艺术怎样被讨论。比如“广东快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就是在阳江租了一层烂尾楼，先在那里搭建，做好了再拆解、走私运去威尼斯；世界书店办了很多交流，“阳江青年”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也吸引了很多策展人、机构、媒体来。同时，当时艺术市场和体制开始形成，你能观察到社群在分化，听到一些之前没有的相互抱怨，和话语上的、其实是自我历史化的焦虑，你会希望自己不要陷入这一类焦虑里，这驱动我做了后来的很多决定。

到2002年底，我们这些80后小孩开始在阳江做自己的空间。就大家想亲自动手试试可能性。那时鲁毅有一个说法，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出现，最好是自己去创造。”意思是等不来别人的，哪怕别人做了，也不会是你想要的样子。后来陈舸还有个说法，也对我影响很大：“自由是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当时我们做了打口青年之家，第二年又做了打口书店，都是诗人陈舸支持的。

我后来参加了高考，为了能够去广州，去博尔赫斯书店工作。我把所有志愿都填了“市场营销”，因为我觉得文学和艺术都可以自我教育，但市场营销可以让我接触到不同的人。我想得很清楚，要去博尔赫斯书店做学徒，还给自己定了“多看、多想、不要问”的规矩，“不要问”是很重要的，迫使你自己去理解和在实践中印证。我和父母有过紧张的青春期，后来就划出一些边界，通过这种对抗，他们知道你起码决定前是会想清楚的。

2004年初我去博尔赫斯书店兼职了，还是逃课，因为离学校很远，后来在中山大学西边的城中村租房住，一年后，更多伙伴从阳江来到广州，我们就开始做合作社。当时广州的文化和艺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对什么是“空间”有了“专业性”的强调，要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去。合作社让我们能在新的环境下消化阳江的经验。

合作社叫“ding-ding-fing！”，这是阳江话，意思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它来自前辈的批评，指我们怎么能租个城中村的破房子就做“空间”呢，还在里面过集体生活，家具也是拼凑的，太不“专业”了。这种批评确实挺困扰的，但还有阳江青年的心气，说这就是“ding-ding-fing！”合作社啊。当时金特也来博尔赫斯书店打工，后来我们还在同一家快餐店打下手和送外卖，那时餐厅会养外卖员。小说家彭剑斌参加了合作社的开张，因为天已经热了，他给我们送了一个吊扇。那是6月3日，卡夫卡逝世的日子，我们聊了一夜卡夫卡。

除了彭剑斌、金特，还有其他路过广州的朋友会在合作社落脚，图书室也是开放的。黄灿然到广州就住在合作社附近，诗人凌越家里。他那时还在《大公报》上班，习惯熬夜，我和彭剑斌去找他通宵聊天，从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一种完整的写作者形象。高中时，他有一篇翻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通信。布罗茨基写的是：

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因为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一个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族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作家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我是写小说出身，无论怎么思考宏大命题，最后都得落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人身上。有一种对复杂性的信仰，对布罗茨基说的这种“人性的幽微”会比较敏感，也因此对口述历史感兴趣。后来金特提议合作社做一本纸刊，逆当时不注重编辑的网络发表风气而动。我们沿用了世界书店的经验，用喷墨打印机打印、手工裁切，就叫《ding-ding-fing！》，最初想法更像艺术家书。

合作社到2008年破裂了。伙伴们平时相处很亲密，在情感和人格完整上给彼此提供了庇护，但对从阳江青年开启的社群经验可以向什么方向演化有不同的想象，回

头看也谈不上想象吧，就是消化了、模糊觉得需要有一些变化，那些相处虽然有安全感，但让它有创造力哪怕是挑衅性的那个环境已经失去了。讨论还是无法弥合，后来喝多了还在街边打了起来，有路人报了警，可我们打一阵又互相安慰又打一阵，警察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管。合作社最后就关掉了，保留了《ding-ding-fing!》。

那是我比较忧郁的一段时间。我搬到了同一个城中村的另一个房子，住得昏天黑地的，睡醒就去网吧玩《魔兽世界》。但开始理解物理空间乃至公共空间折叠进出版空间这件事情，也开始想什么条件下能重新打开它，怎么制造条件。到年底，这个心情下出来了“副本制作”，“副本”是来自《魔兽世界》的一种空间形态。

我首先会关注持续性的问题，会从最糟糕的情况开始琢磨，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支持，包括认可、对虚荣的满足，只有你一个人了，事情还能不能做下去。我也不想在焦虑的推动下做，可以有苦恼，很多苦恼，但不要有焦虑，包括不要在一种对抗性的心情里，不让事情落在自我历史化的话语上，不要有侥幸，包括对自己的人性的侥幸。这需要先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欲望。比如祛除了原来附着在“艺术家书”上的审美化，比如遇到利益的场合，如来自一个领域的利益，我会放到另一个领域去权衡，自己在这个领域遇到同等程度的利益会怎么面对，反过来也是这样能拆解掉一些诱惑。我是怀着这个心情到现在的。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吗？**

A: 曾嘉慧发起了个叫玻璃屋的出版计划，专注于东南亚的文学与思想。六月要出版布鲁岛四部曲”的第二部《万国之子》修订本。此前已经出版了《红运》和《人世间》修订本。

**Q: 对你来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A: “玻璃屋”这个名字来自印尼作家、记者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1965年的930事件后，他经历了四年的关押、十年的流放、十三年的软禁，在流放地“印尼古拉格”布鲁岛用口述形式完成了“布鲁岛四部曲”，一部关于现代印尼、其实也是“新人”如何诞生的长河小说。198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出版“布鲁岛四部曲”的前三卷，但最后一卷的问世却无限期地搁置了，这一卷就叫《玻璃屋》。

相对如“密茨凯维奇五卷本”这样的策划（今年会出版第五卷也是最后一卷《密茨凯维奇文选》），“玻璃屋”把自己放在失落已久的新亚文学运动的精神脉络里，也希望触及一种对当下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我们的期待是和读者们“一起将种子抛向风中”。

**Q: 这件事困难之处是什么？**

A: 缺能直接翻译的译者，版权沟通复杂（部分出于文化情境的差异和版代不完善），编辑上也缺人手，需要各种亲力亲为，有规划但应付不过来更多选题的推进。总之，欢迎对这个方向有兴趣的出版机构不吝与我联系，也欢迎大家关注“玻璃屋”的公众号。

**Q: 推荐一个有趣的人来做接力？**

A: 就曾嘉慧吧，她正在印尼做田野研究，刚从登革热中康复过来，她让“玻璃屋”活跃于东南亚的小出版网络。此外，前面的采访中，我虽然说了一通怎么祛除焦虑，但有时不免也妨碍自己对世界的好奇心，这时要感谢朋友们愿意从各种认知局限中拉我一把，嘉慧就是这么一位朋友，我尤其爱听她讲田野的见闻。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此地吴人》“演出”中；图片均来自公众号老妖精 ssssss



城隍庙小商品商城里的“林子舞厅”

## 专栏

# 034 一娃 这里最大型的表演， 轮不到艺术家来做

杨樱 | 接力访问

当大家在表演里避世的时候，  
有群人偏偏希望让你通过表演更清晰地看到世界。

2022年10月15日，一个周六晚上。上海外滩美术馆举行了一场《老妖精 2022 特别非必要拍卖会》，拍卖内容是廉价的舞会和演出道具，比如红绸缎，大头佛，雨丝，或者有着大荷叶边的布面扇子之类。此地离佳士得拍卖行恰好一个街区的距离。当然了解这一点除了给参加拍卖会的人增加内心戏之外，并不会给这场拍卖带来更多收入。这场拍卖的组织者“老妖精 ensemble”（下文简称“老妖精”）在9月28日就在同一幢楼里开设“林子舞会”零售商店，拍卖、零售和流动商贩的行动整体构成了一个表演艺术作品，叫做《¥2.50》。

“林子舞会”的确存在，是城隍庙小商品市场里一个同名主营舞会派对道具的小商铺。老板娘林子 70 年代生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因为疫情管制，舞会变得“非必要”，做了七八年舞会道具买卖的林子如今拿出店里的半面墙改卖拖鞋，勉力支撑生计。2022 年上海封城之后，整个小商品大楼空关店铺无数，林子的店开在一片冷清中。在刚解封之后的 6 月，“老妖精”为林子带货，踩着“6·18”的热度做了一场淘宝直播——你也可以，一群艺术家做了一场形式是淘宝直播的表演。

“老妖精”之所以在外滩美术馆做《¥2.50》，一是因为她们与林子“在非必要层面上产生了一丝共鸣”“其实我们做的表演艺术也是‘非必要’”，一娃说：“而且可以说是当代艺术系统里最非必要的”，由于它非物质化的存在，就算有影像、合同等物质收藏方式，但这类主流表演艺术收藏和升值都低于其他艺术，在拍卖和收藏体系里几乎看不到它。”

她们调研了类似小商品商贩在疫情期间的生存状况。此前她们经常因为要临时购买演出道具，连网购都来不及，只能冲去城隍庙这样的地方采购，因此不但认识了林子，

还对类似的商业形态在一个多元城市里扮演什么角色有直接了解。因此把城隍庙小商铺空间直接植入外滩大楼，也是对这个两个空间进行最直接的并置对话。

她已经忘记那天一共拍卖了多少钱，只记得“老妖精”最后还拍卖了一场派对，而之所以特别拍卖这个，“也是因为那时候还不能聚集，只能搞借艺术的由头，办一个派对”。

一娃出生于 1995 年，是“老妖精”里最年轻的成员。这个组织对自己的介绍很长：“一个混沌中正在形成的集体创作共同体。以当代实验剧场为创作媒介……寻找比传统戏剧舞台更独特的现场。”如果以更粗糙的说法介绍，那就是这是一个除了舞台哪里都可以演戏的创作群体，而所谓“戏”，既没有明确故事，也不设立传统的观演关系——如果你去看“老妖精”的戏，你绝对不会是那个坐在那里鼓掌的人。

“老妖精”于 2018 年初由三名女性剧场创作者成立，现在核心成员六人。一娃是在 2018 年末的时候加入老妖精的，那时候她刚从美国本科毕业，学的是戏剧导演，还有一个“毕业实践两三年再去读研”的人生计划。不过本科一毕业后她就一直怀疑剧场的意义和功能，“舞台上炫丽的声光电虚构出来的世界有什么意义吗？什么样的剧场作品是值得消耗时间和资源去做的？我（因此）对世界做了什么改变？”

那时候她已经在之前假期回国的时候和朋友在家乡杭州玩过一系列公交车作品：在每年跨年的时候，问巴士公司租一辆公交车——日租比她想的便宜很多——以此为创作框架，探讨公共空间的行动可能。每年跨年杭州交通惯例大堵塞，尤其是景点附近，游客会抓狂到抓住任意公交车就往上挤。一娃和朋友们在车上做了装置，还用大喇叭播放声音作品，有不明就里的路人困惑抗议“噪音”，着急下车，也有缓过神来的路人激情合唱，群魔乱舞，一起瞎搞。

真正为“老妖精”这个创作共同体奠定气质的，还是 2018 年“每周一挠 – 自画像”系列。“我们在上海找了 5 个不同的空间，一家古董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性用品商店，还有当时面临拆迁的棚户区定海桥，一个地方待一个礼拜，就地取材。”一娃说，其中发生在上海老工业居民区定海桥里的场面是这样的：

“定海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东西，而且流动性非常大。比如店铺招牌上写着山东烧饼，其实在卖香蕉……你可以看到人口快速流动的痕迹，同时我们也在里面找到了很多跟自己身份有关的东西。比如老妖精有一个女孩是温州人，爷爷是渔民，她最后的展示就是在水产店扮演一个卖鱼小妹，在那打电话；有成员在理发店想起妈妈小时候给她洗头发的感觉，最后她在里面表演洗头，观众也真的可以进去。我们会用声音漫游的形式，让观众每个人有一张手绘地图，用声音引导大家走动，最后所有人一起走到定海桥上，等一艘船过来。”

艺术机构看中“老妖精”的活力，邀请她们进入美术馆演出——对于一娃她们来说，美术馆这样的“白盒子”是无内容的场景（Nonplace）。于是她们做了关于美术馆里“看不见的人”的作品，邀请了美术馆的观众、志愿者、安保一起参与创作，用行动和表演的方式试图去打破空间的规则和权利，审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美术馆关系、和艺术的关系，以及美术馆空间与艺术的关系。“就想问美术馆这个空间到底是谁的？谁在主导？谁在参与？通常都会放大那些生产者们——艺术家和策展人——但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的潜在规则和那些你看不见的人。”

其实一娃在进入“老妖精”之前有过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和她的毕业衔接特别丝滑：5月28日她在美国毕业，6月1日她就在杭州开始上班了。工作是她自己找的，在一个沉浸式文旅项目里当助理导演。她有一种戏剧专业找不到工作的隐形焦虑，这种“丝滑”某种程度上还让她很自豪。不过这个项目只进行了四个月就宣告倒闭。一娃到了上海。

加入“老妖精”解决了一娃的剧场虚无感：所有的作品都来自于行动和感受，而不是凭空的想象。“我们经常的创作方式是一群人去一个地方，行走、聊天、采访、记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东西作出回应。”与此同时，“老妖精”变成了一个共同体，不仅是创作层面，也是在生活层面。

五年之后回想起来，一娃觉得“老妖精”最初的成员生活和创作都处于某种不可复制的乌托邦状态。几个成员吃、住、讨论、创作都在一个公寓里。“每周一挠”项目——集中创作6天再表演一天——维持了四个星期，回报不过是每次88元一张票钱，每场大约四五十个观众，数千元的收入权当物料和基础生活费。“那个时候真的根本不管，没有场地支持，没有资金支持，没有机构背书，要做就做，然后大家不拿钱也可以……那时候我身边挺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就只是想要做东西。”

这样的勇猛生活让一娃和朋友们离现实很近。我问她是不是因为疫情耽误了出国读研，她的回复是“其实没有那么想急着出去”。“我觉得在这儿很实，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感觉很飘，飘在他们的一层话语上面……比如说移民亚裔……你做剧场，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要做亚裔剧场，你必须代表某一个东西，但你又觉得那个东西跟你没有这么贴近。这几年我们做‘自画像’，做棚户区的移民，做公交车这种公共空间的作品，是我皮肤能碰到的东西。”

“老妖精”有一个城市探索型作品，叫做《此地吴人》，“不是文献剧场也不是口述史，而是基于史料与个人记忆的再想象”。表现形式是声音漫游，参与者“成小组出发，在声音的指引下，追寻苏州人小杨的脚步，来到1938年的上海，途径曾经上海公共租界的主要街道，了解隐藏在建筑背后的故事”。一娃把这个叫做“知识生产型表演”。

“因为表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词语。我们经常会套娃地说，我们在表演表演——什么是表演，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交叉学科，背后有很长的研究，最后的创作反而比较快。”



《此地吴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创作反倒更快

你可以在“老妖精”的公众号里了解这个迷人的创作，这里想说的是，《此地吴人》的形式和越来越流行的旅行消费项目city walk不谋而合，一个文旅项目因此找到“老妖精”合作，并带来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观众。

“那次很多参与者其实是出来逃避生活的，对，包括现在的沉浸式戏剧——你被带到一个新的世界里，可以短暂忘记掉你原来的生活。但我们的创作又很想让你逃避生活，我们是反沉浸式。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悬挂式，就是人挂在空中，脚面点到水这样子。我们拒绝造景。但普通人已经每天在直面生活，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就想娱乐，就想密室逃脱一下。他们以为是来找线索打卡破解谜题的，结果发现要带着一个滤镜看真实生活。很多人不满意。”

大多数情况下，“老妖精”的观众都是有开放心态的人，这是因为他们从不在大麦网之类的渠道上售票的缘故。“传统观演关系有自己的好处，因为观众会有自己的预期：进一个空间、看一场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地下剧场工作者，因为与主流和系统保持着距离，始终游离在边缘。”

不过讽刺的是，2020年是“老妖精”特别紧俏的一年。因为疫情管控，那一年国外的艺术家都很难进入中国，而传统的剧场无法开张营业。“老妖精”因为又在本地、又可以

在户外空间进行创作，就频繁接到邀请，上面提及的和文旅机构的合作，《此地吴人2.0》版本，就是这样的背景。

“老妖精”的各种创作张力都来源于真实世界本身的样子，就像是在现实世界面前竖起一面镜子，而你分不清哪一边才能叫做“表演”。这种感觉一娃也聊到了：“我们很喜欢把社会中的真实的、有表演性的场景用到我们的作品里面，但我们这儿完全不缺这种社会性的表演……最大型、最精彩的表演，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表演，（要是拿）我们这种‘艺术家’做的作品去比，我们都弱爆了。”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聋人演员和艺术家，很年轻时候就去欧洲留学了。我想和她一起做一个工作坊，看看手语可以如何和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当代的语境下产生碰撞。比如现代舞和手语可以怎么碰撞，摄影和手语可以怎么碰撞，或者说雕塑和手语可以怎么碰撞。具体要做什么还不知道，只是先把人带在一起。

很多朋友都问我你怎么还不去做那个手语的戏，我的确还没有，因为我没办法做到“觉得手语这个东西好，就去拿手语排个戏”。这里面一些隐形的权力关系，就是艺术家“我要做一个作品，你是我的素材”那种。所以我就想让大家先不要以结果为目的，自然地发生一些了解和交流。

**Q: 手语对你来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A: 手语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时间性的艺术化表达。现在很多人对手语的理解都还停留在翻译层面。我觉得手语有自己的艺术化职能。因为它是一门视觉语汇，可以构造的艺术形式太多了。手语也像一门秘密语言，我有时候也会教我朋友一些手语，在一些比如很吵的场合上用来偷偷交流一些简单的信息……手语是来源于听觉的缺失，但又给这个群体创造了一个很美的东西。

**Q: 那你要做的事情难在哪里？**

A: 你说手语和艺术的融合难度吗？在中国的聋人群体里面，现存和艺术产生关系的方式是比较单一的，当然现在上海有很多人都在做这方面的行动，但我觉得还大有可能性。比如如何更大面积的触碰到聋人群体（而不只是非常固定的一小部分人），比如更深入地探索手语作为视觉符号、语言本身、肢体动作、节律动能这些不同方面在剧场语境下的潜力。但更多的我还不能设想，当然我也不去设想。就想先玩一玩。

**Q: 推荐一个有趣的人来接力？**

A: 上海本地独立音乐人孙大肆。她会把一些在地的事情写进歌里。感觉她是一个很能观察生活的人。



杨櫻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青塬文化

## 专栏

# 035 滕宇堃 提问“我们该往何处去”之后

杨樱 | 接力访问

答案：先得找和你方向一致的人

滕宇堃在大学里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所谓公民社会是适合当下的吗？

这句陈述需要一些背景解释。滕宇堃出生于1995年，2013年9月，他从兰州到广州上大学，接触到了NGO并开始担任志愿者，一年之后就开始独立负责项目，比如关于环保项目的一线调研。“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所以我就去做了，做了以后，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样子”。滕宇堃看到很多NGO遭遇政府机构的压制，后者认为NGO许多行动危险而敏感。到了滕宇堃毕业的2017年，广州许多公益组织停滞或解散。他到后期也只能转入学校社团做事。所有这些让滕宇堃困惑：为什么会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他毕业三年之后才浮现在他脑海里。他说2020年他状态低迷，因为对陌生的新冠病毒感到恐惧，也被武汉发生的一切正面冲击。

但是当时的滕宇堃已经要比2017年毕业的时候成长了很多。这种成长根据他的说法，有他一贯的随机性。而和滕宇堃聊天的有趣之处在于，你会意识到所谓随机并非完全是无方向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人去除了做事的功利性。

滕宇堃毕业之后去了一家基金会工作，那时候他还在试图解决困扰自己的那个“公民社会”的问题。基金会让他看到了另外一些NGO的状态，它们和政府走得更近，提供政府可以采购的服务，所做的事情也直接与城市、乡村的居民生活相关。滕宇堃对这样的工作状态没有直接的评价，只是说和自己大学期间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法，以及他意识到，必须让更多人认识到“公共是重要的”，包括“关键位置的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极端事件的发生。

但是在基金会参与一项公益人才培养的项目时，滕宇堃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项目内容是这样的，他要去广州一所大专职业学校里培训学生，让他们加入基金会资方设立的公益慈善学院，并致力于公益事业。“真的接触以后发现，职校的学生是两类，一类打算专升本，一类就是玩三年，回家反正有事情等着我去做”，负责具体事务的他发现资

方只是一厢情愿。

他在2020年彻底离开了基金会，“这个事情里面，我意识到了做公共事务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宣称的和实际执行的是有区别的。”

而他那时候打算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和自己大方向一致的人。于是他一边在各种公益机构兼职，提供之前自己积累的服务经验，他称之为“咨询顾问”，一边在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

这就会说到滕宇堃“随机”的人生态度。“就是我现在手头有事情做，做了以后我觉得是对的，我就会接着做；遇到问题，我就想把问题搞清楚，搞得差不多了需要做选择，那就做选择。我觉得所谓目标是个被塑造的过程，不同人会告诉你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做事也有自己的规则，首先是认真对待正在接触的人和事情，其次是不作预判。“我2017年听过一个长辈的分享，他在结尾的时候说，人生的路径不是你走出来的，是你走完了回头看，自己把那条路串起来的。”

他开始做自己的“公共客厅”，和一些朋友一起讨论、记录时事，保持对自己周遭生活的观察。新冠疫情三年，这成了他持续进行的一件事。

“2021年10月，就是当年广州第一次封控之后，我做了一个‘疫中诗’工作坊，其实就是叫几个朋友过来一起做一些表达，任何疫情期间的个人状态都可以。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个参加活动的朋友突然在街上碰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他现在开始尝试读诗了，之前读不懂。我觉得好像那次对话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东西。”

这事固然有公共性的面向，但滕宇堃说，这也是他的个人生活需要。所谓“公共客厅”，也无非就是不定期邀请朋友来吃饭，而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聊起很多事情。

根据我的吃饭经验来看，滕宇堃至少做了两件额外的事情，第一是筛选了来吃饭的朋友，第二是多多少少有自己希望探讨的议题，而且希望把有价值的讨论沉淀下来。

滕宇堃对于前一点表示同意，他说他本来就很认识很多不同圈层的人，也会定期和各种人互通有无。他根据相处状态把不同的朋友分类，有一类是专门吃饭的，微信发一个链接，去吗，去，好，定好时间就走。”这样的饭局聊天不会深入，但可以帮他了解朋友的生活；有些朋友是专门一起读书的，尤其是他有书自己一个人推进不下去的时候；如果是那种讨论问题的朋友，交往的时间一般就更久，有相当的了解和信任。

2022年底，滕宇堃把疫情时期大家的一些讨论印成了小册子，送给朋友们，算是对这段实践的小结。然后他自己开始往更公共的生活方式推进——做一个“知识文化共同体”。

这件事的起源是这样的。滕宇堃的四个朋友，从2019年开始从事面向县城高中的人文教育项目，一开始是带着同学们读书，举办夏令营，而滕宇堃是项目的咨询顾问。在项目进行到2021年时，大家开始思考更多可能，“如何让对人文、公共精神没有太多接触的学生去找到自己生命历程中那些公共性的点，并且还愿意跟着一些脉络持续学习相关的内容。”

这也是滕宇堃后来深度参与的时间。因为他们发现，对于县城的高中生来说，单一的阅读只能带动一小部分人的兴趣，甚至这个部分的同学的热情也开始降温。反倒是学校里的一些社团活动，很能唤起同学们的兴趣，而且也的确需要方法上的指导和支持。于是滕宇堃和朋友们开始推动一些校园行动和公共服务，同时配合人文阅读，反而更能推动同学们对于公共议题的关心。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文化共同体”的愿望出现了。其中一位常年在湖南的朋友，提议在长沙找一个落脚地，大家都同意了。或者说，大家都没想过“为什么是长沙”，只是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就把未来活动的第一个据点放在了长沙。

那是一个岳麓山脚下的院子。打开滕宇堃的朋友圈，你可以看到他2023年的持续劳动：如何收拾一个乡村院落。4月6日发的一条，是两个广告海报夹着一桌菜的照片。海报大字写的是：

**想要耕田吗？想要搬砖吗？**

**青塬小院！周六周日！欢迎青壮年劳动力来蹭饭！**

中间那桌菜看上去挺好：蒜泥黄瓜，红烧茄子，干锅卷心菜，土豆烧肉。

到了4月9日，他的朋友圈里就出现了十几个人；到了4月20日，关于这个项目的首个公众号自我介绍出炉：为了解决“我们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四个项目所有人在岳麓山这个地方共建“文化共同体”，从读书会开始，推行可持续的生活实践，未来还会向更多湖南的县市走，了解县乡生态，基于本地社区历史文化推动“人文营地”。

公众号里没有提及滕宇堃的名字，他在转发的时候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其中说：“2023

年，我会拿出至少一半时间来建设这个文化空间”。与此同时，他还会继续做公益组织的兼职咨询顾问，做自己的家族史，和继续发展自己关于茶叶的爱好。

这很符合滕宇堃在朋友们面前一如既往的模糊形象：“教育圈的朋友会说，我是在做县城高中生人文教育；环境领域的朋友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做社区的；在商业领域混得比较好的朋友会说，这个人好像是在做公益的。”

滕宇堃对青源小院的设想是，在所谓的“共同体”之前要加上“流动”这个词。“可能有状态、有需求的时候就来到了这儿，当觉得需求被满足的时候就离开，就甚至再也不回头，但你会带着在这里一起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去往下走。”

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要求别人在记忆里给自己做的事留下一席之地。而这里持续会进行的，就是关于公共议题的探讨。关于如何推动公共讨论，滕宇堃有一些心得：

“（讨论时的）心理防御是可以被放下来，但需要契机。我自己有一些奇怪的自信，觉得我可以做到让大家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放下防备。靠真诚当然不行，大家只会觉得你有点傻。需要一种场域的营造，里面有很多小技巧。”

“在线下，如何让大家把话说明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很多讨论时的矛盾并不是根源性的，甚至都不涉及根源，连表达那层都还没到，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矛盾——当一个人听到某个关键词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情绪封闭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在公共讨论里面非常常见的状态，也是最大的危险，因为你没办法去理解这个人到底要表达什么，而其实 Ta 只是语言体系和你不一样。”

“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帮助表达的人去做澄清，同时需要帮助聆听的人把耳朵打开。活动发起人需要掌握技能。比如一个人的表达并不一定跟公共相关，可能非常个人，往往在那种时候需要用一些方式让个人表达尽快结束，然后进入一些个人场合的时候，再让 Ta 继续下去。”

我们后来回到了那个让他从大学开始就非常困扰的问题：为何政府会叫停一些公益活动。滕宇堃的理解是这样的：“是标签。就是标签化的一些 NGO 的行为，比如这个叫做干扰，那个叫捣乱。只要出现了一些很类似的行为，你就会被认为有问题。”

我没有回到那个“所谓公民社会是适合当下的吗？”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滕宇堃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还补充了一个让他觉得神奇的近况。

“其实有很多朋友会主动不联系，但是今年开始，有很多人会重新找回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反正大家现在找回来了。我最近一段时间见了好多五六年前没见面的朋友，好奇我在干嘛……他们聊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相似性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想要找一些别的乐趣，但好像又找不到，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最近一直在搞园艺，院子上一任租户留了非常多的植物。跟植物待在一起让我找到一些新的快乐，比如角落里有一些球茎，我把它们移去有阳光的地方，过了四五天，叶子慢慢立起来了，还有些植物，原本以为它是不开花的，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开了朵花。

**Q: 以前养植物吗？**

A: 种过，但这里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比如说我最近认识了桃金娘，以前只在书里看过。

**Q: 这件事的困难是什么呢？**

A: 需要做一些工程，然后每天跟工人师傅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语言特别无力，只能上手做示范。

**Q: 你会推荐什么有趣的人做接力？**

A: 熊老苟，一位在大学时想要学习建筑，但阴差阳错成为了文身师的朋友。他的文身都是原创，还通过文身来帮助顾客完成很多个人表达。他的生活状态很有趣的是，完全没有按照社会时钟在走，但又非常稳定和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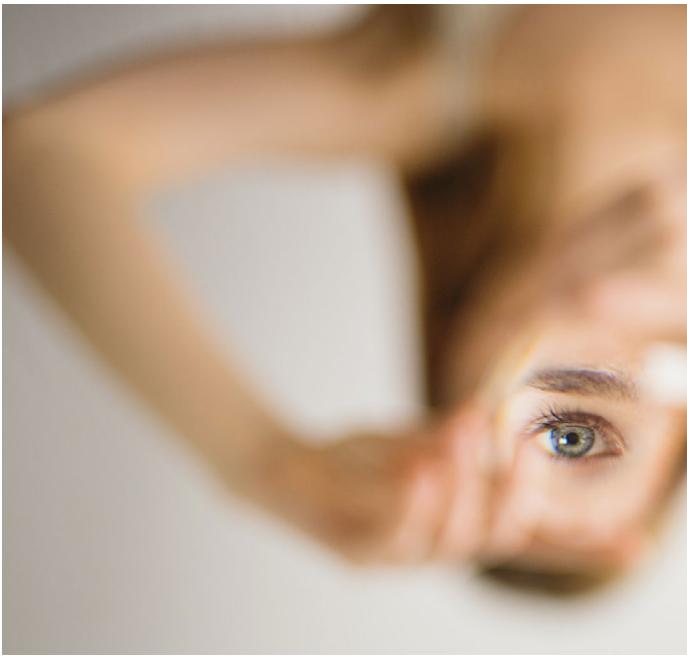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Mathieu Stern](#) on Unsplash

## 专栏

# 036 津一

##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别人，她决定先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

杨樱 | 接力访问

“对我来说，

精神 / 灵性探索是极具公共性的。”

津一说，她在进行“身心灵的探索”。

“就是我的身体如何运作，心理怎样运作，还有精神，是怎样的存在方式。”她探索的工具，是一个叫做 Circling 的社区——你可以很快查到它的官方描述。我的理解是，Circling 就像某种“精神瑜伽”。一群人，通过互相观察和不加评判的事实性描述，让掩盖在日常行为之下的某种精神内质自然流露出来，通过一系列经过验证的活动和交流技巧，让参与者放松下来、了解自己，然后在此基础上，改变参与者与自身之外的人的关联方式。没有既定目标，一切全在于参与者本身的需求，甚至看到需求的过程也必须是自己来推动的。

Circling 是津一在辞去全职的纪录片导演工作之后投入时间最长的活动。2023 年初，她从北京搬到了大理。这应该是她自天津和巴黎之外长期居住的第四个城市，也是她没有尝试过的生活：没有 KPI，但是有密集的体验和思考。我一开始理解为这是她在“自我疗愈”，后来发现她是在换个方式，思考并调整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比如和父母的关系。她说，她从之前的“我是孩子他们是父母”，变成意识到“这是陪伴你生命一段路程的人”。这种视角的转变，也让她发挥自己工作的技能，去发现父母身上自己以往没有留意的面向。

她没有完全中断纪录片的工作，但是更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如果用她现在的表述方式，就会是这样的：

“内在有一个很需要放松和休息的小孩，不喜欢被人喝来喝去，同时又很有灵感，很有感知力。对，我以前意识不到自己的感知力很弱，或者说我意识到，但是有另外一个

力量，一个‘教官’的部分一直在命令他……比方说，早上起来我喝咖啡，喝了半杯之后，身体可能说够了，但是我非常习惯性地、一定要喝完，就完成一个事儿。这就是我的小惯性……从小的一点可以延展到非常多的事情上。要做一个事，必须要做完、做好、做成功，然后被人看到，这个事才算完结，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身体会很痛苦，不想再做了。我以前都必须做完，‘老大’说了算，‘其他人’就得跟着，就被奴役的感觉。现在好像是说，这几个‘部门’要商量。”

津一是一个喜欢观察别人的人，拍摄影像是她表达观察和思考的方式之一。如今她用同一种好奇心来观察自己，只不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如她自己所说，需要额外的勇气来面对自己的阴暗面。她也试图通过这种自观重新梳理过去的思考。在以往做纪录片的时候，如何准确地用镜头语言表达人性的复杂，对她来说是个难题，有几个片子停滞下来，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想好，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

在津一拍摄的纪录片里，有一条叫做《孔唯唯：化身 PUA 终结者的暗夜美少女》，讲述一个反 PUA 女孩的故事。之所以会拍摄孔唯唯，除了好奇心之外，也有津一自身的经历投射。她在巴黎生活的时候，曾经被 PUA，然而她没有逃离，反而举起摄像机，将 PUA 她的人作为主角拍成纪录片，记录他的变化过程。

这种不同寻常的好奇心是津一的底色。关于她的更多自观和思考，你可以通过以下的口述更完整地了解她。出于阅读需要，语序有调整。

我从小觉得，我最大的好奇是个终极问题，就是人到底从哪来、到哪去，宇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其中的真相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会对人有好奇。小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跟着每个人看他一天的生活，那会是怎样。后来我大学学法律，有点被我爸强迫那种，其实非常不喜欢，这个经历让我以后坚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求我做的事。我再也不会听别人的了。

我对我父亲之前还有一些怨恨，他是一个缺席的父亲，然后又很父权，和他的关系影响我对很多性别议题、权力关系、自由，然后现在对身心灵的探索，然后会意识到我父亲其实有非常多他自己看不到的、又需要被看到的东西……可能从去年开始，我有更多的力量去接纳他们，也看到他们的一些需求。

比方以前回家会觉得无聊，但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但今年我回去之后，我们就一起去走访了以前我们在天津住的地方，采访他们在天津三十多年的奋斗，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到彼此……过往跟我父亲没有办法直接交流，他总打断你，也不能聊政治……就尴尬，但是你们又是最亲密的人。

我高中极不愿意回家，我觉得后来我出国都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想逃避躲避他们。我逃了很久，我觉得我现在有力量来面对了，但这个力量根源是我在学着怎么爱自己。当我能接纳自己、爱自己一些部分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他们的很多部分，包括他们对自己不接纳的部分，我都尝试去看到。还挺微妙的，具体我现在还不太知道怎么描述，但是我能感觉到变化。

(回国是) 大学有跟法国的交换项目，当时我参加了各种社团，也学法语，想做电影，可能最初就是喜欢看，以及自己艺术写作能力还可以，有渴望表达的部分。小时候在家里能自由表达的空间比较少，我觉得可能最初原动力是对“表达”和“被看见”的渴望。

大四去交换，父母也不知道我要去读电影，当时网上找到的法国学电影的信息也不是特别多，我等于就是先去了，学不了再说。去了发现也没有那么难，有一些私立学校你交钱，然后语言过了基本就可以上。然后就去读了一个电影学校。在法国待了 8 年半：上学、恋爱、生活、工作。

我是 2018 年回来的，也是个挺大的决定。从 2016 年开始，每年我其实都接国内的项目，待三四个月……好像在国内，活会比较多样，薪酬也还不错，但我回来之后大环境就更糟了。那年年底我进了 Figure，一个纪录片公司，老板之前做社会性议题比较多。我之前在法国也是拿着小 DV 去拍的边缘人物，对那些还蛮感兴趣的。

2014 年，我开始拍一个法国男生，其实是他 PUA 了我，我开始反拍他，花了很多时间拍以他为主公的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事件和问题，然后给自己带来很多疑问。那个片子到现在也没有终结，因为我的认知一直在变化，我也不知道我要最后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

那个片子相当于出了一个粗剪，但是事我一直惦记着，回国之后正好赶上国内 PUA 兴风作浪，我发现有一个女孩是反 PUA 的，就去拍她，也陆续拍了挺多国内 PUA 的组织，了解了整个国内 PUA 这一套系统，那些人背后的故事，还去了 PUA 公司，去拍他们怎么培训学员……这些给我打开了很多东西，也带来很多困惑。对人性的不理解，给我带

来很多痛苦。

简单说，当你开始怀疑反 PUA 的人也在 PUA 别人，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又比如一个人在 PUA 别人，但自己又处于极大的痛苦漩涡当中，看到这些，我就不知道怎么面对。

甚至我去拍 PUA 的那些人，站在他们的视角又能共情到很多东西。做 PUA 的老板面对我的镜头滔滔不绝讲了 4 个小时，通过他的描述，我看到了他的人生，肯定不是全部，但是有一些片段，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个人是这样来的，他在做这样一个事是因为什么。虽然在媒体看来他给很多人造成了很大伤害，但是在他的视角里面他又给人带来了福祉……无论哪个角色，都在自以为是的樊篱、欲望和痛苦的漩涡中挣扎。当摘下道德和法律的眼镜，要去评判谁，而又要去看共情谁？而我有什么资格和立场呢？我又是谁呢？这一切令我难下决断，决定暂停一下。

PUA 就是 Pick Up Artist，所谓搭讪达人……这里面会带有一些欺骗性的东西，或者说是跟我们以往的亲密关系的模式不一样。创造 PUA 的这个人，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糟糕，他甚至有双向情感障碍，其实他在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认可、社会价值和愉悦感。

PUA 这个事情有点像吸毒一样，因为给人刺激很强，然后又感觉自己在掌控当中。所以当事人往往也是一个受害者……这就说远了……你刚才提到说怎么界定，有女孩受了伤害，身体上、精神上、财产上……有的人他有一些反社会人格，或者说他自己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事的时候是没有意识的，或者说 90% 的潜意识，就像“我有掌控的需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要这样做”。

这是我拍的片子之一。我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包括我人生中很重大、花了很多精力去消化和探索的东西。但 PUA 在我生命中还是造成一个挺大的影响。其实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我感觉我是被隐瞒、被欺骗的。

那么多事儿，我只能说我会好奇……很多时候是出于好奇，以及我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绝大部分人对 PUA 会有的反应，要不然就是远离他、删除他，要不然就是骂他，但是我就会在这些情绪之后，决定拿着机器来拍他，并且让他成为我的一个主角，然后回国之后又开始探索更广阔的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里面更多是（出于）好奇心。

我想知道为什么。虽然他做了这个事，对我造成所谓的伤害，但是背后是什么原因？说跳出“小我”的恐惧和愤怒也好……我觉得我可能还有一些冒险精神，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恐惧，甚至生命中都不会发生这种事——就是这个人找你聊天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说话，那这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

他跟我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地铁上，他走过来跟我说，“在巴黎人们彼此都不交谈，但是我想跟你说话”。这句话就吸引了我，然后就有了后续的一切，可能很多人就不会上钩，我就被勾住了。

他会有很多浪漫的东西，但这浪漫背后有很大的目的性。他一天会跟二十几个、上百个人说这样的话。我以前会比较单一地觉得，这个人就是好的，那个人就是坏的，后来慢慢我意识到，人有非常多的面向、层次和需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相信他是认真的，但是同时，他也有“捕猎者”的那部分。天使和魔鬼的部分是共存的。

他同意我拍他，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搭讪半年还是一年了，从一个月都没有人理他，到后来可以一天睡三个妹子，但他到了瓶颈期……虽然有所谓的“成就感”，但是当中也有倦怠。我觉得是作为人性本身，对真正情感和连接的需求，因为他这种方式，其实是把自己和他人都工具化了，虽然可以得到一些快感——就是那种欲望的实现——但是欲望的黑洞会越来越大，无法填满，带来更多的痛苦。

他搭讪我那会儿开始拍一些人，他想自己做一个网站教别人（PUA），然后他不会剪辑，他说，这些素材你能帮我剪辑吗？我说行。其实我拍他，是在我发现他偷拍我之后。我把他约到我家，说你是不是在偷拍我？他的手表、纽扣，包括他的打火机，全都是隐形摄像机。然后相当于我们之间就有一个揭秘，他看见我看见了他这部分，我也没有愤怒，可能我给他了一种安全感，以及我开始拍他的时候，怎么说，他是很渴望被看到的，然后他童年也经历了一些东西……从功利角度，他要我给他剪片子，和同时心理上的“被看见”，和他的表演人格被关注，这两部分都得到了满足。

我对这人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拍的 99% 全都是亚洲女性，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我会想（这是）为什么？我们亚洲女性就很容易屈服？不容易表现愤怒？或者是跟法国女人有什么区别？这里面也有性别议题，也有文化差异，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后来我们有一个冲突，我做完片子给他看了，他突然意识到我对他是这样的视角，挺受刺激的。他可能觉得我还挺认可、支持他，因为我一直没有表露愤怒和其他情绪，一直是比较中性的态度。

他愤怒之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自我调整，后来提出说他要做这个片子的制片人，并且

占的比例比较大，虽然这片子不可能赚钱，但是他的这种要求我是无法接受的。那个事就谈崩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就回国了。又过了两年，我又联系他，问他近况，他又有变化，说要去乌克兰和他的一个伙计一起去搭讪妹子……然后他又想被拍，我回法国的时候就又拍了他在法国的生活，拍了他去乌克兰的经历。

这个片子有点私影像……我们彼此见证着一些成长和冲突，也会经常聊天，不总是天天拍。有时候他也会参加我家的一些聚会，也认识我男朋友，然后我们一起也会有一些活动，是这种关系……其实我是想用这种方式促进他对自我的一个认知，后来我意识到我其实无法通过自己或者一场拍摄去改变一个人，以及一个人的改变是很慢的，可能是螺旋上升的……

最后没把它弄成，有一部分伦理原因，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但是让这个事情一直推动到现在，是我的好奇心。

**Q: 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从外部事务来讲，Circling 和未来要做的死亡咖啡馆。

**Q: 你觉得死亡咖啡馆跟 Circling 很像，那它有趣的部分对你来说是什么？**

A: 一个是它的主题更专注。可能还是终极问题，就是人从哪来到哪去，你怎么面对死亡焦虑。如果我可以直面死亡焦虑，我人生会有什么不同？是否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我想把这种探索也与更多人分享。

再有一个，我猜想是我到大理之后，我可能会想要有固定的活动，而不只是去参加别人的活动。我自己建一个基地，以我为原发点在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以让我与他人产生很深的连接，也多多少少对人有影响和启发。当然启发不是目的，是一个可能性。

**Q: 你目前有什么挑战吗？**

A: 一个参加 Circling 的朋友提到过，深入之后你会更敏感，因为你跟自己的关系更近了，而且你会遇到更多的人。这个接触深入的时候很容易刺激到你自己本身自带的问题，这又是机遇又是挑战，你要非常专注密切地去处理很多问题，你要准备去面对自己，而且很多时候看到阴暗面，是会有恐惧和痛苦的。但与此同时，因为有团体和知识，你的这一部分也是有地方可以安放，相对还是说一个安全的空间。

**Q: 推荐一个有意思的人来接力？**

A: 谷来，她在进行非常多的探索，占星、circling、舞蹈、生食、禅修，刚刚准备去徒步。对我来说，“精神 / 灵性探索”是极具公共性的，是人类历史的一条重要隐线。在幽雾中前行的个体，值得被看见。



杨櫻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八，2023.04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